

学术研究

郭沫若題

Academic Research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主 编：叶金宝

副主编：郭秀文 罗 萍

学术研究

(1958年创刊)

2023年第4期

总第461期

出版日期：4月20日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的关键意蕴、时代价值与当代建构

梁军 邱雪 1

哲学

精神分析视域下主体的嬗变逻辑

——齐泽克与福柯主体观的比较分析与批判 孔明安 石立元 8

“显现”概念的现象学位移：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马成昌 16

从赫布定律到深度学习理论的发展

燕燕 23

有德性地论证：论证研究的德性进路探析

廖彦霖 32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如何实现现代城市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

——基于广东省珠海市、中山市儒家文化资源的调查 薛晓源 李晓辉 39

政法社会学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

从资源分配到资源创造：再分配逻辑下的省内对口帮扶

——基于广东的实践 岳经纶 吴永辉 44

·技术与社会·

数字鸿沟及其跨越：一种技术公共性重建的实践理性视角 袁祖社 53

在线喂养：基于知识再生产的数字鸿沟视角 马中红 孙黎 59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中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框架性分析 李福林 67

经济学 管理学

公司治理发展历程、新兴领域及未来展望 姜付秀 王莹 马嘉 72

重点大学教育回报：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的实证研究 刘生龙 张钟文 江克忠 81

各学科室电子邮箱：

哲学 gzphil@126.com

经济 gzecon@126.com

政法 gzpol@126.com

历史 gzhist@126.com

文学 gzliter@126.com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量化分析

谢莉娟 万长松 **89**

撤县设区是否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李尚蒲 程丹 钟文晶 **97**

历史学

从细节看抗战：华南正面战场若干具体史实之探讨

左双文 曾钰雯 **105**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

——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尉佩云 郝平 **123**

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研究

——新的转向、方法与议题

杨凡 **131**

文学 语言学

关于《世说新语》元刊本的几个问题

宁稼雨 **142**

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及其变革

吴肖丹 **153**

稀见日藏与美藏和刻本“小说三言”考论

花宏艳 **162**

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对罗兰·巴特“中性”思想的启示

张静 **170**

英文摘要

177

CONTENTS

No.4, 2023

The Key Implication, Times Value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Initiative Spirit	Liang Jun and Qiu Xue (1)
The Transmutation Logic of Su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f Žižek's and Foucault's Views on Subject	Kong Ming-an and Shi Liyuan (8)
Phenomenological Displacement of the Concept of Manifestation: From Husserl, Heidegger to Arendt	Ma Chengchang (16)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from the Idea of the Hebbian Learning to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Yan Yan (23)
Argue Virtuously: The Virtue Approach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Liao Yanlin (32)
How to Achieve Creative Effe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Modern Urban Culture an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on Confucian Culture Resources in Zhuhai City and Zhongshan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Xue Xiaoyuan and Li Xiaohui (39)
From Resource Allocation to Resource Creation: Intra-Provincial Paired Assistance Under the Logic of Redistribu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Guangdong's Practice	Yue Jinglun and Wu Yonghui (44)
Digital Divide and Its Bridging: A Practical Ra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echnical Publicity	Yuan Zushe (53)
Online Feeding: A Digital Divide Perspective Based on Knowledge Reproduction Based on Policy Map Data	Ma Zhonghong and Sun Li (59)
The Framework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ve Legal Relations in the Cod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in China	Li Fulin (67)
Corporate Governance: History, Emerging Fields and Future Research	Jing Fuxiu, Wang Ying and Ma Jia (72)
The Impact of Major University Education on Personal Prospects	Liu Shenglong, Zhang Zhongwen and Jiang Kezhong (81)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ublic-Owned Economy in Circulation Field	Xie Lijuan and Wan Changsong (89)
Does "City-County Merger" Hinder the Arable Land Acquisition? ——A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Li Shangpu, Cheng Dan and Zhong Wenjing (97)
Interpret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from the Details: A Discussion of Some Specific Historical Facts on the Center Stage Battlefield in South China	Zuo Shuangwen and Zeng Yuwen (105)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Thinking ——Centered on JörnRüsen	Wei Peiyun and Hao Ping (123)
The Masculinit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West ——New Directions, Methodologies and Agendas	Yang Fan (131)
Several Issues Regarding the Yuan Dynasty Editions of <i>Shi Shuo Xin Yu</i>	Ning Jiayu (142)
The Ukiyoe of the Water Margin and Its Art Change	Wu Xiaodan (153)
Research on the Rare Book of "Xiaoshuo Sanyan" of Japanese Editions in Japan and America	Hua Hongyan (162)
The Enlightenment of Benveniste's Linguistic Theory to Roland Barthes's "Neutral" Thought	Zhang Jing (170)
English Main Abstracts	(177)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的关键意蕴、时代价值与当代建构^{*}

梁军 邱雪

[摘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的明确要求，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历史主动精神的鲜明体现。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命题在于人如何对待历史，尤其是如何发挥历史主体作用、推动历史改革发展。其关键意蕴可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历史主动精神的哲学基础及唯物史观逻辑；二是在客观规律和主观目的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主体意识；三是在普遍趋势和具体国情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历史趋势；四是在政党领导和民众活动的辩证统一中建构实践力量。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坚定历史主体自信、优化历史实践方式、加快历史发展进程，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发展。据此，历史主动精神的建构应从深化唯物史观教育、历史趋势激发、夯实“历史合力”的实践基础等方面持续用力，运用好历史主动精神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

[关键词]历史主动精神 唯物史观 意识形态 历史实践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01-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同志要“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同时强调“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以更加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②历史主动精神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范畴，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在奋力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上，需要自觉赓续发展“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其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作用。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历史主动精神的关键意蕴

总体而言，“历史主动精神”是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具体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科学精神品质。有学者将其意蕴概括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立足所处时代条件和历史方位，自觉适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科学谋划历史宏图，勇担历史使命，主动开辟未来、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品质。”^③但需要进

^{*} 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引领力内在机制优化研究”(20VVSZ02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梁军，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邱雪，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49)。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

② 《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 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4日第2版。

③ 侯衍社：《历史主动精神的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

一步追问的是，人们如何科学地实现“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自觉适应历史发展大势”和“充分发挥主体能动性”。对此具体机理的揭示，有助于深入把握“历史主动精神”丰富意蕴的关键方面。

（一）历史主动精神的哲学基础及唯物史观逻辑

每一个时代具有革命特征的精神形态背后，都有着深刻反映时代命题的哲学理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历史时刻，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的提出不仅映射着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生动实践，也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之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与历史主动的命题相隔万里。正如恩格斯指出：“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寻找，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①在这种唯心主义哲学的历史观下，历史主动是一个伪命题，历史主动精神是出现在遥远海岸线上的海市蜃楼。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观上实现了变革”，^②即“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实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③正是在这个理论的重大发现之上，唯物主义的哲学进入了人类社会，进入了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体系的第一公理。在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条公理被称为唯物史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历史主动命题以及历史主动精神，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转化。

（二）客观规律和主观目的相统一的历史主体意识

“历史主动精神”的预设前提是历史主体意识的建立。在百年来“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历史主体意识的基础地位，严格遵照唯物史观要求，着力于坚持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目的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④一方面，应严格根据历史规律设定历史发展目标（客观目的）。“历史主动精神”不是主观任意，而是在历史规律及其所规定的历史趋势下的“有限主动”。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坚持历史客观性，不能将自身主观意志凌驾于客观历史之上。只有自觉地将自我历史发展目标或实践目的置于客观现实之上，如实反映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才能确保由此形成的“历史主动”取得预期成果。我国既往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实践等一系列重大历史决策就是对历史规律客观要求的遵循与反映。另一方面，应通过科学的历史发展目标（主观目的）优化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历史规律的展开过程非但不会排斥人们的主观诉求反而以此为重要表现形式。其根本逻辑在于，如果人们的历史发展目的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与客观规律及其趋势保持一致，那全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历史“合力”方向就能在最大程度上趋近历史发展方向。历史规律的表现过程将因此更为突出“必然性”，并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⑤由此，历史才会真正显现为人们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历史的变迁也才会真正显现为群众的事业。

综上可知，“历史主动精神”内涵着一种高度科学的历史主体意识。它促使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合乎实际地认识到自身的历史主体价值，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主观能动性的边界。这种理论上的清醒又促使其形成历史主体自信。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23页。

④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三）普遍趋势和具体实际相统一的历史趋势研判

“历史主动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关于未来趋势及其实现方式的研判。只有在历史趋势的激发牵引下，这种潜在的“历史主动”才能被赋予具体内容。因此对“历史主动精神”关键意蕴的分析必然要涉及对其历史趋势研判机理的揭示。结合百年来“历史主动精神”在中国的建构与运用来看，这一过程的重要经验是遵循唯物史观的要求，将经典作家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普遍趋势与我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在两者的辩证统一中具体又不失深远地把握我国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趋势。一方面，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为总体牵引。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之时，推翻旧政权、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指引。虽然在此后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难免遇到各类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大众都没有否定这一趋势的必然性。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①坚持这一普遍趋势的根本价值在于：既为“历史主动精神”提供总体性和根本性的内容指向，便于展开长远谋划，又为之提供富于历史纵深的长远牵引。另一方面，以我国国情为现实依据。“两个必然”的普遍趋势是从宏大尺度对人类历史总体走向进行一般性揭示。但必须看到，该普遍趋势在个别国家及其特定历史时期，都涉及结合具体情况的具体展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较低，肩负着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和实现现代化的双重使命，因此更具特殊性。所以，只有切实立足我国国情，才能准确揭示我国社会在特定时期的具体趋势，具有充实内容和坚实现实依据的“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得到有效激发。

可以看到，这种辩证统一从根本上保障了贯穿百年的“历史主动精神”能够紧密扎根于我国各阶段的历史现实，并切实转变为富于操作性的路线方针政策，而非仅仅停留于抽象的理念或空洞的激情，同时又以其深远的历史格局而保持长期稳定和连贯统一，在最大程度上规避了历史断裂或倒退。

（四）政党领导和民众活动相统一的实践力量建构

“历史主动精神”的最终形态是变革历史的实践力量。只有从主体内的精神转变为外在实践力量，“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得到完整展现并切实推动历史进步。该转变环节的主要内容就是多元主体在该精神驱使下结合成推动历史变革发展的强大“合力”。我国百年来的“历史主动精神”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以建构和运行，所以对“历史主动精神”关键意蕴的揭示就必然关涉对这两类力量的统一机理分析。一方面，将政党领导视为形成历史变革力量的重要保障。在现代社会中，政党是将社会成员有效组织起来开展实践活动的必要条件。对于坚定不移推动历史变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这一条件更为凸显。在过往的“历史主动精神”及其实践力量的建构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重要的先锋引领和组织领导的作用。这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自觉代表最广大民众的历史变革诉求，基于对历史规律和历史趋势的科学把握，从思想理论和精神面貌上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主动”的引领；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心骨，通过科学的历史实践方案及其部署安排，将广大民众有机组织起来，协同参与到不同时期我国社会的变革活动之中，形成巨大历史推动力。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难以有效凝聚为整体、形成变革历史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将民众活动视为形成历史变革力量的基本依托。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无论是“历史主动精神”在全社会的建构，还是相应实践力量的形成，都离不开人民大众作为主体力量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历史就是人民不断追求自我解放的过程，历史变革的规律与趋势内蕴于人民的群体性实践活动之中。可以说，人民群众自身的活动中蕴含着“历史主动”的初始精神形态，同时也在较为自发的程度上展开着变革历史的实践活动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群体力量。我们视其为历史变革的基本依托，就是尊重其“本”“基”“源”地位，从根本上确保“历史主动精神”及其实践力量的科学有效。

总之，在“历史主动精神”转化为实践力量而最终成型的过程中，内在要求对政党领导和民众活动

^① 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求是》2021年第22期。

两种关键力量的有机整合。两者的辩证统一有效解决了科学理论、先进制度、正确道路和最广泛社会动力的深度融合问题，克服了个体自发与感性直观社会运动的弊端，推动了具有广泛社会基础与科学实践指向的现实历史动力的形成。

二、历史主动精神的时代价值

总体而言，“历史主动精神”的主要价值在于充分调动全党全民族的历史主体意识，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①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但在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实践环境和思想态势，“历史主动精神”的具体价值亦有所不同，带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 坚持“两个结合”，在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时指出，一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③必须承认，没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道路可能面临更多的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而具有前瞻性的科学理论恰恰具有准确的判断力，为党的事业指明方向。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照搬，机械地模仿，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事求是地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处在新的历史方位。虽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也面临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科技创新、金融风险、民生保障、生态环境等挑战，存在“一些党员、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本领不强、实干精神不足”，以及“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等问题。应对这些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着眼现实问题，与时俱进推动理论创新，更好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二) 坚定历史主体自信，摒除历史虚无主义干扰

提振全党全民族的历史主动精神有助于坚定历史主体自信，增强唯物史观信仰。虽然在多年来唯物史观的宣传教育下，我国民众普遍形成了对历史主体的基本认识，但还没有更充分地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自觉意识。^⑤导致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规律不可能被很精确地阐述和量化”。^⑥以往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在不同程度上的曲折表现又将此放大，造成了人们对个体实践之于历史演进的“弱效”或“无效”判断。而历史主动精神的提出、阐释与宣传教育，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与有效克服。历史主动精神有助于更为透彻地说明个体实践与历史演进、主体意志与历史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且还指涉着现代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奋力投身历史运动的客观事实，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这必将有助于坚定历史主体自信进而强化唯物史观信仰，使得自主自觉地推动历史变革“成为人们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5页。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6页。

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7页。

⑤邹诗鹏：《虚无主义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1页。

⑥[南斯拉夫]米哈依洛·马尔科维奇：《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论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曲跃厚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3页。

对某种生活目标与社会理想的理性化追求”。^①历史主体自信的恢复并增强，能够从根本上摒除历史虚无主义干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所以在一个时期以来能在多个领域以不同形式反复泛起，其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历史主体意识弱化。当前强调历史“主动”精神，可以说直指该问题的症结。这将有助于转变人民对待历史规律的消极态度，增强其历史归属感，进一步促其深刻认识到个体实践与历史规律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树立深入探究历史规律并加以运用的自信与自觉。随着人的历史主体意识重新确立并趋向充实浑厚，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各类消极思潮自然难以再轻易渗透。

（三）优化历史实践方式，增强全社会向心力与凝聚力

在向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明确提出并着力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有助于优化历史实践方式。恩格斯的合力论指出，历史发展变革就是各成员“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②推动的结果。在缺乏历史自觉时，人们的出发点只是且只能是他们自己，由此形成的合力是“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③恩格斯为此强调，这种“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的状况只是“到目前为止”，^④并非人类历史实践的永久或必然形态。反之，随着历史自觉意识的提升，人们的实践就能逐步摆脱盲目自发状态，以一种立足总体历史目标而自觉自主、科学分工且有机结合的方式形成合力、推动历史进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动历史变革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取得辉煌成就的当下，以更为自觉的方式建构历史合力已具有充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前明确提出并大力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势必有助于全面激发并科学导引广大党员与人民群众的历史自觉意识，有力推进当前我国历史实践方式的优化。在历史实践方式优化的同时，我国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亦将显著增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在当前强化历史主动精神，并据此开展具有较强组织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历史实践，有助于显著减少历史自发性和集体离散性思想观念的客观现实基础，增强全社会在实践方式及思想观念上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此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和持久的精神动力。

三、历史主动精神建构的主要路径

历史主动精神体现着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内容。历史总是具体而现实地向前发展，历史主动精神的境界、状态及其面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并因此对应着不同的建构路径。我国当前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⑥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斗争和历史机遇，呼唤着更为强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必须结合时代特征予以推进。

（一）围绕“历史主动”深化唯物史观宣传教育

历史主动精神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要求将其牢固树立为全党全民族的主导精神。其中关键在于深入理解“历史主动”。“历史主动”是历史主体意识在高水平状态下的必然体现，以唯物史观为基本理论依据与根本叙事语境。由此，当前的基础性工作是围绕“历史主动”深化唯物史观相关理论的宣传教育。

首先，要注重揭示“历史主动”的理论内涵。理论清醒是政治坚定的前提。把握“历史主动”的理论实质，是在全党全社会牢固树立“历史主动精神”的必然要求。其关键是指明“历史主动”是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坚持与创新。就坚持而言，“历史主动”以人类历史客观性、普遍性、发展性，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历史变革的实践本质等唯物史观原理为根本依据；就创新而言，“历史主动”突出了人们在历史演进发展中的能动性，主张人们应积极探索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担当历史使命，在政党领导

^① 邹诗鹏：《虚无主义研究》，第4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5页。

下有序开展历史变革实践并不断优化创新。

其次，要注重说明“历史主动”与“时代机遇”的辩证关系。“历史主动”不是个体自发行为，而是在掌握历史规律即“必然”前提下的自主自觉。要深入理解并形成科学的“历史主动精神”，必须准确把握“历史主动”与“时代机遇”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历史主动”是“时代机遇”下的主动，是在规律指导和趋势牵引下的主动；另一方面，“时代机遇”是“历史主动”的实践结果并以其为重要支撑。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这种关系历史“质变”的重大节点并不经常出现，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把握并有效发挥主体作用，就会贻误时机，阻碍历史发展进程。

最后，要注重说明“历史主动”的实现方式。“历史主动”强调发挥个体历史积极性，投身历史实践。但不同个体的参与方式存在差异，尤其在关乎历史发展的政治经济变革这一核心任务方面存在着距离与作用的较大区别。不能狭义理解“历史主动”，仅仅将其局限于直接的、领导的、规划设计的、批判的实践活动。只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统一部署规划积极开展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历史主动”。同时，“历史主动”不是抽象的精神状态，而是对应着许多具体现实要求，如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三个务必”“六个必须”“五个必由之路”。只有对此加以坚决贯彻，才是对“历史主动”的真正践行。

（二）充分发挥“历史趋势”对全党全社会的激发作用

历史主动精神不是抽象“概念的‘自我规定’”，而是人们在面对客观现实及其所昭示“历史趋势”时形成的具体超越意识，也就是形成具体的历史超越目标和历史超越方式，以及具体的历史超越规划。只有涵摄具体内容，历史主动精神才能真切指向现实，也才能因其客观现实性而呈现为理性化的自觉。因此，必须重视发挥客观现实所昭示“历史趋势”的激发作用。

首先，要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揭示总体历史发展趋势。从人类历史的层次来看，我们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其特点主要包括：虽然资本主义制度还占据世界主导，但其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两制关系及其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①美国对全球的单极化主导能力颓势已显，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崛起，多极格局更为明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被注重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格局取代；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全球政治、经济、生态等领域日渐失去人心，注重团结协作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日渐成为共识。面对以“东升西降”为最大特征的总体历史趋势，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有所作为。

其次，要立足我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各项成就揭示我国历史发展趋势。历史趋势不能凭空形成，总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上取得其必然性。^②我国当前之所以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所依托的现实条件主要归结为两方面。一是近代以来我国历史进程所呈现出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持续向好势头及其所造就的历史积累，包括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等根本前提，以及物质基础、思想理论、制度体制和宝贵经验等现实成果。二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包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成果。由此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局面，塑造了各领域各方面的新发展气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③使之更具现实性与必然性，因而“不可逆转”。

（三）依托“历史合力”形成历史主动精神的实践基础

历史主动精神的建构从根本上离不开“历史主动”实践的展开。所以，当前必须要基于党的领导和民众活动两大根本力量，形成结构合理、持续稳定的“历史合力”，并通过特定的实践结构与机制设计，架设个体日常实践与历史变革实践之间的贯通之路。

① 刘建飞：《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及两制国家关系》，《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首先，要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①其中关键就在于党能立足全民族利益、站在大历史角度，为整个民族的未来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弱化或否定党的领导，就会直接影响整个“历史合力”的方向正确性，进而影响我国未来历史进程。而且，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并确保该“历史合力”方向正确，才能将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形成有机组织并高效运转。因此，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当前建构高水平“历史合力”的根本前提。

其次，要以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抓手将全社会有机高效地组织起来。建构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基础条件。围绕该体系的政策制定、制度建设与部署安排等构建工作，成为将广大民众有机组织起来参与历史实践尤其是宏大历史目标建设的重要路径。其中制度建设是重点。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特点，是“历史合力”的相关组织与结构得以形成的重要保障。为此当前应以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总体目标，不断优化完善治理体系建设，在推动新时代“历史合力”建设中全面打通普通民众参与历史实践、感知历史演进的具体路径。

再次，要在实践操作环节重视“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宣传与方案设计。“共建共治共享”是在实践操作环节广泛调动和凝结社会力量的重要理念。它不仅能够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增强各方面的团结协作意识以及责任主体意识，还能作为一种操作理念贯彻落实社会治理方案，是建构“历史合力”的微观结构或现实基础的关键依托。而且，“共建共治共享”有助于广泛调动参与成员的能动性，为群众智慧的发挥与基层实践探索提供充裕空间，使得相关政策的实施与制度的运行更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继而确保了“历史合力”的活力和发展潜力。

最后，要利用好优秀文化的思想纽带作用。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是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发展活力的最深沉最持久力量，是将各成员彼此联系起来、与历史过往联系起来的重要思想纽带。当前建构强大的“历史合力”必须重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一作用。应充分利用数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各类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知行合一等，还要注重对百年党史中所积累的优秀文化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运用，尤其要运用好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源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四）坚持好运用好历史主动精神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②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历史主动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性论断。贯彻历史主动精神必然要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做到“六个必须坚持”。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本质属性基础上坚持人民至上；在立足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做到“四个自信”，坚持自信自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的前提下敢闯敢干，坚持守正创新；在着力破解难题的过程中坚持问题导向；在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战略决断中坚持系统观念；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坚持胸怀天下。历史主动精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大历史”视角，立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放眼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从唯物史观出发总结凝练的理论成果，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中闪耀灿烂的理论光芒。

责任编辑：王冰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②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8-19页。

精神分析视域下主体的嬗变逻辑

——齐泽克与福柯主体观的比较分析与批判^{*}

孔明安 石立元

[摘要]主体问题是近现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和精神分析理论都是打着反对先验理性主体和存在主义主体的旗号而发展壮大的。但是,以福柯为代表的后政治主体和以拉康、齐泽克为代表的精神分析主体之间仍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差异。齐泽克精神分析视野下的幻象主体和驱力主体是用一种分裂的主体理论彻底打碎了和谐、完满的古典主体观,而福柯的主体观却不知不觉回到了这种古典思路。齐泽克和福柯在哲学主体观上的根本差异,同时也意味着二者在主体的异化及其解放这一问题上的不同思路。研究这一差异将有助于深化对现代主体的理解,也为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哲学的重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后政治 自我伦理 幻象主体 驱力主体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04-0008-08

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主体问题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无论是在19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哲学,还是二战后盛极一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始终未能逃脱“大写的人”这一主体性哲学的窠臼。如果说前者将主体的先验理性吹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么,后者则将“个体主体”的自由意志提升到了空前绝后的地位。尽管这两种哲学貌似势不两立,但无疑都有制造出一个唯我论的自由主体的嫌疑。然而,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则试图驳斥或消解主体之存在,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近现代主体观的道路,即反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中隐含的“大写主体”。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学也对“大写主体”举起了反叛的大旗。可以说,在反对“大写主体”这一点上,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和以拉康、齐泽克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哲学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由于在路径和立场上的微观差异,二者在主体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景观和特征。一方面,福柯早期重点关注的是结构主义及其话语理论,强调了话语中的主体形成以及主体的被动性。他将主体置于话语之中的做法甚至被当时法国的媒体描述为“主体死亡,结构登场”。在福柯意识到自身理论的缺陷之后,为了将主体从外在的权力知识网络中解放出来,他又走向了自我修炼的审美主体。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风靡法国和西方学术界的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直至当今声名大噪的齐泽克意识形态文化批判理论,都反对法国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也开始同以福柯为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16ZDA1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孔明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石立元,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微观政治学渐行渐远。尤其是当今西方左翼学者齐泽克就主体问题对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家，诸如拉克劳和巴特勒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展现了精神分析理论别具一格的主体理论。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主体维度的分析和批判：首先，我们简单勾勒一下福柯前后期的主体观点及其变化；其次，我们从幻象和驱力这两个维度对齐泽克的主体观进行简要的概括和总结；最后，在对福柯与齐泽克的主体观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我们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二者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批判。

一、从话语主体到伦理自我

首先，福柯反对先验主体和存在主义的主体，主张历史主体，认为主体非但不是自主的，相反，它是知识—权力关系的产物。福柯的这一观点在其早期的著作，如《词与物》《知识考古学》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以及《规训和惩罚》中都表露无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这是由于福柯的思想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思想潮的氛围之中，当时在法国流行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对福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法国盛极一时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也刺激了福柯反主体思想的形成。众所周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形成于对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对抗和反对之中，同样，作为阿尔都塞的弟子，福柯在早期也坚决反对萨特的存在主义。在萨特那里，主体被视为世界意义的创造者，这在他的名言“存在先于本质”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然，与康德的先验哲学不同，萨特的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及其意义，这一主体不再是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主体，而是存在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主体。所以，“存在先于本质”的核心并非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先验本质及其意义，而在于主体的生存及其选择，如此一来，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就取代了康德哲学的主体观及其哥白尼革命。

然而，上述两种主体观福柯都不赞同。按照福柯的理论，不存在康德认识论意义上的先验理性主体和萨特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选择主体，而只有作为知识权力建构的人或主体。换句话说，从来就不存在不受任何权力机制约束和规范的自由主体，现实中存在的都是结构中的主体，即“话语”主体。这一观点在福柯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得到了典型体现。在那里，福柯具体论述了主体与话语之间的关系。就如阿尔都塞提到的主体与意识形态的“质询”之间的关系一样，福柯将主体置于“话语”的构架之下。在话语的构架下，福柯分析了话语的结构及其“知识型”，并提出了知识的“断裂”的观点，形成了断裂的历史观，进而消解了自马克思主义以来有关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并深入分析了微观史学的“断裂”认识论。具体而言，福柯反对从目的论和整体论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类历史的知识，他关注的是作为话语的知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转换原则及其结果。从这一立场出发，福柯提出了基于断裂历史观的认识论秩序，即“知识型”。^①

正是基于对上述两种主体的反对以及对结构主义的青睐，福柯早期思想呈现出典型的结构主义特征。换言之，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每个时代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力“话语”或知识“话语”，主体非但不能主宰话语，相反，主体实际上就是这种权力装置或话语秩序的产物。例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列举了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癫狂主体的认知和处置方式因为不同的知识权力网络而有所不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癫狂者采取的是驱逐与医疗合一的“愚人船”形式；而一个多世纪以后，人们将癫狂者视为公共秩序的潜在威胁者，因而对其采取的是关押和禁闭的方式。因此之故，福柯提出了“人之死”^②的宣告，在一次访谈中，福柯说道：“使我感兴趣的恰是合理性的形式，人类主体通过这些形式关注自身。……而我则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主体怎样使自身成为认知之可能的对象，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通过哪些历史状况，以及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③在此，福柯认为人是知识的对象，但是

^①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前言第8页。

^②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译者前言第10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杜小真编选：《福柯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496页。

人却并非自由的存在者，就现实的具体的人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不受任何权力装置抑或话语秩序束缚的自由主体。然而，福柯的这种将主体淹没在结构中的做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不断遭到人们的反对和批判。在此情形下，如何回应人们对其“话语”主体的质疑就成为福柯面前的一个难题，因此，70 年代末的福柯开始了其在主体观上的“微妙”转向。这就是我们下文要谈及的福柯后期的主体观。

其次，福柯晚期的主体开始转向一种自我伦理的主体或自我调适的审美主体。福柯思想的这一重大转变始于 1979—1980 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对活人的治理”之时。他发现，在早期基督教心灵忏悔的考察程序中，“人们不只是简单地服从，而是可以通过陈述它来表明对自己的治理（即修身）是如何形成的”。^①此后，“关怀自身”“自身的技术”“自身的实践”等问题成为福柯关注的焦点，在对性经验史以及自身的技术的研究基础上，福柯提出了他的“生存美学”概念。福柯强调自古希腊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努力使生活艺术化”的实践智慧，而贯穿其中的关键思想，就是“人们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艺术作品的观念”。^②在此，生存美学的核心是“关怀自身”，要将“关怀自身”这一原则贯穿到个体的生活实践中去，就必然离不开一系列的技术、技艺、程序和策略，因此，生存美学也是“自身的技术”，即“为了使自身的生存提升到愉悦快感境界的实践智慧”。^③简而言之，福柯的生存美学力图使人的生活本身成为一件艺术品，这种审美化的生存活动要通过情感、思想、语言表达、生活格调等一切生活领域的修身、锤炼才能达至，在这种自我训练的过程中，生存本身成为一种不断超越和创造的享受快感的活动。

如果说福柯早期思想的主体是一种“话语”主体的话，那么，福柯晚期的生存美学所强调的则是一种自我伦理的主体，它指向的是自我的改变、创造、生成和超越，这与福柯对主体与真理之间关系的看法有关。在《主体解释学》中，福柯运用谱系学的方法对从古典主体到现代性主体的流变进行了考察。福柯说：“大致说来：在整个古代，尽管方式各不相同，‘怎样达至真理’的哲学问题和精神性实践（可以达至真理的主体存在的必要变化），这两个问题，这两个论题从未分开过。”^④古典的主体与真理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在福柯看来，古典的主体是残缺的、不完整的主体，而非现代的大主体。由于这种残缺性和不完整性，古典的主体不能直接通过“认识”获得真理，因此，修身成为主体获得真理的必经之路，即主体通过一系列自我训练的技艺来提升和完善自身，从而达到真理。显然，就古典时代的主体和真理之间的关系而言，真理被视为内在于主体之中。但是，这种非完整的主体观在塞涅卡提出“外在教学法”后逐渐松动。“外在教学法”意味着真理被视为是外在于主体的，因此，主体走向真理的通道也就随之出现了。而在紧随其后的基督教哲学中，有关人的主体思想则投射到上帝作为全知全能形象的描绘中。在现代性的主体观中，完满的上帝形象被大写的理性主体所取代，大写的理性主体开始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福柯说：“笛卡尔的方法指的是认识自己，至少是把它作为意识形式。而且，把主体自身存在的自明性作为通向存在的根据，这一对自身的认识（不再是以检查自明性的方式，而是以我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不可置疑性的方式）使得‘认识你自己’成了通向真理的一条根本途径。”^⑤在福柯看来，笛卡尔是真理史上现代的开端人物，在这一时期的主体与真理的关系中，大写的理性主体被认为有能力直接获得真理，而达至真理的途径就是认识活动。但是，真理本身并不能拯救主体，因为真理外在于主体，主体在对知识和真理永无止境的探求中却忽略和遗漏了改变自我这一目标，或者说，改变自身的努力在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中变成了认识的努力。为了拯救主体，福柯主张沿着古希腊时期的“关怀自身”的思路去为自身的改变进行各种技艺性的修炼，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生存美学”，即个体在生

① [法] 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译者的话第 4 页。

②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44 页。

③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第 401 页。

④ [法] 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第 18 页。

⑤ [法] 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第 16 页。

存实践中要像雕琢艺术品一样来打磨自身，要通过涵养德性、修持身性来不断地精进和完善自我。对福柯来说，真正的自我就是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自我训练和教化中创造和生成出来的，所以，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的美学。这里的审美不再是实现主体救赎的手段或工具，而是被提升到了人生意义或人生目标的崇高地位上，换句话说，就主体的生存活动而言，审美就是其目的。就此而言，福柯晚期的主体就是一种自我调适、修炼的审美主体。另外，因为生存美学要求个体在生存实践中将生活与美学融为一体，这种生活与美学的融合过程需要借助于一套自我操练的技术，因此，生存美学又涉及自我的教化和训练，这种主体无疑是一种自我伦理的主体。毋庸赘言，在福柯那里，每个人都要去发明和创造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将自己作为风格化的、独特的、个性的主体呈现出来，从而体现主体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总而言之，福柯后期有关自我伦理或审美的主体是在否定现代性宏大叙事的基础上提出的单个主体的一种自我调适的活动或行动。它既不同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先验主体，也不是回到存在主义的生存主体，而是在微观政治批判视域下主体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无奈的选择路径。对于福柯的这一转向，当代西方左翼学者齐泽克给出了明确的分析和评价，他指出：“不难发现福柯的主体观是如何进入人本主义—精英主义传统的。近乎完美地实现这一传统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通才人格’理想。‘通才人格’能够掌控自己内心的激情，并把自己的生活改造成艺术作品。”^①由此可见，齐泽克从其精神分析的视野出发，并不认可福柯这一后期主体观的转向，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幻象主体和驱力主体。

二、幻象主体的出现及其困惑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主体的看法与福柯的后政治主体有着明显的不同。当代西方左翼学者齐泽克在继承拉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深化了精神分析学说的主体理论。毫无疑问，齐泽克对主体的阐述是独特而深刻、复杂而繁琐的。这在其一系列的著作，特别是《神经质主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齐泽克的主体要区分为两个不同的维度，即幻象主体和死亡驱力的主体，二者既互相关联又不容混淆。现在，我们先从幻象主体谈起。我们可以看出，精神分析的幻象主体已经摆脱了福柯的那种后政治的主体，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主体道路。

根据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幻象与主体呈现为一种复杂的悖论性关系：幻象既是主体形成的关键要素，也是主体异化的原因，同时它还是主体不至于陷入彻底异化的避难所。众所周知，幻象是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同样，它也构成了齐泽克主体理论的核心范畴。那么，幻象与主体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对此，我们还是要诉诸拉康的幻象公式（\$◇a）来加以说明。

首先，主体的形成一刻也离不开幻象，幻象是主体形成的欲望—成因。这一点借助于拉康的幻象公式可以得到清晰的阐释。拉康的幻象公式的主体非但不是主动的、积极的、斗志昂扬的，反而是受制于幻象—框架的主体。换句话说，在精神分析看来，主体再也不是康德认识论中的那种先验主体，不是“仰望头上的星空和遵守内心的道德律”的理性主体，而是受制于幻象及其构架的主体。借助于拉康的幻象公式，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指出：“大他者是借助于主体自身之内的欲望的悖论性的客体—原因[a]，借助于假定隐藏在大他者内的这一秘密，捕获主体的：\$◇a。”^②也就是说，我们所体验到的社会现实是由幻象建构起来的，而主体本身也是在这种由幻象所支撑的社会现实中生成和发展出来的，正如齐泽克所言：“正是幻象—框架，决定着我们在现实中的活动，决定着我们在现实中的行为模式。”^③由此可见，主体在现实中的活动以及行为模式都是幻象—框架建构起来的，因此，只有幻象—框架才能解释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和活动，换言之，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幻象的产物。

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引论第2页。

②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8, p.44.

③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53页。

其次，主体是分裂的、异化的主体。在拉康那里，主体的首要特征就是分裂，它是一个被阉割的主体，一个“异化”的主体。拉康之所以用“划斜杠的 Es” (\$) 来标记主体，就是为了强调主体这一分裂的特征，它意味着主体是分裂的、虚空的、异化的和被阉割的。齐泽克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直接继承过来了这一观点。那么，主体何以是分裂的呢？齐泽克说：“一个更加矛盾的论点是，这个逃离了我的理解的离心的、坚硬的内核就是自我意识本身；至于它的地位，它是我无法触及的外部对象。”^①齐泽克的这一论述看似悖谬，实际上是在说自我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裂。那个逃离我理解的内核就是无意识，而无意识又是自我意识无法掌控的，所以，自我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分裂就是主体分裂的根源，这也使得分裂和异化成为主体无法规避的宿命。拉康和齐泽克的这一观点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有所不同。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有关劳动及其异化的观点，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现象。马克思认为，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异化是必须被消灭的现象，是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的必然步骤。^②然而，与马克思不同的是，拉康和齐泽克认为，人一出生进入社会，异化就与作为主体的人相伴而生，它是人无法摆脱的基本生存境遇。但人的这种异化又是有限度的，必须局限在幻象的框架内，因而，幻象既是人之异化的原因，又是保护主体不至于疯狂的有力屏障。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拉康和齐泽克所谓的异化并不能和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概念相提并论。但无论如何，澄清异化与幻象的关系至为重要。换句话说，脱离了幻象的主体就不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主体，而是会走向或成为一个“死亡驱力”的主体。因此，从主体的异化入手也是我们理解主体与幻象之复杂关系的钥匙。在此，一方面，由于幻象对主体的操纵实际上是通过主体的无意识欲望发生作用的，所以主体的生成或形成一刻也离不开幻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幻象的存在，主体才不至于彻底异化。

拉康和齐泽克的这一观点与通常意识形态理论并不相同。按照一般意识形态理论的观点，主体的内容是由为他提供象征性认同点、授予他象征性委任的外在的能指网络决定的。显然，通常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主体间关系的符号网络涵盖了主体的全部内容。也就是说，主体的全部内容都是由他者提供的，那么，主体的彻底异化就是无法避免的。为了避免这种传统意识形态主体理论的缺陷，齐泽克就不得不求助于精神分析的幻象概念。他说：“这里存在一种可能，对于主体来说，即使在大他者、异化的象征网络之外，主体依然能够获得某种内容、某种实证的一致性。这种其他的可能性是由幻象提供的：将主体等同于一个幻象客体。”^③所以，对齐泽克来说，主体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符号网络为主体提供的象征身份，这是传统意识形态主体理论所刻意强调和主张的；其二是在主体的欲望这一实在界中，主体的幻象客体为他提供了实证存在的一致性。以庄周梦蝶这个故事为例，在庄子的欲望这一实在界中，庄周就是蝴蝶，蝴蝶就是庄周。为什么呢？因为蝴蝶为他提供了象征网络之外的实证存在的完整一致性。也就是说，蝴蝶既是庄周异化的原因，同时也是他规避彻底异化的依据。只有在梦想的幻象客体“蝴蝶”中，庄周才获得了真正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享受自己成为“蝴蝶”的怡然自得，从而规避现实生活中自己作为某种象征身份的彻底异化。在此，我们就见证了幻象不可或缺的功能：幻象既是主体分裂的原因，也是实现它与幻象客体同一之所在。就此而言，幻象与主体之间就呈现为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主体非但不能消除幻象，反而要依赖幻象来逃避现实世界的彻底异化。

总之，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无论是在主体体验到的社会现实中，还是在主体自身的构建与认同中，幻象都发挥着犹如轴心一般的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幻象与主体的存在密不可分，但是，这种幻象建构的主体无疑是误认的主体。

^① Slavoj Žižek, *Tarrying with the Negative: Kant, Hegel, and the Critique of Ideolog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66-67.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297 页。

^③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46.

三、驱力主体及其解放之维

从幻象主体的形成及其特征可以看出，精神分析的幻象主体与福柯的前后期的主体已经完全不同，是一种另类的主体。但众所周知，幻象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主体主要还是来自拉康的幻象公式（\$◇a），而并非齐泽克本人的独创。为此，齐泽克在拉康的幻象公式及其主体观的基础上，结合德国古典哲学，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具有激进解放性质的驱力主体。鉴于幻象与驱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还是需要先从幻象及其特征谈起。

首先，幻象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于为主体提供避免与“死亡驱力”遭逢的屏障。如上所述，我们已经论及了幻象与主体之间复杂的构成关系。可以说，拉康和齐泽克所谓的幻象并非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那种“天马行空、想入非非”的概念，而是带有某种“结构性”意蕴的精神分析概念。因此，幻象非但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异想天开”，反而“为我们的欲望提供了坐标，即建构了能使我们欲求某物的框架”。^①也就是说，不是作为主体的我或我们，而是幻象一框架建构了我们的欲望对象，以及教会我们如何去欲望。与此同时，齐泽克还指出：“幻象既是协调我们欲望的框架，同时又是对‘你想咋的?’的抵御，是用来遮蔽大他者欲望的鸿沟、深渊的屏幕。”^②这里，我们可以将欲望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幻象建构起来的欲望，另一个是大他者的欲望，前者是对后者的抵御。为什么呢？因为幻象本身就是对大他者的欲望的一种应答，即我们认为幻象建构起来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之所在。或者说，当我们沉浸在幻象建构起来的欲望中时，大他者的欲望这个令人焦躁不安的谜题就被忽略和搁置了。如此一来，幻象就作为屏幕将我们从大他者欲望的困扰中解脱了出来。那么，何谓大他者的欲望呢？齐泽克说：“通过幻象建构起来的欲望就是对大他者欲望的抵御，是对‘纯粹’的、超幻影的欲望——纯粹的‘死亡驱力’——的抵御。”^③由此可见，大他者的欲望是“纯粹”的、超幻影的欲望，是纯粹的“死亡驱力”，它并不是由幻象支撑的欲望，主体在这种欲望面前是无法做出让步的，因此，主体直接与“死亡驱力”遭逢就意味着主体沦为“死亡驱力”操纵的对象。例如，索福克勒斯戏剧中的安提戈涅、莫扎特歌剧中的唐璜都是遭遇“死亡驱力”的典型案例，他们的极端行为都只能用拉康的“涉及欲望不让步”这一有关死亡驱力的行事原则才能解释得通。正是在“死亡驱力”的支配下，安提戈涅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安葬兄长，唐璜宁愿被处死也不肯做出忏悔的姿态。

其次，死亡驱力是引导主体走向象征性死亡的强迫驱策的力量。齐泽克从“两次死亡”的概念出发，阐述了死亡驱力与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是齐泽克区分了主体的“两种死亡”。他说：“萨德的罪恶观暗示了两种死亡的区分：一种是自然死亡，它是生生死死的自然循环的一部分，是自然持续转化的一部分；一种是绝对死亡，它是自然循环自身的毁灭和根除，因而把自然从其自身的规律中解放出来，使自然不再受自然规律的束缚，为无中生有地创造新生命铺平道路。”^④齐泽克在这里提到了“两种死亡”，一种是自然死亡，另一种是绝对死亡。自然死亡就是生物学上的死亡，这是所有生物都无法逃脱的自然规律。齐泽克强调绝对死亡要打破自然规律以及无中生有，这实际上就是追求“永生”或者说“不死”。关于“两种死亡”，齐泽克还指出：“一者是真实（生物）的死亡；一者是真实（生物）死亡的象征化、‘清账’、象征性命运的终结。”^⑤如前所述，主体的象征身份是由象征网络为其提供的，因此，这里的第二种死亡，即象征性死亡，就是指主体被象征秩序彻底排除出去，象征秩序中不再有主体的生存空间。在我们所熟知的古典文学作品中，安提戈涅就是象征性死亡先于生物性死亡的典型例子，在她的生物性死亡之前，她提出安葬其兄长的要求违反了城邦的律令，她对这一要求歇斯底里的坚持使得她被排除在

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 164 页。

②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132.

③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132.

④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第 192-193 页。

⑤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p.150.

了城邦这个象征共同体之外；而在莎士比亚创作的《哈姆雷特》这部戏剧中，哈姆雷特的父亲只有生物性死亡，并没有象征性死亡，因为他生前从来不曾被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二是齐泽克通过揭示死亡驱力与上述“两种死亡”之间的关系来阐释了驱力主体的内涵。他说：“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驱力’之悖论在于，弗洛伊德以‘死亡’称谓它的对立面，称谓这种方式——不朽就是以这种方式出现在精神分析中的，称谓生命的神秘过度，称谓超越了生命与死亡、生成与溃烂的（生物性）循环的‘不死’冲动。”^①按照齐泽克对自然死亡和绝对死亡所做的区分，这里的“死亡驱力”显然属于绝对死亡，它并不是一种自我毁灭或自我死亡的意志，而是一种“不死”冲动，它要求摆脱生死循环的自然规律的束缚，为无中生有地创造新生命铺平道路。齐泽克的这段话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通俗地来说，死亡驱力作为“不死”冲动，打开了一个超越生死循环的第三领域，即活死人的领域，当主体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从象征框架中减除出来，进入活死人的领域，也就开辟了重构象征秩序的空间。因此，就齐泽克所区分的生物性死亡和象征性死亡来说，“死亡驱力”就是引导主体走向象征性死亡的强迫驱策的力量。

在莫扎特创作的《唐璜》这部歌剧中，男主人公唐璜在剧末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死亡驱力的绝佳例子。剧中的唐璜是一个充满诱人魅力，却厚颜无耻、到处寻花问柳的西班牙贵族。当他因斑斑劣迹最后要接受审判时，本来他只要做出忏悔的姿态，就可以不用遭受死亡的惩罚，但他宁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肯为自己的无耻行为做出任何形式上的悔过。他的这一选择就是死亡驱力的体现。如果将我们置于唐璜的处境之中，出于求生的本能，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认错和忏悔。但是，人除了求生的欲望之外，还受到死亡驱力的掌控，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正是死亡驱力迫使唐璜摆脱了求生欲望的要求，在他遭受生物性死亡之前，已经选择了象征性死亡。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唐璜拒绝了象征网络为其提供的任何位置或者内容。需要指出的是，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唐璜的行为就其内容来说并不值得称道，但从精神分析的理论出发，他的行为就其姿态来说具有伦理的价值和意义。他坦然面对自己作为好色之徒的欲望，宁愿被剥夺生命也不肯在这种欲望面前让步，这种不惜一切代价将自己的纯粹欲望坚持到底的姿态是精神分析所推崇的伦理原则，因而具有积极意义。

总而言之，“死亡驱力”作为人之为人的独特维度，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由于它的存在，人不是像动物一样本能地适应外在的环境，而是能够不断突破外在环境的限制，不断调整自己与外在环境的关联模式。它是主体的否定性力量的展现，即悬置象征网络，承受象征性死亡，进入介于两次死亡之间的领域，从而中止象征秩序的象征效力。

最后，驱力主体是不同于幻象主体的另类主体，也被称为“神经质的”（*ticklish*）主体或歇斯底里（*hysteria*）的主体。驱力主体与驱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拉康的驱力公式（\$ ◇ D）来表示。从精神分析的视野看，幻象主体与驱力主体并非截然分开的两类不同的主体，而是呈现为一种拓扑学结构的主体，二者是相互转换的。换句话说，“正常情况下”的幻象主体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偶然性”事件的境况下才会成为“驱力主体”。当然，死亡驱力的主体未必一定去“死”，但是他一定是一个无惧“死亡”、勇于接受命运挑战的主体。如古希腊戏剧中的安提戈涅式的主体，或者中国传统戏曲《梁祝》中祝英台的形象，她们都是典型的驱力主体。毫无疑问，齐泽克所谓的驱力主体是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的阐释。死亡驱力在齐泽克那里被提升到了主体的特有维度，成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死亡驱力的呈现直接例证了主体在本体论维度上的分裂特征，也表明了主体具有的激进否定性的力量。具体而言，死亡驱力体现了主体的非理性向度，体现了主体“决绝”的意志和“执拗”的性格，体现了主体“坚持的”（*persistent*）^②特性。齐泽克经常把主体的这一特征称为“恶魔之恶”，并将其与康德所谓的“根

①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季广茂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7页。

② Slavoj Žižek, *Less Than Nothing: Hegel and the Shadow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p.490.

本恶”加以比较。^①当然，我们并不能从“善与恶”这种二元对立的维度来理解齐泽克的“恶魔之恶”，而必须从死亡驱力的角度来加以把握。即在驱力主体这个层次，主体根本无法通过理性（这里，理性不过是幻象的代名词而已）来压抑或控制这种冲动，因而主体的分裂或不一致无疑在死亡驱力爆发的这一时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如果说幻象是人与动物区分的标志，那么在齐泽克那里，死亡驱力才真正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也是拉康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转向探讨以驱力主体为特征的“精神分析伦理学”的主要原因。齐泽克对拉康的这一后期转向极为认可，他明确指出：“在其最激进的层面上，‘做人’之所以为‘做人’，就在于不再一头扎进自己的环境，就在于服从某种自动机制，而自动机制漠视对适应的要求。归根结底，这相当于‘死亡驱力’。”^②死亡驱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有维度，它为人的本体论维度的自由提供了根本保证。当作为主体的人面临死亡或某种环境威胁时，主体不是进行自我调适，适应环境以驯服自我，而是罔顾死亡威胁和环境之逼迫，“执着而坚定地”迎难而上。这一点正是齐泽克与福柯在主体观上的根本差异之所在。相反，对于动物而言，动物与环境之间表现出“自我调适性”的特征。动物出于本能的需要完全依附于周遭环境，它们只能采取“适者生存”的策略。因此，死亡驱力作为人的天性中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倾向，使得人类能够打破周遭环境对人的限制和束缚，将人从被动地适应周遭环境中解脱出来，从而达到齐泽克所谓的“主体的解放”维度。

四、结语

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开始就不乏对自我的思考，而在以笛卡尔为开端的西方近现代哲学中，主体问题更是成为其核心问题。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表面上似乎在消解以“在场”为特征的主体性哲学，其实不过是把主体问题更加深入和复杂化罢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与以拉康和齐泽克为代表的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无疑都深化了我们对现代主体的理解。虽然二者在广义上都归属于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潮，但仔细考察，二者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一方面，福柯前后期的主体观可以说差异甚大，其前期对先验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反叛明显具有结构主义的色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尽管福柯本人一再抗拒自己被贴上结构主义的标签；另一方面，为了将其主体从结构中拯救出来，福柯后期反而回到了传统哲学的主体观，诸如自我教化、自我修身的伦理美学与生存美学。福柯后期的这一转向与当代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基础上重建现代交往主体表面上看似不同，但并无本质差异。对此，齐泽克在《意识形态崇高客体》中一开始就指出福柯与哈贝马斯是一枚硬币之两面。他说：“福柯的主体观是古典的主体观：主体是自我调停的力量，他能够调和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抗；主体是通过恢复自我形象来掌握‘快乐的用途’的方式。在这里，哈贝马斯和福柯是一币之两面。”^③齐泽克精神分析视野下的幻象主体和驱力主体与福柯的主体观有着巨大差异，前者用一种分裂的主体理论彻底打碎了古典的主体观，而后者却不知不觉回到了完满、和谐的古典主体中。这一差异及其比较将有助于深化对现代主体的理解，也有利于进一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主体观。在21世纪的当下，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既不是福柯那种结构主体或自我伦理的主体，也不是如齐泽克那般的精神分析维度下的幻象主体或驱力主体，而是追求人类解放与自由的，以及具有“实践”向度的革命的唯物主义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的主体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我们的世界；它不仅是个体意义上的，而且也是带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集体实践的主体。因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体观，并以此对福柯和齐泽克的主体观进行批判性分析就成为我们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一重大的理论课题任重而道远，不是本文在此能完成的。但是，指出他们二人的主体观与马克思基于阶级分析的主体观的根本差异及其不同道路选择，是我们重构马克思主义主体性哲学的重要基础。

责任编辑：罗 萍

^① 参见孔明安、石立元：《论驱力主体的生成与解放逻辑——从康德的根本恶到齐泽克的恶魔之恶的反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4期。

^②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视差之见》，第377页。

^③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引论第2-3页。

“显现”概念的现象学位移： 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阿伦特^{*}

马成昌

[摘要]“显现”概念是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现象学最直接的交汇点，他们都将“现象”的原初意义理解为“自身显现”，这既体现了三者在“回到事实本身”问题上的一脉相承性，也彰显了现象学理论谱系的相互关联性。但他们对显现内容的理解却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又充分体现了他们各自理论的自足性。胡塞尔强调“纯粹意识”之显现，将“什么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如何显现”的现象学问题，开创了现象学的哥白尼式革命；海德格尔强调“存在者自身之显现”，将“现象”从意识领域拓展至整个存在者领域，实现了现象学的存在论转向；而阿伦特则强调“人之复多性的显现”，揭示了现象学所隐含的公共维度，实现了现象学的政治转向。

[关键词]显现 现象学 胡塞尔 海德格尔 阿伦特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16-07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现象学思想的传承与分野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海德格尔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现象学的？他为什么将现象学视为澄清存在问题的唯一方法？胡塞尔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现象学之间的理论枢纽究竟体现在何处？这些仍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显性”关系早已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海德格尔现象学与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之间有着怎样的思想关联？阿伦特如何转化了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进而使其在公共政治领域获得新的意义？这种转化最终又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与矫正？阐明三者之间理论发生的内在机制，对于厘清整个现象学运动的理论谱系以及丰富整个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资源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本文尝试以“显现”概念为切入点，探讨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在如何理解“现象”问题上的理论勾连与思想分歧。

一、纯粹意识之显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就是对意识进行研究的科学，这里的“意识”就是纯粹自我意识，先验意识行为是构造一切的终极存在，一切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①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将胡塞尔现象学称为“意识现象学”。当然，这里的“纯粹意识”并非实体性存在，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关系方式或行为方式。^②早在《逻辑研究》中，胡塞尔就明确提出了现象学的无前提性，即

^{*}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海德格尔现象学对阿伦特政治哲学影响研究”(20ZXE24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成昌，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黑龙江 哈尔滨，150040)。

① [德] 埃德蒙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63页。

② [德]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60页。

不将任何实体性存在作为现象学的根本原则。《观念（一）》则进一步将这种无前神性原则发展为一种先验还原的方法，这一方法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自然态度的悬置，^①即悬置一切超验实体、外部世界以及意识本身的自在存在。其实质可以视为一种“去存在论化”（de-ontologize）^②的过程，而“纯粹意识”即是这种“去存在论化”的结果，它不是某种实体或对象，而是纯粹现象的显现——既对自身显现，也对其他一切存在者显现。通过对存在者的“去存在论化”，胡塞尔转换了问题的视角，即由“什么存在”的形而上学问题转换为存在者“如何显现”的现象学问题。现象不是与本原、实体对立的附属物，而是自身显现的一切，是事实本身。先验现象学使一切存在者成为现象，即事物显现为某种被构造的意义（Sinn），它将意识自身的显现视为一切非意识之物自身显现的前提。后期的发生现象学更是将内时间意识视为一切意向性构造的视域，内时间之发生既是世界显现的前提，也是意识显现的前提，意识意向性地构造世界。现象的原初意义即是自身给予、自身显现。“胡塞尔告诉我们，事物的意义既非事物本身所固有（这是反古典存在学），也不是由主体赋予的（这是反近代知识学和主体哲学），而是取决于事物是如何被给予我们的，也即取决于视域，取决于事物是如何在某个视域里呈现给我们的，‘视域’决定了事物以何种意义被给予我们，或者说，事物的意义取决于我们与事物的关联方式。”^③而海德格尔“存在论区分”的理论前提即是将“现象”理解为存在者的自身显现，“胡塞尔借‘面向实事本身’这一现象学原则所倡导的基本态度，亦即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来实行的现象学的‘看’，对海德格尔的追问和运思来说亦是根本性的姿态。正是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受惠于胡塞尔最多。”^④由此看来，海德格尔对现象的理解与胡塞尔对现象学的基本规定是一脉相承的——现象即“显现”或“显示自身”（sich zeigen）。

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继承了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的意义，将其视为探索存在问题的唯一方法，认为“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⑤海德格尔多次指出胡塞尔的伟大洞见对他的启发意义：“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对我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⑥“胡塞尔打开了我的眼界”。^⑦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写道：现象学“只有在胡塞尔奠定的地基上才是可能的”。^⑧虽然海德格尔并未对此做出具体说明，但从其基础存在论的理论关切来看，这里他所指的具体内容应该是胡塞尔所阐明的“显现”问题。根据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存在即现象，也即存在者的自身显现，此在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或自身显现的前提，唯有从生存论出发才能澄清存在之意义。因此，胡塞尔先验现象学所实现的将存在者之存在还原为存在者之自身显现的转换，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区分提供了出发点，^⑨“只有在现象学还原的背景下海德格尔的‘在世’才是可能的。”^⑩当然，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不仅是一种描述的方法，也是一种以“纯粹意识”为特定研究对象的事实性科学，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仅仅是一种意味着纯粹可能性的方法，它比任何具体现象学都更具优越性，它

①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94-97页。

② David Carr, *Phenomen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History: A Study of Husserl's 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p.36.

③ 孙周兴：《海德格尔与德国当代艺术》，《学术界》2017年第8期。

④ 孙周兴：《还原、建构、解构——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初探》，《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现象学方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229页。

⑤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2页。

⑥ Heidegger, *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es (1910-1976)*,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2000, S.38.

⑦ Heidegger, *Ontologie: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8, S.5.

⑧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5页。

⑨ [法]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04-213页。

⑩ Maurice Merleau-Ponty,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Donald A. Landes, transl., London/NY: Routledge, 2012, p.lxxviii.

不仅描述纯粹意识之显现，而且描述其他一切存在者的显现。胡塞尔并未探究纯粹意识如何自身显现的存在论前提，只将其视为某种不言自明的存在者。换言之，胡塞尔只回到了纯粹意识这一特定的存在者区域，将意识视为终极存在，但对意识自身的存在方式却存而不论。这仅是一种强加于周围世界之上的理论反思，是将周围世界置于静止之“我”面前的一次对象化侵害。^① 纯粹意识本质上来说是对具有前理论性的生活体验世界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这是一种“去生活化”(Ent-leben)的理论态度，是对原初生活经验的抽象化。前理论的实际生活经验才是原初物，而纯粹自我只是衍生物。即使胡塞尔具有动态构成性质的内时间生成流，在海德格看来这仍然是以意识本身的始终在场为前提的。因此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通过先验还原的方式悬置了外部世界的存在，获得了纯粹意识，并将其视为绝对存在，但由于他没能看到存在论区分，因而仍堕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这是对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延续。他将先验自我视为一种绝对存在的哲学立场不仅遗忘了人的具体生存，而且也遗忘了存在本身。^②

由此看来，二者对什么是现象学的“事实本身”存在根本分歧。在胡塞尔那里，事实本身即具有意向性结构的纯粹意识，它能使对象明证地得以显现，而描述纯粹意识的本质结构及其对象的显现方式便成为现象学的根本任务。但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纯粹意识并不是原初生活经验，它只具有派生性，且胡塞尔的反思性描述很容易堕入对象化的主体性思维方式。^③ 在他看来，胡塞尔并未“回到事实本身”。他认为，“事实本身”是生活经验而非纯粹意识，而生活经验具有非理论性与生存的开放性特征，这是一种与胡塞尔反思现象学不同的“解释学的现象学”(hermeneutische Phenomenologie)或“解释学的直观”(hermeneutische Intuition)。^④ 这样，现象学在海德格尔那里便兼具描述人的生存经验与追索存在意义问题的双重意涵。由此，海德格尔在秉承显现原初意义的同时，将胡塞尔对纯粹意识的研究扩展至更具始源意义的生活经验领域的探讨，将纯粹意识的显现转化为存在者自身的显现，从胡塞尔的反思现象学转向解释学现象学。“海德格尔的世界分析推进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并且把它彻底化了。”^⑤

二、存在者自身之显现

如前所述，胡塞尔将现象视为能够直接描述的自身显现，在他看来现象背后没有任何实体的存在。但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往往被“假象”与“显象”扭曲而处于各种可能的被遮蔽状态，^⑥ 因此首先应将现象从被遮蔽状态中摆脱出来。“恰恰因为现象首先与通常是未给予的，所以才需要现象学。”^⑦ 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现象即为此在之生存——此在之自身显现，而现象的被遮蔽状态则意味着此在往往回避自身之显现，即此在之在世往往处在非本真状态(Uneigentlichkeit)中。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本质虽然是生存，但其却总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个现成的存在者而“沉沦”于世，从而堕入非本真状态。但在畏(Angst)这种特殊的生存论处境中，此在的本真状态(Eigentlichkeit)得以敞开与显现，它体现为时间性的“绽出视域”，即此在以“向死而在”的状态承担起自己“被抛于世”的存在，并对自己“寓于世内存在者”之存在做出决断，这即是此在自身显现的展开(Erschlossenheit)。通过此在这种自我显现之展开，存在者本身才能够如其所是地从各种被遮蔽状态中得以揭示。所以，在海德格尔看

① 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7, S.85-89.

② [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5-66页。

③ 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GA56/57)*, hrsg. Von Bernd Heimbüchel,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7, S.84-92.

④ 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GA56/57)*, hrsg. Von Bernd Heimbüchel,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7, S.116-117.

⑤ [德]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孙周兴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7页。

⑥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2页。

⑦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2页。

来，“真”（aletheia）首先意味着需要摆脱某种“被遮蔽状态”。^①

早在《哲学的观念与世界观问题》这部被人们视为海德格尔现象学起点的著作中，他就将哲学视为一种前理论、非对象化、非概念化的“原初科学”（Urwissenschaft），^②这应该是海德格尔关于显现问题的最早论述，但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无疑是《存在与时间》。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Phänomenologie）由“现象”（Phänomen）与“逻各斯”（Logos）两个希腊文词根构成。“现象”是“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公开者。”^③海德格尔将现象与假象（Scheinen）、显相（Erscheinung）做了区分。“假象”是指存在者不是显现为自身，而是显现为他者，如原本的白脸在红灯照射下显现为红脸。假象也是现象，只是它是现象的扭曲与变形。而显相则与现象完全对立，它意指存在者并非显现自身，而是“指引”（verweisen）某种自身不显现者，如某人脸红并非脸红的自身显现，而标志着他的发烧状态。海德格尔对现象、假象、显相三者进行区分的目的即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因为后者混淆了现象与显相，认为现象背后隐藏着某种不可见的本体类存在，如柏拉图哲学中自身显现的感性世界只是标识自身不显现的理念世界的工具，康德哲学中同样存在着自身显现的现象与其背后不显现的“物自体”（Ding an sich）。^④海德格尔认为，假象与显相皆源于现象，都是对现象的扭曲与遮蔽，现象就是“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此外无他。“逻各斯”（Logos）的希腊文原意是“言谈”（Rede），意指将语言所及之物公开出来，“让人看见”（Sehenlassen）是对自身显现之物的描述，而非人们通常所说的理性、根据、规律之意。因此，海德格尔所强调的使现象如其所是地显现与胡塞尔“回到事实本身”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海德格尔将“现象”“假象”“显相”联系起来加以阐述，进而揭示了现象的多维意蕴。由此看来，无论是从显现内容、显现维度还是从显现的彻底性上来说，海德格尔对现象的理解都要比胡塞尔厚重与丰富。

正是在对现象学方法的彻底贯彻以及对现象学研究领域拓展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揭示了客观世界及其主体的被遮蔽状态，展开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现象学解构，使人与世界如其所是地得以显现。如果存在不是现成的存在者，那么对存在意义的探求就不能采取传统形而上学探求存在者是“什么”（was）的对象化方法，现象学描述存在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即存在者“如何”（wie）显现自身。“‘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是从关乎实事的方面来描述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而描述哲学研究的‘如何’”。^⑤它不是一种事实性（schlichkeit）科学，而是一种纯粹的方法，它只在于澄清存在的意义，描述存在者的自身显现。此在之显现也意味着世界之显现，此在的自身显现是一切其他存在者自身显现的前提，一切器具的意义与因缘均在此在的上手状态中得以揭示，世界整体先于一切用具整体的因缘而自身显现，并伴随用具的显现而显示自身，此在对一切世内存在者的理解总已包含了对于世界的“前理解”。通过前期的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剥去了整个形而上学附加于人与世界之上的各种遮蔽状态，使人与世界的本然状态得以显现出来。

三、人之复多性的显现

如果说胡塞尔的“显现”专注于意识领域，海德格尔的“显现”专注于存在领域，那么，阿伦特的“显现”则专注于公共领域，她的创造性即在于将现象学方法引入政治世界，为当代政治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⑥“如若今日我们可以一种哲学上可证明的意义上谈论‘政治世界’，那就要归功于阿伦特。虽然阿伦特并不自以为现象学家，但人们却应该将她发现政治之世界性这一点视为现象学

^①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68页。

^② 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GA56/57)*, hrsg. Von Bernd Heimbüchel,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7, S.60-73.

^③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4页。

^④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6页。

^⑤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2页。

^⑥ 关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现象学方法的相似性，可参见 L. P. Hinchman, S. K. Hinchman, “In Heidegger’s Shadow: Hannah Arendt’s Phenomenological Human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46, no.2, 1984, pp.183-211。

百年运动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①应该说，这种现象学的“位移”既彰显了他们理论视域的差异，也体现了他们理论宗旨的一脉相承性。

事实上，现象学的开创者胡塞尔的后期思想就已经有一种将纯粹科学理论还原到人类经验世界的倾向。他认为，现代科学建立在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基础上，将自然数学化偏离了古典科学的理性意蕴，脱离了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欧洲人性的危机。生活世界“对于在其中生活的人具有恒常的存在意义，它是思想劳动的永恒基础，是始终准备好的不言而喻的源泉，实践的人们和科学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利用它。”^②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不断变换与开放的视域，每一个体都从自身境域认识这个普遍境域，世界仅从个体特殊视角向自身开启，这意味着每一个体在普遍境域中都会遭遇他者的境域。但胡塞尔的这一理论根本上是为了他的先验现象学服务的，因此他并没有意识到政治对人类存在的意义，或者在他看来，政治世界的意义本身就内含于生活世界的意蕴之中，“他受的教育、他的爱好、他的职业以及他对科学严格性的偏好都决定了他的非政治性。”^③海德格尔虽然关注本真的政治问题，但他却将公共政治领域视为常人状态而加以摒弃，从而在根本上忽略了政治领域中“显现”问题的重要意义。而阿伦特则认为，人们在公共领域中以复多性的方式显现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本真的活动是以复多的行动为基础的公共政治活动，传统政治哲学以一种制作产品的政治模式代替了本真的政治活动，掩盖了人之复多性的显现，从而遮蔽了人类本真的政治经验。

尽管他们的关注点各不相同，但从理论实质来说，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对显现问题的理解都是从胡塞尔所强调的纯粹意识之“显现”而来的：海德格尔强调存在之显现，而阿伦特则将之转入公共领域，强调人之复多性的显现，认为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才有真正的人与物的“显现”。这是阿伦特、海德格尔、胡塞尔现象学最直接的交汇点。具体来说，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对“显现”问题的理解源自胡塞尔的侧显(Abschattung)理论。^④在胡塞尔看来，“‘我们的’知觉只通过对物的纯侧显作用本身才能达到物本身”。^⑤侧显是对象多个维度的呈现过程，即每个人在特定时刻只能看到事物的某个侧面，但如果有很多人在不同位置，则会尽可能看到事物的全貌。“侧显是知觉的基本样式。对象自身的呈现过程也即一个侧显的过程。侧显关涉对象之可能、知识之可能。”^⑥早期海德格尔认为，事物只有在此在的生存论结构中才能充分显现，即此在对事物的揭示(Entdeckung)，但海德格尔不只追求让事物如其所是地显现，因为显现物总是相对于一个观看者而言的，他追求的是让事物如其所是地“存在”。正是基于此，他将此在的本质揭示为“去—存在”(zu-sein)与“能在”(Seinkönnen)意义上的“生存”。而阿伦特认为事物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才能充分显现。一方面，公共领域的交流能够使得事物越来越充分地、如其所是地显现；另一方面，人们在公共领域中能够让自己在他人眼中更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此意义上，阿伦特批判海德格尔仅考虑单数的“此在”问题，而未考虑到复数的“共在”问题。她认为只有在公共领域中，事物才能真正如其所是地向人们显现，即人们在多重视角中观看公共领域中的事物与自身，个体在公共空间中显现自身，在其中人们通过行动与言说显现自身的生存可能性，从而实现本真政治。“事物无须改变其本性就能够为许多人从不同方面加以观看，以至于围绕它们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知道他们在全然的多样性中看到了同一性，只有在这些地方，世间现实才能真正可靠地显现出来。”^⑦人们在公共空间中与他者相互观看，这个公共空间就是政治领域——人类活动场所。^⑧

① [德]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第219页。

② [德]埃德蒙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6页。

③ 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35页。

④ 关于侧显理论的内容以及不同侧显面的统一性问题，参见张瑞臣：《胡塞尔侧显理论中的统一性建构》，《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

⑤ [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第119页。

⑥ 张瑞臣：《胡塞尔侧显理论中的统一性建构》，《学术研究》2019年第7期。

⑦ [德]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7页。

⑧ 阿伦特关于人类活动的时空意义，参见P. Ricoeur, “Action, Story and History——On Re-Reading the Human Condition”, *Salmagundi*, vol.60, no.3, 1983, pp.60-72。

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人之复多性，即“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生活在地球上并栖息于世界的事”，^①也即一种“可能是”的生成性，它体现的是人的一种开端启新能力，阿伦特称之为行动，其核心是保持与他人的言说与互动，即在公共领域中显现自身。阿伦特在这里继承了海德格尔此在之本质在于其生存的描述，此在永远是一种处境和关系的存在——人是处境式的有限存在，总在一定条件与境况下显示自身。她将此在的生存筹划转化为共同体的政治筹划，即政治行动就是敞开政治共同体之生存可能性。但阿伦特反对海德格尔将公共政治视为常人状态加以拒斥的哲学态度。在海德格尔那里，非本真状态（Uneigentlichkeit）下的常人话语垄断了一切政治参与，这使此在在政治领域中的真正显现成为不可能。而只有在本真状态（Eigentlichkeit）下，此在承担起自己的生存，才能真正作为自身显现于政治领域，即通过此在之“决断”（Entscheidung）才能实现个体与民族的本真存在。阿伦特同样反对常人话语对政治参与的垄断以及对诸种政治可能性的敉平，她强调建立公共领域并将公共交流和政治参与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但阿伦特认为，“决断”取消了人们之间的共通感与交往纽带而进入自我封闭的个人化境遇之中，从而取消了人之复多性的显现。公共领域需要复多的人们通过语言与行动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公共意见。阿伦特就此认为，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缺乏“他者”（the other）的维度，是一种封闭的唯我论。“不带任何人之属性即把此在带回到自我，这样，存在之意义问题便从根本上被抛弃了。……自我的这一典型特征是海德格尔早期存在论将人塑造为神的必然结果。”^②在此意义上，阿伦特更趋向于雅斯贝尔斯等存在主义者，^③因为他们强调个体之间互动与显现的意义，认为“只有在与他人相处时，‘我’才能在相互发现的活动中被显示出来”，^④而“人只有出于自发的自由而行动并‘通过与他人的自由沟通联系起来’才能获得现实性。”^⑤在阿伦特看来，海德格尔基础存在论中封闭的唯我论倾向阻挡了人之复多性得以显现的各种可能性，从而扭曲了他对本真政治生活的理解。

事实上，阿伦特批判海德格尔的真正地方并不是他对常人状态的拒斥，而是他在本真状态中对常人状态的完全遗忘。因为一种本真的政治行动显然不应遗忘他人与具体的政治事项、程序、习惯、规则等，而是要以一种新的方式筹划它们，但海德格尔则缺乏这个维度。海德格尔对“常人”（das Man）和“公共性”（Offentlichkeit）的排斥使他从根本上忽略了政治的中心内容即人之复多性的显现。他蔑视复杂多变的人类生存境况，极力回避人类公共事务，从而封闭了政治生活的广阔空间，陷入孤独而封闭的沉思之境，最终“错失了政治的核心——作为行动的存在者的个人。”^⑥阿伦特则重视政治领域中公共交流的重要意义，以至于她认为没有言说的行动就根本不是行动，它们共同提供了作为人之显现的公共活动空间。后期海德格尔更是将纯粹之思作为真理历史中唯一有意义的活动。在阿伦特看来，在他那里，“思是人类唯一真正的行动（Tun）；在其中超越与凌驾一切人类行动之上的‘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最终实现了。’^⑦这种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使人远离公共领域，消除了人之复多性的显现，否弃了公共政治领域。“思想本身是从活生生的经验事件中来的，必须始终把它们作为为思想指路的唯一路标。”^⑧海德格尔用思想吞没了行动，自然也就消灭了个人复多性得以显现的诸种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之复多性是阿伦特政治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它是显现个体独特身份、实现个

① [德]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第1-2页。

② Hannah Arendt,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Jerome Kohn, ed., New York, San Diego, London: Harcourt Brance & Company, 1994, p.180.

③ 关于阿伦特受惠于雅斯贝尔斯的情形，参见 L. P. Hinchman, S. K. Hinchman, “Existentialism Politicized: Arendt’s Debt to Jaspers”, *Review of Politics*, vol.53, no.3, 1991, pp.435-468。

④ [美]JW·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9页。

⑤ Hannah Arendt,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Jerome Kohn, ed., New York, San Diego, London: Harcourt Brance & Company, 1994, p.180.

⑥ Hannah Arendt, “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Jerome Kohn, eds., New York, San Diego, London: Harcourt Brance & Company, 1994, p.433.

⑦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 Willing*, Mary McCarthy, eds., Harcourt, Inc., 1977, p.175.

⑧ [德]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体自由能力、赋予个体存在意义以及确证世界之现实性的根本人类活动。复多性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条件，纵观阿伦特的整个政治思想，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复多性指人的群居性，人们的共存产生了公共问题，因此，政治思想的出发点是共处于世的人们而非孤立的个人。这种复多性并非集体意义的抽象同一，而是不同个体的集合，从而与人民、民族概念相区别。复多性不仅意指个体的尊严、权利、个人存在的依据，更突出了个体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是单纯的个性或独特的生活方式，而是每一个体所拥有的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由此展现个体的独一无二性。人的复多性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我们无法摆脱的事实，政治思想只能正视它，而不能漠视它。“没有一个从政治上得到确保的公共领域，自由就没有得以显现的在世空间。”^①只有在公共舞台上，人们才能以行动与言说的能力充分展现个体之所是，这是人之为人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公共领域既是行动的前提，又是行动的结果，更是个人存在必不可少的条件。”^②所以，政治的关键就在于给人们提供显现自身的各种机会，国家政治结构的形式就是人们得以自我显现的公共空间，政治权力的作用就是保障这一公共空间的存在。政治即是一种制度化的空间显现形式，复多性的人们在语言、行动形成的动态空间中显现自身。

阿伦特以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为例，阐述了复多性对于政治的本真意义，认为二者之动机皆为自由，但前者导致灾难，后者却实现了真正自由。在她看来，卢梭的“人民”剥夺了人之独特性，要求个体意志必须服从“公意”，这最终将导致暴政，其原因在于消除了人的复多性，进而消除了公共领域和政治参与的可能性。在美国革命中，“‘人民’一词有多数人之意，即无穷无尽、数不胜数的群众，它的崇高就在于它的多样性。反对公意，也就是反对潜在的全体一致性，便成为美国革命者们取得高度一致的众多事情之一。”^③复多性即人们在平等的共同生活中将自身与他者相区别并呈现自己的独特个性，而政治空间是个体显示其本真存在、追求卓越、获得人类存在最高可能性的唯一场所，本真的活动是以复多性为基础的公共政治活动。如果没有他者的在场、看见、听见，行动将失去其固有的意义，所以，复多性是政治的前提条件。公共领域具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是个体得以显现的自由空间，它将人们聚在一起又彼此分开，在其中每一个体得以获得现实感。在《论革命》中，阿伦特将她的“复多性之显现”的理念落实到一个更具象的层面，她极力倡导杰斐逊的“街区初级共和国”的设想。这一设想将行政分布更加细化，从而能够更好地倾听人民的声音，使得每个人能够履行各自的权力与义务。阿伦特由此提出了她的“委员会制度”(council system)，在其中公民们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这样能够使人之复多性得到最充分的显现，公民们能够直接参与政治，从而实现现代政治的本真状态。正是基于此，阿伦特的政治思想在当代主流政治哲学中始终保持着特立独行的姿态：她强调的不是个人权利至上的现代自由，而是公共生活至上的古代自由；不是身份认同的共同体，而是个体显现的共同体；不是分权制衡的现代共和精神，而是注重德性政治的古典共和精神。而这一切又都与她广阔的现象学视野是分不开的。

四、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显现”概念在现象学基底上不断位移的过程，就是现象学在胡塞尔、海德格尔与阿伦特那里以不同形态获得新的生命力的过程：从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研究到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研究，再到阿伦特的公共世界研究。但这种研究领域的位移并没有改变现象学“面向事实本身”这一根本的研究方法，即显现原则。从纯粹意识之显现到存在者自身之显现，乃至人之复多性的显现，每一次位移都是对传统哲学的强力挑战，也是对哲学发展的强力推动。这既体现了现象学本身所包蕴的丰富内容与宽阔维度，也体现了现象学作为一场持续的运动所具有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因此，它也必将以其强烈的历史关照与现实关切而获得新的方向与可能性。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德]汉娜·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第141页。

② 王音力：《鄂兰》，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第68页。

③ [德]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从赫布定律到深度学习理论的发展 *

燕 燕

[摘要]神经生理学家赫布 (Donald Hebb) 假设学习的发生建立在突触的可塑性之上, 构建了学习的突触原理的模型。突触学习的还原论在揭示大脑与行为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既被推进也被反驳, 并在不同的发展路径中促进了神经科学、生物学、脑科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多领域的交叉合作, 从而演化出神经动力的拓扑结构的学习理论。也是基于赫布的突触学习原理, 深度学习概念被提出。深度学习理论从突触的联结主义模型发展到多层神经迭代的卷积模型, 再至机体与环境相嵌合的 Q 模型, 虽然表现出实证科学的优越性与力量, 也凸显了深度从神经元活动样态的可测性至机体—环境的厚度交织的不可测性, 但它因为局限于实证的偏狭而未明了深度学习乃是时间性的浸身介入。

[关键词]赫布突触 突触学习 拓扑 深度学习 浸身介入

[中图分类号] B842; Q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23-09

一、赫布突触学习理论及其对实证研究的提示

1949 年, 神经生理学家唐纳德·赫布 (Donald Hebb) 的专著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出版。在这部专著中, 赫布提出了一个假设: “当细胞 A 的轴突与细胞 B 如此接近足以激活它, 且不断重复或持续性地对细胞 B 放电时, 某种成长过程或新陈代谢的变化就会在其中之一细胞或两个细胞中发生, 以至于使细胞 B 放电之一的细胞 A 的效能就会增强”。^① 从字面上看, 这仅仅是生理学、生物学意义上的神经传导机制, 但若结合有机体的行为来分析, 则其指意深刻。假设有细胞 A、C 与突触后细胞 B 三个神经元, 突触后细胞 B 同时与细胞 A 与 C 相连。其中细胞 A 与细胞 B 是强度相关, 即细胞 A 的兴奋必然会激活细胞 B 使其放电; 相比之下, 细胞 C 与细胞 B 是弱相关, 即在同样的刺激作用下, 细胞 A 参与细胞 B 的激活并使其放电的强度大于细胞 C 对细胞 B 的放电强度。假如在某种情境下, 在细胞 A 兴奋并激活细胞 B 时, 细胞 C 也在对细胞 B 的作用中, 那么根据赫布假设, 细胞 B 与细胞 C 之间的作用也会增强。以小老鼠为例, 一只小老鼠生活在中间相连的两个笼子里, 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笼子进入另一个笼子中, 这样的环境对于这个小动物来说已经是弱刺激。假如这只小老鼠像往常一样经过笼子之间的相连处, 这时研究人员对其施以电击, 强刺激出现, 突如其来的强刺激让小老鼠立刻产生恐惧感而仓皇逃窜。随后研究人员会观察到小老鼠的行为明显地改变: 小老鼠回避经过那里或者在别无选择的限制条件下惊恐万状地经过那里。于是, 在两个原本毫不相关的事件即电刺激与一个空间位置之间就建立了联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 2019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多维视角下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研究”(BCA190082)、安徽省省级认知神经科学教育学教学团队项目(2020jxtd23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燕燕,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安徽 淮北, 235065),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现象学研究中心”(Phenomenology Research Center) Edward Cazey 教授团队成员(11794-3391)。

① D. O.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49, p.62.

结。小老鼠习得了应对环境的新的行为方式，学习发生。由此可知，赫布假设揭示的是学习的原理。故此，赫布假设又被称为赫布学习定律、赫布突触或赫布可塑性。

赫布的这本书一经出版即引发了学界相当广泛的争鸣，尤其是赫布提出的“突触的‘学习’”假设，因为“这一机制是局域性的”。^① Hemmen 与 Senn 之所以称“局域性”是个惊世骇俗的想法，是因为“局域性的突触，其机制效应除了受制于一定时空下的前突触与后突触所能接收的信息之外，别无他制。”^② 但也正是赫布捕捉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互动方式的尝试，促进了“大脑的工作模型的建构以揭示大脑对外在世界的表征方式，使赫布对神经与行为关系研究的影响远远大于突触可塑性的发现”。^③ 赫布假设的原则是“通过实证数据建构而不是描述中央神经系统的形式与结构，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组织过程以及有机体的行为。”^④ 因而，赫布假设也就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总的指导框架：“通过动态的神经网络建立了行为与突触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在分子以及细胞的层面上理解学习与记忆的发生过程。”^⑤ 赫布突触原理的启发性在于行为的发生不能在简单的刺激—反应层面上来理解，而是有它的神经枢机。基于赫布定律，行为组织的生物神经原理在分子层面上的实证研究成为典范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最著名的实证成果之一就是“奖赏系统”的发现，研究者 James Olds 与 Peter Milner 的实验也是在赫布的指导下完成的。James Olds 在两篇论文中详细地描述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即把 Hess 的技术——将电极留置在小老鼠脑内，与 Skinner 箱——测评小老鼠的行为动机结合起来。研究者对实验中的小老鼠进行食物剥夺 12 个小时，然后给予其电刺激。令研究者诧异的是这只小动物总在遭遇电刺激的那一处停留，而根本无意前行获得食物。显然，这只饥饿的小老鼠从电刺激中获得的某种欲望的满足压倒了食物的诱惑。但如果对不同的脑区施以相同的刺激，小老鼠的行为表现是否相同呢？Olds 与 Milner 把小老鼠放入 Skinner 箱中，并于其脑部留置电极，观察这只小动物踩踏脚板以自我刺激大脑的情况。如此，研究者也就把动机的强度转化为可测量的频率。实验表明，电极留置于大脑中线结构的大部分区域，比如嗅觉皮层、边缘系统的核团时，小老鼠踩踏以自我刺激的次数显著高于其他脑区。显然，行为并不是单纯刺激的结果，而是具有神经的相关性，这部分脑区的刺激能够使有机体获得比食物以及其他奖赏更强的满足感，“情绪与动机的机制在大脑中有定位”。^⑥ 如此，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也就被改造为刺激—突触—反应的模式，即行为是神经机制介导的产物。Olds 自我刺激与奖赏系统的发现开启了生理心理学的复兴，推动了生物学导向的行为研究，并促进了心理学家与神经生物学家的合作，“20 世纪 60 年代跨学科神经科学协会的成立就是这种合作过程不断增加的产物。”^⑦

赫布假设的重要性在于它假定突触是可塑的。因为这种可塑性，突触前、后神经元的机制性联结得以改变，行为或者说学习以及记忆才能发生。然而，关于突触可塑性的证实，直到 T. Bliss 与 T. LoMo 联合发表他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Long-Lasting Potentiation of Synaptic Transmission in the Dentate Area of The Anaesthetized Rabbit Following Stimulation Of The Perforant Path”才得以实现。两位研究者在研究海马体背侧齿状区穿通路的线性神经元群时发现，在施以电流刺激后，目标神经元群在突触层面上的反映在以下三个参数上出现长时性增强（long lasting potentiation）现象：兴奋性突触后电位（excitatory post-synaptic potential）的振幅，群峰电位的振幅，群峰值潜伏期的缩短。这就是延时性增强

① J. Leo van Hemmen, Walter Senn, “Hebb in Perspective”, *Biological Cybernetics*, vol.87, no.5-6, 2002, pp. 317-318.

② J. Leo van Hemmen, Walter Senn, “Hebb in Perspective”, *Biological Cybernetics*, vol.87, no.5-6, 2002, pp. 317-318.

③ Peter M. Milner, *Donald Olding Hebb (1904-1985)*, <http://www.Encyclopedia.com/psychology/encyclopedia-almanac-transcripts-and-masp/hebb-donald/-1904-1985>.

④ Steven J. Cooper, O. Donald, “Hebb’s Synapse and Learning Rule: A History and Commentary”, *Neuroscience and Biobehavioral Reviews*, vol.28, no.8, 2005, pp. 851-874.

⑤ H. Sebastian Seung, “Half a Century of Hebb”, *Nature Neuroscience*, vol.3, 2000, p.1166.

⑥ James Olds, “Pleasure Centers in the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1956, pp.105-116.

⑦ Henry J. De Hann, “Origins and Import of Reinforcing Self-Stimulation of the Bra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Neurosciences*, vol.19, no.1, 2010, pp.24-32.

(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 概念。突触的传导效能随着群峰电位的增强而增强，更多神经递质的释放也使突触后电位增强。虽然突触的兴奋时长根据刺激的强度不同而在持续性以及程度上有所不同，但突触传导效应的增强却是其共同的特征。这种强度有时会持续数个小时，有时会持续至 3 天。在输入刺激已经停止的某些条件下，兴奋性有时仍在持续。

突触延时性增强现象的“重要性无论怎样高估也不为过”，^①因为它不仅为其他研究成果的发现开辟了路径，也揭示了学习与记忆可能性的内因条件。“海马区内某些突触的 LTP 可以延长数周。在某些连接处，LTP 要求突触前神经元与突触后神经元的共同激活，支持了赫布的学习定律。但如果突触后神经元在突触前神经元启动性的刺激中处于惰性状态，那么，LTP 将不会发生。”^②可是，行为的突触机制也留下了一个罅隙：如果突触的功能出现反赫布定律，行为会是怎样的？

虽然赫布突触的可塑性原理催生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为解释学习以及记忆的发生机制提供了实证的依据，但聚焦于突触来解释行为的发生或改变有它的不完备性，因为赫布假设的神经元的联结也可能不会发生，即反赫布原理的行为模型出现。20 世纪 60 年代，Torsten N. Wiesel 与 David H. Hubel 合作开展了实验探究。他们把出生 8 天的小猫右眼缝合长达两个半月，用电极一次性穿透其左半脑视觉纹状区检测 25 个细胞的反应活动，发现 20 个细胞仅仅被同侧即正常的左眼传导的刺激激活，期间没有一个细胞被对侧来的刺激激活，剩下的 5 个细胞既不能被同侧又不能被对侧的刺激激活。他们又对 7 只小猫以及 1 只成年猫进行试验，并通过人为的手段使这些猫咪在不同成长时期产生视觉障碍，然后检测视觉神经元的功能，其中检测的数量也是各不相等，但实验结果均表明，总有一定数量的神经元存在不能被来自双侧电流激活的情形。从突触的层面上来解释这一实验结果，即“如果前突触细胞 A 反复且不断地未能激活突触后细胞 B，而细胞 B 因为其他前突触神经元的影响而处于放电状态，那么，其中一个或两个细胞之间会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以至于细胞 A 作为使细胞 B 放电的神经元之一，效能会减弱。”^③这恰恰是赫布定律的反面。

事实上，Hubel 与 Wiesel 1962 年在对猫的视觉系统展开实验时，关注的就不是赫布定律，而是复杂细胞的感受野的检查。“为理解单独神经元的行为，就必须采用这种方法，尽管它不能处理神经元与它相邻神经元之间的关系。”^④也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Wiesel 和 Hubel 不仅发现了猫的视觉皮层上的神经元是功能性层级结构的，而且发现了当一只眼睛失去功能作用后，大多数视皮层的神经元变成单眼加工，有些只接受来自左眼的视觉信息，其他则只加工右眼的信息。这说明视皮层突触的配偶功效 (conjoint survival) 要求同步活动，但同时也表明，有些神经元是具有强烈的特定倾向性地优势加工左眼或右眼的投射。如此，突触前后神经元的相互关系就不是最重要的，视觉刺激的同步性、神经元的特定功能性以及优势倾向性对视觉系统才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功能性层级结构的神经元在视觉通路上的结构性地转换以及视皮层的高度组织化的功能柱，使可视物的各种信息被知觉。功能性层级、同步又特定倾向性优势加工的视觉系统的开创性成果使这两位研究者荣获 1981 年诺贝尔奖，而功能层级、同步以及有些神经元仅局域性地前馈加工的模型也成为半个世纪后优化深度学习模式的路径。Hubel 与 Wiesel 采用的方法，即以单独细胞作为研究对象来解释行为的神经环路的原理，同样也被 Eric R. Kandel 所运用。

或许是认为“赫布突触”这一说法有太强的局限性，Kandel 在他的研究中很少使用这一说法，他更倾向于认为可塑性“很可能是神经元的其他功能，比如细胞阈值或自发放电的方式。”^⑤他也由此转向

① Roger A. Nicoll, “A Brief History of Long-Term Potentiation”, *Neuro*, vol.93, no.2, 2017, pp.281-290.

② Gerald D. Fischbach, “Mind and Brain”, *Scientific American*, vol.267, no.3, 1992, pp.48-57.

③ Gunther S. Stent, “A Physiological Mechanism for Hebb’s Postulate of Learning”,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70, no.4, 1973, pp.997-1001.

④ Torsten N. Wiesel, David H. Hubel, “Single-Cell Response in Striate Cortex of Kittens Deprived of Vision in One Eye”,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1963, pp.1003-1017.

⑤ Eric. R. Kandel, “Nerve Cells and Behavior”, *Scientific American*, vol.223, no.1, 1970, pp.57-70.

神经元与神经系统的相互作用的行为研究，更确切地说，是转向对神经环路的连线方式的研究。Kandel 认为，行为是由神经环路介导的，而一个神经环路中的神经元以及兴奋性突触后神经元电位可以受相邻的神经环路的激活方式制约。通过对神经环路以及单独的细胞进行研究，Kandel 认识到不同类型的学习以及记忆在大脑中有不同的神经环路的生物物理基础，换言之，学习、记忆的发生取决于特定的神经环路的功能化。于是，赫布“局域性”机制的学习原理被环路作业所取代。

与 Eric Kandel 关注神经元—神经环路的行为研究相似亦差不多同时进行的是 John O’Keefe 对单独神经元功能的分析。O’Keefe 亦通过刺激单独的神经元来勘测神经元是怎样概念性地表征世界的。20 世纪 70 年代，O’Keefe 与其合作者通过“留置微电极在小老鼠的海马区，发现这一脑区的锥体细胞激活放电使小老鼠具有空间定向的方向感或表现出空间运动的意向。”^① 并且，每当小老鼠接近它特别熟悉的空间位置时，这些锥体细胞放电频率增加，这就是“位置细胞”(place cells)^② 的发现。随后，“头向定位细胞”(head-direction cells)^③ 也被实验证实。因分子以及神经系统的传导机制的研究成效卓著，Eric Kandel, Arvid Carlsson 与 Paul Greengard 获 2000 年诺贝尔奖；John O’Keefe, May Britt Moser 与 Edvard Moser 也因为构成大脑定位细胞的发现获 2014 年诺贝尔奖。之后，神经元层面上的功能定位研究继续扬势，Jeffrey C. Hall, Michael Rosbash 与 Michael W. Young 发现了昼夜节律的分子控制机制并因此荣获 2017 年诺贝尔奖。

基于突触的还原论研究表明我们是 Changeux 所定义的神经元人，而“自我是突触”。^④ 颇为吊诡的是，虽然还原论的方法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还原论者也意识到了“局域性”的偏狭，即“还原论的色彩太浓”。^⑤ 相反，“所有的行为，所有的感觉，都可由拓扑意义上的神经元的内在调动来说明，它们是一个特定的图谱。”^⑥ 用拓扑来解释神经元的联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还原论的局狭，但引进拓扑结构并不是 Changeux 的创见，赫布在论述视觉时已经运用了拓扑结构，只不过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运用。

二、赫布拓扑的情绪神经机制观及其对情绪实证研究的奠基

赫布在论述视觉信息在初级视觉皮层的投射时认为只有第 17 区是拓扑的结构：“第 17 区是大脑皮层的一个组织。由于场的作用力，动力性的信息补全会在这个皮层内发生。超出第 17 区之外的信号传导将不会出现同形现象，而是弥散性的。从视网膜向第 17 视觉区信息投射的拓扑关系离开第 17 区后即消失。”^⑦ 第 17 区又被称为 V1 区、纹状区或初级视觉加工区。赫布说：“视网膜成像的方式在第 17 区的再现不是地形学的而是拓扑的，一旦这种同一性由视觉皮层的兴奋方式完全决定后，无论兴奋点是什么样，移动的目光或距离变化中知觉到的一个正方形的特征也明显保持在变化中，它仍然是一个四边形（拓扑的变化保证了这一点），这是千真万确的，但已经不是相同的比例。”^⑧ 所以，赫布也用变形 (distortion) 来解释视觉的拓扑结构。赫布用第 17 区局域性的拓扑动力结构反对格式塔心理学的视知觉补全理论，即认为患者不是在视知觉中补全了缺失一半的视觉客体，而是初级视觉加工区的动力拓扑结构补全了完整的视觉，这就是赫布的突触可塑性的作用。然而，33 年后才有实验证明赫布反复提到的初级视觉加工区的动力拓扑结构来自神经系统对数表征世界的特征。

① John O’Keefe, J. Dostrovsky, “The Hippocampus as a Spatial Map.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Unit Activity in the Freely-Moving Rat”, *Brain Reserch*, vol.34, no.1, 1971, pp.171-175.

② John O’Keefe, “A Review of the Hippocampal Place Cells”, *Progress in Neurobiology*, vol.13, no.4, 1979, pp.419-439.

③ Jeffrey S. Taube, Robert U. Muller, James B. Ranck, Jr., “Head-Direction Cells Recorded from the Postsubiculum in Freely Moving Rats. I. Descrip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990, vol.10, no.2, pp.420-435.

④ Joseph LeDoux, *Synaptic Self*,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2, p.2.

⑤ Jean-Pierre Changeux, *Neuronal Man*, Laurence Garey, transl.,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126.

⑥ Jean-Pierre Changeux, *Neuronal Man*, p.124.

⑦ D. O.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p.51.

⑧ D. O.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p.53.

1982 年, R. B. Tootell, M. S. Silverman, E. Switkes, R. L. De Valois 利用脱氧-d-葡萄糖技术对猕猴的视觉皮层成像特征进行勘明。他们将猕猴麻醉、插管, 使猕猴处于药理性的麻痹状态中, 并将猕猴与呼吸器相连。猕猴的头被固定在牢固但无痛的塑料定位架上, 研究人员再在光线下把刺激屏幕聚焦投射到猕猴的视网膜上, 刺激屏上是由大小两个同心圆以及射线条交叉构成的视觉刺激。因为仅仅将刺激呈现给一只眼, 所以视觉皮层上是这个刺激图形的一半映射 (mapping)。研究团队开发了平装技术, 能够把卷积的视觉皮层铺展开以观察视觉信息在这一组织上的活动形状。Tootell 等人发现, “视觉皮层的神经活动的样式与所视图形的样式相对应, 且是整体以小于 2:1 的比例尺度变形地对应。”^① Damasio 曾解释这种现象是“神经元以拓扑结构组织了它的活动模式, 所以与被视图形的样式惊人的一致。”^② 事实上, Tootell 等人根本没有提到拓扑这个概念。相反, 他们多次在文中提到“对数”概念, 即“映射在视觉皮层上的视阈场的空间性转换是这一组织上的神经元以复杂的对数关系表征的。”^③ 因为视觉皮层上的神经元的活动是以自然对数的放大形式表现被视物的样式的, 所以才有拓扑结构以及动力组织的发生与命名。准确地说, 视觉神经系统是对数地表达视觉物, 因而产生了拓扑变形。拓扑结构保证了我们感知的依旧是那个被视物, 而对数关系则既解释了神经系统的动力学特征, 又确保了视觉的放大能力及其限度。学界强调 Tootell 实验解释的视觉变形, 即拓扑结构, 但忽略了神经系统的对数表达方式与能力。

赫布认为, 视皮层的第 17 区是拓扑结构的, 视觉皮层其他区的信息传导是弥散性的, 但后来的研究者“发现大脑各皮层都是拓扑结构的。”^④ 这也与 Changeux 所说的相一致, 即大脑神经元的联结是拓扑结构的。如此, “神经冲动传导的重心就不在于孤立、原子式的突触的境遇, 而是拓扑的神经网络对含于其间的集成—放电神经元的同步与振动的影响。”^⑤ 如此一来, 赫布的拓扑视觉皮层就被扩展为全脑神经网络的拓扑结构。

赫布同样讨论了视觉与情绪体验的关系, 但批判了传统的视觉与情绪的交互作用论。根据这种理论, 情绪是视觉引起的意识状态, 是意识中的一个事件。赫布举例说明交互理论的错误, 他说, 看到一头熊是一种刺激, 刺激输入引发的兴奋产生了感觉 (feeling) 或一种意识 (awareness), 感觉又作用于神经系统, 结果就得出是这种感觉导致这个感知主体冒汗、发抖或转身就跑的动作的结论, 但事实是神经纤维作用下的腺体分泌汗腺, 激素的释放驱动了拔腿就跑的动作。相反, 赫布再次提出假设: “情绪行为有它的神经起源, 情绪这一术语指的是产生情绪行为的这一神经过程。搞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与情绪相关联的是产生情绪性行为的这些假定的神经过程。明确地说, 情绪既不是一种即发的意识状态, 又不是客观观察的情绪性的行为。”^⑥ 如同突触学习的行为机制, 赫布也把情绪等同为神经机制。虽然赫布认为恐惧的情绪是“神经图式的必然结果”,^⑦ 但他并没有给出特定的神经环路。他所说的与恐惧情绪相关的神经环路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被确定, 即“特定性的杏仁核神经环路”。^⑧ 杏仁核直接作用于丘脑、脑干, 而脑干直接介导内脏系统, 于是瞬间产生身体僵硬、心跳加速、汗腺分泌以及皮质醇激增等生理现象。Damasio 在他 2018 年出版的新著 *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 Life, Feelings and the Making of*

① Roger B. Tootell, M. S. Silverman, E. Switkes, R. L. De Valois, “Deoxyglucose Analysis of Retinotopic Organization in Primate Striate Cortex”, *Science*, vol.218, no.4575, 1982, pp.902-904.

② 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Emotion, Reason and the Human Bra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4, p.104.

③ Roger B. Tootell, M. S. Silverman, E. Switkes, R. L. De Valois, “Deoxyglucose Analysis of Retinotopic Organization in Primate Striate Cortex”, *Science*, vol.218, no.4575, 1982, pp.902-904.

④ D. O.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p.238.

⑤ Duane Q. Nykamp, Alex Roxin, Albert Compte,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Topology on Synchrony and Oscillations in Networks of Spiking Neurons”, *BMC Neuroscience*, 2011, vol.12, no.1, pp.44-45.

⑥ D. O.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p.238.

⑦ D. O.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p.253.

⑧ Michael S. Gazzaniga, Richard B. Ivry, George R. Mangu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The Biology of the Mind* (The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14, p.438.

Culture 中提出“情绪从身体何处产生”的问题并给出解释：“无论是恐惧、生气还是喜悦的情绪状态，必然有化学分子的释放，内脏变化的伴随以及脸部、肢体或整个身体的动作。”^① 据此，看到一头熊的恐惧情绪，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视觉—杏仁核—脑干—内脏—肢体这一全身系统的整合态。赫布 1949 年就阐述了这一观点：“情绪是这样一种整合化的功能。”^②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以及 Damasio 的解释可以说是对赫布“整合化”观点的解析。

看到一头熊的恐惧是由视觉介导产生的情绪状态，恐惧的情绪同样也可由听觉介导产生，比如突如其来紧急的汽车鸣笛声或急促戛然而止的刹车声。如果我们把视听系统视为文化化的感知系统，即感官接收到的情绪性的刺激与可能产生的结果立刻联系起来，以至于身体瞬间处于某种应激状态，那么，视听的介导作用揭示的恰恰是神经系统的对数表征原理。“人类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信息是以刺激的物理属性的对数关系被编码。说得再明确些，神经系统是根据对刺激的力量或能量的尺度来进行编码的，而这基本上是对数函数关系。”^③ 这里的引证并不是说在杏仁核（或其他脑组织）与引发恐惧情绪的刺激物之间存在对数放大关系，而是说感官与物理量的刺激物之间是神经系统的对数表征关系。也正是基于神经系统的对数表征，生命的感知域限被拓宽。“近乎对数的映射是神经系统非常有效的机制，因为它拓开了感知的宽域度。比如，声音的音量和光的亮度都有界限的范围，以至于最大的物理量（感官所能承受的上限），与最小可察觉的物理量相比，大约是 105 和相等于 1010 的强度。”^④ 如此，情绪尤其是恐惧的情绪就是对数表征的神经系统瞬间又深度地实现的心物整合，而应激行为则是这一完整系统的完成形式。

虽然赫布并没有运用对数概念来解释神经系统，但他把情绪还原为神经机制的做法却为生理学的情绪观开辟了道路，Changeux 与 LeDoux 都是这种情绪观的代表。但还原论情绪观仅仅看到了实证的生理反应机制，却没有看到身体的张力。把 Changeux 还原论的情绪观身体认知化就是 Damasio 的情绪理论。Damasio 于 1994 年出版的 *Descartes' Error* 中颠覆传统，把情绪正名为肉身的维度，而在其 2018 年的新著中，Damasio 的理论视点进一步放大：不仅强调“情绪是身体与神经系统彻头彻尾地同步并相互作用的现象”，^⑤ 即情绪是身体存在的维度，更突出历史、文化对身体、神经、情绪之间关系的塑造，从而把身体体现性放大为文化模式的身体体现性。但 Damasio 的身体维度的情绪观钩沉的是达尔文的理论。当然，达尔文的情绪理论也有其直接的启示录，即英国生理学家 Charles Bell 的神经机制情绪观。而达尔文的思想也被保留在 Charles Sherrington 的情绪讨论中。有趣的是，Sherrington 的名字反复出现在赫布的著作中。赫布曾在 Wilder Penfield 的实验室从事研究，而 Penfield 是 Sherrington 的学生并深受其影响。如此承续与循环，也就不难理解赫布从神经营过程出发解释情绪的产生。

值得一提的还有另一学习理论支流，它早于赫布学习、情绪模型。与赫布相同，这一学习模型也基于实证研究，却走向了赫布还原主义学习理论的反面并发展为当下壮观的具身认知理论。其源流可追溯至生理心理学家、哲学家 William James。James 于 1890 年出版的专著 *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中提出了“身体体现性的身心哲学观”。^⑥ James 的理论又被 John Dewey 承流发扬，他强调：“身体必须动起来，比如眼、耳、口、手等，积极地参与到学习的过程，并通过身体的动作再把它们表现出来，才是有

^① Antonio Damasio, *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 Life, Feeling,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 New York: Panthen Books, 2018, p.113.

^② D. O. Hebb, *The Organization of Behavior*, 1949, p.238.

^③ Thomas B. Sheridan, *Modeling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with Examples*, New Jersey: John Wiley&Sons Inc., 2017, p.54.

^④ Thomas B. Sheridan, *Modeling Human-System Interaction: Philosoph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with Examples*, 2017, p.54.

^⑤ Antonio Damasio, *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 Life, Feeling, and the Making of Culture*, p.128.

^⑥ Richard Shusterman, *Body Consciousn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39.

效的学习。”^①稍晚的另一位心理学家 Jean Piaget 同样独立地认识到动作塑造知识的发生意义：“知识从动作以及从动作协调的操作中生成。”^②从 20 世纪上半叶突触表征世界发展到身体表征世界，赫布学习理论看似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但事实恰恰相反。赫布学习定律的深远影响与其说是开启了大脑与行为研究的新模型，不如说是肇始了另一个领域的兴起并以其强势的社会应用性而于当下大放异彩。这就是起源于赫布突触定律的深度学习概念。

三、从赫布突触学习定律到深度学习理论的发展

Rina Dechter 在 1986 年刊发的 “Learning While Searching in Constraint-Satisfaction-Problems” 一文中提出了“深度学习”概念，并把它与浅层学习相对。我们以例子来诠释 Dechter 的深度学习概念。假如一个问题的解决存在 X_1, X_2, X_3, X_4, X_5 五个变量。其中变量 X_1 的取值范围是 (a, b, c), X_2, X_3, X_4 依次如此。目标状态 X_5 取决于前四个变量的值数。再假如当 $X_1=b, X_2=b, X_3=a, X_4=b$ 时, X_5 是无解状态，这就意味着这四种取值的组合不是此问题的解。要摆脱死局就必须回溯算法，排查哪些取值导致无解。如果 X_3 的值与 X_4 的值是相关的变量，那么，($X_3=a, X_4=b$) 就是与问题的解决相冲突的值。解决问题就是要发现这些数值以及无解的局。据此，Dechter 写道：

如果最小冲突局的状态 $m_1, m_2 \dots m_i$ 被设定后，并且如果 $d(m_i)$ 是 m_i 变量中最深层次的变量，那么，算法将退回到所有这些变量中最浅显的值。

$$\text{Min } \{ d(m_i) \}$$

发现所有最小冲突局就获得了规避无解之局的所有可能的信息。然而，这样的深度学习可能需要庞大的工作量。^③

这就是 Dechter 所定义的“深度学习”的概念。显然，Dechter 是从算法对知识表征的结果来定义深度学习的。因为深度学习涉及的是搜索并记录算法的取值、步骤以及冲突的路径，所以，确定最初的冲突值也就是第一步，而这也正是 Dechter 所定义的浅层学习。“确定这个冲突局只是发现随后无解局的第一步，根据它自身，我们把它定义为浅层学习。”^④深度学习因为需要记录每一组值数的空间布局以及信息的加工，再加上它是从起始状态向目标状态渐开的正向推演，并没有以预期的目标状态来限制算法的展开，所以，寻求问题解决的所有有效算法就如同 Dechter 所说的那样是庞大的工作量，既是被动的又是试错的，因而也是低效的学习。因为模型是从起始态到目标态的拓开，所以 Dechter 又称这种模型为“空间搜索”(search-space)^⑤模型。空间搜索模型是通过节点把每个变量的值数与路径联结起来构成的图谱，因而也就是心理学的单层的联结主义。可是，如果我们把每个节点视为突触，那么，这个空间搜索模型正好就是由赫布的突触联结起来的图谱，即它是形式化算法的赫布学习原理。

不仅 Dechter 的深度学习模型是赫布学习原理的呈现，而且“早期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学习模型的建构就是赫布原理的体现。”^⑥事实上，自赫布的这本专著出版后，他的“假设与观点出乎意料地启发了神经网络的计算机建模”，^⑦“学界更是在计算机科学与理论神经科学的文献中了解赫布的思想。”^⑧Hinton 说：“Hebb 学习定律支配神经网络模型的开发长达半个多世纪。”^⑨20 世纪 90 年代，第一个延迟效应的神经网络模型产生。在此之前的 20 年里，理论家们纷纷展示了“形式不一的神经网络，它们具有多种

① 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rtino Publishing Mansfield Centre, CT, 2011, p.166.

② Jean Piaget, *Genetic Epistem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Company, Inc., 1970, p.16.

③ Rina Dechter, “Learning While Searching in Constraint-Satisfaction-Problems”, *AAAI-86 Proceedings*, 1986, pp.178-183.

④ Rina Dechter, “Learning While Searching in Constraint-Satisfaction-Problems”, *AAAI-86 Proceedings*, 1986, pp.178-183.

⑤ Rina Dechter, “Learning While Searching in Constraint-Satisfaction-Problems”, *AAAI-86 Proceedings*, 1986, pp.178-183.

⑥ David E. Rumelhart, Geoffrey E. Hinton, Ronald J. Williams,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by Back-Propagating Errors”, *Nature*, vol.323, 1986, pp.533-536.

⑦ Peter M. Milner, “The Mind and Donald H. Debb”, *Scientific American*, 1993, January, pp.124-129.

⑧ J. Leo van Hemmen, Walter Senn, “Hebb in Perspective”, *Biological Cybernetics*, 2002, pp.317-318.

⑨ Geoffrey Hinton, “The Ups and Downs of Hebb Synapses”, *Canadian Psychology*, vol.44, no.1, 2003, pp.10-13.

稳定的状态并存储在赫布突触网络中。”^①然而，正如我们在 Dechter 的模型中发现的明显缺陷：线性的联结主义并不是人类学习的机制与原理，因为大脑不是简单线性结构的。人类也并不是主要通过试错法来学习新知识的，尽管在适应环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运用了联想主义心理学家所说的试错法学习。更明显的是，Dechter 的模型是有限空间里的纠错与选择，这种机械式的深度学习连最简单形式的逻辑推理也难以执行。

基于赫布定律的简单空间联结主义的学习模式并不符合大脑表征世界的事，‘空间搜索’模式的深度学习也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卷积网络的深度学习模型，它是 Yann LeCun 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发的模型。如同 Dechter 的模型是赫布生物生理学的原理体现，‘卷积神经网络模型的建模同样也是从生物神经科学的研究中获得灵感，那就是 Hubel 与 Wiesel 的视觉神经机制研究。’^② LeCun 假设‘处于一个系统网络中的神经元仅仅局域性地接收它前一层的信息输入。’^③在卷积网络模型中，深度学习如同 Dechter 的模型一样，也是一种方法。它是‘多层表征叠加的表征—学习的方法，它由简单但非线性的模型组合而成，每一个模型在一个层面上（把原始的数据）转换成更高级、也较为抽象的表征。’^④之所以称之为卷积网络模型，是因为它是对卷积数学运算的运用，而其中涉及的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就是反向传播算法（Backpropagation）的引进。反向传播算法就是相对于一个多层次叠加模型的权变，计算其目标功能的梯度，也就是运用一系列的规则求导数的过程。反向算法的深刻性在于模型输入的目标导数是根据模型输出的梯度反向推算出来的，且这种梯度算法从顶层的输出开始，一直持续到最底层的输出，故而是深度地迭代。为此，首先给出一个近似的模型并事先设定一个学习目标。把大量数据喂给模型，学习的结果与预期的目标状态存在差异。根据差异通过数学求出一个导数，再根据这个导数逐层训练每一层的神经元，改变其权值。换言之，就是各层服务于一个学习目标。由此，模型就进化为数据驱动与导数调制下的各层神经网络的并行处理系统，较为粗糙的模型就在大数据的驱动下不断地接近期望值。层级越多，数据的量越大，迭代次数越多，则学习就越有深度，模型的期望值的最优化也就越高。如此，深度学习这个概念也就被赋予了新义：它不再是 Dechter 模型的平面拓展，而是纵深的迭代。数据驱动的卷积网络模型最成功的运用典范莫过于 AlphaGo 在围棋方面的优越表现，2016 年它战胜了围棋天才选手李世石，成为那一年计算机行业、人工智能领域里最热门的事件与话题。

但卷积深度学习模型缺失了重要的环境因素，所以它又被强化学习模型所改进。不同于以往以算法主导的学习模型，“强化学习理论深深植根于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关于动物行为的生活化的解读，即有机体是最优化地控制环境。”^⑤该模型同样是训练深层神经元，开发新型的人工智能体并将其命名为深度 Q 网络，但研究者把这一智能体置入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并设置一系列挑战性的任务。该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智能体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中，在高级感觉层面建立事件与事件之间的直接关联，然后采取行动，并以较小的信息占有迅速地学会、生成控制环境的有效策略。卷积神经的深度学习似乎抛弃了赫布学习原理，而强化学习模型似乎也可与赫布无关。事实上，LeCun 基于 Hubel 与 Wiesel 的研究所开发的卷积模型也可溯源至赫布。“Hubel 与 Wiesel 关于感觉系统发展的神经可塑性的灵感正来自《行为的组织》这部著作的前五章的内容。”^⑥赫布学习理论在神经科学、神经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留痕班可

① H. Sebastian Seung, “Half a Century of Hebb”, *Neuroscience*, vol.3, 2000, p.1166.

② Yann LeCun,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Deep Learning”, *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8, pp.22-27.

③ Yann LeCun, “The Power and Limits of Deep Learning”, *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 2018, pp.22-27.

④ Yann LeCun, Yoshua Bengio, Geoffrey Hinton, “Deep Learning”, *Nature*, vol.521, 2015, pp.436-444.

⑤ Volodymyr Mnih, Koray Kavukcuoglu, David Silver, Andrei A. Rusu, Joel Veness, Marc G. Bellemare, Alex Graves, Martin Riedmiller, Andreas K. Fidjeland, Georg Ostrovski, Stig Petersen, Charles Beattie, Amir Sadik, Ioannis Antonoglou, Helen King, Dharshan Kumaran, Daan Wierstra, Shane Legg, Demis Hassabis, “Human-Level Control Through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Nature*, vol.518, no.7540, 2015, pp.529-533.

⑥ Richard E. Brown, Peter M. Milner, “The Legacy of Donald O. Hebb: More Than the Hebb Synaps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vol.4, 2003, pp.1013-1018.

考。“现代神经心理学是基于与彭菲尔德共事的赫布的工作，这就是环境对发展的影响，而这来自赫布在丰富的家庭环境中饲养小老鼠的实验研究。大脑工作机制的计算机建模也是基于赫布的突触以及细胞聚集的想法。另外，学习与记忆的生理学基础也是源于赫布的多种记忆系统观。”^①Paul Adams 评论说：“赫布就是神经科学领域里的达尔文。”^②如此，我们不妨把强化学习理论视为赫布—达尔文主义。

尽管赫布主义表现出强大的神经研究的启发性以及应用价值，但我们仍然需要在突触规制的行为与历时性介入的理解、预期之间进行区分。行为也许可以还原到赫布定律或反赫布定律，但对事件、环境的理解与预期并不能还原到突触的时间窗口。“虽然神经科学的确是无以堪比的向导，使我们识别了神经结构和网络的精密复杂的环路与连通，正是这些结构与网络支撑了我们的认知活动。但我依旧找不出理由来相信神经科学能够揭示构成我们心灵之种种材料的位置与起源，以及自我是怎样形成的。如此，我们又在何处寻找心灵？我们又该怎样停止以二元论的方式思考心灵与世界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超越肌肤的边界，跨越时间的尺度来看物质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基础。”^③行为也并不是局域性的突触机制，比如“位置细胞”，它们“不仅是功能特异性的神经元活动的标志，而且更是环境的标志；是各具突触的个体怎样介入环境，又介入怎样的环境重塑了突触、神经的可塑性的文化的、历史的行为。”^④只有个体“浸身介入某一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种种感受性，并能够采取适应的动作、行为，个体才能生成自我。”^⑤神经系统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而是 Glannon 所说的“人脸的神经伦理”。^⑥换言之，理解与预期不是突触的时间，而是历时性的身体的感知。这才是深度学习的意蕴所在。故此，突触流源的深度学习的“深”就不是空间、算法的问题，而是时间性的、生命纵深向度的问题，它既是危险情境下身体全部潜能的调动与应对，又是浸身于一种陌生的文化中时间性地去理解、预期，它是“历时性、身体介入的人、物同构。”^⑦其中，“个体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反思能力对个体与环境的适应关系将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⑧William James 这位专长于生理神经科学却又超越了实证的局限与狭促的心理学家及“身体哲学家”^⑨对此总括得最为精当：“把采取行动——不是在他的行为方式这个狭隘的意义上，而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当作对环境的每一种可能的适应。而这些环境能够把他置入对生活的种种沉浮变迁的体验中。”^⑩

20世纪40年代末，Hebb 学习定律激发了研究者深入微观探明大脑表征世界的原理。基于赫布学习理论，实证科学通过还原性的实验操作在理解行为、记忆乃至深度学习的机制上取得了精密弥深的成果。但赫布主义也有它研究视阈以及方法的局限性，因此它不可避免地遭遇反思性浸身介入学习理论的批判。可见，浸身学习才是脑、身、物质文化在深度介入的交织意义上的深度学习。

责任编辑：徐博雅

^① Richard E. Brown, Peter M. Milner, “The Legacy of Donald O. Hebb: More Than the Hebb Synapse”,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vol.4, no.12, 2003, pp.1013-1018.

^② Paul Adams, “Hebb and Darwi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Biology*, vol.195, no.4, 1998, pp.419-438.

^③ Lambros Malafouris, *How Things Shape the Mind: A Theory of Material Engagement*, MA: The MIT Press, 2013, p.4.

^④ Bruno Poucet, Etienne Save, Pierre-Pascal Lenck-Santini, “Sensory and Memory Properties of Hippocampal Place Cells”, *Reviews in the Neurosciences*, vol.11, no.2-3, 2000, pp.95 -111.

^⑤ Tom Feldges, “Bodily Feelings and Atmospheres: The Felt Situational Impact Upon Educatio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 vol.20, no.2, 2020.

^⑥ Walter Glannon, *Brain, Body, and Mind: Neuroethics with a Human F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3.

^⑦ Karenleigh A. Overmann, “Concepts and How They Get that Way”,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19, pp.153-168.

^⑧ Cherie Tsingos, Sinthia Bosnic-Anticevich, Lorraine Smith, “Learning Styles and Approaches: Can Reflective Strategies Encourage Deep Learning?”, *Currents in Pharmacy Teaching and Learning*, vol.7, no.4, 2015, pp.492-504.

^⑨ Richard Shusterman, *Body Consciousnes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5.

^⑩ William James, *Talks to Teachers on Psychology; And to Student on Some of Life's Ideal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58, p.36.

有德性地论证：论证研究的德性进路探析^{*}

廖彦霖

[摘要]德性论证理论是将当代伦理学与知识论研究中兴起的德性视角注入论证分析与评估的一种新论证研究进路。该进路主张把论证主体的德性纳入论证评估中考量，并试图据此重塑论证规范性。以论证规范性为核心线索，可以将德性论证理论的基本问题塑述为论证评估中主体德性的作用以及论证德性的概念建构。对于论证评估中主体德性的作用，将相关主张重构为经典进路、扩充进路与重塑进路，并反思各进路的得失；对于论证德性的概念建构，阐明德性知识论与批判性思维两大传统的基础性作用，并评价当前的建构方案。基于此，德性论证理论的创生与发展为论证理论研究描绘出一条既复古又创新的进路，揭示出论证研究德性转向的可能。论证研究的德性转向能为谬误理论的发展注入新视角，且有望成为中西逻辑学对话的重要枢纽。

[关键词]论证理论 德性论证理论 德性理论 非形式逻辑

[中图分类号] B81-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32-07

逻辑、论辩与修辞是论证研究的三大经典进路。与这些经典进路不同，科恩（Daniel Cohen）和阿伯丁（Andrew Aberdein）近年尝试将哲学研究中的德性视角注入论证的分析与评估，开创了论证研究的德性进路，并将这一新进路称为德性论证理论（virtue argumentation theory）。该理论主张把论证主体的德性纳入论证评估的考量，并试图据此重塑论证规范性。凭借深厚的哲学渊源与大胆的理论诉求，德性论证理论已成为当代论证理论领域不容忽视的“非经典进路”之一。^①然而，相较于德性视角在伦理学与知识论领域的成功应用和由此引发的深刻变革，作为德性理论谱系新成员的德性论证理论尚处于提出基本纲领的起步阶段，仍有待学界给予更多关注与重视。基于此，本文力图以论证规范性为核心线索，塑述出该理论的两大基本问题，同时就其现阶段的理论得失做出批判性的分析与反思，并阐述其未来发展的前景与方向。

一、作为新进路的德性论证理论

长久以来，“逻辑—论辩—修辞”构成了论证理论领域的主流分析框架，是论证研究的三大经典进路。^②逻辑进路把论证主要视为一个静态的产品（product），其论证强度的评估标准包括有效性标准、归纳强度标准以及论证优度标准（即非形式逻辑标准）；论辩进路把论证主要视为批判性讨论的程序（procedure），并通过一系列的讨论规范与规则来确保论证活动的质量；修辞进路把论证主要视为改变受众观点的过程（process），重点关注能否论证以及如何说服目标受众。而德性论证理论的问世，为研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语用逻辑的深度拓展与应用研究”（19ZDA0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廖彦霖，中山大学哲学系、逻辑与认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广东广州，510275）。

① Andrew Aberdein, Daniel H. Cohen, “Introduction: Virtues and Arguments”, *Topoi*, vol.35, no.2, 2016, pp.339-343.

② Joseph W. Wenzel, “Three Perspectives on Argument: Rhetoric, Dialectic, Logic”, R. Trapp, J. Schuetz, eds., *Perspectives on Argument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Wayne Brockriede*, Prospect Heights: Waveland Press, 1990, pp.9-26.

者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为论证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进路。

德性论证理论滥觞于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德性传统。这一传统在当代伦理学和知识论研究中得以复兴，被称为“德性转向”(the virtue turn)或“德性回归”(the virtue return)。作为一种有别于后果主义和义务论的规范伦理学，德性伦理学旨在以德性(如勤奋、仁慈、真诚等)作为基始概念(primitive concept)来解释行为、品德、规则、事态为何在道德上“应当”如此，并以此指导人们的行为。^①德性知识论旨在以德性作为基始概念来界定知识定义并建构整套知识理论，但由于学界对德性的界定存在重大分歧，故区分为以卓越能力为基础的德性可靠论(virtue reliabilism)和以人格特性为基础的德性责任论(virtue responsibilism)两大阵营。^②伦理学和知识论都属于规范性理论，既然德性视角能成功注入这两项理论之中并开拓新的理论疆域，那么该视角是否也能成功注入有关论证的规范性理论(即论证理论)之中？进一步地，既然存在以德性作为伦理规范性(ethical normativity)依据的德性伦理学，也存在以德性作为认知规范性(epistemic normativity)基础的德性认识论，那么是否可能建立以德性为论证规范性(argumentative normativity)根据的理论？这应当是德性论证理论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

自2005年起，科恩与阿伯丁的系列研究宣告了德性论证理论的诞生，勾勒出德性论证理论的基本构想。^③有别于“产品—程序—过程”导向的三大论证研究进路，德性论证理论聚焦于论证主体的德性，并将其引入论证评估的分析框架。当研究视角从论证产品、程序或过程转换到论证主体后，我们就可据此对论证理论的重大问题提供新的解答。那么，德性和好论证的具体联系为何？科恩认为，好论证的判断标准在于“认知成就”(cognitive achievements)的达成，而认知成就具体包括加深对自身以及对手立场的理解、完善自身或对手的立场、更关注以前所忽视的细节、更好地把握事物间的关系等。当我们在论证中展现有助于达成认知成就的思维习惯时，就是在有德性地进行论证。^④由此可见，德性论证理论试图从更宽广的认知视域来分析论证，而不是仅仅将论证视为包含前提与结论的命题序列。

尽管基于主体的论证分析进路极具理论想象力，但仍需面对伴随而来的种种理论疑难。笔者认为，其中最显见的疑难便是：主体进路有没有犯诉诸人身谬误(the fallacy of ad hominem)？简单地说，诉诸人身谬误是指基于对论证者人身条件的不相干攻击来得出结论。^⑤这意味着在某些语境下，对论证者人身条件的批评可能是与结论相干的，此时便只能算作合理的诉诸人身论证(ad hominem arguments)而非谬误。如此一来，问题便转换为：将论证者德性纳入考量，与其论证的好坏是否相干？换言之，主体德性在论证评估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对此，一个常见的回应是：当被用于指向“论证恶习”(argumentational vices)时，一个负面的德性论证才是正当的；相应地，当被用于指向“论证德性”(argumentational virtues)时，一个正面的德性论证才是正当的。^⑥

然而，上述回应难以令人满意，甚至有循环论证之嫌，因为论证德性与恶习的概念并不清晰，其与论证规范性之间的关联机制仍聚讼纷纭。那么，论证德性这一概念究竟应如何理解？从比较的视角观之，伦理学上的德性追求善(the good)，有德性的人去做善的事；知识论上的德性追求真(truth)，有德性的求知者倾向于相信真命题。那么一个有德性的论证者是怎么样的？论证上的德性究竟追求什么？^⑦学

① 陈真：《何为美德伦理学？》，《哲学研究》2016年第7期。

② 陈嘉明：《德性知识论》，《东南学术》2003年第1期；米建国：《智德与道德：德性知识论的当代发展》，《伦理学》2019年第2期。

③ Andrew Aberdein, “Virtue in Argument”, *Argumentation*, vol.24, no.2, 2010, pp.165-179; Daniel Cohen,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Argumentation Theory”, *OSSA Conference Archive*, 29, 2007; Andrew Aberdein, “Virtue Argumentation”, F. H. van Eemeren et. al., eds., *Proceedings of the Sixth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Argumentation*, Amsterdam: SicSat, 2007.

④ Daniel Cohen,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Argumentation Theory”, *OSSA Conference Archive*, 29, 2007.

⑤ Ralph H. Johnson, J. Anthony Blair, *Logical Self-Defense*,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4, pp.98-99.

⑥ Andrew Aberdein, “Virtue in Argument”, *Argumentation*, vol.24, no.2, 2010, p.171.

⑦ Andrew Aberdein, “Virtue in Argument”, *Argumentation*, vol.24, no.2, 2010, p.173.

者们试图借助伦理学、知识论、法理学及批判性思维等领域的理论资源，建构出论证德性的基本概念及其典型的表现形式。从论证规范性的角度观之，主体论证德性在论证评估中的作用是其论证规范性的直接体现，而这又与论证德性的概念建构存在深度关联。基于此，本文将论证评估中主体德性的作用以及论证德性的概念建构视为德性论证理论的两大基本问题。前者涉及外在规范，后者处理内在定义，两者相互影响。下文将对这两大基本问题及其相关争议做出批判性的分析与反思。

二、论证评估中的主体德性

一般说来，“就事论事”“莫以人为据”“不因人废言”是区分理性思考与非理性思考的标志之一。然而，德性论证理论却要求把主体的品格纳入考量。这是否有悖于理性思考的要求？这一问题可谓德性论证理论的立论基础，事关其作为一种规范性理论的基本正当性。要准确把握德性论证理论的规范性，就必须先澄清主体德性在论证评估中所发挥的作用。学界当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存在重大分歧。笔者将这些歧见重构为以下三种路径：“经典进路”“扩充进路”以及“重塑进路”。

所谓经典进路指的是以经典的 RSA 标准（即相干性、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标准）为论证评估的框架，将德性论证理论视为该框架下的一个分支理论。与德性论证理论以主体为中心的进路不同，RSA 标准大体上是主体中立（agent-neutral）的。在该标准中，相干性指前提为结论提供支持，而充分性指前提为结论提供足够的支持。这两者均考察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关联。此外，可接受性是指论证前提可以被一般理性人接受。^① 不难发现，基于 RSA 标准的论证评估关注的是论证本身，即论证前提、结论与两者间的推理关系，这似乎与论证主体的德性并无关系。相反，若将论证主体的德性纳入评估，将容易导向诉诸人身谬误（the fallacy of ad hominem）。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论证主体在论证评估中不应该扮演任何角色？是否只要将论证主体纳入考虑，就势必会犯人身攻击谬误？沃尔顿（Douglas Walton）对诉诸人身论证（ad hominem）的各种类型进行了细致考察。在他的分类中，诉诸人身论证包含五个子类：辱骂型、境况型、偏见型、利益型与虚伪型。^② 虽然这五种诉诸人身论证对于论证主体人身性质或行为的关注各有侧重，但它们的总体策略可归结为：通过阐述论证主体的特定行为、认知偏见、利害关系等方面来打击论证主体的可信性（credibility），进而对该主体提出的论证提出反驳。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诉诸人身论证并不总是逻辑谬误，在特定语境下完全可能存在合理的诉诸人身论证。

即便将论证者德性纳入论证评估的考量并不必然导致谬误，但这并不足以说明德性论证理论能与经典的 RSA 标准分庭抗礼。RSA 标准虽大体上是主体中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没有办法考量论证主体。RSA 标准的支持者试图表明，有关论证者德性的考量在需要时仍然可以被 RSA 标准囊括在内。一个诉诸人身论证是合理的，意味着该论证对原论证主体的可信性提出了合理质疑，进而也对原论证持怀疑态度。以 RSA 标准视之，原论证主体的“不可信”可转化为前提的可接受性问题，此处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若论证者的可信性将对论证前提的可接受性产生重要影响，如仅凭论证者给出的断言而选择接受前提，那么对论证者可信性的考察便是可接受性标准的题中之义；第二，若论证者的可信性让评估者对其论证的客观性产生重大疑虑，如怀疑论证者有意隐瞒某些不利证据，那么这可被视为某项未表达前提的可接受性遭受了挑战。^③ 也就是说，RSA 标准中的可接受性标准已经有条件将论证者的德性纳入考量。通过可接受性这个概念枢纽，德性论证理论能够在主体基本中立的 RSA 标准中找到发展空间，也为自身的合理性求得可靠依托。如此一来，德性论证理论在经典进路下被视为 RSA 经典框架统摄下的一个分支理论，但这恐怕并不符合部分德性论证理论家的期待。

所谓扩充进路是指对经典的 RSA 标准进行扩充，将德性标准纳入其中，试图以此对论证做出更完

① Ralph H. Johnson, J. Anthony Blair, *Logical Self-Defense*,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4, pp.54-55.

② Douglas Walton, *Ad Hominem Arguments*, Tuscaloos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8, pp.2-14.

③ Tracy Bowell, Justine Kingsbury, “Virtue and Argument: Taking Character into Account”, *Informal Logic*, vol.3, no.1, 2013, pp.22-32.

整的评估。约翰逊认为，论证除了包括由前提、结论和推理关系组成的“推理核”(illative core)以外，还应包括由论证主体履行论辩义务(即回应潜在反对意见的义务)的“论辩层”(dialectical tier)。这一定义无疑是对传统论证定义及其结构的革新，只含前提、结论与推理关系的论证将被视为一个不完整的论证。基于此，约翰逊认为论证评估标准也应当分为推理核与论辩层两大部分。RSA 标准应用于推理核，而论辩层的评估标准则包括以下四点：(1)对反驳前提的预测；(2)对其他批评的预测；(3)对替代立场(alternative position)的处理；(4)对后果与蕴涵的预测。^①不难看出，推理核与论辩层的双重结构对经典的 RSA 标准进行了扩充，而有关论辩层的评估策略让部分学者看到了德性论证理论的发挥空间。

加斯康(José Ángel Gascón)尝试以论证的论辩层为枢纽，将论证与德性串联起来，进而将德性作为 RSA 标准以外的第四项标准，这便是本文所谓的扩充进路。论证者除了需要给出一个满足 RSA 标准的论证(即一个好的推理核)，还必须回应潜在的反对意见。当论证主体正确理解并妥善回应这些反对意见时，该论证主体才算善尽论辩义务，该论证才算满足了论辩层的评估要求。而只有论证主体具备相关的德性，才能够充分理解己方论证，并对潜在的批判性意见进行合理回应。^②笔者认为，扩充进路为好论证设立了更高的要求。论证除了其本身需满足 RSA 标准外，还需要一个有德性的论证主体来履行好论辩义务。也就是说，论证评估由 RSA 标准扩充为 RSAV 标准(“V”代表德性)。然而，有德性的论证者与履行好论辩义务之间的具体关联尚不清晰。扩充进路的主张者仅援引安纳斯(Julia Annas)的语言习得类比作为论证，即“只有真正的意大利语使用者才能和他人持续对话”，以此说明有德性的论证主体方可妥善地为己方论证辩护。^③然而，德性与论辩义务之间的关联并不能通过这个简单类比来证成。进一步澄清德性与论辩义务之间的关联，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所谓重塑进路指的是抛弃 RSA 标准，提出一个新的论证评估理论，进而最大限度地为论证主体的德性创造空间。尽管上文中约翰逊对论证的双重定义(即推理核与论辩层)已对传统的论证概念做出拓展，但这种拓展仍以 RSA 经典标准为必要条件。那么，是否有可能“另起炉灶”，完全摆脱 RSA 标准的限制？根据帕列里(Fabio Paglieri)的分类，试图抛弃 RSA 标准而完全以论证主体的德性来评价论证的理论，属于激进型德性论证理论；而在 RSA 标准的基础上引入论证主体德性的理论，属于温和型德性论证理论。^④不过，德性论证理论的支持者们似乎有着更进取的理论愿景。科恩提出了“饱满论证”(fully satisfying argument)概念：逻辑上的好论证并不一定是饱满论证，逻辑上的坏论证也并不一定不是饱满论证。^⑤这一想法似乎意味着搁置经典的 RSA 标准，属于帕列里分类中激进型德性论证理论。

不难想象，激进的重塑进路仍面临诸多疑难。戈登(David Godden)通过构造“有德性却不可靠的论证者”及“精于诡辩的论证者”两个反例，指出这种试图纯粹以德性来构建一个论证规范理论的尝试是不可行的。^⑥面对这些批评，重塑进路往往主张一种对“论证”更广义的理解，即论证除了前提、结论和推理关系以外，还应包括传播与认知维度的考量。在这种“大论证观”视野下，传统意义的论证只是一部分，此外还涉及论证的使用，包括论证者、受众、语境、论证目的、相关的非言语信息等。^⑦

值得追问的是，倘若“大论证观”笼罩下的论证评估能抛开 RSA 标准，这样的德性论证理论还称

^① Ralph H. Johnson, *Manifest Rationality: A Pragmatic Theory of Argument*, Mahwah: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0, pp.164-208.

^② José Ángel Gascón, “Arguing as a Virtuous Arguer Would Argue”, *Informal Logic*, vol.35, no.4, 2015, pp.475-479.

^③ Julia Annas, *Intelligent Virtu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51.

^④ Fabio Paglieri, “Bogency and Goodacies: On Argument Quality in Virtue Argumentation Theory”, *Informal Logic*, vol.35, no.1, p.74.

^⑤ Daniel Cohen, “Virtue, in Context”, *Informal Logic*, vol.33, no.4, 2013, pp.471-485.

^⑥ David Godden, “On the Priority of Agent-Based Argumentative Norms”, *Topoi*, vol.35, no.2, 2016, pp.350-351.

^⑦ 事实上，当国外学者使用“argumentation theory”这一术语时，往往指的是“大论证观”意义上的论证理论；当他们使用“informal logic”这一术语时，指的是传统论证意义上的论证理论。参见廖彦霖：《作为推理评价方法的非形式逻辑——访汉斯·汉森教授》，《哲学分析》2021年第1期。

得上是一个规范性理论吗？沃尔顿主张的“理性分级论”或许能为此提供一定程度的疏解：根据不同的对话类型（如说服、谈判、审议等），理性也有着不同的要求。如“诉诸威胁”（ad baculum）在说服对话中被归为逻辑谬误，但在谈判对话中却未必如此。^①

三、论证德性的概念建构

德性在德性伦理学中是伦理规范性的基础，在德性知识论中是认知规范性的基础，在德性论证理论中则是论证规范性的基础。那么，论证理论中的德性或论证德性究竟是什么意思？有关论证德性的概念建构，当前主要从德性知识论传统与批判性思维传统中汲取思想资源，以下先对这两大传统做简要解析。

首先是德性知识论传统。由于论证与认知的密切关联，加上德性知识论是德性视角的应用范本之一，所以认知德性对论证德性的建构具有重大意义。一个有德性的知道者（knower）也似乎是一个有德性的论证者。索萨（Ernest Sosa）将视觉、听觉、内省、记忆、演绎和归纳等视为认知德性，开创出建立在卓越能力基础上的德性可靠论；^②扎格泽斯基（Linda Zagzebski）则给出了另一类认知德性，如辨识事实的能力、理智谦逊、理智坚持等，开创出建立在人格特性基础上的德性责任论。^③尽管上述认知德性可为论证德性的建构提供思想资源，但也必须注意到德性知识论内部的理论分野——德性可靠论是后盖提尔知识论传统下的一套“知识理论”，旨在处理知识本质、知识价值与怀疑论问题；德性责任论则是亚里士多德讨论实践智慧与幸福人生传统下的一套“知识伦理学”，重在解答知识价值与美好人生的问题。^④在认知德性的借鉴过程中，应尽力在可靠论与知识论之间维持必要张力，以免节外生枝。可靠论与知识论之间或许可以相容（如两者给出的德性清单存在重叠之处），在两理论间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探讨论证德性的建构，将是可期的方向。

其次是批判性思维传统。作为一种思考方法论，当代的批判性思维理论源于杜威（John Dewey）所提出的“反思性思维”（reflective thought），指对任何信念和主张的知识形式保持积极、持久和谨慎的考虑。到了1970年代，北美兴起批判性思维运动，强调在教育中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与反思能力。作为一个涉及哲学、逻辑学、修辞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跨学科领域，批判性思维的定义历来多样而充满争议，但恩尼斯（Robert H. Ennis）提出的简明版本常被作为批判性思维的工作定义——批判性是带有合理性、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我们决定什么或相信什么。^⑤批判性思维包括技能与德性两个维度，技能维度包括语义分析、论证评估、论证建构等技能，德性维度则包括理智谦逊、理智勇气、理智同情、理智自主、理智正直、理智坚持、理智自信以及理智公正八个方面。为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八德性”。强调德性维度的意义在于，假如缺乏德性，主体可能以一种狭隘利己的方式去运用批判性思维的各项技能。一个公正的批判性思维者不仅仅应熟练掌握相关技能，而且应具有相关的理智倾向（dispositions），亦即上述八德性。^⑥此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方面，上述八德性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以理智谦逊为例，主体若能意识到并承认自己在知识和思考上的不足，这说明他具备理智勇气和正直来面对无知，拥有理智公正和同情来看待不同意见，还体现其对真理的追求具有理智的坚持，对自我理性的提升保有理智的自主和自信。另一方面，尽管此处谈的是德性，但这里的德性关心的是主体的思考方式而非纯粹求得知识的过程，故其与德性知识论意义上的德性存在区别。鉴于批判性思维、非形式逻辑与论证理论三者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批判性思维者的德性大概是论证德性建构过程中最直接的思想资源。然而，对于激进的德性论证理论而言，批判性思维者的理智德性或许仍受限于严格的逻辑规范性（如RSA标准），与其理论诉求仍存在距离。

① 廖彦霖：《非形式逻辑与论辩理论的前沿进展——访道格拉斯·沃尔顿教授》，《哲学动态》2021年第1期。

② Ernest Sosa, *Knowledge in Perspective: Selected Essays in Epistem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Linda Zagzebski, *Virtues of the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14.

④ 米建国：《两种德性知识论：知识的本质、价值与怀疑论》，《世界哲学》2014年第5期。

⑤ Robert H. Ennis, “A Logical Basis for Measur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Educational Leadership*, vol.43, no.2, 1985, p.45.

⑥ Richard Paul, Linda Elder, *The Miniature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 (8th Edition)*,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20.

基于两大传统，阿伯丁结合科恩对论证德性的碎片化论述初步拟定了论证德性的清单，为论证德性的系统建构提供了基本蓝图。对于这些论证德性的阐释，科恩和阿伯丁在原则上遵循了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即通过与这些德性相对立的恶习来进行对比说明。根据亚氏的主张，德性是恰如其分的特质，而恶习则是特质的两极（不足或过度）。阿伯丁将论证德性分为四大类：愿意参与论证、愿意聆听他人、愿意修正个人的立场及愿意质疑理所当然的事，而每一大类包含数个子类（见表1）。^①

如表1所示，目前的论证德性虽然已有框架雏形，但对于特定论证德性的详细阐释仍远未完善，且相近德性间的区别（如理智公正与理智正直）也有待厘清。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运用一种论证德性时，是否会与另一种论证德性冲突？对于论证德性间的潜在冲突问题，存在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对德性进行排序，故冲突时可依据顺序优先级做出取舍，但该顺序的建立与如何应对情境主义的挑战将是一大难题；二是采取亚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加以处理，即在两项冲突的德性中寻找调和方案，可用这种思想却难以对复杂的现实案例提供具体指导。^②此外，当前的论证德性更多强调“涉己德性”（self-regarding virtues），对“涉他德性”（other-regarding virtues）尚缺乏系统认知，而论证作为一项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涉他德性与涉己德性同样重要。^③

四、论证研究的德性转向

上文已塑述出德性论证理论的两大基本问题，并对其现阶段的理论得失进行了分析与评价。总的来说，德性论证理论的创生与发展为论证理论研究描绘出一条既复古又创新的进路，在逻辑学领域呼应了哲学研究的德性转向——为论证研究提供了德性转向的可能。那么具体而言，德性论证理论展露出了什么值得期待的解题功能与发展前景？以下将从两个面向对这一问题做出更进一步的阐释。

从基本理论问题的面向看，德性论证理论能够为谬误理论的发展带来全新的视角。作为逻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谬误理论与论证评估密切相关，是检验各研究视角解题功能的理想平台。例如，RSA 标准将谬误分为前提谬误、相干谬误和充分谬误三大类，论证型式理论以论证主体对批判性问题的回应情况作为界定谬误的标准，语用论辩学（Pragma-Dialectics）通过考察论者是否违反批判性讨论的十条规则来判定谬误。类似地，德性论证理论同样可通过论证德性来分析谬误。阿伯丁以伍兹（John Woods）提出的十八项常见谬误（Gang of Eighteen）为对象，^④将谬误解释为论证主体与受众缺乏论证德性（即具有某种论证恶习）的体现。例如，诉诸威胁的谬误被解释为：^⑤

谬误	提出者	应答者
诉诸威胁的谬误	对他人不公正、无荣誉感	理智懦弱

在批判性讨论或说服性对话中，人们通过提出合理论证的方式来化解意见分歧。若某人诉诸威胁手段而非提出合理论证来迫使对方接受意见，那么他就犯了诉诸威胁的谬误。从论证德性视角观之，犯下诉诸威胁谬误的主体具有“对他人不公正”（隶属于“不愿意聆听他人”）和“无荣誉感”（隶属于“不愿

① Andrew Aberdein, “Virtue in Argument”, *Argumentation*, vol.24, no.2, 2010, pp.165-179.

② Fabio Paglieri, “Bogency and Goodacies: On Argument Quality in Virtue Argumentation Theory”, *Informal Logic*, vol.35, no.1, 2015, p.82.

③ Felipe Oliveira De Sousa, “Other-Regarding Virtues and Their Place in Virtue Argumentation Theory”, *Informal Logic*, vol.40, no.3, 2020, pp.317-357.

④ John Woods, “The Concept of Fallacy is Empty: A Resource-Bound Approach to Error”, Lorenzo Magnani, Ping Li, eds., *Model-Based Reasoning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Berlin: Springer, 2007, pp.69-90.

⑤ Andrew Aberdein, “The Vices of Argument”, *Topoi*, vol.35, no.2, 2016, p.416.

表1 论证德性的初步清单

愿意参与论证	愿意聆听他人	愿意修正个人的立场	愿意质疑理所当然的事
愿意沟通	理智同情	有常识	适当尊重公众意见
相信理性	理智公正	理智诚恳	自主
理智勇敢	识别可靠的权威	理智谦逊	理智坚持
	识别显著的事实	理智正直	

意修正个人立场”）这两项论证恶习。倘若这个谬误成功奏效，那还说明接受者具有“理智懦弱”（隶属于“不愿意参与论证”）这项恶习。对于阿伯丁的应用尝试，我们可做出几点观察。其一，现有的谬误理论一般只聚焦于论证主体的表现，如主体给出的论证，是否妥善回答批判性问题，是否违反批判性讨论规则等，但阿伯丁的分析却同时关注到论证主体和应答者，这为谬误分析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方向，也进一步拓宽了德性论证理论的考察范围。其二，德性视角不仅可以为常见谬误提供新解，还可能帮助人们识别新谬误。在阿伯丁对十八项常见谬误的分析中，“过度愿意质疑理所当然的事”“不愿意参与论证”“过度愿意参与论证”和“过度愿意修正个人立场”这几类论证恶习中仍有很多子类恶习并未得到体现，故研究者可根据这些恶习来定义并识别更多的新谬误，这表明德性视角或许能拓展现有的谬误理论。其三，以论证恶习去定义谬误是否失之宽泛？如诉诸威胁的谬误被定义为“对他人不公正”及“无荣誉感”，可这两项恶习似乎同样可以用来定义稻草人谬误或偷换论题谬误。即仅凭论证恶习的描述，并不能准确定位到特定谬误。如何解决宽泛疑难，是德性视角下谬误理论必须回应的问题。

从比较研究的面向看，德性论证理论能作为中西逻辑对话的重要枢纽。多年来，学者们已基于现代逻辑和论证理论的成果与分析框架，对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与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重构与分析工作，推进了中西方的哲学对话。作为当代论证理论的新成果，德性论证理论在中西逻辑的交流中将扮演非常令人期待的角色。我们可就交流的双方分别做出探讨。

对于中国逻辑学而言，德性论证理论有助于开启中国古代逻辑的德性重构。运用数理逻辑等西方经典逻辑理论对中国古代逻辑的诠释与重构，属于所谓的“名辩逻辑化”进路。尽管该进路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古代逻辑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据西释中”的做法可能会陷入片面求同、牵强比附、生搬硬套等方法论陷阱。学界对此已有深刻的反思与讨论，并在近年来通过引入非形式逻辑与论证理论、自然语言逻辑、语言学和辩证逻辑等新工具来避免落入这种方法论的窠臼。^① 德性论证理论当然也属于西方理论，但和上述各西方理论相比，其与中国哲学传统的距离更近、隔膜更薄。这是因为德性一直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且常被视为中西哲学交流的关键桥梁。陈来表示，自他20世纪90年代参加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开始，就注意到西方德性伦理学与儒学思想的“亲和性”，这直接推动了他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比较研究。^② 米建国认为，不仅是哲学，甚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都存在德性的复兴与转向。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德性理论的典型；在东方，先秦儒家思想便是德性理论的典型。^③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构与诠释过程中，德性论证理论将拥有比其他西方逻辑工具更广阔的空间。事实上，学界目前对儒家哲学论证模式的考察已涉及德性维度，这可视为中国古代逻辑理论的“德性重构”的先导尝试。^④

对于西方逻辑学而言，中国古代逻辑中有关论证德性的论述可为德性论证理论本身的建构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在过往的中西逻辑交流中，主要还是单方的输入而非双方的互动，即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来阐释中国的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的理论往往只扮演西方理论的一项示例，而其对西方理论的发展与修正影响甚微。然而，德性理论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传统，使得中国古代逻辑有机会在德性论证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做出不容忽视的独特贡献，进而使我们的探索带有浓厚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特色。

责任编辑：罗 萍

① 晋荣东：《中国近现代名辩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08-230页。

② 陈来、何俊：《中国学术与世界——陈来教授访谈》，《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③ 米建国、叶方兴：《当代知识论的德性转型——台湾东吴大学哲学系米建国教授学术访谈》，《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④ 熊明辉、吕有云：《儒家哲学的论证模式及其理性根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Lin-qiong Yan, Ming-hui Xiong, “Refutational Strategies in Mencius’ Argumentative Discourse on Human Nature”, *Argumentation*, vol.33, no.3, 2019, pp.541-578.

文化研究与文化建设

如何实现现代城市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

——基于广东省珠海市、中山市儒家文化资源的调查^{*}

薛晓源 李晓辉

[摘要]新时代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就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广东省珠海市、中山市的儒家文化在传承与发展方面具有独特性：两地儒家文化根植于深厚的现实环境，同广府文化、商业文化、华侨文化、红色文化和近代西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传承和发展中获得鲜活的生命力和时代特色。深度挖掘珠海市、中山市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对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儒家文化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4-0039-0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①文化自信要对以儒学思想精华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充分自信，这是保持中国特色的基本所在。珠海市和中山市是中国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儒家文化资源丰富，保留、传承情况较好，有着鲜活的生命力，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着重要价值。研究珠海市和中山市的案例，对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珠海市、中山市的儒家文化存在样态与资源现状

珠海市和中山市在历史上与澳门同属古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南部，与香港、澳门、广州、深圳水陆毗邻。古香山孕育了内容丰富的香山文化，在文化地缘上，香山文化隶属于广府文化。^②本文参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资源的分类方式，把珠海市、中山市的儒家文化资源分为物质文化存在样态和非物质文化存在样态两种类型。

(一) 物质文化存在样态

1. 祠堂。珠海市和中山市可以上溯至明清时期的村落非常多，大姓家族的不同支脉都建有祠堂，这些祠堂很多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儒家文化资源留存、呈现、传承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载体，如珠海市的祠堂有莫氏大宗祠、唐氏宗祠群、杨氏宗祠群和赵氏菉猗堂宗祠等。大多数祠堂仍承担宗族事

^{*}本文系国际儒学联合会2021年委托课题“广东省珠海市中山市儒家文化资源调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薛晓源，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晓辉，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化与文化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广东珠海，519087）。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0页。

^②袁钟仁：《岭南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20页。

务，由于珠海中山侨民众多，家族祠堂也是联系海外宗族的重要纽带。此外，很多祠堂承担着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功能，在现代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故居、纪念馆。近代以来，珠海市、中山市涌现出一大批名人，他们接受了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也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熏陶。现今，他们的故居都设立了纪念馆，呈现儒家文化和其他文化相互融合的鲜明特点。如孙中山故居呈现了孙中山救国救民的革命热忱、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天下为公的革命情怀；唐绍仪故居中的廉政公园把儒家思想嵌入现实的社会关切，同新时代的廉政文化相融合，赋予了儒家文化崭新的生命力。

3. 家塾、书院。家塾和书院是古代的重要教育机构，教育内容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承担普及儒家思想、宣扬儒家文化、培养儒学人才、促进社会安定的重要功能。如中山市的秀峰家塾、烟洲书院等。

4. 牌坊、牌匾、对联。牌坊分为功德牌坊、功名牌坊和道德牌坊，是中国古代具有褒扬作用的装饰性建筑，其文化和道德内涵非常丰富。牌匾、对联是我国特有的文化形式，文字多从儒家经典中摘录，或体现儒家思想，彰显儒家文化意味，在祠堂、牌坊等各种建筑形式中广泛存在。如陈芳故居的梅溪牌坊体现了其家族三代人正自身、助他人，待人以爱、为政以仁，为家乡发展尽心、为扶助乡民尽力的家风和情怀；珠海市斗门区接霞庄赵氏家塾题联：“棣庭贻孝友，桂苑大文章”，强调家风建设和才学道德。

5. 古墓葬。儒家提倡“事死如事生”，推崇忠贞爱国，褒扬英雄烈士，相关墓葬蕴含着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文化价值极为珍贵，在新时代也焕发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如珠海市斗门区张世杰墓。

6. 寺庙。寺庙本是佛教场所，但珠海市金台寺由于历史原因，蕴含着丰富的儒家文化元素，独具一格。金台寺把“服务人民、扶助危困”作为立寺之本，热心公益，节日慰问孤老，遇灾捐赠救助，每年在当地资助200名贫困学生，几十年从未间断。寺内广设文化宣传板，把儒家的仁爱之道、家国情怀，融合佛家的向善思想，向信徒和游客广泛宣传。如“佛家智慧”栏有“只要还有明天，今天永远是起跑线”“不要因为没有阳光，而不走近春天”等标语，通俗易懂，启人向上。寺内铁铸法钟，铭文除了“佛日增辉”“正法久住”外，还有“人民安乐”“世界和平”，体现了儒家胸怀天下的思想。

（二）非物质文化存在样态

1. 历史故事。珠海、中山相关历史故事可歌可泣，催人向上，如千古名篇《过零丁洋》即在珠海海域写就。^①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批志士坚贞不屈，集中体现了孟子倡导的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核心的大丈夫精神和“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精神，这些精神凝聚着中华民族英雄儿女的信念和力量，在任何年代都能赋予社会最大的正能量，有着极大的弘扬价值。

2. 村规、民俗。珠海和中山古村镇众多，这些古村镇普遍立有村规、民约。在修缮陈芳故居时出土了清代的村约石碑，其内容已成为其他村镇编撰民约的重要参考。珠海淇澳岛现存以“社”为特色的祭祀文化，拜“黄天厚土”，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宗教或迷信，这种祭祀以现世的、世俗的关切为重点，演化出一套约定的规程，成为当地的民俗，其中寄托的美好企望，既有世俗功利的性质，也有美好道德的追求。

3. 祖训、家规。中山市面积占古香山县的大部分，有许多历史久远的大姓家族，祖训家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基本都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如元洞黄公祠挂有“黄氏祖训”，大涌镇林氏家族有代代相传的48字家规，火炬开发区郑氏大宗祠的“郑氏规范”包含了168条家规，库充村陈天觉文化广场刻有“家训篇”等。

二、珠海市、中山市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融合的基本方式

第一，儒家文化与广府文化相融合。自秦代以来，中原就开始向岭南地区移民，尤其战乱时期，如两晋、唐末、宋末等时期，移民规模巨大。这些移民定居后，由于山川阻隔反而更好地保留了传统，

^① 珠海市文化体育旅游局：《风流人物——旅游文化系列之人文珠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5页。

再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形成独特的、更为包容的岭南文化。^①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一直是海洋贸易的重要港口，海洋文化传统深厚，由此形成的广府文化和北方传统文化相比，更加包容，更加开放，也赋予了香山文化同样开放、包容的特征。因此，虽然珠海市和中山市在近代接触西方的同时，把传统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土壤传承发扬，这种开放、包容的特征也使得儒家文化在新时代有新的内容来丰富自身。

第二，儒家文化与商业文化相融合。珠三角地区自唐宋起就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窗口，与海外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近代以来，珠海市、中山市毗邻港澳，涌现出一批以商著称的大家族，如唐、莫、郑等家族，商业文化传统非常深厚。^②这些家族在治家、行事方面都遵循传统儒家思想，修身立德、勤俭持家、扶危济困、勇于担当、爱家爱国，由此形成了普遍的儒商传统。改革开放之初，珠海成为首批经济特区之一，儒商传统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以儒行商，在商尊儒，重情义，守信义，讲道义，在现代商业中特别注重以传统美德作为评价标准的口碑。儒家文化元素在商业领域获得了肥沃的土壤，为自身发展找到了强有力的实际支点和内驱力。

第三，儒家文化与华侨文化相融合。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巨变，珠三角地区居民赴海外谋生者数量众多，这些侨民背井离乡，饱受欺凌，但仍然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很多人都事业有成。他们身处恶劣环境，但仍以优秀儒家文化塑造家风，坚持中国传统价值，心从未远离家乡故土。在危难之际，团结一心，共赴国难；在建设之际，积极投资，共谋发展。目前，珠海市和中山市都是著名侨乡，珠海、中山籍的华侨遍布全球，他们普遍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为家乡发展尽心助力。儒家文化与华侨文化的深度融合，为自身价值传承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儒家的传统思想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第四，儒家文化与红色文化相融合。珠海市、中山市有着非常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由此形成了儒家文化与红色文化相融合的鲜明特点。诸如苏兆征、林伟民、杨匏安等一批革命先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些先驱在启蒙阶段普遍接受传统儒家文化教育，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解放奋不顾身、舍生取义，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这些先驱们的故居现在都已成为纪念馆，是爱国主义、家风教育的重要场所，人们可以切实感受到儒家文化与革命先驱的光辉事迹交相辉映。

第五，儒家文化与近代西学相融合。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一批志士开始放眼世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珠三角成为看世界的最前沿。当时香山县最早学习西方，香山人走出国门，引领着西学东渐之风。在特定历史时期，这批人既自觉秉承中华传统儒家思想，又积极学习先进的工业文明，成为东西融合的典范。其中，孙中山先生最为杰出，他提倡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民本思想、民族思想、经济思想同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思想相融合的产物。^③郑观应一方面抨击科举，主张学习西学，实行立宪政治，另一方面又认为应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珠海市、中山市的儒家文化所体现的这种东西融合特点具有保持传承的活力，又焕发出具有时代特征的生命力。

三、珠海市、中山市儒家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是“修齐治平”的思想价值体系为当代发展贡献智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理念和价值支撑，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的运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部分国人认为“修、齐、治、平”早已过时，在现代社会毫无价值。珠海市和中山市对此给出了不同答案，儒家传统文化在当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从儒家文化资源呈现看，相关内容既有关注个人发展的“修”和“齐”，也有关注社会发展的“治”与“平”。而包容开放的特性，使得儒家文化可与多种文化融合发展，顺应潮流，构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体现“修、齐、治、平”内核的文化价值观。如珠海市、中山市数量众多的祠堂，在功能上具有现代特征，祠堂的对联、家训，文字千锤百炼，

^①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中华文化通志（岭南文化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7-38页。

^② 政协珠海市委员会：《珠海人物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58页。

^③ 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北京：华文出版社，2011年，第84-88页。

是家风建设的最好素材。祠堂各种家族活动使家训形成规范压力，促进家族成员提升自我。祭祀既是追念祖先筚路蓝缕开拓精神，也是以祖先为榜样、自我勉励承担当代责任的许诺。这种开拓、责任从时间上贯穿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空间上突破了个人事务的范畴，指向社区、社会。祠堂作为海外华人与故乡联系的纽带，致力于提升开放性和服务性，儒家文化也由此获得更广更深的发展空间。因此，儒家这种肇端于修身，首先在道德、思想、行为等方面做到正而不邪、仁而不骄、严而不怠，情高志远，进而为人民和国家奋斗，最终追求天下大同的“修齐治平”的体系，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逻辑。

二是“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精神是最崇高的英雄主义。南宋末年，无数志士慷慨悲歌、毅然赴死的故事就发生在珠海域内，这种坚贞不屈的气节正体现了孟子所说的“大丈夫”精神。从“舍生取义”的孔子、孟子，到“民族脊梁”的鲁迅先生，从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员前赴后继，到当下千万乡村振兴干部忘我工作，都可以看到“舍生取义”的真意。这是英雄主义的最高阶段，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依旧蓬勃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新时代建立“四个自信”的底气所在，在当代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三是“天下为公”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之一。“天下为公”出自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他甚至明确地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①可见，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包括中国传统“天下为公”的儒家“大同”理想，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相关理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论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他强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②“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携手构建合作共赢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③“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的不是一国或者少数国家的发展，而是所有国家乃至全人类的自由平等，这正是“天下为公”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时代的回响。

四是现实关切赋予儒家传统文化全新的时代意义。中国历史悠久，儒家文化在各个时期以当时的社会关切为根据，不断地自我演化。两宋时期理学兴起，明代中期心学问世，这些演化使得儒家文化能始终顺应时代的发展，为社会良好运行提供价值基础。珠海廉政主题公园就是把儒家传统文化和现实关切相结合的优秀案例，以通俗易懂的内容和活泼多样的形式向游人传播儒家传统文化，主题直击社会的关切，提升了公众的廉政意识和监督意识，是提升政府执政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

五是融合发展为儒家文化传承提供内生动力。珠海市和中山市是中国经济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之一，但并没有因为现代化而遗弃传统文化。相反，儒家文化对当地经济社会产生着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其一，珠海市、中山市的儒家文化在发展中嵌入其他类型的文化，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每一类型的被嵌入文化都为儒家文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点。其二，儒家文化在传承与发展中，没有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成为书本特有的知识或被某一阶层垄断，而是沉淀到社区层面，其自身包含的儒家文化元素潜移默化地深度嵌入居民日常的生活和意识中。儒家文化把人作为核心，这种人不是西方观念化的抽象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人。人的开放包容赋予文化同样的特点，是文化获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

四、促进珠海市、中山市儒家文化深度发展的路径

第一，深度挖掘，提炼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珠海市、中山市有着丰富的儒家文化资源。但是，这些历史素材没有形成具有本地特色的叙事，没有丰富生动的情节，细节模糊不清，历史的记载和传承缺乏细究，更缺乏对如“大丈夫”等具体精神的深度提炼。因此，增加相关故事的饱和度和鲜活度，形成带有当地烙印的叙事，提炼升华出本地的优秀精神，才能更好地反哺本地文化发展和城市

① 李菁：《天下为公：孙中山传》，第 84-88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55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526 页。

文明建设。以潮州为例，韩江之名源自韩愈，以韩江为中心有大量古建古城，包括著名的广济桥和牌坊街。在修缮每一处古迹时，当地都会挖掘整理出建筑背后生动的故事，包括每一处牌坊都有相关的人物、事迹和精神内涵。由此，在实物层面形成了以广济桥和牌坊街为核心的古迹景区，在文化层面构建起以韩愈在潮州实施“仁治”为核心的文化，包含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各个方面的精神与价值体系，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以凤凰单丛茶为代表的潮州茶文化和潮州特产的商业模式。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潮州时强调，潮州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潮汕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潮绣、潮雕、潮塑、潮剧以及工夫茶、潮州菜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弥足珍贵，实属难得。我们爱这个城市，就要呵护好她、建设好她。^①这为深度挖掘传统文化、促进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指出了方向。

第二，创新思维，探索优秀精神文化的良好呈现方式。宋末历史凝重壮烈，元素众多，但目前，与文天祥和崖山之战相关的素材几乎没有实体呈现，实物留存只有张世杰墓和宋皇室后裔聚居村庄的祠堂。这些元素缺乏深度挖掘整理，彼此间也缺乏关联呈现。参考上述潮州模式，珠海市和中山市可以把实物层面的资源列清单，找联系，先形成关联性较强的实物资源群。然后在挖掘详尽史料基础上，形成内容饱满、细节生动的历史故事。以实物和故事为基础，把其中蕴含的优秀精神分层次地提炼出来，最核心的精神必须最能直指人心，如潮州提炼的韩愈“仁治”思想。最后要以各种载体把故事和精神结合实物资源进行综合性的呈现。如珠海市可以把“宋末三杰”和宋末历史相关的资源组成资源群，把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相嵌合，形成综合性文化载体，大力弘扬舍生取义的“大丈夫”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打上珠海烙印。这必将极大丰富本地儒家文化的内容，为我国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提供优秀案例。

第三，关注发展全局，接地气与谋大局并重。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珠海市和中山市起到了关键性作用。2021年，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发展。珠海、中山和澳门同根同源，儒家文化是全体华人的价值依托，如何把儒家文化资源用于粤港澳深度合作，是一项具有急迫性和现实性的课题。这就需要横琴新区在建设中不仅要重视环境因素，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要重视文化因素，把以儒家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化城市建设中，有文化的人与自然才是更为全面的和谐，这一点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在未来发展中应该重点关注的领域。在未来的发展中，珠海和中山应该打破市域限制，着眼全局，多平台、多渠道、多样化促进粤港澳之间深度的文化合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注入文化血脉，真正实现全方位的合作发展。

第四，结合教育改革，探索儒家文化资源助力青少年教育。珠海市和中山市儒家文化留存，尤其是建筑类的留存，有巨大的公共空间。从目前情况看，空间较多用于老年人服务，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我国目前启动了基础教育改革，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语文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将成为重点，把优质儒家文化资源和青少年教育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与孙中山相关的资源开发比较成熟，开展了诸如游学等教育活动，但其他资源开发欠缺。青少年是未来，儒家文化资源应该大规模地引入青少年教育中，这将会大幅提高整体的人口素质。

珠海市、中山市在儒家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探索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道路，也为现代城市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性互动贡献了生动的案例。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在现代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治理、社区生活等各个方面发挥重要的、甚至是基础性的作用，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与各种文化的融合促进自身的蓬勃发展。相信随着现代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互动研究的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模式会呈现于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会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柱。

责任编辑：王冰 许磊

^①《习近平考察潮州古城：爱这个城市，就要呵护好她、建设好她》，《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3日第1版。

政 法 社会学

·中国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研究·

从资源分配到资源创造：再分配逻辑下的省内对口帮扶 ——基于广东的实践^{*}

岳经纶 吴永辉

[摘要]对口帮扶是我国推进扶贫开发与区域协调实践中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政策。然而，省内对口帮扶作为对口帮扶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未被充分关注。广东是内部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省份，无论是在扶贫开发还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广东都高度重视省内对口帮扶，在发展阶段的完整性和帮扶举措的系统化方面，广东均具有典型性。再分配是驱动广东省内对口帮扶政策变迁的基本依据，可以从再分配的层次、内容及目标三个方面全景呈现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发展趋势。从层次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区域再分配转变为以区域再分配引导城乡和阶层再分配；从内容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单一的资源再分配转变为资源与制度再分配；从目标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资源分配转变为资源创造。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引领下，省内对口帮扶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仍将发挥持续作用。

[关键词]省内对口帮扶 再分配逻辑 区域协调 乡村振兴 社会投资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44-09

一、问题的提出

在脱贫攻坚战略的关键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脱贫攻坚收官以后的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一个重要议题予以长期规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一项“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对口帮扶政策不仅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措施。全面总结对口帮扶的实践经验，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从既有的涉及对口帮扶的经验研究来看，其关注的重点是对口帮扶中的“东西扶贫协作”^①或者“对口支援”，^②缺乏对“省内对口帮扶”这一分支议题的应有关注。实际上，在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促进困难群体共同富裕的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研究”(22JZD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岳经纶，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永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① 吴国宝：《东西部扶贫协作困境及其破解》，《改革》2017年第8期。

② 杨明洪、张营为：《对口支援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行为——以对口援藏为例》，《财经科学》2016年第5期。

要内容的高质量发展任务体系中，省域内部的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应有之义。经由再分配策略开展的省内对口帮扶实践，不仅推动了区域协调与扶贫开发两个目标的协同落实，也能够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因此，从再分配的角度深入研究省内对口帮扶的实践，有助于审视和剖析其内在的重要价值。本文以较早开展省内对口帮扶的广东为案例，尝试解读再分配逻辑下不断演进的省内对口帮扶实践。

二、再分配逻辑：基于层次、内容与目标维度的分析框架

区域内部的发展失衡是制约一国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往往有催生贫困问题的潜在风险。为了削减这一内在困境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要一套合理的机制来进行各项资源的重新配置。市场和政府被视为是实现区域协调及解决贫困问题的两种基本力量。一方面，市场模式下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各项资源的自由流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特别是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欠发达地区而言，“落后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潜在优势”。^①这意味着一旦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得以释放，有望带来十分可观的增长动能，进而助推这些地区的经济进步。^②另一方面，尽管市场力量的优势十分显著，但市场模式并不会自动弥合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如果放任市场机制运行，反而有可能助长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相对剥夺，导致区域间发展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并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作为与市场并行的另一种路径，国家或者说政府也是进行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而政府视角的资源配置通常被称为“再分配”。一般来说，狭义的再分配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而广义上的再分配则可以指涉政府用以重新配置资源的各项政策。事实上，作为兼顾贫困治理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再分配主义”在20世纪末就已经逐渐流行。^③在这一思潮的鼓动下，政府力量在资源区域调配中的显示度日益增强，而在这一路径显著的政策效果的加持下，再分配的正当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对于我国而言，以东西扶贫协作为代表的对口帮扶正是再分配机制下的政策产物，而衍生于对口帮扶的省内对口帮扶，只不过是将参与资源配置的共同体范围缩小到省级行政区内部，在具体的政策举措上并没有显著差别。从这个角度来看，依循再分配的逻辑，能够对省内对口帮扶的实践进展进行阐释性分析，并理清再分配何以驱动省内对口帮扶。本文认为，基于再分配逻辑，可以从层次、内容及目标三个维度建构分析框架。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再分配的层次。从扶贫开发与区域协调的角度来看，再分配层次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区域、城乡以及阶层。这也是再分配政策施加作用的主要场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落实到不同层次的再分配政策，其政策取向则体现出一定差异。具体而言，三个层次的再分配政策分别旨在实现地域正义（即满足不同地区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需求）、^④破除身份限制（即公共服务的供给不与城乡身份绑定）^⑤以及缩减贫富差距（即通过积极的再分配政策缓解贫富差距的悬殊现状，进而实现共同富裕）。

其次需要关注的是再分配的内容。如前所述，再分配着眼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再分配的内容指涉的就是笼统意义上的可以重新配置的各类“资源”。如果对资源进行类型学划分，则可以进一步将其按照性质、用途或状况进行分类。本文无意对资源类型进行深入探讨，而是将关注点放到一类特定的资源——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影响的各类生产要素。

①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456.

② 黄蕊、金晓彤：《我国区域经济非平衡非充分发展的解决路径：创新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与重构——基于后发优势理论视角》，《经济问题》2018年第10期。

③ 方珂、蒋卓余：《东西协作扶贫的制度特点与关键问题》，《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10期。

④ Robert Walker and Dorothy Lawton, “Social Assistance and Territorial Justice: The Example of Single Payments”,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vol.17, no.4, 1988.

⑤ 岳经纶、方珂：《从“社会身份本位”到“人类需要本位”：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式演进》，《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最后需要关注的是再分配的目标。中国语境下的再分配其本质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可观测的角度来看，一个典型的再分配过程必然是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或者说是资源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的过程。如果进行了这种区域间的资源再分配，就可以认为再分配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同时，相较于外显性的资源分配，内隐性的资源创造也是目标体系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通过再分配激活被帮扶的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主体意识，应该是一个更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

综上所述，再分配逻辑的分析维度可以在层次、内容以及目标三个方向展开。下文将借助这一分析维度，全景呈现再分配逻辑下的广东省内对口帮扶实践。可以看到，在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中，分阶段实施的帮扶行动不仅完成了预期的政策目标，其政策手段也实现了对一般性再分配政策的超越和延展，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动能，为后续的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推进乃至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条件和实践基础。

三、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发展历程

(一) 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萌芽时期

为了缩小粤东西北与珠三角之间的巨大差距，广东省委、省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干部驻点扶贫的探索。1987 年，广东省开始选派省直机关干部赴贫困县驻点扶贫，这一政策实践一直持续到 2000 年。^① 尽管彼时的政策方案只是以驻点扶贫为突破口，将帮扶主体界定为干部队伍，并未在各市间建立明确的对口帮扶关系，但这一探索性的举措揭开了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序幕。

其后，广东省政府于 2002 年 10 月正式就省内各地市间的对口帮扶进行了决策部署，并出台了《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市与山区市县对口帮扶实施意见》(粤府办〔2002〕78 号)(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以帮扶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奔康为总目标，明确了珠三角 7 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江门、珠海、中山)的教育、卫生和科技等部门对粤东西北 6 市(梅州、河源、清远、韶关、揭阳、汕尾)20 个山区县(市)的结对帮扶任务(表 1)，要求帮扶双方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五年帮扶规划，同时引导社会力量支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改善生产生活条件，而重点的合作领域则聚焦于劳务输出和经贸发展两大部分。在这一时期，广东以省级文件的形式明确要求将省内对口帮扶关系扩展到市级层面，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的帮扶任务体系逐渐建立起来。

不过，由于缺乏系统性的扶贫战略作为依托，这一阶段的省内对口帮扶相较而言还存在着一定的简单化倾向。在帮扶政策工具选择方面，过于强调资金投入，而不是根据被帮扶方的具体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帮扶策略。例如，《意见》明确规定帮扶方应协调确保财政每年无偿支持每个对口山区县 500 万元，并按 5% 逐年递增。尽管资金投入对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分侧重资金投入的扶贫方式实际上仍在沿袭“输血式”扶贫的常规路径。帮扶策略的单一化和简单化未能实现帮扶内容和帮扶形式的拓展，忽视了综合性帮扶手段的内在价值，致使贫困地区的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也未能得以有效激发。

此外，这一阶段的对口帮扶关注政策执行过程，相较而言忽视了针对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虽然《意见》确立了对口帮扶工作的主要

表 1 珠三角经济发达市与山区市县对口帮扶一览表

帮扶市	被帮扶市	被帮扶山区县(市)
广州市	梅州市	帮扶全市，对口大埔、丰顺、五华、平远、兴宁 5 县(市)
深圳市	河源市	帮扶全市，对口紫金、东源、和平、连平、龙川 5 县
佛山市	清远市	帮扶全市，对口阳山、连山、连南、清新 4 县
东莞市	韶关市	帮扶全市，对口乳源、新丰 2 县
江门市		帮扶全市，对口乐昌、翁源 2 县(市)
珠海市	揭阳市	帮扶全市，对口帮扶揭西县
中山市	汕尾市	帮扶全市，对口帮扶陆河县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关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市与山区市县对口帮扶实施意见》(粤府办〔2002〕78 号)整理。

^① 方刚：《广东全面开展扶贫工作初期的三大举措》，《源流》2019 年第 12 期。

任务,但帮扶双方并未围绕帮扶任务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导致帮扶成效既不易识别也无法实现横向可比。由于缺乏一套便于全面识别帮扶效果的绩效考核标准,为了凸显对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数字指标呈现的年度帮扶资金及投入的增长率便成为了帮扶方可选择的最为理想的帮扶指标。而对这种指标的重视则进一步加剧了帮扶策略的简单化倾向。

总体而言,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萌芽时期在整合多元化帮扶工具方面尚存不足,偏重资金投入的工具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其他帮扶策略的发展空间。不过,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帮扶双方把握住了省内对口帮扶这项制度设计的初衷,相关的专项帮扶资金及时用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扶贫开发项目,其益贫效果也较为可观,进而为后续省内对口帮扶制度的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

(二) 扶贫开发“双到”时期的广东省内对口帮扶

在《意见》出台以及第一个对口帮扶五年规划实施后,广东省内较为落后的粤东西北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等主要指标均实现了量的增加和质的突破,基础设施建设渐次推进,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也实现了稳定的供给。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广东省内的区域发展失衡和农村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区域发展失衡自不必说。长期以来,时间维度上的发展速度与区域层次上的发展差距在广东省内始终是一个难以协调的问题症结:在粤东西北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与珠三角地区的相对发展差距却在进一步扩大,后发优势尚不足以消弭资源集聚的长期效应。此外,农村贫困问题依然严峻。国务院扶贫调研组2008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按照当时的广东省定扶贫标准,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省农村总人口的6.14%,高于全国4.60%的农村贫困发生率。^①

以此为背景,在充分调研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科学总结既往扶贫开发经验的基础上,广东省委、省政府于2009年在全省推行“规划到户、责任到人”(以下简称“双到”)扶贫开发新模式。这一模式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形成合力,通过信息化管理、“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定点对口帮扶等综合性扶贫举措,创造性地率先进行了省级扶贫方面的“精准”实践。^②其中,省内对口帮扶已不再作为一项孤立的政策,而是作为扶贫开发“双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抓手作用。

扶贫开发“双到”共分两轮进行(2009—2012,2013—2015)。在两轮“双到”期间,广东对省内的对口帮扶关系进行了一些调整。具体而言,第一轮扶贫开发“双到”期间,广东依托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进一步发挥珠三角对粤东西北地区在市级合作产业转移园上的帮扶作用(表2),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了贫困人口收入。

第二轮扶贫开发“双到”期间,为了降低管理协调难度,集中帮扶资源,广东于2013年3月以原共建产业转移园的结对帮扶关系为主,部分调整了省内对口帮扶关系(表3)。

此外,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粤发〔2013〕9号)和《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关系的通知》(粤办发〔2013〕27号),广东于2013年11月从促进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角度调整了珠三角6市和粤东西北地区8市的帮扶关系(表4)。

总体而言,扶贫开发“双到”时期的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相比于萌芽时期,在帮扶策略的设计上出现了重要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帮扶责任的清晰界定。为了防止因帮扶

表2 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市级合作产业转移园帮扶关系

帮扶市	被帮扶市
广州市	阳江、湛江、梅州市
深圳市	汕尾、潮州市
珠海市	茂名、揭阳市
佛山市	清远、云浮市
东莞市	韶关、惠州市
中山市	肇庆、河源市
江门市和汕头市自行负责本市产业转移工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合并对口帮扶关系的通知》(粤办函〔2013〕118号)整理。

① 吴晨、葛孚桥:《广东扶贫开发中“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理论探讨》,《广东农业科学》2011年第19期。

② 岳经纶、吴永辉:《从“双到”扶贫到“精准扶贫”:基于广东经验的中国扶贫之路》,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11页。

责任界定不清而出现的推诿卸责和帮扶缺位，在第一轮扶贫开发“双到”期间，广东即出台了《广东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帮扶与被帮扶双方工作责任》(粤贫〔2009〕12号)，明晰了帮扶与被帮扶的群体划分及工作责任，有力地推动了帮扶工作的开展。具体而言，帮扶方的职责涉及成立专责小组、制定帮扶措施、积极筹集资金、做好登记管理、定期汇报情况、开展跟踪检查、组织考评工作等多个方面。特别是在考核评估方面，为了促进和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对“双到”工作的重视，推进各项帮扶工作的有序开展，确保定点帮扶目标的如期实现，广东省委、省政府借助《广东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考评办法》(粤贫〔2010〕1号)和《广东省扶贫开发工作问责暂行办法》(粤办发〔2010〕25号)明晰了帮扶工作中考评和问责的对象、办法、内容及奖惩措施。

二是愈加注重社会帮扶资源的有效利用。扶贫开发“双到”期间，为了引起广东全省对扶贫工作的重视与参与，“广东扶贫济困日”得以设立。^①以此为契机，广东省每年都会围绕特定主题举办类型丰富的扶贫活动。为了鼓励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在“广东扶贫济困日”的系列活动中作出贡献，广东还特别通过授予“广东扶贫济困红棉杯”，对在“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对象进行集中的荣誉表彰。在此过程中，地处帮扶方企业的市场优势、科研院所的智力优势、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以及民众的慈善热情都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丰富的社会帮扶资源得以有组织地向贫困地区不断注入。

三是对口定点帮扶的细化分类。第二轮扶贫开发“双到”按照帮扶难度将贫困村分为重点帮扶村与非重点帮扶村，将贫困户分为有劳动能力和无劳动能力，并据此精细化分配不同的单位进行定点帮扶。同时，对于驻村干部的选派和管理，广东省委组织部和广东省扶贫办以《关于做好新一轮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驻村干部选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粤组通〔2013〕32号)进行具体的规定。定点帮扶的细化分类在避免资源浪费的同时，进一步保证了帮扶成效的获取。

通过历时性梳理能够发现，广东既往的对口帮扶策略实际上是沿着两条路径实施的。一是扶贫开发中的对口帮扶，典型例证是两轮扶贫开发“双到”中珠三角对粤东西北地区的帮扶。二是区域协调中的对口帮扶，如2013年《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的决定》(粤发〔2013〕9号)发布后，广东调整了珠三角对粤东西北的帮扶关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两条帮扶路径是并行的，但无论目的是扶贫开发还是区域协调，对口帮扶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政策手段往往能够实现综合性的政策效果。

换言之，尽管两条帮扶路径的靶向并不一致，但考虑到扶贫开发与区域协调有着紧密的联系，特别是二者对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持续发展、社会事业进步等方面给予了共同的关注，所以以扶贫开发(区域协调)为主要目标的对口帮扶政策实际上也有助于区域协调(扶贫开发)。如果实现两条路径的整合，或许能够提高帮扶资源的利用效率。从实践来看，广东在2016年开展的脱贫攻坚行动或许正是秉承了这样的整合思路。

^① 经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倡议，国务院批准，确定自2010年起，每年的6月30日为“广东扶贫济困日”。

表3 第二轮扶贫开发“双到”期间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的对口帮扶关系

帮扶市	被帮扶市
广州市	清远、湛江、梅州市
深圳市	汕尾、潮州市
珠海市	茂名、阳江市
佛山市	清远、云浮市
东莞市	韶关、揭阳市
中山市	肇庆、河源市
江门市、汕头市和惠州市自行负责本市产业转移和“双到”工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合并对口帮扶关系的通知》(粤办函〔2013〕118号)整理。

表4 粤东西北振兴发展战略下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的对口帮扶关系

帮扶市	被帮扶市
广州市	清远、梅州市
深圳市	汕尾、河源市
珠海市	阳江市
佛山市	云浮市
东莞市	韶关市
中山市	潮州市
汕头、湛江、茂名、揭阳四市不安排对口帮扶，由省里直接给予部分支持，同时享受粤东西北的各项政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珠三角地区与粤东西北地区对口帮扶关系的通知》(粤办发〔2013〕27号)整理。

(三) 脱贫攻坚时期的广东省内对口帮扶

脱贫攻坚期内，广东在综合考虑既往扶贫开发和区域协调中的对口帮扶关系的基础上，将两条路径的对口帮扶进行合流，重新调整了珠三角6市和粤东西北12市之间的对口帮扶关系（表5）。

从对口帮扶的实践来看，最新一轮的广东省内对口帮扶不仅规避了既往两条路径并行所带来的管理混乱和资源浪费，而且超越了资源供给的低水平帮扶，更加注重制度上的建设、理念上的改造和发展环境的培育。例如，珠三角城市与粤东西北城市之间建立党政联席会议机制、选派珠三角地区的领导干部到粤东西北地区挂职（如对口帮扶总指挥兼任帮扶市与被帮扶市两市的市委常委）、帮扶人员牵头招商引资、鼓励粤东西北地区参与在珠三角举办的各类城市发展研讨会（论坛）等。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推动了成熟制度与创新理念的扩散，成为广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法宝。

从萌芽时期的初步探索，中经扶贫开发“双到”时期的创新实践，再到脱贫攻坚时期的路径整合，广东省内的对口帮扶走过了一段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发展历程。在历时性推进过程中，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策略出现了鲜明的变化。为此，需要思考的是，在阶段变迁的过程中，什么因素主导了帮扶策略的变化？本文认为，对口帮扶可被视为一个再分配过程，而从再分配的角度解读对口帮扶，也有助于我们明晰策略变化背后的逻辑变迁。

四、从资源分配到资源创造：再分配逻辑下的省内对口帮扶

(一) 再分配的层次：从区域再分配转变为以区域再分配引导城乡和阶层再分配

从实践来看，广东省内对口帮扶实施之初，帮扶主体和帮扶策略即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再分配特征。首先，在对口帮扶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地方政府是跨区域资源分配的直接主体，^①在对口帮扶的萌芽时期，珠三角地区的地级以上市政府即承担了主要的帮扶责任，直接履行各项帮扶任务。尽管政策文件对开展社会帮扶进行了鼓励和倡导，但相关部门却并未为社会力量的参与开辟政策空间。彼时，由于对口帮扶还未上升到战略高度，政府力量的直接参与已能够完成基础性的帮扶任务，社会力量的参与反而会带来监管问题。考虑到社会力量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发育不足，客观上也不完全具备全面参与的能力。其次，萌芽时期的帮扶策略集中表现为帮扶方对被帮扶方进行无偿的资金注入，而这种政府主导的府际间横向财政转移正是区域再分配的典型表征。在这一时期，帮扶成效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包括无偿帮扶资金在内的资源投入。

自扶贫开发“双到”实施以来，省内各市间的对口帮扶逐渐上升到战略高度，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对口帮扶被视为广东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一方面，既往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帮扶路径有助于推进各项帮扶政策的落地，因此无论结对帮扶关系如何发生变动，政府主导始终是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的体制安排下，“党关注的议题”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能够带来超越科层体制的强势执行力量，而广东省委、省政府高规格的联合发文所传递的政治信号，更进一步为对口帮扶政策赋予了强劲的政治势能。^②不过，在贫困治理这类复杂任务面前，单一的政府力量已经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对口帮扶格局开始得以构建。尽管如此，在新的帮扶格局中，珠三角地区的地级以上市政府依然沿着区域再分配的路径向被帮扶地区进行直接的资源投入，财政资金的横向转移是省内对口帮扶中始终贯穿的重要策略。

^① 王士心、刘梦月：《东西部协作扶贫须做好资源跨区域分配》，《人民论坛》2019年第3期。

^② 贺东航、孔繁斌：《中国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政治势能——基于近20年农村林改政策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表5 脱贫攻坚期内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地区的对口帮扶关系

帮扶市	被帮扶市
广州市	清远、梅州市
深圳市	汕尾、河源市
珠海市	阳江、茂名市
佛山市	湛江、云浮市
东莞市	韶关、揭阳市
中山市	肇庆、潮州市
汕头市、惠州市和江门市自行负责本市的脱贫攻坚工作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粤发〔2016〕13号）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扶贫开发“双到”时期实施的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实际上也是区域再分配的另一表现形式：作为帮扶方的珠三角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东西北地区转移，而粤东西北地区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则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以此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同于直接的横向财政转移，“双转移”战略的定位事实上是互惠基础上的资源置换，人力资源和产业资源通过地理位置的置换实现了空间的再利用。从这个视角来看，这种帮扶策略可被视为区域再分配的创新探索。

与此同时，相较于区域再分配的路径依赖，城乡再分配和阶层再分配在广东省内对口帮扶政策中的显示度也日益提高。在脱贫攻坚时期，广东制定了“两不愁三保障一相当”的脱贫目标，其中，“一相当”指的是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是广东省在国家目标上增加的新目标，也体现了城乡再分配维度上的政策目标。就对口帮扶政策而言，这一目标意味着帮扶市应助力被帮扶的贫困地区发展民生社会事业，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为了完成上述目标，财政资金的投入作为推进城乡再分配的重要手段依然不可或缺，帮扶市提供的资金、项目、技术等各类资源要素经由派驻工作队直接投向对口帮扶的定点贫困村。从这个角度来看，城乡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再分配的延伸和拓展。尽管被帮扶方成为了城乡再分配的具体执行者，但帮扶方的资金投入继续发挥着推进城乡再分配的重要作用。

此外，在新的帮扶格局中，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社会动员能够实现资源集聚，^①而社会动员的高效运转则需要发挥精英人群的引领作用。^②从阶层再分配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够充分动员资源富集的企业家和中高收入群体参与省内对口帮扶，无疑会进一步提高帮扶成效。2016年发布的《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三年攻坚的实施意见》（粤发〔2016〕13号）在“实施对口帮扶”方面专门提出要“落实企业和个人公益扶贫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旨在为慈善帮扶提供强劲的动因。广东省通过“广东扶贫济困日”的扶贫资源动员以及专门面向企业开辟的“万企帮万村”专项帮扶通道，引导企业家积极参与省内对口帮扶。在“广东扶贫济困日”举办10周年之际，广东省扶贫办会同相关部门组织认定了有突出贡献的10名优秀个人，而这10人的身份都是企业家。

此外，作为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一条重要途径，消费扶贫在广东省内对口帮扶中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在消费扶贫的开展过程中，为数众多的企业家和个人或是通过认购的方式积极购买消费扶贫名单中的各类产品，或是以搭建交易平台的方式帮助消费扶贫产品拓宽销售渠道。一系列举措充分表明，广东省以非强制性的，或者说柔性激励的方式推进了阶层再分配，企业家的广泛参与也为省内对口帮扶注入了强劲动力。

总体而言，从再分配层次来看，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特征是从区域再分配转变为以区域再分配引导城乡和阶层再分配，区域再分配是贯穿始终的重要路径，而城乡再分配和阶层再分配也逐渐成为补充性的路径选择。

（二）再分配的内容：从资源再分配转变为资源与制度再分配

从再分配的内容着眼，可以发现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另一趋势，即随着发展阶段的推进，资源再分配的政策取向逐渐转变为资源与制度再分配的并行。实际上，资源再分配的政策取向内嵌于区域再分配的分配路径，在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萌芽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所谓的资源再分配可以简单理解为“给钱给物”的财政帮扶策略。就一般性的财政脱贫理论而言，财政帮扶和金融帮扶被视为应对贫困户发展资金不足的最为常见且主要的手段，^③对于缓解贫困有着显著的效果。但是，在财政帮扶下的资源再分配达到了一定程度时，既定资源投入下的帮扶成效便会引发是否可持续的质疑。

① 贺治方：《社会动员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合理边界》，《学术界》2019年第7期。

② 李晓燕：《社会动员的双重逻辑：社会理性和精英治理》，《党政研究》2020年第5期。

③ 吴本健、葛宇航等：《精准扶贫时期财政扶贫与金融扶贫的绩效比较——基于扶贫对象贫困程度差异和多维贫困的视角》，《中国农村经济》2019年第7期。

广东省内对口帮扶实践对上述质疑进行了验证：随着资源再分配趋于稳定，帮扶成效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趋势，甚至在低水平锁定。为了突破这一困境，广东省内对口帮扶在维持资源再分配的基础上，开始谋划推进制度再分配。广东的决策者认识到，物质财富的不足只是贫困的表象，贫困的本质是制度缺位所造成的贫困对象发展权利的丧失。在这样的思路引导下，自扶贫开发“双到”开始，广东即着眼于省内对口帮扶战略中的制度创新，而这些举措集中体现在帮扶中的组织建设。

从组织建设的角度来看，广东省内对口帮扶实现了顶层与基层的双向布局。一方面，帮扶双方以党政联席会议机制、领导干部交流挂职等方式开辟直接沟通对接的平台，降低信息传递的层级和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全面制定发展规划。由此可见，帮扶双方在决策层面结成了目标一致的领导团体，这是制度赋权推动省内对口帮扶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广东在扶贫开发“双到”时期即在基层进行了驻村干部的制度创设，保证至少1名优秀干部驻重点帮扶村工作。脱贫攻坚期内，驻村干部制度进一步向第一书记制度演进，为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时期，广东省创新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工作新机制，将驻镇帮镇扶村工作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该举措通过向镇级派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实行分级分类帮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抓手和主平台。

（三）再分配的目标：从资源分配转变为资源创造

一般意义上的再分配往往着眼于存量资源的分配，而不是创造新的资源，或者扩大资源的增量。为此，如果能在再分配的过程中实现资源由存量向增量的转变，无疑能够推动贫困地区的内生性发展。综观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历程，再分配层次的拓展与内容的延伸，实际上皆是服务于目标的变迁，而目标的变化可以被归纳为从资源分配转变为资源创造。

从动因来看，资源分配不均是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重要逻辑起点，而为了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破解贫困地区的发展困境，帮扶方从资源分配的角度开展了长期的帮扶活动。如果仅就存量资源进行空间上的调整，实际取得的帮扶成效较为有限，而经由再分配提升对口帮扶成效的关键节点在于形成消耗性资源向再生性资源转变的良性循环。随着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渐次发展，“资源创造”的再分配目标愈发鲜明。这一目标下的政策指向是“为贫困地区赋能”。具体而言，围绕“为贫困地区赋能”这一基点，广东经由再分配路径，着力于将激发内生力量和进行社会投资内嵌于省内对口帮扶的整体框架。

就激发内生力量而言，这是实现“资源创造”的根本之策。从现实情景来看，党和政府的治贫态度与贫困人口的脱贫态度并不总是同向的，由此造成的差异化行为选择屡见不鲜。一方面，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足以表明中国在贫困治理方面是“有效国家”。另一方面，长期的贫困治理历程却始终存在部分贫困户自身的“不作为”，这种不同于物质贫困的精神贫困是造成扶贫资源济贫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考虑到唯有合理施策的政府与积极行动的贫困户之间的结合，才能够达致最有效的扶贫效果，^②因而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性力量和主体性意识应成为实现“资源创造”的应有之义。

从广东省内的对口帮扶实践来看，各帮扶单位派驻到贫困村的第一书记充分挖掘贫困地区的特色与优势，重寻乡村价值，帮助贫困人口建立对自身优势的充分了解，唤醒自我意识，进而产生乡村自信和个体自信，打破精神贫困的桎梏。同时，第一书记还就地开展了建强基层组织、制定村规民约、完善村民自治机制等一系列帮扶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由于内生力量得到了激发，加之经过帮扶后的贫困地区拥有了稳步提升发展能力的组织基础，结合本地实际的发展策略不断涌现，进而开启了资源创造的探索道路。

^① 郭小聪、吴高辉：《第一书记驻村扶贫的互动策略与影响因素——基于互动治理视角的考察》，《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4期。

^② 邓大才：《积极国家：反贫困战略中的政府干预与理论基础——基于国际反贫困战略的比较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社会投资是实现“资源创造”的核心机制。广东在省内对口帮扶中重视社会投资理念的运用，充分发挥人力资本投资和资产建设等基本策略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广东省通过参与省内对口帮扶的各类技工学校，积极开展智力扶贫，开辟面向贫困地区适龄学生的招生通道，在重点教授技术的同时构建完善的“奖、勤、助、补、免”保障体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为了促进贫困人口的社会和市场参与，广东在对口帮扶策略构成中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和就业扶贫，切实保障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和贫困人口的稳定就业。帮扶方一方面因地制宜发展贫困人口参与度高的区域特色产业，依托特色产业开设“扶贫车间”和“扶贫工作坊”，实现了贫困人口在“家门口”就地就近就业，推动了产业扶贫与就业扶贫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帮扶方在对贫困人口进行技能培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贫困地区的劳务对接机制，拓展贫困人口的就业空间。在资产建设方面，广东省在对口帮扶过程中积极推动金融扶贫。除了投放精准扶贫贷款和扶贫小额信贷，广东各类金融机构还与电商平台、快递公司开展全方位合作，打造“金融+电商+寄投”模式。具体而言，金融机构为对口帮扶的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的初期贷款，待农产品成熟后联系电商平台建立销售渠道，最后再经由快递公司发运，通过资源整合显著提升了帮扶成效。

可以说，伴随着广东省内对口帮扶不断向纵深推进，无论是被重视的贫困地区，还是被赋能的贫困人口，其摆脱贫困、发展生产、走向富裕的内生力量得到了充分激发，加之社会投资的积极助推，再分配目标已经实现了由资源分配向资源创造的转变。

五、结语

从20世纪80年代的初步探索，到脱贫攻坚阶段的稳定成型，广东省内对口帮扶走过了一段长期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资源的再分配是对口帮扶政策实践的一条主线，而再分配的逻辑演进则驱动了对口帮扶阶段性的变迁。总体而言，可从再分配的层次、内容及目标三个方面全景呈现广东省内对口帮扶的发展状况：从层次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区域再分配转变为以区域再分配引导城乡和阶层再分配；从内容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单一的资源再分配转变为资源与制度再分配；从目标上来看，广东的省内对口帮扶是从资源分配转变为资源创造。

时至今日，脱贫攻坚业已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接棒成为促进农村全面发展的主导性战略。党的二十大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①而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仍需在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增强群众内生动力以及统筹公共服务布局等方面持续发力。当前，广东省深入实施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正是围绕上述议题开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并要求以“深化拓展省内帮扶协作，建立纵向支持、横向帮扶、内部协作相结合的机制”作为重要的保障措施。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省内对口帮扶这一战略仍然有其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

责任编辑：王冰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0-31页。

·技术与社会·

数字鸿沟及其跨越： 一种技术公共性重建的实践理性视角^{*}

袁祖社

[摘要]飞速发展的智能革命时代，数字鸿沟的产生、蔓延以及不断的加剧、升级，究其根源是狭隘的技术价值（利益）本位理念所导致的阶层间裂隙的扩大与冲突的加剧，以及新的特定社会群体之生存不平等问题的集中体现。对此，需要立足反身性理论，运用场域理论，围绕技术边界与限度、技术问题社会综合治理实践和公共性价值规制的制度安排，重新审视技术与人的社会性生存、技术美好社会的伦理文化根基、现代“技术公民”的权利以及总体性意义上技术与生活的合理性关系。

[关键词]数字鸿沟 技术公共性 实践理性

[中图分类号] D035-3；B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23）04-0053-06

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纳首次提出“知沟”假设，认为当大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不断增加时，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将会比拥有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快地获取信息。^①数字鸿沟具体表现为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人群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占有和应用程度不同造成了信息落差、知识分隔、技术技能的不平等、文化进步程度差异扩大以及经济差距和新的贫富分化等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信息化、智能革命促进了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互联网+智慧养老”“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的出现，宣告了数字化生存成为新的社会现实。但是，技术本身的二重性导致数字化还产生新的不平等，老年数字鸿沟是其中最突出的社会性难题之一。数字鸿沟对于技术本位时代数字化理论的发明者和实践倡导者而言，不是大的难题。这样一种傲慢和自信，源于技术乐观主义的信念支撑。反思性批判要求研究者关注的不是有关“数字鸿沟”的经验性的现实展示，而是使得“鸿沟”成为可能的背后的理据和逻辑。

一、技术公共性视角的介入：技术与社会、人性和人的生存及日常生活之间多维关系的审视

数字鸿沟问题及其语境、语义的生成，是技术化价值本位的全球性生存情境推波助澜的结果。就一般意义而言，技术的发现、发明和发展过程，伴随着技术自身公共性的赋值性获得、丧失以及重建中再度获得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是人类在更高的立足点上，对技术与社会、人性和人的生存之间多维关系之生态位不断审视、重建和恢复的过程。

对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审视，首先需要法国学者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介入，布迪厄指出：“我将一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创性贡献与世界意义研究”（20&ZD026）及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字弱势群体社会融入的媒介支持研究”（22BXW04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袁祖社，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710119）。

① 刘雪梅：《大众传媒发展知沟现状刍议》，《当代传播》2003年第4期。

个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①场域的出现是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的结果，“在场域中活跃的力量是那些用来定义各种‘资本’的东西。”^②技术引导、资本支配的场域一旦产生，就会依照自己的逻辑，在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一种新的权利。具体的社会成员所获得、掌握的知识化资本的总量及其势位，客观上确定了其在特定场域中的位置，与技术、权利合谋的资本数量及其相应分配机制，决定了特定社会空间的结构。可见，场域本质上是由社会成员依照某种技术和资本逻辑要求集体参与建设的结果。就其核心和实质而言，不过是普遍意义的抽象符号竞争和现实个人价值化生存方略的自主性选择。就其动机和目的而言，是指向某种有特定价值的“符号商品”的生产。这一商品的价值，离不开消费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消费社会中大众基于个体兴趣和意愿对其所做的重新归类。因此，符号的创制、认同和消费实践决定着商品价值的大小和有无，这一逻辑会反过来影响和支配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布迪厄以“符号暴力”表征其特质。

场域理论关涉着反身性 (reflexivity)，也称反思性、自反性等，同样是西方社会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依照对这一问题的共通性解释，反身性是理论和研究实践中的一种“德行” (virtue)，强调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历史、社会处位和实践，以社会性的立场，对技术主导的知识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做全面的批判性审视，以此为据对特定知识生产的理念、逻辑和方式以及其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和实践前景等提出前瞻性的评估，从而要求掌握知识生产和技术成果社会性运用的特定权力阶层，基于不同社会群体价值意愿，改变其策略，确保知识的生产、技术成果社会性运用的实践与人性自身的进化逻辑、人类文明的方向等尽可能保持一致。反身性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约束技术运用的规范性逻辑，构成知识生产、技术运用以及政策制定和决策的参与者的思考和所参与客观情境之间的反馈循环。

场域理论、反身性理论及其话语范式，提供了一种对于新技术与数字鸿沟产生的社会文化根源、所以可能的合理性的由来，数字鸿沟综合性、整体性社会治理方略以及基于优良制度理性所展开的集体行动的选择等问题进行有效思考的较为恰当的视角和相应的确当性立场。人类历史进步以及生存和生活实践中所获得的自主性品质，可以因技术进步不断丰富内容、增强其韧性和张力，但是技术不可能取代自主性本身。也正因此，虽然技术的进步产生了人不断加深的“异化”现象，人类也曾沉溺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的体验之中。但即使如此，人从来没有在完全意义上心甘情愿地接受技术的摆布，在享受技术的过程中完全自我放逐。由于人的文化、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存在，人在自己和技术之间永远保持一种必要的、可能性的张力空间，人不会轻易地将自己全部交给技术，或者向某种技术臣服。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过程中所创生的所谓“技术的联系”，本质上只是人的真实的社会性联系的一部分。这种联系之所以在近代随着启蒙现代性、市场经济、社会现代化实践以及技术理性、资本逻辑的合谋，成为一种新支配性关系，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技术本身。技术根本不足以将自己造就为一种强势性的存在。技术社会学的研究显示，技术之所以呈现某种样态，完全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的制度形态中，某种利益集团出于某种秩序维护的需要有意为之的结果。虽然各种真实的社会联系形式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但技术联系和通常意义的社会联系和文化联系，在潜移默化之中被逐渐改变了。社会联系的隐匿或者匿名化的结果，使得人们误以为，技术联系就是人之为人的真实的、唯一的联系，是人之为人、社会之为社会、历史之为历史，以及整个世界之为世界的内核与本质，这使得人与整个对象世界的合理关系完全被颠倒了。

现代社会，“人”被抽象化了，人与技术的联系变成了所有联系中最为直接、重要、核心的联系形态。技术联系使得任何人如果不想被这个社会所淘汰，要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一种合理性存在，就必须接受技术的规制，让自己在每一个方面完全成为“技术的”，似乎这就是一个“现代人”的标志和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华康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3-134页。

^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56页。

表征。毫无疑问，这样一种设定没有任何合法性的理由和先在性前提。人类演化、发展的历史表明，技术只是人对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技术的出现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和生活质量，但是无论在何种意义上，技术都不是人类历史、人的存在的全部。技术的确可以提供、创造人对于价值、意义的新的理解和体验，但技术永远不能成为意义和价值本身。在技术的发现、使用过程中审视技术之为技术的理据和方式，回归技术的初心和本质，是现代社会对待技术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技术的存在和使用，技术作为改变世界的方式和工具，绝非一个单一因素孤立起作用的结果。技术以它自己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社会秩序的建构。技术的这种僭越意味着其对自己本质的违背，从而蜕变成了一种对于人的新的主宰和奴役方式，产生了一种新的技术文化对抗。这种新的形式一旦产生，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扩张性，向其所及的所有领域无限扩张。“人类生活、社会和生物圈中的各个元素在技术上重新组织之后形成了一张全球网络，而这个全球网络就是新的技术秩序。技术进路把各种元素从自然执行和文化秩序中提取出来，对它们加以改造，之后再将它们重新安插到技术秩序之中。现在，这些元素已经可以于这个技术秩序实现完美无暇的匹配了。”^①

技术进步的历程、新技术的发现和社会性运用历史表明，技术本身可以形成、重组人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为人类个体对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提供多样化、更优的选择与可能，但即使如此，技术依然不能在根本的意义上取代人之为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完全个性化的对生活的信念、态度、生活价值、生活方式的自主性选择。不难想象，如果一种技术强大到可以左右、支配人类历史、生活以及何以如此的最深刻的理性根基，那么这必将带来悲剧性的“技术神话”。技术一旦产生，就是一种时时刻刻试图参与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存在样貌的力量。对于作为“形式上”的技术主体（此处所谓“形式”意指对于技术而言，人是唯一、绝对的控制因素），始终面临着要么依照人的意图“改变技术”，要么任由“技术改变人类”的两难选择。作为技术的发现者、创造者和应用者，人当然希望作为人造物的技术顺从人的意愿，尽可能保持客观、中立，尽可能确保技术的实践过程与人性、人的文化与人类所期待的文明之间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但是，人类史、制度史、文化史、技术史等的演进，却并非完全如人所愿，冲突甚或不同形式的背反现象时有发生。“技术进路的第一个后果就是知和做同经验和文化的分离，这样一来，就把某物变‘更好’的做法从文化领域搬到了被技术日益侵染的领域……第二个后果是使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革。过去人们参与活动的方式呈现出一种自我调整的品格，现在这种品格被破坏了，却辅以外部管理。”^②

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社会的新的生存情境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生活的多因素、多维度与完整性同时呈现和始终在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情境决定了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化和可能性，纯粹技术理性失去了对于人类生活的支配性。在此种情形下，技术公共性实践之最现实的、最紧迫的要求，就是让技术回归生活情境，从技术主体和技术发现者、技术使用者的现实生活出发，重新确立技术使用的制度化框架及其对于世界建构的生活化逻辑，为技术主体提供基于具体生活情境的价值获得。

二、呼唤技术公共性本质的价值回归：重建数字化生存的公共性伦理

后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民族国家本位的利益纷争，强化了数字鸿沟强者为王的优势心理，容易产生新的数字化生存壁垒和以及数字化意识形态。从学理性上讲，包括技术在内，一切属于人类智力劳作的产品，都必然具有与生俱来的公共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基于人类生存与生活的公共性理念，得益于人类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公共性实践，在技术的发现、进步与合理的社会运用中，逐渐改善、优化人类整体性的生存境遇，最大限度地不断增进人类公共价值总量，从而在根本性意义上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和生存境界。技术公共性逻辑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技术史、社会史以及人类

^① [加]威廉姆·H. 凡登伯格：《生活在技术的迷宫中》，尹文娟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第233页。

^② [加]威廉姆·H. 凡登伯格：《生活在技术的迷宫中》，第271页。

生存与生活史的考察表明技术现象的形成，绝对不是个体化的、偶然性的，它是人类集体性心智进化和合作的产物。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等的产生，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工具的进步，伴随着人类创造和获取财富能力的提高，伴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社会和自身认知、判断、理解能力的加深等……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层次和不同程度上，扩展着人类的生存境界和生活质量。相应地，技术也从来不会因为负面效应的不断增加而停止或者减缓步履。

可见，技术进步遵循着的一种常态逻辑，其实就是技术的公共性逻辑。技术公共性旨趣的核心要义，本质上是自明性的。其一，它坚定地指认技术在其本质上是人类在特定的制度共同体中集体理性劳作的产品，理应是成果共创、普惠共享的。因此，公共性理应是技术至高无上的品质和内在属性；其二，技术公共性主张技术的发现、变革和进步理应有益于人，造福于人。技术发展的步履应和人性的演化逻辑保持一致。技术的逻辑要服从人的逻辑，按照人的方式助人为人。人的尊严、幸福是技术的底线、边界和内在限度。然而，从历史以及人类现实的生存与生活的实践着眼不难发现，技术自产生以后，因其与生俱来的二重性，技术公共性逻辑在历史进程中屡屡受挫，助长了各种形式的技术怀疑主义、技术悲观主义以及某种形态的技术无政府主义。在上述观点看来，一方面，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使得技术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复杂的环境和要素相关性，技术公共性理念和主张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具有乌托邦倾向。另一方面，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技术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内在特质。近代以来，技术及技术的社会化运用本身，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技术社会性运用的结果，往往产生有违技术发明者初衷的现象，如此，技术距离自己的本质渐行渐远。

文明人类史的演进历程表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制度情境中，社会历史主体认识、对待、理解技术的理念、方式，必然有很大的差异。技术公共性的有无以及对待技术公共性的方式，或者技术公共性的实现程度和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影响、决定着人类文明演进的方式和方向；另一方面，在社会中产生又始终依附于社会的技术本身总是被统治阶层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加以使用。所谓“技术民主”概念在先发现代化国家政治实践中的使用，就是一个明证。针对技术社会化运用弊端问题的价值治理方式的前提，是充分认识到一个高度复杂的、高度风险化社会中，技术社会化运用所产生、所出现的问题，会带有较大程度的随机性、突发性以及危害的全球性、长期性，而导致这一类问题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减少以至于从源头上杜绝此类问题的产生，依靠单一手段无法真正奏效。

技术的初心和本质，是让人类生活更美好。技术本来是一种改善人类生存，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们交互理解，共享人类创造性成果的平等力量，此既所谓“被正确理解了的技术”的民主和技术的政治、技术的伦理与道德治理所应有的内涵。作为科学理论的社会性应用，制度化情境中的技术，肩负着消除技术运用的阶层壁垒，实现新成果的平等性共享，增进技术运用者的幸福感，促进普遍意义的社会平等的使命。因此，与狭隘的私人性、集团性相对立的公共性、公益性，是技术社会化实践最重要的价值内核和评判标准。数字鸿沟无疑是技术异化的时代表征，这种狭隘的数字化实践背后的强大逻辑是征服、占有、支配核心的资本逻辑，因为资本逻辑是对人类生存的公有性、共有性、共享性之“生活逻辑”的僭越。这是一个技术、社会、人性、生存与生活等高度相关的时代。新技术与社会协同发展的主题之一，在于明晰技术进步和人性本身的内在限度，以制度的方式约制人性欲望，在此基础上，寻求、达成三者良性制衡基础上的有机融通。对于“日益技术化社会”的突出特征，安德鲁·芬伯格指出：“首先，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泛化的技术为特征的时代，这些技术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其次，它关系到我们如何对待技术。因为，这也许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公众的参与正开始对技术变革的形式产生重要的影响。”^①技术成果的社会运用，社会对于技术的高度依赖和神话般的崇拜，业已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文化和价值意义上的“技术代码”，这是某种形式的技术专制的开始。芬伯格指出，统治阶级“把进步导

^①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

向了一个符合那些利益的特殊方向。”^①现代社会，技术之于人，如影随行。技术原初的公共性特质和功能是明确的。譬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技术提供了全新的理解与体验方式，人与自然的技术化水平，甚至决定着人类生存的水平和人类心智的开化水平，技术因此是人类理智的福报和享受。技术和技术的社会性运用，应该是评价技术公共性问题中被严格区别开的两个问题。技术社会化运用的直接目的，是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化”和技术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其结果是无所不在的强大的技术对于人的身心的全面、强烈的支配的加剧。人在技术面前，变得透明、空心，失去了属于人的内在性，社会依靠技术的支持，超常运转。普通民众对此并没有一致的清醒和集体性自觉。

不仅如此，技术之于社会，其影响也是愈来愈全面。得益于技术的进步、扩张和弥漫性渗透，现代社会日益成为“技术化社会”。社会的技术化意味着，不仅社会的发生、存在方式，而且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和功能的发挥，都必须完全服从技术的逻辑。否则，此社会就会面临“出局”的危险。技术就是如此以自身的逻辑占有了社会，成为社会的根据，让社会在不知不觉中俯首称臣。如现代人所感受到的那样，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中，技术愈来愈成为一种内在嵌入性要素，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行动的内在逻辑。相应地，社会生活的一切，其合理、正当与否，也越来越受制于日益复杂、日益精准的技术性标准。面对人类理性的有限性，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社会管理者往往重视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最后，技术作用于人自身，就更为直接。没有技术，人可能就无法成为主体，心智也无法随社会进化而日益开化。

三、技术化时代“人本政治”的回归与鸿沟的跨越：基于优良制度理性的治理智慧

这是一个技术、社会、人性、生存与生活等高度相关的时代。新技术要实现与社会协同发展、与美好生活实践同步的主题之一，在于明晰技术进步和人性本身的内在限度，以优良制度理性的方式制约不断扩张着的人性欲望，寻求达成三者良性制衡基础上的有机融通。技术崇拜会让社会成为无根的存在。迄今为止，许多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都与技术的滥用有关。技术异化现象的发生不是孤立的，技术对于社会的影响幅度和程度，也完全取决于社会公共政策的支持度问题。技术解构的是人的社会性，冲击的是共同体的既有规范和价值。让人非人化（愈益孤独、自私、功利），让社会非共同化，是技术的隐形主旨。

当代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曾发出了如下的提问：置身现代社会，技术理性、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基本缺失？^②他指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政治变成了人本政治……而这种政治只是在形式上是人本学的，因为即使它想保障、围绕、呵护日常生活，它没有进入人的生活的内容。它局限于给人的生活以各种保险。而真正的人本政治将是这样的：它不仅关注生活的水平，而且关注生活的艺术。”在人本政治中，“政治的核心将是处于世界上和发展中的人类”。^③

数字鸿沟客观上造成了个别或社会特定群体的“边缘化生存”的境况，这种现象的出现，有悖于基于文明、人类福祉、普遍道义引领和内在规制的技术人文主义所追求的现代社会的公共性精神。技术的本质是普遍理性，旨在消除差异，追求一种形式理性意义上的平等，本无可指责。数字鸿沟产生的根本原因通常被归结为是主体能力的差别问题，这种观点其实经不起推敲。均等享有数字化、智能化社会的红利，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本体性使命，是一个让技术引领美好社会的共识性意义的价值担当。^④

数字鸿沟的存在是客观的，但从辩证的立场来看，也并非全是坏事。面对一个完全技术异化的社会，被排除是技术本身的门槛使然。就技术实用理性的本质而言，其社会性的运用本身，完全服务于某个特定群体、特定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不断地制造门槛、然后再消除门槛，恰恰是技术理性

① [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第35页。

② Edgar Morin, *Introduction à une politique de l'hom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9, p.14.

③ Edgar Morin, *Introduction à une politique de l'homme*,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99, p.118, p.15.

④ 胡延平：《跨越数字鸿沟——面对第二次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页。

的狡猾的体现而已。有学者指出，数字鸿沟通常被认为包含三种层次：基础设施和技术接入层面的差异、对信息技术使用技能和方式的差距以及前两种差异和不平等导致的知识鸿沟。对此，有学者指出，存在数字鸿沟的人群间会因为习惯于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认为数字移民与数字原住民之间不同的社交和学习方式会使移民对技术的冲击感到恐惧和紧张，两者的思考和表达方式都会产生较大差异，成为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发展阻碍。^① 智能化时代，就数字鸿沟的类型来看，传统的基础性接入性鸿沟正在减少，而使用性鸿沟的难度也在不断减弱，但是，知识性鸿沟或者内容性鸿沟随技术进步在不断加大，这是技术自身的变迁和逻辑使然。数字鸿沟导致技术技能拥有和使用的不平等。有学者认为数字鸿沟导致了技术享有、技术使用授权、技能水平、社会支持可行度等多种不平等，说明了即使在信息技术使用者之间也存在使用密度以及使用类型的差异。^②

老年数字鸿沟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早在1999年，为缩小老年数字鸿沟，美国发布了《填平数字鸿沟》政府报告及一系列举措。譬如，《通信法案》中明确要求全美电信企业必须免费义务为不愿或不擅长使用网络的老年群体提供普遍平等的电信服务、开设免费的计算机和数字扫盲课程，一些非营利组织专门为50岁及以上人群提供互联网教育。美国还设立老年人技术服务中心。较早进入“超级老龄化”的日本，其政府部门、企业以及社会机构也将关切重心转向智能化养老服务的发展，出台了“超智能社会”的构想，旨在运用信息技术缩小代际差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鼓励并确保老年人有平等的权利和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活动。我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从常态化防疫、日常交通出行、就医、消费、参与文体活动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老年人面对的数字化困难的解决方案。

知识、技术、社会、制度以及价值等的密切相关性表明，数字鸿沟现象背后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单纯是技术问题，还涉及许多具体的、现实的社会政策和制度问题。首先是互联网产品、信息和服务发展未能关注老年群体需求：智能设备和服务的适老化建设匮乏、数字化改革过于强调技术效率偏好、网络信息安全系数有待提高、老年人对使用互联网及智能产品的安全性普遍存在焦虑感。媒体对互联网此类事件的大量报道，也使得老年人对互联网持有偏见。其次是社会支持网络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代际数字反哺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老年信息技术教育、养老事业多元主体协同发展局面尚未形成。^③

消除鸿沟的目的是破除技术变革与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分层，让每个人都平等地享受技术带来的红利，增加一种新的生活体验。技术无疑具有社会公共性。此种公共性特质的形成、获得与确立，并不完全是技术自身的事情，而是基于历史传统，文化价值信念和制度理性，自主、自觉地建构的结果。在一个生产、生活日益市场化、商业化和功利化的社会，技术一旦产生，就难逃被“编码”的危险。技术“符码”化的产生，是利益主导的结果。利益的追逐会使技术变成韦伯意义上的工具理性，意义的遮蔽和沉沦成为必然。技术崇拜会让社会成为无根的存在。拥有强烈自主意识的现代人，绝对不能容忍、也不会听任自己的命运任由技术摆布。人们渴望技术的改进带来人类生存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渴望新技术的运用中所带来的种种前所未有的享受体验。但是，人对于技术的高度依赖，会让人的生存与生活完全听命于技术的逻辑，人深陷于技术崇拜中不能自拔。任何一种技术都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而是伴着非确定、可能性风险以及巨大的安全隐患。人类在自己的文明进化历程中，获益最大、最多的是技术；生存的辩证逻辑也提醒我们，其实，对于人类最大、最直接的或显性、或隐性的伤害，同样来自技术。

责任编辑：王冰

① 陈力丹、金灿：《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鸿沟》，《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7期。

② K. Neckerman, *Social Inequalit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4, pp.355-400.

③ 黄晨熹：《老年数字鸿沟的现状、挑战及对策》，《人民论坛》2020年第29期。

在线喂养：基于知识再生产的数字鸿沟视角

马中红 孙黎

[摘要]在线喂养中的分化问题，反映了同代人参与知识再生产过程中涉及数字接入、使用和结果层面的不平等事实。其理论依据在于，知识再生产概念是在建构主义的框架下串联起技术、个体和情境的多重要素，是数字鸿沟的综合体现。将在线育儿社区中的喂养故事和一对一深层次访谈作为经验材料，通过编码和归纳将研究锚定于资源搜寻、知识加工、新知扩散三个节点，进而勾勒出单一社区和跨媒介网络、教科书宣教型和数字叙事型、普通阅听者和亲密公众的差异影响，有助于深入研究知识再生产过程如何产生数字鸿沟。需要重视不断扩大的知识再生产鸿沟，因为它分别在线下和线上形塑了育儿实践和育儿观念，甚至带来了家庭权力关系的重塑和限制弱势群体从公共动员中获利等更突出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数字鸿沟 知识再生产 跨媒介网络 数字叙事 亲密公众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4-0059-08

一、喂养分化：从线下隔代到线上同代

随着社会的转型和环境的改变，育儿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家庭所认识，关于育儿的争论也时有上演，作为育儿首要环节的喂养表现尤其突出。两代人在“6个月后的母乳是否还有营养”“辅食里需不需要加盐”等问题僵持不下。《半月谈》为此特地撰文，指出隔代的喂养分化实际上是老一辈所持的传统知识和新一代父母崇尚的科学知识之间的对撞。^①与过去喂养知识主要在传帮带环境中传播^②所不同的是，随着互联网嵌入日常生活，育儿群体的聚集方式自线下向线上转移。在最近的一项对我国女性哺乳学习实践的研究中，研究者关注到在线社区已成为她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③育儿社区的数据报告也充分表露，妈妈们更加偏好在育儿社区上获取健康类的知识。^④在代际矛盾不明显的线上社区，据研究者对在线喂养话题的考察，虽然同属于一个育儿社区，同为新一代父母，同以科学养育的名义传播，但在围绕“母乳”还是“混合”“亲喂”还是“瓶喂”“离乳”还是“断奶”等讨论中，不仅有喂养知识的分化，还隐含着不同社区用户解构理想化喂养以及挑战传统喂养权力关系的差异。核心用户不仅是知识的接收者，还借助良好的数字化能力成为知识普及者、知识阐释家，^⑤创造出知识传播的新范式——

作者简介 马中红，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孙黎，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苏州，215123）。

^① 艾福梅、丽萍：《“育儿帮扶者”还是矛盾导火索？“隔代抚育”之痛如何化解》，澎湃新闻转自公众号半月谈：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839694，2021年10月10日。

^② 李沛霖、王茜等：《浅析健康育儿知识普及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基于传播学的角度》，《改革与开放》2017年第5期。

^③ 周培勤：《学哺乳：基于网络社区中妈妈关于母乳喂养讨论的话语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9年第5期。

^④ 艾媒出行和生活研究中心：《2019中国综合母婴平台监测报告》，广州：艾媒咨询，2019年，第20页。

^⑤ 朱婧雯：《建构主义视域下媒介化知识传播与社会认知》，《中州学刊》2022年第1期。

将个人喂养经验融入精心组织的数字叙事中，积极地参与诠释、更新知识的再生产过程中，善于调用资源以提升叙事话语的可见性，以期在性别化身体和技术关联中获得更大的意义；而非核心用户往往是默默无闻的浏览者、被动的信息接收者，或是纯粹的科学话语搬运工，其可见性和影响力逐渐式微。

基于此，研究者认为在线喂养分化已不同于前文讨论过的隔代喂养分化，如果说后者是数字接入的鸿沟显现，那么前者则是覆盖数字接入、使用、结果的多层次数字鸿沟。为了考察这种数字鸿沟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表现，本文尝试引入知识再生产这一过程性的概念，促使数字鸿沟理论的单向度技术视角转向人和数字技术的双向互动视角。

二、知识再生产：探求数字鸿沟的新视角

随着互联网和其他通信技术的普及，数字鸿沟的研究重点正在发生变化。最早的探索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的数字鸿沟被认为是对数字技术拥有者和缺失者之间的二元划分，数字接入的差距也被总结为“一级数字鸿沟”。到 21 世纪，研究者们意识到数字鸿沟的解释应该综合不同的要素，需要纳入技术手段、使用自主性、使用模式等方面的差异，^① 这激活了数字鸿沟表现的多样性理解，不再停留于接入向度，数字使用被称为“二级数字鸿沟”。有学者提到了数字鸿沟的心理表现，^② 这被视为是对过往技术中心研究视角的一次有益偏离。也有学者认为，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也很容易影响个人的结果和利益，^③ 这就使得数字鸿沟从接入、使用跨入到结果的“三级数字鸿沟”。本文对数字鸿沟三层表现的梳理，突出了数字鸿沟研究的动态开放性。研究者们将重点置于拓展数字鸿沟的不同层面，如凡狄克 (Jan Van Dijk) 将单一的数字接入的概念丰富为动机性、物质性、技能性、应用性四个维度，这一度成为数字鸿沟研究中的经典框架。^④ 到如今，数字鸿沟的三层表现更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常以多维交织的复杂作用显现。因此，为了更为准确地把握当下的数字鸿沟，也需要予以动态且整体的关照。

论及在线社区中的数字鸿沟问题，最初有研究者从种族、阶级视角分析影响社区的设计和使用差异，^⑤ 但从中观角度来论，对鸿沟的形成过程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而后有一些研究者从个人层面看到了在线社区使用的有益影响，例如社区内互动量和强度的增加会使社会关系的多样化和扩大成为可能；^⑥ 与在线社区用户的联系会提供信息和情感的支持。^⑦ 尤其是健康类的在线社区，填补了公共历史中没有女性叙事的空白，被研究者认为提供了一种理解女性化自我意识的挑战。^⑧ 尽管在线社区现在被广泛用于教育、营销、政治宣传等，但它也被认为是一个性别化的空间知识的产物，有助于女性重新协商他们的特殊经历。^⑨ 与其他的在线资源相比，健康类在线社区凭借着低准入门槛、更充裕的表达空间、多样化的表达风格，一直处于这一领域的发展前沿。

① Sophie Lythreatis, Singh Kumar Sanjay and Abdul-Nasser El-Kassar, “The Digital Divide: A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Agend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175, no.2, 2021.

② Jan Van Dijk and Kenneth Hacker, “The Digital Divide as a Complex and Dynamic Phenomen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vol.19, no.4, 2003.

③ Alexander JAM Van Deursen and Ellen J. Helsper, “The Third-Level Digital Divide: Who Benefitsmost from Being Online? ”,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vol.10, Annual, 2015.

④ Jan Van Dijk and Kenneth Hacker, *The Deepening Divide: In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5, p.205.

⑤ Shannon McR, “Coming apart at the Seams; Sex, Text and the Virtual Body”, Lynn Cherny and Elizabeth R. Weise (eds.), *Wired Women: Gender and New Realities in Cyberspace*, Seattle, WA: Seal Press, 1996, pp.242-263.

⑥ Nicole L. Muscanell and Rosanna E. Guadagno, “Make New Friends or Keep the Old: Gender and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in Social Networking 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28, no.1, 2012.

⑦ Kuang-Yuan Huang, Indushobha Chengalur-Smith and Alain Pinsonneault, “Sharing is Caring: Social Support Provision and Companionship Activities in Healthcare Virtual Support Communities”, *MIS Quarterly*, vol.43, no.2, 2019.

⑧ Lena Karlsson, “Desperately Seeking Sameness: The Processes and Pleasures of Identification in Women’s Diary Blog Reading”,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7, no.2, 2007.

⑨ Katherine Harrison, “Online Negotiations of Infertility: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in) Fertility Blogs”, *Convergence*, vol.20, no.3, 2014.

回到研究对象在线育儿社区，逐一考察三级数字鸿沟，似乎在社区接入、社区的基本功能使用差异上并不显著，但若是以知识再生产过程为考察标准，就较容易探及部分用户以在线社区为核心配置起媒介资源，通过消解、融合、再创等方式对原本艰涩、难懂的科学喂养知识进行再生产，将之转化为一种易理解、更具体操作的新知识，再充分发挥自己在社区中的身份优势，充分运用在线社区的功能模块和曝光逻辑提升新知的可见性，并力求将协商推进到公共意义体系之中。至此，本文认为，以知识再生产为视角审查在线喂养的分化问题，不仅将数字接入和数字使用差异再次拉回到分析视野，而且还能沿着过程脉络对用户如何调用数字资源以及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进行追踪考察。鉴于数字鸿沟的三级表现均可在知识再生产中找到关联映射，利用知识再生产视角动态、过程地考察数字鸿沟便成为可能。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再生产呢？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进路，建构主义的知识理论逐渐清晰。第一，知识是情境性的。马克思、卢卡奇把知识作为社会意识的存在方式，他们的研究致力于在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中理解知识；伯格和卢克曼将知识置于日常生活的情境，关注知识成为现实的社会过程。第二，知识是可以被认识、诠释的。伯格和卢克曼指出有关社会的知识可被理解为一种“实现”，一方面是客体化的社会现实被理解了，另一方面是这一现实被不断地生产出来。知识被理解的方式总是经由一个思维框架或结构来把握，认识知识的方法论建立在诠释等人文主义基础上。^①第三，知识具有反身性。布鲁尔将知识的普遍有效性要求转向反身性，^②它反映出知识不断经受检验，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反思并返回既有知识的过程。^③

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主义转向预设着知识研究的核心问题从知识为何转为知识如何，研究的首要任务是要描述知识建构的过程。卡林·诺尔-塞蒂纳（Karin D. Knorr-Cetina）特别指出科学知识建构过程中有着实现和传播科学的目标，它依赖于科学知识的持续转化和重新境化。^④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首先界定知识再生产的概念。知识再生产是为了促成知识的传播，处于不同社会情境或社会环境的主体以不同的视角、标准，对模糊知识进行加工和扩散，使其转变为可阐释知识的过程。由此观之，个人能动的差异、所处情境的区别均对知识阐释的分化产生了直接影响。

再将知识再生产置于数字技术这个大背景下进一步考查。首先，数字技术提供了知识再生产的工具，主体根据再生产的具体需求能动地配置起多样化的跨平台网络，在对知识的加工和重组中充分发挥了技术优势。其次，数字技术改变了知识形态，知识以一种可读、可写、可分享的存在方式促成了传播的快速扩散。最后，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情境要素进一步激活了知识建构中的一组链条——叙述与协商，^⑤以更为活跃的姿态影响着知识的再产生。

综上，数字空间中的知识再生产概念是在建构主义的框架下串联起技术、个体和情境的多重要素，符合上文中提及的动态且整体的进入视角。与此同时，知识再生产概念中隐含的技术网络的差异、个人能动的高低、所处情境的区别，均会一定程度地干预知识的可见性、影响力。因此，本文认为数字空间中的知识再生产已经具备构成数字鸿沟的潜能，需锚定资源搜寻、知识加工和新知扩散三个节点，具体展现知识再生产的过程如何产生数字鸿沟。

三、研究方法：半结构化访谈的探索

遵循着上述思路，本文主要采用的是质化研究中的半结构化访谈。之所以如此选择，第一是因为本文属于探索性探究，如果没有充分的先行研究给予明确结论的指引，则需要在前期调研、田野观察、深

^① 赵超、赵万里：《知识社会学中的范式转换及其动力机制研究》，《人文杂志》2015年第6期。

^② [英]布鲁尔：《知识和社会意象》，艾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8页。

^③ 黄华新、唐礼勇：《社会科学知识的“反身性”——兼与自然科学知识反身性的比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④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4-239页。

^⑤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2-3页。

度访谈等基础上挖掘一定量的深度信息；第二是由于质化研究更善于捕捉动态的意义建构，更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过程和整体进行具有丰富性、生动性、深层性的描述，^①适合于情境化地探索知识再生产的过程；第三是并非所有在线社区用户涉及知识再生产全过程，因故无法采用大规模量化方式推进在线社区的用户行为研究。

围绕着半结构化访谈的目标，本文首先根据母婴平台相关报告^②中披露的月活排行挑选了“妈妈网孕育”“亲宝宝”两个育儿社区，再依据官方公布的用户数据勾画被访人群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媒介使用特征，并设定问卷内容，主要问题涉及人口统计学层面的性别、年龄、城市、职业和社区用户等级层面的粉丝量、发帖数。紧接着以“喂养日记”“喂养经历”等关键词在两个平台的社区中进行搜索，共搜集到157个喂养故事，从中筛选了22位参与发帖或回帖的用户，在浏览她们日常分享内容的基础上，剔除广告信息多、真实性存疑的用户，并向其中14位私信了问卷链接，共收到了6位回复，确定为被访者。由于缺乏知识再生产的考量依据，参考知识贡献的过往研究，^③以及在线社区的实际状况，本文确定粉丝量或发帖数作为知识再生产偏好度高低的划分，将被访者分为两个小组。最后，研究者重新搜集被访者被发布在妈妈网孕育、亲宝宝社区中的喂养内容，补充了8个喂养故事，再通过微信、邮件等方式与6位被访者进行了线上一对一访谈，涉及喂养知识再生产参与、过程等问题，即时访谈最长一个半小时，最短40分钟。为了保护被访者的个人信息，本文统一匿名处理。

针对6份转录的访谈内容、165篇发帖内容（包含评论内容）的统计和分析，本文借鉴了迈尔斯（Matthew Miles）和休伯曼（Michael Huberman）对质性材料的编码和分析，^④首先确定通用编码、知识再生产两大编码类属；其次，研究团队多次阅读质性材料并对其进行注释，尤其关注到一些评论数量多的典型内容，深入了解其涉及的生产过程，这一步骤有助于探索数据的基本形状，创建了知识再生产编码的细分含义（分别为资源搜寻、知识加工、新知扩散）；最后，通过对比归纳核心用户和非核心用户在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差异确认二者是否存在数字鸿沟。

四、透视数字鸿沟：锚定知识再生产三环节

（一）资源搜寻之沟：单一社区 VS 跨媒介网络

“‘妈妈网孕育’就是我搜寻喂养信息的地方，这里各种问题应该都找得到应对方法……好像从我宝宝一出生，我就在这个社区里了。”（被访者2-c）“对我来说，‘亲宝宝’就足够了呀，我加了一些关注，都是跟我理念契合的，然后娃比我家大一点的妈妈们，她们尝试还不错的我就跟着抄作业。”（被访者2-a）对类似样的非核心用户而言，最初进入在线社区都是以获得信息支持为目标的，她们善用社区内部的搜索、收藏、点赞等功能，提升了社区的参与度，但主要还是作为知识的接收者进行社区实践。若在长期使用中没有发生负面影响，这类用户一般不太愿意改变既有习惯，也不会同时使用多个类似社区进行比较。这使得她们在信息来源的多样性上大打折扣，在个性化推荐技术的加持，容易陷入封闭的信息茧房中。

面对科学本身带有的强烈“不确定性”，^⑤核心用户会充分利用媒介技术搜寻资源，进行跨媒介实践。这指向两个层面：第一是技术层面，通过某些技术功能可从一种媒介转移到另一种媒介，或者一种媒介可根据其使用方式发展出各种技术服务；第二是内容层面，特定的内容可在许多不同的平台上分发和使用。处于这样一个复杂媒介系统中的核心用户，会依据需求的不同、素养的差异，配置出个性化的跨

① 沃野：《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

② 易观千帆：《2019年最新母婴亲子类APP榜单》，北京：北京易观智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2019年，第2页。

③ 王世明、邝华伟：《关注行为如何影响问答社区用户的知识贡献——基于观察学习的实证研究》，《情报探索》2023年第1期。

④ Matthew B. Miles and Michael A. Huberman,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An Expanded Sourcebook*,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 1994, pp.55-71.

⑤ [奥]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第19页。

媒体网络，以搜寻到更为丰富的知识再生产资源。被访者 1-a 是一位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她在亲宝宝平台上有着超过 10 万的粉丝。大家倾向于把她的喂养分享称为“满满的干货”，原因就是喂养分享中连接了来自不同平台不同形式的丰富知识，为喂养经验增加了专业砝码。不仅如此，被访者 1-a 还在亲宝宝平台外链了自己在小红书上的直播，丰富了喂养知识的表达方式。研究者观察到被访者 1-a 为了获取更多知识再产生的资源，配置出一个个性化的跨媒介网络，包括育儿社区亲宝宝、母乳监测应用程序 Baby Breastfeeding Tracker、UGC 视频平台 Youtube、权威知识平台美国 Mayo 医学中心、生活类分享平台小红书等。她俨然就是行动者网络概念中的转译者，可轻松地在各个不同类型的媒介之间来回转换，构建起一个可相互解释、能共同演进的异质性网络。

配置跨媒介网络的首要原则是连通性。随着技术不断加速更新，设备、界面、平台逐渐多元化，从应用程序连接到网站及社交媒体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又连接到网站，它们之间互相联系，形成了网络且产生了多维的秩序，其连通性逐渐表现为各种数字媒体之间的相互连接。知识再生产语境下的连通性代表着通过技术系统将所有人类知识网络化的开创性愿景。如被访者 1-a 提及的无法连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内容资源积累的便利性，她也因此更新自己的跨媒介网络配置。“‘亲宝宝’之前是有过私信功能的，后来这个功能取消了，现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在评论里互留微信，日常就转去微信了。”（被访者 1-a）“大部分人都是手机端登录妈妈网孕育社区，但我常常会切换去 PC 端，有很多手机端没有的功能。”（被访者 1-b）配置跨媒介网络的第二个原则就是数字灵活性。灵活性被认为是在不同层次上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为了实现这种灵活性，需挖掘数字优势，以利用各种机会并应对环境中的变化。^① 数字灵活性表明了个体对技术非常熟悉，使用策略的范围非常广泛，以及对自己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有高度的自信。^② 核心用户出于提升搜集资源网络化程度的目的，会充分地调用数字灵活性以拓宽、更新、组织好自己的跨媒介网络。不管是“拓展”“转”还是“切换”，都表明核心用户正在以灵活和自信的方式使用数字技术，并借由技术游刃有余地拓展时空和关系。不管是 PC 端的存在还是其曾经出现过的功能，他们都了如指掌，这也从侧面证明核心用户在平台中有着大量时间成本的投入，当需求、场景发生变化之时，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掌控不同的数字技术，合理调整跨媒介网络的配置。

与非核心用户相比，核心用户展现了跨媒介网络的强大力量，这不仅消减了再生产知识的不确定性，更是为知识添上了多样的延伸背景，亲宝宝、妈妈网孕育这样的平台可能是这些核心用户们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

（二）知识加工之沟：教科书宣教型 VS 数字叙事型

在线社区中喂养知识的加工主要呈现出两种范式。一种是维护科学的权威性，完整引用官方的喂养知识，并严格标明出处，如教科书一般宣教。例如在两个平台中，都有全文完整引用中国营养学会最新修订完成的婴幼儿、学龄前儿童喂养和膳食指南——《中国 0—6 月龄婴儿母乳喂养指南》《中国 7—24 月龄婴幼儿喂养指南》《中国学龄前儿童膳食指南》。在教科书宣教范式下，用户的加工能动主要体现在知识的筛选而非诠释上，因为他们将在线社区转化为纯粹的知识发布平台，忽略了社区内的互动机制。因此，这类内容效果只是反映在一部分的浏览上，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充实了社区内的喂养信息，但无法积累起有效的流量热度。“这种帖子我一般就直接刷过，又不是考试一定要背，真有问题的那一天再找来学吧。”（被访者 2-a）

另一种范式是数字叙事，即在个人化的喂养故事讲述中嵌入再生产的喂养知识。在线喂养中的这种数字叙事并非是新生的框架。有学者通过对英国全国性报纸中“断奶”的公共叙事与在线社区 Mumsnet

^① Sheshadri Chatterjee, Ranjan Chaudhuri and Demetris Vrontis, et al., “Adop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Integrated CRM Systems in Agile Organizations in India”,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108, no.4, 2021.

^② Jane Seale, E. A. Draffan and Mike Wald, “Digital Agility and Digital Decision-Making: Conceptualising Digital Inclusion in the Context of Disabled Learners i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vol.35, no.4, 2010.

中“断奶”的个体叙事之间的互动分析，发现在线社区创造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改变了科学的单向传播，社区的成员也会通过添加自己的建议和经验来美化断奶问题的沟通。^①这充分说明了在线社区中的数字喂养叙事有效地充当了科学新闻报道与公共观点的边界。^②还有学者对喂养日记这种非结构化的自传式叙事进行了研究，发现个体喂养记录给医疗保健研究人员带来了挑战，喂养日记中妈妈真实的情感体验和自我反思指向了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医疗保健问题。^③可见，围绕喂养的数字叙事正在以丰富的张力涵盖私人和公共领域在营养、医学、保健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出院之后十多天的时候，渐渐发觉他眼白部分有点黄，而且嘴巴周围、鼻翼两侧，也有些泛黄。我马上意识到，宝宝可能是黄疸了，所以就带去看了下医生，确定是晚发性母乳性黄疸。家人都说这个时候要停母乳，医生说不太严重不用停，我也有点犹豫，上网查了下，最后还是决定一边吃医生开的茵栀黄口服液，一边增加喂奶的次数。吃了茵栀黄之后宝宝排便比平时更多，也饿得更快了，要注意小屁屁的护理……原来母乳性黄疸宝宝是可以继续喂奶的，而茵栀黄也确实可以给宝宝退黄用的。”（“Bee 妈妈”发表于妈妈网孕育平台）

类似关于喂养的数字叙事有着非常明显的特点：个人的情感、行动与医疗知识交织拼凑，共同推动了母乳喂养知识的再生产。上述故事中，艰涩的医学术语中嵌入了“犹豫”“决定”等主观化的表达，这充分表明，分享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注解母乳性黄疸，直接明晰地解释了母乳性黄疸的宝宝还能不能母乳喂养，茵栀黄给宝宝退黄到底靠不靠谱这两个让妈妈们异常纠结的问题。显然，混合表述是对医疗建议进行的一次调节，它有着哈拉维（Donna Haraway）观念中的“情境化知识”的特性。哈拉维展示了看似客观的知识是如何被创造的，所谓的情境化知识由异质性、多元性的主体建构，是从社会偶然性的视角对知识客观性的阐释。^④一方面，这些知识并不一定与医疗知识相反，而是一种由经验知识强化下的医疗知识的替代形式，分享者需要在理解、活用的基础上，将自己的经验、建议与医学知识拼凑在一起，达到降低医疗知识理解门槛的目的；另一方面，分享这些知识时常会伴有具体的语境化，不同的情境又帮助重新配置专业知识、重新排列知识的优先次序。

核心用户们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局部视角，在不同位置、不同情境下反复验证科学、专业知识的经验性解释，再生产出多样化经验性的新知识，使得同样处于不同位置、不同情境的受众能够快速接收到针对性极强的喂养知识，从而潜在地改变自己。当然，这些喂养知识的加工以拼凑的方式形成新的行动指南，为打破医学等机构垄断的信息边界创造了可能。^⑤“第五次乳腺炎发炎，低烧 37.4 度。我已经想破罐子破摔了。把发炎的一侧乳房先用吸奶器吸一下，因为吸奶器大部分时候只能吸出前奶，所以吸了以后我就自己动手一边按摩胸部一边把剩余的后奶挤出来，这样两三次以后烧退了，疼痛感也在慢慢减轻。”（被访者 1-c 发表于亲宝宝平台中）哺乳带来的痛苦体验在主流生育话语中是难以听见的，偶尔提及的生育痛苦也大多将其视为获得妈妈身份的必经考验，是“为母则刚”的印证。^⑥然而，育儿社区中这些泛着痛楚的文字却真实记录了科学喂养背后年轻妈妈们的付出。生理性涨奶、堵奶、急性乳腺炎、乳头皲裂等带来的喂奶痛，是大部分的新手妈妈在喂养之前并不清楚知晓。

① Ruth Knowles and Clare Wilkinson, “The Worries of Weaning: Newspaper Reporting of Infant Weaning and Its Impact on Dialogue in Online Discussion Forums”, *Journalism*, vol.18, no.3, 2017.

② Shanahan Marie-Claire, “Science Blogs as Boundary Layers: Creating and Understanding New Writer and Reader Interactions Through Science Blogging”, *Journalism*, vol.12, no.7, 2011.

③ Kathryn Hinsliff-Smith and Rachael Spencer, “Researcher Perspectives from a Study of Women’s Experiences of Breastfeeding”, *Nurse Researcher*, vol.23, no.3, 2016.

④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vol.14, no.3, 1988.

⑤ Sophia Alice Johnson, “‘Intimate Mothering Publics’: Comparing Face-to-Face Support Groups and Internet Use for Women Seeking Information and Advice in the Transition to First-Time Motherhood”,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vol.17, no.2, 2015.

⑥ 周培勤：《学哺乳：基于网络社区中妈妈关于母乳喂养讨论的话语分析》，《妇女研究论丛》2019 年第 5 期。

相比教科书式的喂养宣教，喂养故事中“第五次乳腺炎发炎”等话语有力彰显了“过来人”的身份，使得再生产的喂养知识在面对大众时更具备穿透力，也改变了既往母乳喂养单向度的宣教。早前一组针对我国育儿流行杂志的分析显示，医学专家的科学意见已成为日常喂养中的重要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妈妈的育儿能力和自信，削弱了妈妈在育儿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①数字叙事为这些妈妈们带来潜在政治力量，因为再生产的具身知识挑战了专家权威，创造出与主流媒体不同的母性印象，^②凭借自身的粉丝影响力，一方面保证了在社区的可见性，而另一方面，也可能达到促进了公共的喂养讨论，提升喂养相关的政治和社会影响。^③被访者1-a坦言自己的一条关于科普瓶喂优势的短视频曾被粉丝转去其他平台，她乐于见到自己再生产知识作为导火索，引发了一场关于瓶喂和亲喂的讨论。

（三）新知扩散之沟：普通阅听者 VS 亲密公众

在线社区的知识传播一般会触达两类不同受众。第一类是通过搜索或者浏览产生的普通阅听者，若是遇到完整引用型的知识，本身转化能力有限，超越收藏或者点赞的反馈行为可能性不大，若是遇到叙事型知识，由于忠诚度还未建立，互动的可能性不高，后续再生产内容的曝光机会不足且到达性可能较弱。第二类是核心用户在长期的传播中积累起的粉丝群体。“关注”机制的存在决定了内容对粉丝的高到达，忠诚度又提升了互动意愿，更会参与到知识进行过滤和验证中。就如哈拉维所言，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并不依赖于“发现”的逻辑，而是依赖于“对话”这种充满力量的社会关系。^④核心用户个性化经历的分享一方面让她们在同龄人中相互认可、心心相印，获得了一起奋斗的满足感，产生了一起共渡难关的情结，另一方面，串联起的粉丝空间又提供了人人参与协商的机会。这两个特征让研究者看到了核心用户作为分享者和他们的粉丝之间形成了贝兰特（Lauren Berlant）提出的“亲密公众（Intimate Publics）”^⑤的潜力，个人喂养故事的扩散提供了一种在政治上和个人上增强女性文化力量的模型。“孕期时，同一孕期妈妈们互动，感觉自己不是孤军奋战，有些妈妈现在还依然保持联络，之前还有个妈妈从国内给我寄了圣诞礼物。后来，记录小A成长过程，即便有些粉丝素不相识却感觉我们是相识的至交、知己。现在我转做房产经济人，平台上的姐妹甚至还有帮我推荐客户的。”（被访者1-a）

妈妈网孕育社区中的“明媚0501”是一位有着1万多粉丝的核心用户，自怀孕期起一直在社区中分享经历。在一篇标题为“生理性涨奶+乳头皲裂，不亲喂就不是好妈妈了吗？”的自叙文中，她详细地描述了因喂奶痛被迫选择母乳瓶喂宝宝的过往经历，分析了瓶喂在时间把控、奶量把控上的优势。这样的分享吸引了近100人参与讨论，不少人提出了反对，甚至还有一些人指责她柔弱。最后粉丝在她的评论区集合，有的拿出自己的经历“我也痛了一星期，一星期都是有点硬的，半夜痛到哭”来例证涨奶之痛，有的开导她“反正你娃吃的也是母乳，最重要的是你心情要好”来帮助心情的调适，还有的给予她无视别人的勇气，这些声援评论驳斥了那些不和谐的绑架之声。

核心用户还懂得善用育儿社区中配置的私信、评论、点赞、转发等互动机制。其中的话题标签具有促进对话和创建主题社区的功能，也是赋权和代理的手段，可通过共同的单词、短语或句子联合在社交媒体进行对抗话语而促成#标签行动主义。^⑥研究者搜索了亲宝宝平台社区中关于瓶喂的话题，发现#瓶喂也能按需喂养吗#、#瓶喂怎么喂#等话题标签提供了瓶喂讨论搜索的标识入口，也利于话题讨论

① 陶艳兰：《养育快乐的孩子——流行育儿杂志中亲职话语的爱与迷思》，《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2期。

② Lori Kido Lopez, “The Radical Act of Mommy Blogging”: Redefining Motherhood Through the Blogo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 vol.11, no.5, 2009.

③ Clancy Ratliff, “Policing Miscarriage: Infertility Blogging, Rhetorical Enclaves, and the Case of House Bill 1677”,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vol.37, no.1/2, 2009.

④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vol.14, no.3, 1988.

⑤ Lauren Berlant and Jay Prosser, “Life Writing and Intimate Publics: A Conversation with Lauren Berlant”, *Biography*, vol.34, no.1, 2011.

⑥ Guobin Yang, “Narrative Agency in Hashtag Activism: The Case of# BlackLivesMatte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vol.4, no.4, 2016.

者加入互动、参与分享。话题标签带来了公共性和协作性，将原本处于低可见的分散、个体叙事连接成为网状的共同叙事。同一话题标签下的用户对喂养有着共有的观念，容易转化为亲密公众，形成彼此依靠的力量，又能通过各自的文字和图片叙述不同情境下的差异故事。如同一个开放的数据库，它期待着海量的价值数据加入，能帮助用户多角度多阶段深化对瓶喂的认识，拓展原有话题标签的内涵。

五、正向利用数字鸿沟：发挥知识再生产的延伸价值

在线喂养中的分化问题，它反映了同代人参与知识再生产过程中涉及数字接入、使用和结果层面不平等的事实。其理论依据在于，知识再生产概念是在建构主义的框架下串联起技术、个体和情境的多重要素，这是数字鸿沟表现的综合体现。再结合经验材料进一步分析，研究者将视线落于知识再生产的过程，通过锚定资源搜寻、知识加工、新知扩散三个节点阐释数字鸿沟。

首先，因媒介连通性和数字灵活性的差异，核心用户配置起个性化的跨媒介网络，实现了技术资源和内容资源的双重搜寻，而非核心用户停留在单一的社区中挖掘资源，极易陷入信息茧房。其次，核心用户以具身经验对艰涩难懂的科学提供生动的注解，创造出一种拼凑风格的再生产知识范式，相比冷冰冰教科书式的喂养宣教更受用户的青睐，也能创造出更多挑战权威的政治潜力。最后，不同于普通阅听者的分散力量，数字叙事将自下而上的喂养观念、育儿文化变得集中可见，再结合标签、评论、点赞、转发等前台互动行为，与亲密公众缔结了一段段流动的新社会关系。

应该说，以知识再生产为视角透视数字鸿沟是一次理论探索的勇敢尝试。历来，研究数字鸿沟的不同层面总是能够引发辩论，精确测量仍是一件困难之事，知识再生产作为一种过程、综合的方法赋予了数字鸿沟多维和不断变化的性质。因此，它回避了数字鸿沟技术决定或社会决定的单向度理解，人和技术交互的视角为整合性地关照全部三级数字鸿沟提供了可能。尤其是近年来，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二级和三级数字鸿沟上，而新冠疫情提醒着一级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就像本文也发现了不同社区成员的接入差异，一个是跨媒介网络的丰富配置，另一个则是单一社区的封闭狭隘。另外，过往数字鸿沟研究多专注于某一数字技术，而本文也启发需要推进与数字技术有关的整个数字鸿沟研究，尤其需要将新的数字技术，如算法等纳入重点考察中，因此往往这些技术带来的不平等更为隐匿。

有理由相信不断扩大的知识再生产鸿沟，将会在线上和线下分别重塑育儿实践和育儿观念，甚至带来更深的社会问题。其一，妈妈们通过数字空间中的知识再生产不仅收获了新知，而且还带来了新的社会关系，这将进一步扩大代际喂养鸿沟。喂养鸿沟的一端凭借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丰盈，实现了家庭喂养话语权的迭代，而喂养鸿沟的另一端由于缺乏话语权，逐渐沦为只能贡献体力的育儿劳动者。其二，虽然育儿社区中妈妈们局部、零散的话语还未真正凝聚起来一起解决过与喂养相关的社会偏见问题或政治问题，比如公共场所哺乳权、哺乳假的有效实施、育儿假的落地等问题，但是理论上，知识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经具备影响公共舆论的潜在力量，未来也完全拥有改变公共政策的行动主义的影响能力。那么，对于知识再生产的弱势群体而言，他们的微弱发声甚至不发声限制了他们从社会动员中使其获益的可能，而在倡导数字包容、数字平等的今天，这些分散而隐匿的声音也代表着知识体系和观察方式转换的希望。^①

责任编辑：王冰

^①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Feminist Studies*, vol.14, no.3, 1988.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中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框架性分析^{*}

李福林

[摘要]中国行政法法典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行政观念的转变，也需要制度建设的保障，更需要法学方法论的有效运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为现代行政法革新，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发展所普遍重视与接受的法学方法论。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发展中具有包容性、时代性与合宪性的法解释论上的价值，在逻辑层面与经验维度中发挥着法认识论的价值，在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法学建设的体系化中体现出法教义学上的价值。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合理运用能够推动中国行政法学形成更加严谨的体系，为推进我国行政法法典化提供另一种重要的法学方法论。

[关键词]行政法律关系理论 行政法法典化 学术价值 框架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 D9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67-05

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与行政行为形式理论是构建行政法秩序框架的两个重要方法论。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因其显著的功能性与鲜明的形式化成为了传统行政法教义学的核心。但是，随着公共行政的发展和政府执法理念的转变，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对行政法事实的整体观察、行政法规范的认识和民主法治国家理念的实践都稍显不足，行政法各论中的问题对行政行为形式理论提出了挑战：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仅仅关注行政的局部性而不是行政的整体性、仅仅关注行政的静态性而不是行政的动态性、仅仅关注行政的结果而不是行政的过程、仅仅关注行政的单一主体而不是行政的复数主体。现代行政法学的发展则要求其方法论要关注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过程性和动态性。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进程对行政法方法论的更新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则能够提供行政现象的全方位观察视角，调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分析与论证私人权利的保障。因此，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可以作为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另一个重要的方法论，以分担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在行政法体系中过重的负担。

一、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中国行政法法典化中的适用

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促进中国行政法法典化中行政现象开放，在法规范和社会现实之间穿梭往返，将各种行政事实纳入并统合在行政法的解释和评价之中，其有益于行政法规范与社会现实进行沟通和交流，有助于行政法体系具备合理的包容性、多元性和动态性。

(一) 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与行政法法典化的契合

随着民主法治的发展、政府执法理念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理念向公共领域的渗透，诸多不为行政行为形式理论规制的行政现象相继出现，如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计划、内部行政以及行政事实行为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党内法规制定技术规范研究”(GD19CFX06)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委托课题“党规与国法的衔接协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福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420)。

等。这些行政现象对相对人同样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会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因此也有寻求行政救济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把行政救济的范围扩大到对相对人有法律影响的公法活动，相对人在公法规范下的所有活动都应该有公法的评价和寻求行政救济的权利。

一是行政主体的多元化。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认为，应当发展行政主体理论，丰富行政主体的内涵，行政主体的范围不仅应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还应包括作为社会公共行政主体的非政府社区组织、行政组织以及公共事业单位。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将所有行政现象纳入行政法的考察范围之中，由此扩展行政法的认识对象与考察范围。传统的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仅以行政行为的最终结果作为评价对象，忽略了对行政过程整体的、动态的观察和评价。现代行政法学的发展应当考察整体的、动态的行政过程，包括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等阶段。为此，在中国行政法典化的过程中，应倡导以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作为行政法学的另一重要方法论，以行政法律关系在不同阶段的链接或者复数行政法律关系的连续性为纽带，全面、动态地考察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及其变化，注重相对人在行政过程中的参与作用，提高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使得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更加及时和充分。二是行政基础的正当性。伴随行政现实的复杂化、利益主体复数性以及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行政基础的正当性亦发生转变。在现代的行政中，仅仅僵化地遵守法律，已不能再为复杂的行政个案决定提供充分的正当性基础。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认为，行政过程的透明性和亲民性、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和可理解性、行政效能的合理性和高效性等综合指标，已经取代单一的“合法性”标准，成为新的行政正当性基础。我国在行政领域已经面临着民营化、风险化和信息化等多维度的变迁，中国行政法学应当勇于跳出以往仅仅以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作为方法论的思维模式，充分整合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以更灵活有效的方式克服新时代的问题。^①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综合把行政现象、行政过程以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作为检视对象，必要时还应回归到宪法层面，运用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原则去思考和评价现实中复杂多变的问题，巩固了现代行政的正当性基础。

（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行政法法典化中的困境

一是“平等秩序”作为解释框架的问题。公民与国家之间属于平等关系的构想与传统法治理念不符。依据法治理念，法律所构筑的是一种国家权力行使正当性的分层构造。在这种分层构造中，必然涉及国家主权的行使与公民的服从义务的基本原则。从这些原则出发，行政秩序是通过法律所赋予的“权限”来确定的。因此，明确公民与国家关系的首要法则应该是行政权限的上位性而非同等性。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必然是国家权力的表现形式。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主张在国家对公民实施行政活动的过程中导入平等的法秩序，这与行政行为的本质特征相左。二是“功能价值”指向模糊的问题。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行政法学的核心概念，主要是因为其具有明确的功能指向与目标追求。对行政予以合法性控制是行政法的法理基础与逻辑起点。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却缺乏这种明确的功能指向与目标追求。法律关系理论虽然同样提供给现代行政可行与适切的观察框架和分析工具，但这一框架并不能体现出具体的目的指向特质，尤其对行政予以合法性控制的功能指向并不明显。

（三）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行政法法典化中的特质

一是“关系主体”分析法。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关系主体”分析法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视为行政法律关系的平等主体，提高了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并以此为基础观察和分析行政法中存在的问题。随着现代行政的发展，“行政权的行使也只有运用服务理论，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否则就属于权力的滥用”。^②“关系主体”分析法促进了以行政行为作为发现和分析问题的模式发生转变，将研究对象拓展到行政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以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构成行政法的逻辑

^① 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法学家》2015年第3期。

^② 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起点，使两者从对立到统一，从不平衡到平衡。^①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关系主体”分析法也因应了现代行政法学中平衡理论的理念和精神。二是“整体事实”分析法。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整体事实”分析法对行政现象进行整体的、全过程的考察和分析，有效回应了现代行政多样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现象。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行政活动分为事前过程、事后过程和救济过程。“整体事实”分析法着重关注各种行政法律现象和行政法律规范的构造以及各种非要式行政行为与行政事实行为之间的关联和衔接，形成对整体行政活动的全面考察。面对现代行政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复杂情况，“整体事实”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地对单一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行综合评价。三是“动态过程”分析法。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动态过程”分析法对动态的行政现象进行考察，将一系列连续的行政行为作为动态的过程进行观察，并将其拓展到所有行政现象和法律秩序中，其核心内容在于将所有的行政现象作为“法律创造行为”和“法律执行行为”。这意味着科学的行政法法典化不应仅考虑固化的法律规范，而应更多地考虑行政活动的动态过程。

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中国行政法法典化中的价值

(一) 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法解释论上的价值

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以规范命题与法律现象为媒介，以表述规范构造与社会现象构造为解释，对行政活动和行政现象进行直接推论和演绎推理，体现出其在解释方法上具有包容性、时代性、社会性等价值。

一是解释之包容性。法的解释方法是解释者对法律、法规和规定进行分析时，为了达到解释的目标所使用的方法。^②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以法律解释学的视角观察行政活动的动态过程，对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法律关系的产生、变化和消灭等进行全过程分析。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解释之包容性特质不仅能充分地认识和评价行政现象，而且能开放地观察和分析行政秩序。这有效地克服了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主要是对行政行为与法律规范的对照和分析，机械地判断行政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问题。二是解释之时代性。法律解释之时代性又称为法解释的现在性。^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重视运用社会上普遍认可的客观规律、秩序、价值和原则，把不确定的概念和规则具体化，与时俱进地理解与解释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及时回应当时社会的复杂变化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识。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强调的动态互动与行政法律解释的时代性不谋而合，针对社会和公众的时代需要，把历史问题时代化，把抽象问题具体化，以实现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时代性。三是解释之合宪性。在运用法学方法论对行政现象进行解释时，不能机械地从法律规范寻找个案的结果，而应站在宪法的高度，从法的秩序和逻辑出发，对行政现象与具体个案评价和解释。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把行政活动双方当事人看作宪法层面的主体身份，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中具备主体的地位，符合宪法规定的公民是国家主人翁的定位，其本质是宪法中人民主权原则在行政法中的具体体现。

(二) 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法认识论上的价值

行政法认识之客观性既需要规范维度逻辑分析的方法，也依赖经验层面事实检验的方法。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从逻辑分析与事实检验两个方面来观察和分析行政法，从而确保行政法法典化的科学性品质。

一是从逻辑层面认识行政法的客观性。法律关系理论在法认识论上的意义在于揭示法体系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解决的方法。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涉及如何维护国家法体系的逻辑理性，是法概念在认识论范畴的主要分析工具。一方面，制定法律的基础事实应是构成法律认识的界限。在风险社会中，法律规则制定的基础理性越来越趋于不确定的状态，对事情的认识无法仅仅依靠固化的“因果关系”或“均衡模型”来实现，而是必须结合非线性的、非均衡的模型进行预测与分析。行政法法典化既具有一定程度

^① 罗豪才、袁曙宏等：《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中国法学》1993年第1期。

^②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③ 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135页。

的抽象构想，又有一般立法规律的遵循。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思维模式下，行政法体系应该保护、补充以及强化其他权利，经由“私人间关系之类型化规律”，适应行政民营化的趋势，将市场体系融入法体系利益，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作为平等权利予以保护。另一方面，解释法律的基础事实应是构成法律评价的界限。在一般的法律解释和法律评价中如何判断涉及的相关利益，无法在立法时加以明确和定性，而是要进行具体个案的分析和讨论。例如，在计划行政中，对于法律评价中所涉及利益为何，一般无法事前加以周全的规定，而须进行详细思考；在给付行政中，给付的利益具有个别性，无法以一般化方式加以定型。以上情况造成法解释的困境时，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视野下，为处理上述法律评价的界限，应使用法律规范的多元化手段，保障公民个人权利的程序参加权，适当合理地表现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二是从经验层面认识行政法的客观性。“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①法是一种实践取向的规范秩序。因此，法既非纯粹规范命题，亦非纯粹经验命题，而是统合二者自应然过渡到实然的实践命题。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运用即体现“自经验中寻求法律之生命”的道理。一方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注重在经验维度对社会事实的考察。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能够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和及时反映生活现象的现代行政的需求。它能够有效地化解行政行为形式理论对社会现实的调控只能按照立法时的预设来处理问题，无法从现实生活的经验层面去发现、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困境。同时，其也能够有效地平衡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行政相对人也不再是单纯行政权力的客体，而是与行政主体具有对等地位的权利主体。因此，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运用对行政相对人主观权利的判定，不必仅仅受制于先前的、形式化的行政行为的束缚，而是可以使用将行政法律关系与社会事实相互对照与互动的方法，根据其开放性与包容性，寻求行政相对人主观权利存在的自然基础。^②另一方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注重对现实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夯实了对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它要求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不仅要求形式合法，而且要求实质公正。在现代行政活动中，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判断与人民的主观权利有机融合，才能有效提升行政相对人在国家行政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的正当性。可见，行政法律关系理论重视对现实社会利益的权衡和调适，科学地回应行政的合法性控制与公民权利有效保障之间平衡发展的恒久追求。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助于推动行政法学抛弃僵化的“规范法学”立场，适度向“利益法学”的方向倾斜，推动行政法学更加注重对社会生活利益关系的调节，更加重视私益之间的协调，更加重视私益与公益之间的平衡。^③

（三）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法教义学上的价值

法教义学就是对法律素材的科学体系化。行政法律关系理论通过对实定法的观察、归纳和评价，对错综复杂的行政现象进行类型化和系统化，构建统一的知识体系和思考模式，为解决现实的行政争议提供合理的方案。

一是有利于法律解释的统一性。解释学是法教义学的一种方法。为了维护法在解释上的统一性和适切性，中国行政法学正在经历一场法律解释学的转向和发展，落实其作为规范学科和实践学科所应该承载的功能。一方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利于行政法解释的规范化与统一性。在法的秩序框架内对行政法律现象进行描述与分析并提出解决争议的具体方案。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行政行为之间推导出一个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的规范结构，在多边行政法律关系中各种利益主体在行政关系的统合下，表现法教义学之关联性与一致性。同时，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可以统一解释复数法律关系或连续性法律关系的产生与形成，并可以对其进行一致的规制与调整。另一方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利于对法律关系的清晰感知和正确理解。在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必然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整个过程必然体现了行政法律关系里的动态性；其二，行政法律关系不仅仅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

①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 *The Common Law*,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881, p.1.

② 苏宇：《面向未来的学理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之省视与展望》，《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

③ 李福林、张肇廷：《从“行为论”到“关系论”的中国行政法学》，《学术研究》2018年第10期。

对人两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还可能包括其他行政相关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①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对行政相对人的涵摄和统合体现了行政法律关系的包容性和柔软性的特点，对行政相对人的相互捕捉、相互组合等方式，逐渐形成新的法律关系，从而更加清晰地认识行政现象，促进法解释的统一性。

二是有益于学科建设的体系化。体系化是法教义学的另一种方法。大陆法系国家的公法学体系特别强调法律体系化的重要性。^②体系化的方法在于对法律现象内在联系的挖掘，追求对基本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的逻辑一致性与内外协调性。一方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助于中国行政法典化的体系建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注重行政法核心概念的解释，以及法体系的逻辑性分析。行政法律关系理论采用逻辑分析的方法研究行政法的构成要素、主体结构、程序过程以及公民个人权利的确认与保障，从而形成对行政法一般概念、理念、原则和体系的系统认识。同时，其对行政法的核心问题采用权利义务分析法，将权利义务放置在社会关系之中，提供完整的观察与评价行政事实的思维模式，有效地弥补了行政行为形式理论难以有效发现与解释行政相对人的主张等问题。另一方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有助于现代行政法学的体系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关系主体”“整体事实”“动态过程”的行政法学重要方法论，可以弥补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理论仅仅重视公权力的强制性和单方性的明显缺陷。它“不仅注意一个法律事实的规范形式，更重视一个法律关系的规范内容；不仅关心国家意志如何形成，更顾及一个法律关系可能涉及之多边法律主体利益冲突的调节；不仅思考手段如何达成目的，更强调多元利益的协调”。^③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具有的“利益论”“过程论”以及“主体论”基因，能够把所有的行政现象都纳入行政法的体系性分析之中。

三、结论

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提升了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中的法律地位，增强了行政法学作为规范学科对法规范的理解，提供了行政法学完整观察行政事实的方法，弥补了行政行为形式理论的局限性。期待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中国行政法典化进程中也可以成为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思维模式，更好地实现行政法对行政的合法性控制和公民权利保障的重要目标。

责任编辑：王冰

^① 鲁鹏宇：《论行政法学的阿基米德支点——以德国行政法律关系论为核心的考察》，《当代法学》2009年第5期。

^② [美] 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禄正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65页。

^③ 张锐盛：《法律关系理论作为行政法体系革新的动力》，翁岳生教授祝寿论文编辑委员会：《当代公法新论》中，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第66页。

公司治理发展历程、新兴领域及未来展望^{*}

姜付秀 王莹 马嘉

[摘要]公司治理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成为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关注的核心话题。在学术思想方面，公司治理分别经历了源起、奠定理论基础、框架基本形成、框架进一步完善、学科交叉融合五个阶段。在研究方法方面，早期的研究多采用现象描述法和历史归纳法，后来理论模型法和实证研究法成为主流，如今研究样本已拓展到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就新兴研究方向而言，随着科技进步以及新的经济、社会思潮出现，ESG、大数据、区块链和平台组织成为现今公司治理领域研究的最新话题。

[关键词]公司治理 发展简史 新兴领域 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 F09;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72-09

伴随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委托代理理论成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而公司治理正是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探讨如何使投资者（委托人）获得应得回报的问题。^①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32年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为经济、金融、会计、管理领域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核心话题之一。此后40余年，经过诸多学者的不断深耕，公司治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理论基础不断夯实，研究框架逐渐成熟，研究边界也在不断拓展。

实践的横向差异和纵向演变是公司治理领域研究历经40余年仍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就横向差异而言，宏观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中观行业层面的市场竞争，微观公司层面的产权性质、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以及高管特征等诸多错综复杂因素，都对公司治理实践产生了深刻影响，不断吸引着学者们进行相应探索。就纵向演变而言，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公司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公司本身的组织形态都不断地发生变化。这给公司治理实践带来碰撞、冲击和挑战的同时，也给学者们开启新研究话题提供了诸多机会。可以预期，公司治理在未来仍是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如今关于公司治理的文献非常多，但其中却鲜有对公司治理学术发展史的梳理和总结。无疑，这一工作十分必要。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对于任何一个学科以及学科中涉及的核心内容，应从源头追溯，一步一步厘定并拼接出它的发展历程。只有知晓了它缘何而来，才有可能知道它将走向何处。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其历史演进过程，可以发现推动其学术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方法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重视对公司治理学术发展史中方法论的梳理，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272144）的阶段性成果。限于篇幅，文章有大部分文献没有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

作者简介 姜付秀，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环境、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莹，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马嘉（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①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52, no.2, 1997, pp.737-783.

这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公司治理学术思想发展史，也对我们恰当选择和应用研究方法、做好公司治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公司治理学术思想发展简史

（一）公司治理的源起

从历史源头上看，公司治理的学术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相关论述。1776年，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写道，“股份公司的董事管理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而是别人的钱。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他们会像私人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那样尽心尽力。在股份公司的业务管理中，漫不经心和浪费总是无处不在”。以上论述虽没有明确提及“公司治理”，但已经关注到当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可能因为当时股份公司并非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在之后的150多年里，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把企业视作一个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进行投入一产出的“黑箱”，只关注企业的生产问题，并未就亚当·斯密对企业内部关系的洞察继续深入探究。直到1932年，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兴起，在《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中，伯利和米恩斯以详细的数据展示了20世纪20—30年代美国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首次指出分散的股权结构会导致管理者滥用自由裁量权。尽管这部著作还停留在两权分离的表面现象，但毋庸置疑的是，该研究已经将学者们的视角引入到现代公司的内部运行中来，被学术界认为是公司治理研究发轫的标志。

（二）20世纪30至70年代前期：奠定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

在这一时期，公司治理的研究看似沉寂，实则处于厚积薄发的孕育阶段，企业理论、融资理论、代理理论蓬勃发展为公司治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企业理论方面，Coase（1937）打开了企业的“黑箱”，开创了现代企业契约理论；Alchian和Demsetz（1972）、Williamson（1975）相继提出“剩余索取权”和“治理结构”的概念，从此产权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在融资理论方面，Modigliani和Miller（1958）开始探寻企业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并提出MM定理；后续研究相继放松MM定理的假设来进一步进行探讨。在代理理论方面，Ross（1973）正式提出了代理关系这一概念，指出当事人双方中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代理关系随之产生。^①正是在吸收了以上多种理论成果的基础上，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企业所有权结构理论。该研究基于理论模型系统地阐述了现代企业中的委托代理关系，聚焦股东、债权人与经理人之间契约安排所产生的各类代理成本，探究企业如何安排所有权结构以达到最小化代理成本的目的。^②他们首次针对现代公司治理搭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后续研究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学者，基本都继承和延续了这一理论分析范式。从此，公司治理的学术研究开始沿着各个方向铺开，迅速向前推进。

（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聚焦美国，开始构建公司治理研究体系框架

在这一阶段，学者们沿袭伯利和米恩斯（1932）对美国股份公司的关注，借鉴Jensen和Meckling（1976）的分析框架，对美国公司治理问题的表现以及各种治理机制展开了热烈讨论。第一类代理问题（即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学者们相继指出这类代理问题的具体表现，如经理人的帝国构建以及巩固地位的行为等。针对如何缓解这一代理问题，学者们也从内部和外部治理机制两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答案。在这样的探索中，公司治理研究体系的框架逐渐清晰起来。

首先，在内部治理机制方面，学者们讨论了包括机构投资者在内的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高管激励、负债等机制安排对代理问题的缓解作用。（1）大股东积极治理作用的研究，始于Shleifer和Vishny（1986）。该文通过模型分析指出，相比于中小股东，由于开展积极监督带来的收益能够弥补其

^① Stephen A. Ros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gency: The Principal’s Problem”,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3, no.2, 1973, pp.134-139.

^② Michael C. Jensen,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3, no.4, 1976, pp.305-360.

监督成本，拥有大量股权的大股东更有动力进行监督；凭借较多的投票权，大股东也更有能力监督经理人。^①值得注意的是，机构投资者是美国资本市场上重要的大股东。1985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协会的成立，更是标志着股东积极主义的兴起。在这一时期，机构投资者的治理作用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②（2）作为公司内部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负有监督、聘任、解雇经理人以及设定经理人薪酬的重要职责。^③学者们也开始关注这一重要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并就影响董事会治理的因素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如董事会规模以及董事会独立性等。^④（3）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也在这一时期受到广泛关注。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高管薪酬迅速增长，薪酬业绩敏感性大大增强，股权激励在整个薪酬结构中的占比开始大幅度增加。学者们基于对美国企业上述薪酬实践变化的现实思考，开始讨论经理人薪酬的影响因素和相应治理效果。相关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指出最优的薪酬契约能够使经理人与股东的利益趋同，从而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但Morck等（1988）则提供了管理者持股与公司价值呈N型关系的实证证据，认为只有在管理者持股比例处于较低或较高水平时，正面的利益协同效应才居于主导，否则负面的堑壕效应将占据上风。^⑤（4）负债往往被认为是一项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在Jensen和Meckling（1976）首次提及负债的治理作用之后，学者们相继开始了对该领域的探索。Grossman和Hart（1982）提出的“绑定效应”假说认为，管理者通过举债使自身与公司利益绑定在一起，负债可以作为管理者按照股东利益行动的事先承诺，因为当公司无力偿付债务而被清算时，管理者将面临失业。^⑥Jensen（1986）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则强调，负债利息的定期偿付将减少经理人可支配的自由现金流，从而降低其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此外，这一时期也有学者专门就银行这类大债权人的治理作用进行探讨。^⑦

其次，在外部治理机制方面，学者们关注市场机制以及信息中介的治理作用。在市场机制方面，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治理作用均开始被学者们挖掘和探究。20世纪70—80年代，美国活跃的控制权市场理所当然地吸引了公司治理学者们的目光。大多数学者认同控制权市场这一治理机制的有效性（Fama and Jensen，1983）。但也有学者指出控制权市场具有负面治理效应，认为来自这一市场的威胁会让目标公司经理人行为短视化。^⑧在经理人市场方面，Fama（1980）首次明确指出经理人市场对公司经理人的约束作用，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和探讨。大量研究表明，经理人市场会对不称职的管理者施加惩罚。但与控制权市场相似，也有学者认为经理人亦会出于快速建立声誉的动机进行机会主义行为，即经理人市场也有负面效应。产品市场竞争在公司治理领域的正式研究始于Hart（1983）。在委托代理框架下，Hart通过理论模型论证了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抑制经理人的松懈行为，明确强调这一机制的积极治理效果，引发了后续研究的跟进和探索。信息中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缓解代理问题也在同一时期得到关注。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应由诸如分析师这类有相对信息优势的群体对经理人进行监督，且外部审计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式。自此之后，分析师和审计师等信息中介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如Moyer等（1989）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分析师能够有效降低股权和债权代理成本，Watts和Zimmerman（1983）则研究发现审计师的独立性对其治理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四）20世纪90年代：放眼全球，公司治理研究体系框架逐渐完整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们的视野开始从美国扩大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一研究范围的扩展使得公司治理中的第二类代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同时也让法律机制和利益相关者治理两类机制纳入

^①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4, no.3, 1986, pp.461-488.

^② Eugene F. Fama, Michael C. Jensen,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26, no.2, 1983, pp.301-325.

^③ Sanford J. Grossman, Oliver D. Hart, *Corporate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Managerial Incent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p.107-140.

^④ Douglas W. Diamond, "Reputation Acquisition in Debt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7, no.4, 1989, pp.828-862.

^⑤ Jeremy C. Stein, "Takeover Threats and Managerial Myopi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6, no.1, 1988, pp.61-80.

到公司治理研究的框架中来。

在这一阶段，一系列的研究发现除英、美外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Shleifer 和 Vishny (1997) 指出，在集中的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会出于私利动机损害中小股东的权益。也就是说，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成为这类公司的核心代理问题。从此，针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研究开始向前推进。学者们相继讨论了控股股东进行利益侵占的具体表现以及相应的经济后果，并形成一系列丰富的研究成果。^①为什么各个国家/地区的公司股权结构和代理问题会存在差异？La Porta 等 (1997) 的一系列“法与金融”的文献给出了一定解释。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公司治理情况，他们研究发现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和地区，公司的股权往往高度集中。这说明投资者法律保护的差异是各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不同代理问题的内在原因，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相应成为改善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在此之后，法律机制成为了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此外，相关研究开始关注强调利益相关者权益的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并对其与英美模式的差异展开热烈讨论，如 Kaplan (1994) 等。同时，美国在 1980 年代兴起的恶意并购浪潮让股东之外的利益相关者付出了惨重代价。1980 年代末，美国各州相继修订公司法，要求经理人对利益相关者负责。在以上研究推动和实践的要求下，利益相关者治理的新思想应运而生。Hill 和 Jone (1992) 指出，不同于传统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理念下，委托人从股东扩大到利益相关者，经理人成为连接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键角色，被视为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代理人。后续研究继续对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效果展开了探究。不难看出，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公司治理研究体系的框架逐渐完整，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也逐渐得到确立和巩固。

(五) 21 世纪：多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完善研究框架，拓展研究边界

自 21 世纪以来，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除了在以上这些分支中继续深耕外，还更加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完善和丰富公司治理研究体系框架。通过公司治理与社会学的融合，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自然而然地被纳入公司治理的框架中。具体来说，学者们从社会学视角研究发现，文化差异是导致各国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控制权私有收益和相应公司治理实践差异的原因之一。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启发了后续学者将非正式制度作为重要的外部公司治理机制进行探究。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不断拓展着该领域的研究边界。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给环境、社会和治理带来的巨大冲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热切呼吁之下，ESG 成为公司治理研究领域中一个新兴的研究话题。同时，数字经济的繁荣造就了大数据信息资产、区块链信息技术以及平台企业等新型组织形式，它们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并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新方向。

二、公司治理研究方法发展简史

从起源上看，公司治理从经济学、公司金融等学科发展而来，因此公司治理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必然依托于经济学、金融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演进。同时，不同历史阶段的科学哲学认识论，也会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化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在本部分，我们试图从科学哲学认识论影响下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沿革中撷取两三支与公司治理研究有关的历史脉络，以期从中知晓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如何发展至今，接下来又可能会走向何处。

(一) 20 世纪上半叶之前：以抽象演绎法与现象描述法为主

早在 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相关论述就已经涉及公司治理问题。就研究方法而言，这一著作受英国古典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采用了抽象演绎与现象描述相结合的方式，即亚当·斯密既对现实进行初步的抽象化，又用描述的方式把经验与现象联系起来，但还停留在现象之间的表面联系上。

^① Simon Johnson, et al., “Tunnel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2, 2000, pp.22-27; Stijn Claessens, et al., “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57, no.6, 2002, pp.2741-2771.

在 100 多年后，随着现代公司形式的逐步发展和成熟，伯利和米恩斯在 1932 年出版了著作《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两位作者用详细的统计数据描述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美国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这部开创了公司治理学术研究先河的著作，大体上仍旧采用现象描述的方式进行陈述，进步之处在用于了简单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加以佐证。

（二）20 世纪下半叶：理论模型法与实证研究法成为主流，并不断深化

此后，公司治理的研究方法得到快速发展，学者们开始成为实证原则的信徒。这主要得益于 20 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作为现代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潮之一，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和观点并不是有效的知识，只有逻辑和数学这种科学知识才是知识唯一有效的形式，同时还主张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逻辑与数学之外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可见，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正在于取消“形而上学”并建立一种科学哲学，即以经验为根据，以逻辑为工具来进行推理，并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这对经济学（包括公司治理）产生了以下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将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公理化，即转化为一致的数学形式，这推动了数理经济学的发展。受此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 Jensen 和 Meckling（1976）、Ross（1977）等为代表的公司治理研究都是采用理论模型演绎的方式来讨论多种形式的代理问题。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还要求经济学的结论是可检验的，需要利用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对理论涉及的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这也推动了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也指出经济模型忽视了经验数据的检验，会使经济学退化为“数学的仆人”。受此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公司治理领域的学者们也逐渐使用经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如探究控制权市场的治理效应等。与此同时，计量经济学开始集中讨论经验研究的可信度问题，不断在计量推断的稳健性和因果关系的识别上取得进步。这让公司治理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自 20 世纪末开始朝着更加可靠、可信的方向迈进。

首先，就计量推断的稳健性而言，横截面样本往往不满足同方差假定，使得用普通标准误构造的 t 统计量失效。White（1980）基于此问题，提出了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而在面板数据中，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扰动项也通常存在相关性，这会让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也变得不可靠。Liang 和 Zeger（1986）和 Arellano（1987）等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聚类稳健的标准误。以上两类稳健标准误成为计量经济学的标准工具，被公司治理领域的实证研究广泛应用。

其次，就因果关系的识别来说，当遗漏变量、反向因果、选择偏差（包括样本选择偏差和自选择偏差）或测量误差等问题导致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与随机扰动项相关时，内生性问题随即产生。为了缓解这一因果识别问题，包括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断点回归法以及事件研究法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应运而生。（1）工具变量法早在 1928 年就被提出，并成为了公司治理研究中应用较早、较广泛的方法之一。但事实上，要寻找一个相对“完美”的工具变量似乎不容易。我们在这里举一个公司治理领域中较为经典的工具变量案例。Bennedsen 等（2007）在探究“继任 CEO 是否为家族成员”对企业后续绩效的影响中，精妙地选取了“离任 CEO 第一个孩子是否为男性”这一工具变量，“长子继承制”的习俗保证了该工具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并且个体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具有极强的外生性。（2）双重差分法应用的关键在于政策或其他冲击事件的外生性能使研究对象较随机地被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达到准自然实验的效果。美国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陆续出台的反并购法案，是公司治理研究学者们眼中的外生场景之一。早期一系列探究并购的公司治理相关文献都利用这一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从而将准自然实验的研究设计引入公司治理研究中来。（3）相对前两种方法，断点回归法要研究在某一微小断点处的政策效应，研究设计更为严苛，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应用相对较少。但在众多研究方法中，断点回归场景最接近随机试验，最能干净地识别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和重要地位。例如，Chava 和 Roberts（2008）研究债务契约违约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其只关注契约规定的企业净资产门槛值附近的状态，即净资产一旦低于该门槛值，债权人就会获得企业控制权，而

略高于该门槛值的企业的控制权则不会发生转移，以此设计断点回归。Cuñat 等 (2012) 聚焦以微弱票数优势通过和以微弱票数劣势未通过的两类股东提案，通过关注获得赞同票比例在 50% 左右的提案来探究股东提案对公司价值的影响。(4) 有着悠久历史的事件研究法最初只是用来衡量并购、盈余宣告或股票发行等公司重大事件的市场反应，但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其作为缓解内生性的有效手段之一。例如，Nguyen 和 Nielsen (2010) 探究独立董事突然死亡这一事件带来的市场价值影响，避免了董事治理相关研究中常见的内生性问题。Deng 等(2013)探究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 (CSR) 对股东价值的影响，认为宣告并购往往在意料之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 CSR 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由此可见，事件研究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缓解内生性的方法，关键在于该事件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外生性，同时该方法关注事件发生后极短的几天之内的市场反应，较少受到其他重大事件的干扰。

(三) 进入 21 世纪：非结构化数据获得关注，文本分析法开始应用

自 21 世纪以来，大数据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统计学研究的发展突飞猛进。与此同时，大量非结构化的文本信息，如年报、新闻、盈余电话会议等可用性也大大提高。这使得基于大样本的文本分析方法开始出现在公司治理研究中。Li (2008) 较早开始使用^①文本分析法衡量了公司年报的可读性，旨在探究管理层通过增加信息复杂度来隐藏负面信息的行为。Kim 等 (2019) 进一步使用了更为先进的文本分析方法，发现年报可读性越差，股价崩盘风险越高。^② 不难看出，文本分析法确实填补了针对非结构化数据研究的应用空白，让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更加丰富和全面。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我们相信公司治理研究方法会进一步应用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同时也将谨防掉入“技术陷阱”，朝着更准确、更可靠、更全面的方向迈进。

三、公司治理的新兴研究领域

近年来，全球变暖、生态失衡等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地区贫困、员工保护等社会问题也备受关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此背景下，ESG 投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了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新兴研究问题。同时，21 世纪伊始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了大数据信息资产、区块链信息技术以及平台组织形式，改变了人类生活和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三类数字经济的产物也对公司治理的实践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冲击和影响，成为现今的前沿研究方向。

(一) 环境、社会与治理 (ESG)

ESG 是“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的缩写，是一种在投资决策中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纳入考虑的投资理念，也是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有足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2004 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联合来自 9 个国家的 20 家大型金融机构共同签署和发布了“Who Cares Wins”报告。该报告首次将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并列，提出了 ESG 概念，并指导人们如何将 ESG 理念融入到投资实践当中。随后，他们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组织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支持下发起设立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简称 PRI)，并于 2006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布“负责任投资原则”，要求签署 PRI 的机构不仅要将 ESG 因素纳入到投资决策中，还要推动被投资实体的 ESG 发展。自此之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ESG 投资理念也逐渐向全球推广。截至 2022 年 1 月，PRI 的签署方总数超过 4700 家，资产管理总规模超过 120 万亿美元。近年来，学术界开始追随 ESG 实践的步伐，这一研究话题的热度持续上升。在 2015 年前后，国际顶级期刊上开始出现关于 ESG 主题的研究。Dimson 等 (2015) 较早关注到 21 世纪以来 ESG 投资的繁荣态势，发现具有 ESG 理念的

^① Feng Li, “Annual Report Readability, Current Earnings, and Earnings Persistence”,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vol.45, no.2-3, 2008, pp.221-247.

^② Chansog Francis Kim, Ke Wang, Liandong Zhang, “Readability of 10-K Report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vol.36, no.2, 2019, pp.1184-1216.

机构投资者能够给被投资公司带来正向的市场反应，并提高了公司的经营绩效和治理水平。^①这一研究打开了ESG在公司金融领域的研究大门。随后，多个顶级期刊陆续开始征集或刊登ESG相关主题的研究，预示着该领域具有良好的学术前景和极大的探索价值。2017年，*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发起征集关于“气候金融”的研究设计，密切关注可持续投资中的气候问题。2021年，*Review of Finance*也开始征集关于“可持续金融”的研究，指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整个社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年，*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刊登了一期以“社会责任投资”为研究主题的特别栏目，亦凸显了学术界对ESG理念的重视。就目前已发表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大多关注ESG投资给投资者带来的收益问题，而较少直接讨论公司治理相关话题。但从ESG的缘起就能够看出，ESG理念本身就是利益相关者治理推动的结果，其与公司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相信，随着未来利益相关者治理研究增多，ESG这一新兴研究话题势必会拓展公司治理研究的边界。

（二）大数据（Big Data）

随着21世纪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经济时代。无处不在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场景催生了呈几何级数增长的海量数据。这些大数据不仅在实践中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其在学术研究中的巨大价值也日益显现。2021年，*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发布了一期以“金融中的大数据”（Big Data in Finance）为主题的特刊。在该期卷首文章中，Goldstein等将“大数据”定义为具有大体量（Large Size）、高维度（High Dimension）和复杂结构（Complex Structure）的数据，并言明了其在金融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首先，大数据的大体量特征有助于克服传统研究中的样本选择偏差，缓解实证结果的内生性问题。其次，大数据的高维度特征能够捕捉到研究对象更多维度和层面的特征，使研究更贴合实际。因为现实中的问题往往涉及非常多的变量，同时变量之间的影响也有可能是非线性的，使用大数据能够更好地拟合这一现实。最后，大数据的复杂结构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扩展研究对象。文本、图片、视频、音频等非结构化数据往往包含着以往研究未能关注到的重要信息，利用机器学习等方法对这类复杂结构的大数据进行挖掘和分析，有助于填补研究空白。近几年，公司治理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开始尝试大数据背景下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学者们基于大数据样本，利用深度学习等相关技术，来更准确、全面地研究现有的公司治理问题。如Li等（2021）首次利用机器学习的方法对将近21万份公司电话会议记录进行分析，识别出每一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内容，进而讨论公司文化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②另一方面，学者们也开始探索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大数据变革对公司相关行为决策的影响。如Zhu（2019）发现，当投资者能够使用大数据对公司进行分析时，公司股价的信息含量会上升，同时经理人机会主义行为将有所下降。Erel等（2021）发现机器学习技术能够帮助公司优化董事提名决策，进而改善公司治理。从以上几篇前沿研究中可以看出，大数据将深化学者们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理解，也将重塑公司治理相关实践。因此，大数据与公司治理的新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大数据处理方法的应用愈加成熟，该领域必将获得更快的发展。

（三）区块链（Blockchain）

区块链（blockchain）是一个分布式的共享账本和数据库，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集体维护、公开透明等特点。Nakamoto（2008）第一次提出区块链的概念和技术，并用于验证虚拟货币的所有权。在2015年前后，鉴于区块链这种记账方式在成本、速度和数据完整性方面都具有强大优势，金融、物流、公共服务、数字版权等多个领域开始关注并投资这一技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在金融领域，区块链技术已经开始落地。例如，

^① Elroy Dimson, Oğuzhan Karakaş, Xi Li, “Active Ownership”,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28, no.12, 2015, pp.3225-3268.

^② Kai Li, et al., “Measuring Corporate Culture Using Machine Learning”,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34, no.7, 2021, pp.3265-3315.

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在 2016 年 1 月宣布其将使用区块链技术重新设计清算和结算系统；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下属的爱沙尼亚塔林证券交易所于 2016 年开始在区块链平台上进行股东投票；美国上市公司 Overstock.com 也在 2016 年底开始通过私有区块链来发行股票 (Yermack, 2017)。不难想象，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会一定程度影响到公司的行为决策，随着该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企业内部治理也可能直接用到区块链技术。由于预见到了这一点，公司治理领域的学者们开始就区块链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展开初步探讨。Yermack (2017) 最早对区块链与公司治理领域进行系统性论述，分析了区块链对企业经理人、机构投资者、债权人、审计师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影响。Murray 等 (2021) 则具体讨论了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在降低公司代理成本方面的利弊，认为区块链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代理成本，但由于无法预见到所有的意外情况，智能合约也不能完全解决公司内部的代理问题。从以上两篇研究能够看出，区块链这一基于算法来建立信任的技术，将给公司治理带来极大的影响，甚至可能产生颠覆性的效果。但现有研究还停留在规范性的描述和设想层面，远未形成系统、清晰的认识。因此，该新兴领域是一片值得探索的蓝海，将大有可为。

(四) 平台组织 (Platform)

平台组织这一概念最早由 Ciborra (1996) 提出，是指在新型的商业机会和挑战中构建灵活的资源、惯例和结构组合的一种组织形态。这一抽象的概念听起来有些艰深晦涩，但在互联网经济风靡全球的当下，一个个具体的平台组织早已触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越来越重要、有价值的一种商业模式。2016 年 8 月，在全世界市值最高的 5 家公司中，第一次没有了石油、金融、工业等公司的身影，全部变成了清一色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2017 年，中国平台企业腾讯和阿里巴巴也进入该榜单前 10。从这些企业的共性中不难看出，平台组织正是通过构建一个活跃互动的双边 (或多边) 市场，来促进外部供应商和顾客进行信息、商品与服务、社会货币的交换，从而为所有参与者创造价值。实际上，在学术研究中，产业组织学和战略管理学已经对平台组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在产业组织领域，学者们主要基于双边市场理论来分析平台的定价和竞争策略。在战略管理领域，学者们主要聚焦平台生态系统的治理机制和效果等。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中提及的平台治理，指的是平台拥有者制定一系列控制规则 (包括决策权配置、激励结构和控制机制)，以实现整体上对平台的足够控制，并激励平台内开发者的创新行为，最终促进平台商业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可见，上述探讨的平台治理与基于代理问题的公司治理并不相干。至今为止，围绕平台组织的公司治理问题仍处于空白，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我们认为，平台组织作为一个新型企业组织形式，其公司治理既具有一般公司组织的个性，也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值得学者们来探索和挖掘。

四、未来研究展望

ESG、大数据、区块链和平台组织是近年来公司治理领域最新关注的话题，我们在这一部分对以上新兴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一些展望。

第一，ESG。ESG 研究的兴起有两大背景。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环境、社会以及治理问题的冲击；二是长期以来企业目标正在逐步从股东利益最大化向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演进。但该领域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鉴于此，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构建一个逻辑自洽且综合全面的 ESG 理论，结合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环境学等多个学科知识，从学理上合理论证 ESG 的意义所在。新兴研究问题不能只关注、追逐“新”，更要关注“新”概念、“新”话题背后的基础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 ESG 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提供底层的逻辑支撑和理论依据，推动 ESG 与公司治理领域扎实稳步地向前发展。除此之外，考虑到目前 ESG 评级领域仍然有很大的争议，不同机构出具的 ESG 评级之间的相关系数只有 0.3 左右，这也启示学者们应探寻 ESG 评级差异的原因，并尽可能构建出一套能够达成共识的 ESG 评价体系。现有关于 ESG 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研究的结论也差异极大，未来研究也应着力于这一点，从企业特征、行业特征以及国别差异等多个角度为现有结论的差异乃至矛盾找到

合理的解释。

第二，大数据。得益于近年来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大数据成为了企业重要的价值创造来源。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所预测的那样，“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整个世界”。大数据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正是当今公司最具价值的资产之一。面对这一变革，公司治理领域的学者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一是利用大数据衡量相关公司治理变量，如用音频、视频或图像等复杂结构数据捕捉公司高管的特征，以此对高管特征进行更准确或更全面的刻画，推动与公司治理相关问题研究。二是探究大数据应用在公司治理实践上的效果，如 Erel 等（2021）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将提高公司提名董事的决策效率。未来研究可以继续寻找大数据技术在其他公司决策上的应用，以及探索大数据的应用是否具有消极效应等。三是探索大数据变革的冲击对公司行为产生的相关影响。例如，随着机器学习在投资界的广泛应用，Cao 等（2020）发现公司会策略性调整其年报的信息披露方式来迎合人工智能阅读年报的偏好。

第三，区块链。如果说大数据是信息在规模、维度方面的创新性产物，那么区块链则是信息在安全性、可靠性方面的创造性颠覆。这一技术提供了一种新型信息记录方式，大大提升了信息的安全性和透明度，大幅降低了信息记录的相关成本。而公司治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正是信息不对称。可想而知，区块链技术在信息透明度上的提升将给公司治理带来怎样巨大的影响。由于这一技术还未广泛应用在公司治理的相关机制中，目前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启发性的设想层面。我们认为在现阶段，仍然可以进行一些基于经济模型的理论研究。区块链技术将通过改善公司的透明度，降低公司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提高公司内部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影响其效用函数和相关约束条件，最终使得模型的均衡解发生改变。这类理论研究既能推动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也能为区块链技术在公司治理上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等到这一技术真正在公司治理领域落地并得到推广时，学者们还可借此进行相关实证研究，为区块链与公司治理领域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第四，平台组织。数字经济不仅催生了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也使得企业组织形式发生转变。平台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式，既扩展了企业边界，也赋予了“价值创造”新的内涵。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很难再单纯依靠扩大规模、减少成本的传统规模经济模式来灵活应对用户需求，而需要依托企业内部即时沟通、外部与供应商之间快速协同，才能提高对客户的响应速度，实现价值创造（Rietveld, Schilling and Bellavitis, 2019）。平台组织通过搭建商业生态系统，使得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密，使得各个参与方的价值相互依存。由此可见，相比于传统企业，平台组织更加强调并重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比较利益相关者在传统企业和平台企业中的重要性、探讨平台企业如何平衡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等。因此，对平台组织的探索为研究新组织形态下的公司治理问题提供了机会的同时，也将推动和深化公司治理领域中利益相关者治理的研究。

责任编辑：张超

重点大学教育回报：基于断点回归设计的实证研究^{*}

刘生龙 张钟文 江克忠

[摘要]借助中国高等教育考试录取规则和相关制度，基于断点回归设计框架，估计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和第一份工作工资的影响发现，重点大学教育回报非常显著，它使得个人读研究生的概率增加 19.2%、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收入增长 22.1%，对出国留学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重点大学教育通过人力资本效应、信号效应和同伴效应对个人的学业和职业产生影响，使得个人英语成绩更好，用于学习的时间明显增加，并且更容易获得保送研究生的机会。本文证实了高质量教育对个人前途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促进高等教育平衡发展和阶层流动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重点大学 教育回报 人力资本效应 信号效应 同伴效应

[中图分类号] F12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81-08

一、引言

考上大学，尤其是上重点大学一直被认为是底层人口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渠道。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对大学教育回报进行了测算和评估，^{①②③}但很少有文献探讨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除收入之外其他方面的回报，如对进一步深造（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的影响。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的很长时间，考上大学意味着可以找到非常体面的工作，许多农村子弟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1977—1998 年，中国的高考录取人数从 27 万人增加到 108 万人。1999 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1999—2019 年，高考录取人数从 160 万人增加到 820 万人。高校扩招使得更多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中国的整体人力素质迅速提高。但高校扩招带来的巨大供给，使得大学生的劳动力价值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初次就业的大学生平均工资上涨幅度缓慢。^④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农民工短缺问题逐渐显现，初次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加速上涨。农民工与刚毕业大学生的平均就业工资越来越接近，于是社会上出现了“读书无用”的声音。

中国的国家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简称高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标准化测试，全国每年大约 1000 万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YJA790047）、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项目（2021THZWYY03）和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创新方向建设专项项目 C03（2021TSG083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生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100084）；张钟文，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872）；江克忠（通讯作者），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副教授（上海，201620）。

① 李雪松、詹姆斯·赫克曼：《选择偏差、比较优势与教育的异质性回报：基于中国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② Dan A. Black, Jeffrey A. Smith, “How Robust is the Evidence on the Effects of College Quality? Evidence from Matching”,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121, no.1-2, 2004, pp.99-124.

③ 刘生龙、胡鞍钢：《大学教育回报：基于扩招的自然实验》，《劳动经济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④ 吴要武、赵泉：《高校扩招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经济研究》2010 年第 9 期。

人参加高考，其目的是为了进入国内 2300 多所大学中的某一所。高考成绩越高的考生越有机会进入排名靠前的大学，也就是本文所说的重点大学。每个省份都有一个清晰的不同层级大学入学的最低资格线，当我们知道学生的高考成绩时就可以基于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来估计重点大学对个人未来进一步深造（读研究生或出国留学）或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在论证重点大学对个人升学和就业的影响时，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是不可观测的个人能力影响。个人能力越强的人越容易考上重点大学，而个人能力越强意味着越容易获得更好的职业生涯，内生性问题难以避免。RDD 可以很好地解决由个人能力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为重点大学在每个省份都有一个临界分数线，在临界分数点附近的考生具有相似的个人特征，只需要比较临界点附近考生结果变量的不同就能够解决由不可观测的个人能力、家庭背景等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的研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边际贡献：一是基于 RDD 方法估计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职业生涯的回报。尽管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已经在很多经济学文献中得以论证，但仅有少数文献用 RDD 方法进行论证，而且只能够论证少量的精英高校的影响。^{①②} 相对于 IV 估计时需要满足“排除性约束”的强假设，RDD 估计的假设前提要更弱一些，当前提假设条件得到满足时，RDD 在因果识别中具有随机实验的特征。^③ 因此，在没有随机设计（Random Assignment）的情况下，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RDD 方法是识别因果关系最可信的方法。^④ 二是首次估计了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人力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因果影响。三是解释并验证重点大学教育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个人升学和工资收入。重点大学教育影响个人结果变量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人力资本效应、信号效应和同伴效应，本文分别就这三个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数据和实证策略

在本文中，重点大学被定义成全国范围内都被承认的第一批次大学，即“211 工程”大学。与一般大学相比，重点大学在师资、财政性教育经费、生源质量等方面比普通大学强很多。除了 112 所“211 工程”大学之外，还有大约 200 所左右的省属重点大学，这些大学只是在少数省份被列为第一批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声望并不是很高，因此在本文中没有被定义为重点大学。随着高校扩招，有 75% 的高考考生最终将进入大学学习，但只有 5% 左右的人进入重点大学。在知道各个省份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和考生的高考分数后，我们能够用考生高考成绩是否超过所在省份重点大学的最低分数线（也即临界分数线）来识别考生能否上重点大学。虽然中国高考的录取过程非常复杂，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实证策略的有效性。我们主要比较录取临界点附近学生在进一步深造或者第一份工作工资上的差异。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0 年和 2011 年中国大学生调查（Chinese College Student Survey），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所联合调查获得。该调查在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域（东北、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所有大学中随机抽选 100 所大学，在抽样时用招生的学生数量作为权重，大学生数量越多的大学被抽中的概率越大。该调查更多地偏向重点大学样本，这是为了获取足够多的高考分数位于临界点附近的学生样本，使得本文处理组（Treatment Group）样本与控制组（Control Group）样本基本上平衡。该调查包括了大学生的家庭背景、高考成绩、大学时期的表现和毕业去向等信息，非常适合本研究话题。我们要研究的是上重点大学对个人进一步深造和劳动力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核心被解释变量包括三个：一是是否在国内读研究生，如果是则取值为 1。样本中 22.7% 的大学毕

^① Mark Hockstra, “The Effect of Attending the Flagship State University on Earnings: A Discontinuity-Based Approach”,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1, no.4, 2009, pp.717-724.

^② Massimo Anelli, “The Returns to Elite College Education: A Quasi-Experimental Analysis”, *Institute of Labor Economics (IZA)*, 2016.

^③ David S. Lee, “Randomized Experiment from Non-Random Selection in U.S. House Election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142, no.2, 2008, pp.675-697.

^④ John DiNardo, David S. Lee, “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Designs”, *In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vol.4, 2011, pp.463-536.

业生将要在国内读研究生，其中重点大学毕业生读研究生的比重是 30.3%，明显高于非重点大学的比重 14.8%。二是是否出国留学，如果是则取值为 1。样本中只有 2.8% 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出国留学，其中重点大学毕业生出国留学比重为 4.1%，也明显高于非重点大学的 1.4%。三是第一份工资收入。样本中重点大学毕业生的初次工作的平均工资水平要明显高于非重点大学，平均高出约 550 元。重点大学学生比重为 51%，与非重点大学学生比重几乎一样，这也保证了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量基本平衡，在临界点附近有足够样本量。

在实证研究时，简单地比较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学生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无法反映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结果变量的因果效应。这是因为不可观测的个人能力和家庭遗传性因素会同时影响考生是否考上重点大学和结果变量，内生性问题难以避免。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我们基于 RDD 方法进行因果识别。这就需要找到一个驱动变量 (Running Variable)，该变量在某一个临界点会导致是否接受处理的概率发生跳跃。我们以高考分数作为驱动变量，以各省份在当年第一批重点线成绩 (分文科和理工科) 作为临界点，当学生的高考成绩减去临界点大于或等于 0 时，该学生被认为可以上重点大学，此时 Eligibility 取值为 1，否则为 0。可以看到，样本中高考成绩上了重点线的学生比重为 61.1%，而重点大学中有 86.5% 的学生上了重点线，非重点大学中有 34.8% 的学生上了重点线。这就意味着样本中既有总是接受者 (Always-Takers)，也有从不接受者 (Never-Takers)，因此我们将采取模糊断点回归设计 (Fuzzy RDD) 进行因果识别。在进行 RDD 估计时，我们还引入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变量和家庭收入。个人特征变量包括被调查学生的年龄、性别 (男性 =1)、民族 (汉族 =1)、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文科生 =1)、高考之前的户口 (农村 =1)。为了对 RDD 估计结果进行更好解释，我们还引入了其他一些与个人在大学学习、生活有关的机制变量。通过这些变量，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重点大学教育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机制变量包括英语四级是否达到 450 分以上、是否获得计算机等级证书、是否保送研究生、是否获得体制内工作、每周学习时长、每周锻炼时长。经过清洗和梳理，我们最终获得的样本量为 9203，其中重点大学样本量为 4680，非重点大学样本量为 4523。

由于后面我们将基于 RDD 框架进行因果识别，这就要求在临界点前后考生上重点大学的概率有一个明显的跳跃。具体来说， $(score_i - cut_{p,y,s})$ 设定为驱动变量 D，这里 $score_i$ 是学生 i 的高考成绩， $cut_{p,y,s}$ 是文科或理科 s 的学生 i 所在省份 p 的 y 年份第一批最低录取线。要想 RDD 方法适用，当 $D \geq 0$ 时，学生 i 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应当有一个明显向上的跳跃。图 1 中垂直线是各省份在当年文理科第一批分数线；横坐标是考生成绩与临界线之差，也就是上面所说的 D；纵坐标反映的是在每一个分数点上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图形中的曲线是二阶多项式拟合曲线。从图 1 可以看到，一旦考生的成绩超过重点大学录取线，考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概率就大大上升，而且在临界点处存在非常明显的跳跃。图 2—图 4 给出了高考成绩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在临界点附近，大学生在国内读研究生和出国留学的概率、第一份工资收入都存在明显向上的跳跃，证明了上重点大学会给个人的升学和职业发展带来正向回报。图形直观地给出了重点大学学习与个人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它们之间的量化关系。

三、实证策略与结果

(一) OLS 估计

我们基于如下方程估计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结果变量的影响：

$$Y_i = \alpha * Major_i + \beta *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Y_i 是大学生 i 的结果变量，包括是否在国内读研究生、是否出国留学和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水平的对数值； $Major_i$ 是学生 i 是否在重点大学接受教育； X'_i 是表 1 中所列示的控制变量向量。此外，在回归方程中我们还引入了省份虚拟变量和调查年份虚拟变量。表 1 报告了重点大学教育影响学生结果变量的 OLS 估计结果。所有的估计结果都表明，重点大学教育会显著增加学生进一步读研究生和出国留



图1 高考成绩与重点大学录用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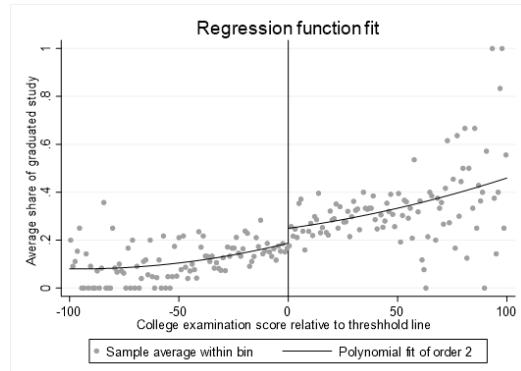


图2 高考成绩与国内上研究生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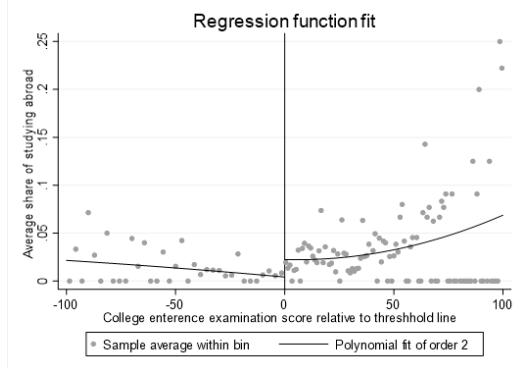


图3 高考成绩与出国留学的概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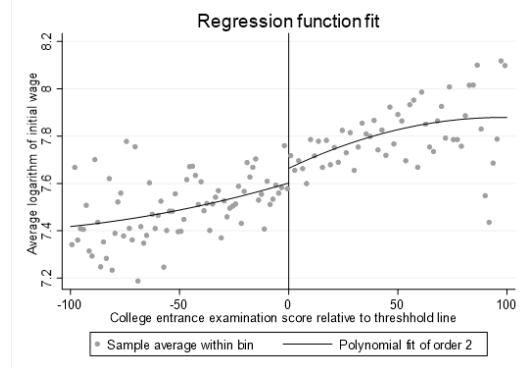


图4 高考成绩与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水平

学的概率。从数值上来看，控制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读重点大学使得学生上研究生的概率增加 15.4%，出国留学的概率增加 2.1%。重点大学教育对初次工作的收入回报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使得初次工作的工资收入增长 16.5%。

(二) RDD 估计

以上 OLS 估计初步证实了上重点大学对个人职业前途的重要影响，但由于不可观测的能力变量会同时影响上重点大学和个人职业前途，内生性问题难以避免，且 OLS 不能够解决上重点大学与个人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进一步基于 RDD 来进行因果识别。本文的实证样本既有政策的从不接受者，也有政策的总是接受者，只能够采用模糊断点回归。遵循标准的程序，^{①②} 我们基于 2SLS 方法进行相关参数估计。具体来说，我们对如下三个方程进行估计：

$$Major_i = \delta_0 + \delta_1 \cdot Eligibility_i + h(D_i) + \mu_i \quad (2)$$

简化式 (reduced form) 方程：

$$Y_i = \beta_0 + \beta_1 \cdot Eligibility_i + g(D_i) + \gamma_i \quad (3)$$

结构式方程：

$$Y_i = \alpha_0 + \alpha_1 \cdot Major_i + f(D_i) + \varepsilon_i \quad (4)$$

其中，*Eligibility* 是指针变量，当 $D \geq 0$ 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D 为前面所定义的驱动变量； $h(\cdot)$ 、 $g(\cdot)$ 和 $f(\cdot)$ 是驱动变量的平滑函数，它们可以通过多项式或者非参数拟合。基于不同的拟合方式，RDD 估计包括参数多项式估计和非参数估计。基于 Nichols (2007) 的研究方法，^③ 模糊 RDD 估计的 α_1 为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前途影响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LATE)。

① Joshua D. Angrist, Victor Lavy, "Using Maimonides' Rule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Class Size on Scholastic Achieve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4, no.2, 1999, pp.533-575.

② Wilbert Van Der Klaauw,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Aid Offers on College Enrollment: A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Approac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vol.43, no.4, 2002, pp.1249-1287.

③ Austin Nichols, "Causal Inference with Observational Data", *The Stata Journal*, vol.7, no.4, 2007, pp.507-541.

表 1 重点大学教育对结果变量影响的 OLS 估计

VARIABLES	(1)	(2)	(3)	(4)	(5)	(6)
	duyan	duyan	liuxue	liuxue	lnincome	lnincome
major	0.155*** (0.009)	0.154*** (0.010)	0.028*** (0.003)	0.021*** (0.004)	0.194*** (0.013)	0.165*** (0.015)
age		0.026 (0.032)		0.0164** (0.0070)		0.015 (0.096)
age2		-0.0009 (0.0007)		-0.0005*** (0.0002)		-0.0005 (0.002)
gender		-0.066*** (0.007)		-0.004 (0.004)		0.109*** (0.013)
minzu		-0.004 (0.013)		-0.003 (0.007)		-0.025 (0.027)
wenke		-0.047*** (0.010)		0.006 (0.007)		-0.068*** (0.025)
hukou		-0.028*** (0.007)		-0.039*** (0.004)		-0.053*** (0.014)
Famincome/100000		-0.008 (0.010)		0.049*** (0.008)		0.095*** (0.020)
Year dummies	No	Yes	No	Yes	No	Yes
Province dummies	No	Yes	No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9,203	7,533	9,203	7,533	4,582	3,871
R-squared	0.034	0.086	0.007	0.051	0.049	0.138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的标准误差；*、**、***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下同。

本文在主回归中采用非参数估计，在后面的稳健性检验时也给出了参数多项式估计结果。非参数估计的核函数选择会使估计结果比较敏感，而现有统计领域的文献研究指出三角核函数在边界处的点估计是最优的，^{①②} 因此在主回归中我们的非参数估计用三角核函数，后面的稳健性检验用矩形核函数。在窗宽选择时，我们用遵循 Calonico 等（2014）的方法计算最优窗宽，^③ 同时用不同窗宽下的其他 RDD 估计值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首先估计了重点大学教育对学生个体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和第一份工资收入的影响，结果见表 2，计算出来的最优窗宽为临界点前后 34 分。在最优窗宽下，考过重点线显著增大上重点大学的概率，且数值都在 30% 左右，说明第一阶段的估计值非常稳健。同时，上重点大学使得学生进一步读研究生深造的概率增加了 19.2%，第一份工作工资收入增长 22.1%，但重点大学教育对学生出国留学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我们引入控制变量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进入劳动力市场且已明确签署有关工资协议的大学毕业生占样本总量的一半左右，即样本存在大量的缺失。样本缺失的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重点大学毕业生要进一步读研究生深造，这些学生往往是大学生中比较优秀的，少量非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考上了研究生，还有一部分在样本调查期间还没有找到工作。这些学生没有参加劳动力市场，因此工资信息不清楚。重点大学中考上研究生的毕业生因为人力资本质量更高，所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工资应该更高一些，而非重点大学中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因为人力资本质量更低，即使找到工作，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大概率会更低一些。这意味着，现有的数据样本很可能低估了重点大学的教育回报，表 2 中大学教育的工资回报是一个被低估了的值，重点大学教育对第一份工资的回报率至少在 20% 以上。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① J. Fan, I. Gijbels, *Local Polynomial Modell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London, New York and Melbourne: Chapman and Hall, 1996.

② David S. Lee, Thomas Lemieux,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48, no.2, 2010, pp.281-355.

③ Sebastian Calonico, Matias D. Cattaneo, Rocio Titiunik, “Robust Nonparametric Confidence Intervals for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s”, *Econometrica*, vol.82, 2014, pp.2295-2326.

表2给出了重点大学教育对学生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和第一份工资影响的非参数 RDD 估计结果，并且做了引入控制变量后的稳健性检验。我们还进一步给出其他稳健性检验。一是基于参数多项式估计，在不同多项式阶数下进行稳健性检验。在一阶、二阶和三阶多项式条件以及是否引入控制变量的条件下，重点大学教育都对上研究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用参数多项式估计并不改变非参数估计结果。二是用不同的核密度函数进行非 RDD 估计，结果仍然没有发生变化。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①

四、有效性检验

本文基于 RDD 框架对重点大学的效应进行因果识别，还需要 RDD 实施的前提条件得到满足。^②接下来，我们将对 RDD 估计的前提条件进行有效性检验。

(一) 驱动变量的随机分布检验

驱动变量的分布是随机的，意味着个人不能对驱动变量数值进行操纵。本文的驱动变量是高考分数，中国的高考是非常严格和公正的，个人很难对自己的高考成绩进行操纵。但高考分数的误报或者测度误差是有可能存在的，因为被调查对象都是毕业生，有些人可能会记错高考成绩而产生误报现象，另一些人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故意报高自己的高考成绩。但这些并不影响本文的估计结果，这是因为我们仅仅关注的是在临界点附近的高考成绩，考生没有很大必要在临界点附近误报高考成绩。基于 Battistin 等 (2009) 的经验研究，^③ 即使驱动变量存在一定的误报，也并不妨碍我们基于模糊断点回归模型进行因果识别。如果个人能够在驱动变量临界点附近进行精确操纵，那么高考成绩应该更多地扎堆在临界点附近。我们可以基于 McCrary (2008) 提出的方法对驱动变量随机分布进行检验，^④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在临界点前后的驱动变量密度并没有发生明显的跳跃，其对数差分为 0.435 (标准误差为 0.346)，说明即使个人高考成绩可能存在误报，也没有高考成绩在重点线临界点附近被精确操纵的情况。这证明了本文的驱动变量满足随机分布的前提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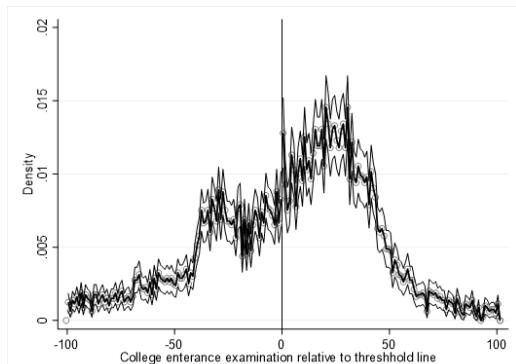


图 5 驱动变量随机分布的 McCrary 检验

^① Gelman and Imbens (2019) 指出使用参数 RDD 进行因果识别时多项式阶数最好不要超过 2 阶，目前在应用参数多项式估计时很多文献仍然用 3 阶多项式做稳健性检验，本文同样也用到了 3 阶多项式，发现与 2 阶多项式估计结果并没有明显的不同。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所有其他稳健性检验没有列入正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② Guido W. Imbens, Thomas Lemieux,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A Guide to Practi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142, no.2, 2008, pp.615-635.

^③ Erich Battistin, Agar Brugiavini, Enrico Rettore, Guglielmo Weber, "The Retirement Consumption Puzzle: Evidence from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9, no.5, 2009, pp.2209-2226.

^④ Justin McCrary, "Manipulation of the Running Variable in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 Density Test",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142, no.2, 2008, pp.698-714.

表2 重点大学教育对读研、出国留学和第一份工资的影响

	duyan		liuxue		lnincome	
	(1)	(2)	(1)	(2)	(1)	(2)
Panel A: The first stage						
Eligibility	0.343*** (0.027)	0.350*** (0.024)	0.289*** (0.033)	0.300*** (0.029)	0.305*** (0.034)	0.250*** (0.031)
Panel B: reduced form						
Eligibility	0.066*** (0.025)	0.092*** (0.025)	0.004 (0.006)	0.001 (0.006)	0.067** (0.030)	0.054* (0.029)
Panel C: 2SLS estimation						
Major	0.192** (0.075)	0.263*** (0.095)	0.012 (0.020)	0.003 (0.030)	0.221** (0.102)	0.217* (0.119)
Control Variables	No	Yes	No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4939	4916	3213	3197	2883	2870

注：核密度函数为三角核函数 (triangle kernel)，第 4 列控制了年龄、年龄的平方、性别 (男性 =1)、户口 (农村 =1)、高考文理科 (文科 =1)、家庭收入、调查年份和所在省份虚拟变量。

不改变非参数估计结果。二是用不同的核密度函数进行非 RDD 估计，结果仍然没有发生变化。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是非常稳健的。^①

(二) 控制变量的连续性检验

断点回归设计实施有效的第二个假设前提是前定控制变量在临界点处不能存在明显的跳跃，这是因为前定变量不连续尤其是在临界点处不连续会对本文的实证结果产生干扰。我们基于非参数三角核密度函数估计了控制变量在临界点处跳跃的参数估计值，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到，在最优窗宽下，所有控制变量在临界点处的跳跃估计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些前定控制变量的连续性是得到满足的。

表 3 前定变量的连续性检验

Dep. vars	(1) Age	(2) Male=1	(3) Hanzu=1	(4) Arts=1	(5) Rural=1	(6) Family income
最优窗宽	31 scores	41 scores	29 scores	36 scores	41 scores	36 scores
Eligibility	-0.033 (0.081)	-0.005 (0.029)	-0.014 (0.016)	0.019 (0.019)	-0.038 (0.027)	2098 (2510)
Observations	3623	5822	4319	5206	5948	4328

注：最优窗宽根据 CCT 确定。

五、机制分析

已有的研究表明，教育可以从人力资本、信号、同伴三个效应对个人的前途产生影响。基于现有数据，我们无法准确地对三种效应进行完全区分，但可以尝试对这些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首先是人力资本效应。重点大学在学生的教育和培训方面更加严格，对学生毕业和获得学位的要求会更高，因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平均技能水平会更高一些。一般来说，英语和计算机被认为是现在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必备技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学生的学习技能和劳动生产率。我们估计了重点大学教育对学生英语四级是否超过 450 分和是否获得计算机等级证书的影响。表 4 的第 1 列和第 2 列显示，重点大学学生英语四级超过 450 分的概率明显更高。第 3 列和第 4 列的结果则表明，重点大学教育对是否获得计算机等级证书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次是信号效应。在招生时重点大学学生的高考成绩明显会高于非重点大学，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也即能够进入重点大学学习的学生本身就更加优秀。由于信号效应明显，重点大学在进一步升学和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不言自明。就上研究生而言，很多重点大学有相当多的保送名额，它们在接受保送研究生时往往只考虑重点大学推荐的优秀学生，而那些非重点大学的学生很难获得保送资格，这使得重点大

表 4 大学教育对其他变量的影响

Dep. vars	Siji>=450		Jisuanji		Baoyan	
	(1)	(2)	(3)	(4)	(5)	(6)
	21 scores	21 scores	27 scores	27 scores	28 scores	28 scores
Panel A: The first stage						
Eligibility	0.271*** (0.035)	0.186*** (0.031)	0.258*** (0.038)	0.215*** (0.030)	0.325*** (0.030)	0.241*** (0.027)
Panel B: 2SLS estimation						
Major universities	0.266* (0.153)	0.511** (0.217)	0.141 (0.142)	0.192 (0.185)	0.149*** (0.045)	0.185*** (0.061)
Control Variables	No	Yes	No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2906	2891	3228	3212	3849	3831
	(7)	(8)	(9)	(10)	(11)	(12)
	22 scores	22 scores	21 scores	21 scores	22 scores	22 scores
Panel A: The first stage						
Eligibility	0.209*** (0.045)	0.134*** (0.039)	0.268*** (0.038)	0.190*** (0.033)	0.283*** (0.033)	0.197*** (0.033)
Panel B: 2SLS estimation						
Major universities	0.412 (0.259)	0.667 (0.415)	5.64* (3.044)	9.17* (4.90)	0.812 (1.450)	0.113 (2.028)
Control Variables	No	Yes	Yes	Yes	No	Yes
Observations	2705	2577	2503	2492	2705	2577

学的学生在读国内研究生时具有先天性的优势。表4的第5、6两列显示，相对非重点大学来说，上重点大学使得学生获得保送研究生的概率增加了14.9%。此外，一些重要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大型国有企业在招聘时仅仅招聘重点大学的毕业生，这也使得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有一定机会上的优势，但第7、8两列的估计结果没有支持这一点。

最后是同伴效应。表4第9、10列的估计结果表明，该断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上重点大学使得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相对上非重点大学显著提升，重点大学的学生每周在学习上要多花5.6个小时，相当于每天多花0.8个小时。重点大学的学业要求更高，学生在学习上也更加自律，在大家都非常努力学习的氛围下，每一个学生都会更加努力，因此学习时长增加。我们还比较了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学生在体育锻炼上的差异，表4第11、12列的估计结果发现，虽然重点大学锻炼的时间更长，但他们的差异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六、结论

本文致力于研究重点大学教育对个人前途的影响。在一个断点回归框架下，我们的研究表明高考成绩对上什么样的大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临界点附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概率存在明显的跳跃。这种跳跃对学生在后来进一步深造或者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收入都有明显的影响。上重点大学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进一步攻读研究生，相比于普通高校来说，重点大学的学生攻读国内研究生的概率要高出近20个百分点。重点大学教育对第一份工作工资收入的提升至少在20%以上。但我们并没有发现重点大学教育对出国留学的显著影响。重点大学教育影响个人前途的机制包括人力资本效应、信号效应和同伴效应。重点大学的学生英语四级成绩更好，一定程度上证实重点大学教育接受者的人力资本更高。重点大学教育使得学生在保送研究生时占据明显的优势，这也是重点大学的学生上研究生的概率明显高于非重点大学的原因之一。由于大学生规模已经非常庞大，本科学历严重贬值，在这种背景下，接受更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是提高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重点大学教育使得个人读研究生的概率明显增加，因此对于有志于接受高层次教育的人来说，考上重点大学非常重要。我们还发现重点大学的同伴效应十分明显，具体反映在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间更长。这是因为重点大学选拔的学生更加优秀，在周围都是优秀同伴的情况下，同学之间往往容易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从而大家都变得更加优秀。但我们并没有发现上重点大学能够提高学生获得计算机等级证书的概率，上重点大学对学生获得体制内工作机会的影响也不显著。

本文研究说明了高质量教育对个人前途发展的重要作用，获得重点大学教育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底层百姓的命运，对于促进阶层流动和打破阶层固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底层家庭尤其是农村子女上重点大学改变命运越来越困难。为了促进更加公平和更加高质量的教育，中国需要进一步解决进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高校招生要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力度，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责任编辑：张超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量化分析^{*}

谢莉娟 万长松

[摘要]准确判断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量，是科学认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表现、构建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2003—2020年全国层面流通业数据，从总资产、销售额和从业人数三个角度对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量进行估算，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比较不同所有制类型流通企业的效率。研究发现，我国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在量的层面总体实现了适度平衡发展；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逐渐多样化，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重要的实现形式；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具备效率上的优势，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相对效率优势趋于稳定，而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效率优势逐渐凸显。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进程中，要从质与量的辩证视角认识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积极探索和创新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推动其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关键词]商品流通 公有制经济 量化估计 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7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4-0089-08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保障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既体现于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一定数量上，也愈益强调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了科学认识现阶段我国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及表现，需要对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做出科学的量化分析。既有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估算了我国国民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量，^{②③④}但有关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量化分析仍然较缺乏。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流通领域发挥着关键又特殊的作用。生产和交换作为“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⑤互相影响、互相制约，分别发挥价值生成和价值实现的核心职能，在社会再生产循环中缺一不可、同等重要。无论是计划经济阶段以分配式流通体系配合执行国家计划，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在国有资本充分参与流通竞争基础上保障市场大局稳定，流通领域及其公有制经济主体作用的发挥都功不可没。但从改革初期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大项目“在新发展格局中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22XNL01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谢莉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万长松（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

① 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2020年第16期。

② 李成瑞：《关于我国目前公私经济比重的初步测算》，《探索》2006年第4期。

③ 杨新铭、杨春学：《对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现状的一种定量估算》，《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④ 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9页。

流通正名，^①到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再探讨，^②以及不同时期有关商品流通渠道、^③国有商业的功能定位、^④如何促进公有制商业高效发展^⑤等系列具体现实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流通基本理论和中国之治的定性探索尚有很大空间。再加之量化研究方法和流通相关数据的制约，量化分析相对更少。目前，已有定量研究主要涉及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经济效益评估。例如，孙敬水和章迪平（2010）发现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减弱，^⑥谢莉娟和王诗桺（2016）指出国有企业的效率优势在流通领域相较生产领域更明显；^⑦新近研究则指出流通领域国有资本通过降低流通费用和更好发挥商业资本职能来促进流通效率提升，^⑧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能够强化流通业发展、减小城乡收入差距。^⑨

综上，目前较有限的有关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实证分析，多从资本、就业等单一视角进行衡量，并且未充分考虑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经济成分。鉴于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估算方法基础上，充分考虑混合所有制经济，从资产、从业人数和经济产出三个视角对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量进行估算，并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进一步比较分析流通领域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效率。本文的估算将为深入理解流通领域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内涵及表现，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提供经验支撑。

一、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估算与分析

（一）公有制经济的定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公有制经济内涵表述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⑩因此，要准确估算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量，必然要求考察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成分的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对限额以上流通企业按登记注册类型的分类标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能够明晰对应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而混合所有制经济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与之相对应。在此参考现有一般做法，将除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之外的各类企业界定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并以此来表征混合所有制经济。^{⑪⑫}具体而言，国有经济成分对应于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和国有独资企业；集体经济成分对应于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和集体联营企业；私营企业构成私营经济成分；“三资”经济成分对应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除此之外的各类经济成分界定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包括其他联营企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企业。因此，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私营经济、“三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成分。

在对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进行估算时，本文主要用限额以上批发业和零售业来表征流通业，^⑬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分年度数据库、各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和国泰安数据库。

① 孙冶方：《流通概论》，《财贸经济》1981年第1期。

② 谢莉娟、王晓东：《马克思的流通经济理论及其中国化启示》，《经济研究》2021年第5期。

③ 冒天启：《对接所有制形式划定流通渠道的质疑》，《财贸经济》1981年第6期。

④ 王晓东、许雅琳、王诗桺：《政府治理视角下的国有流通企业：功能定位及其逻辑》，《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5期。

⑤ 程红、吴利军：《彻底改制才是国有小型流通企业的改革出路——兼谈对“国有民营”的实践肯定和理论否定》，《财贸经济》1996年第6期。

⑥ 孙敬水、章迪平：《中国流通业所有制结构变迁绩效实证分析》，《经济学家》2010年第2期。

⑦ 谢莉娟、王诗桺：《国有资本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吗——基于行业比较与批发业效率机制的分析》，《财贸经济》2016年第2期。

⑧ 谢莉娟、万长松、王诗桺：《国有资本与流通效率：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中国经验》，《世界经济》2021年第4期。

⑨ 谢莉娟、万长松、武子歆：《流通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公有制经济调节效应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21年第6期。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页。

⑪ 杨新铭、杨春学：《对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现状的一种定量估算》，《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⑫ 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⑬ 根据纯粹流通费用与生产性流通费用的科学划分，流通业可分为物流运输和批发零售两大类。本文主要研究以媒介性劳动性质为主的批发和零售业，原因在于同生产性流通费用对应的物流运输业缺少估计公有制经济成分连续有效的统计数据。

(二) 公有制经济规模: 总资产

在估算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总资产规模时, 第一步是要对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进行估计。现有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实收资本的公私结构, 并在假定法人资本公私结构同非法人资本公私结构一致的前提下, 对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总资产进行分解。^{①②}由于缺乏完整详细的流通行业实收资本相关数据,^③并考虑到上市企业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 且相较于小微型流通企业, 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上市流通企业更易成为公有资本进入的目标, 所以本文将基于上市流通企业公有制所有权占比, 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总资产中的公有制成分进行区分。具体而言,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A股上市批发和零售企业为参照样本, 以实际控制人所有权占比为依据,^④对批发和零售业分别进行估算, 由此得到各年流通业、批发业和零售业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公有资产的比重, 其结果如表1所示。从混合所有制经济视角看, 样本期内流通领域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产占比呈递减趋势,^⑤但总体波动不大, 且自2016年以来稳定在14%左右。其中, 批发业和零售业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产占比的递减趋势均明显存在, 但相较于零售业, 批发业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产占比相对较高。近年来, 批发业和零售业的该占比分别稳定在23%和8%左右。

进一步基于对流通领域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产占比的估计, 估算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总量及占比。公有制经济总资产的量为:

表1 流通领域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产占比(%)

时间	流通业	批发业	零售业	时间	流通业	批发业	零售业
2003	27.03	28.94	24.89	2012	17.44	23.01	12.80
2004	34.17	39.39	27.89	2013	17.17	22.59	12.56
2005	31.35	35.68	26.22	2014	17.00	20.99	13.24
2006	26.15	31.01	20.56	2015	16.47	23.77	10.70
2007	23.27	28.26	17.55	2016	14.10	21.70	8.65
2008	22.31	28.90	15.05	2017	14.75	22.75	8.63
2009	20.86	28.46	12.99	2018	14.30	23.14	8.13
2010	19.07	25.43	13.03	2019	14.07	23.36	8.01
2011	17.46	23.28	12.49	2020	14.67	23.68	8.51

批发(零售)业公有制经济总资产 = 批发(零售)业国有成分 + 批发(零售)业集体成分 + 批发(零售)业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成分

流通业公有制经济总资产 = 批发业公有制经济总资产 + 零售业公有制经济总资产

公有制经济总资产的占比为:

$$\text{批发(零售)业公有制经济总资产占比} = \frac{\text{批发(零售)业公有制经济总资产}}{\text{批发(零售)业总资产}} \times 100\%$$

$$\text{流通业公有制经济总资产占比} = \frac{\text{流通业公有制经济总资产}}{\text{批发业总资产} + \text{零售业总资产}} \times 100\%$$

由以上各式计算得到的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总资产量及占比如图1所示。首先, 从公有制经济总量角度看, 考察期内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总资产的绝对数量逐年增加, 且更多集中于批发业。同总资产绝对量相对应的是,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总资产占比逐年降低, 近年来表现出平稳波动的趋势, 总体维持在20%左右。批发业中公有制经济总资产占比大于零售业, 近年来分别维持在25%和10%左右。其次, 从公有制经济各组成部分看, 相较于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产不断增加, 且在公有制经济资产总量中的比重呈增加趋势。这反映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流通领域公有制经

① 杨新铭、杨春学:《对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现状的一种定量估算》,《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② 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③ 仅可获得一段时间内批发零售业实收资本结构数据, 且若以第三产业实收资本公私结构进行估计, 则会高估流通领域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成分。

④ 不以国有股占比为依据的原因在于, 国家或相关机构会通过股权控制链间接控股的方式掌握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而这不会直接体现为国有股, 用国有股来进行区分会低估公有制经济在流通领域的占比。

⑤ 在公有制资本占比逐年降低的同时公有股本数量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 2003—2020年间, 批发业的公有股本量由46.63亿股增加为181.55亿股, 零售业的由36.01亿股增加为95.29亿股。

济的主要存在形式，且混合所有制经济日益成为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与批发业中的增加趋势不同，在零售业中，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产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三）公有制经济规模：销售额

流通职能作用的发挥直接体现为商品的采买和销售，本文将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企业商品销售额视角定量分析公有制经济的经济产出。借鉴裴长洪（2014）的方法，^①本文利用不同年份各省数据估算流通领域不同类型所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以此来估算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对应的销售额。具体构建如下模型：

$$\ln Sale_i = \alpha_0 + \alpha_1 \ln K_i + \alpha_2 \ln E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1）中， $Sale$ 为批发业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K 为总资产量， E 为从业人员数。 α_1 即为资本产出弹性，表示总资产每增加一个百分比所实现的销售额增加的百分比，可从单要素视角评价资产的经济效益。本文将按年份分别对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进行截面数据回归，^②得到各年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四类不同所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然后以对应企业的总资产额为权重，分别计算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

$$\eta_{Kp}^i = \eta_{Ks}^i \times \frac{K_s^i}{K_s^i + K_c^i} + \eta_{Kc}^i \times \frac{K_c^i}{K_s^i + K_c^i} \quad (2)$$

$$\eta_{Kn}^i = \eta_{Kp}^i \times \frac{K_p^i}{K_p^i + K_f^i} + \eta_{Kf}^i \times \frac{K_f^i}{K_p^i + K_f^i} \quad (3)$$

式（2）和（3）中， $i = w$ 或 r ，分别表示批发业和零售业； η_{Kp}^i 和 η_{Kn}^i 分别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应的资本产出弹性； K_s^i 、 K_c^i 、 K_p^i 和 K_f^i 分别表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资产总额； η_{Ks}^i 、 η_{Kc}^i 、 η_{Kp}^i 和 η_{Kf}^i 分别表示四类企业所对应的资本产出弹性。进一步以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公有资产总额和非公有资产总额为权重，计算流通业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

$$\eta_{Kp} = \eta_{Kp}^w \times \frac{K_s^w + K_c^w}{K_s^w + K_c^w + K_s^r + K_c^r} + \eta_{Kp}^r \times \frac{K_s^r + K_c^r}{K_s^w + K_c^w + K_s^r + K_c^r} \quad (4)$$

$$\eta_{Kn} = \eta_{Kn}^w \times \frac{K_p^w + K_f^w}{K_p^w + K_f^w + K_p^r + K_f^r} + \eta_{Kn}^r \times \frac{K_p^r + K_f^r}{K_p^w + K_f^w + K_p^r + K_f^r} \quad (5)$$

式（4）和（5）中， η_{Kp} 和 η_{Kn} 即为流通业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根据以上各公式，计算得到流通领域各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上看，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呈现波浪递减的趋势。从不同行业看，批发业中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总体上大于零售业，公有制经济在批发业中更具资本产出效率优势。相比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在批发业中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优势更明显，但近年来其优势逐渐逆转。在零售业中，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经过一段时间的超越后又表现出相对劣势。这表明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效率是伴随公有制经济相对量的调整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根据资本产出弹性的定义有：

^① 裴长洪：《中国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量化估算及其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② 为了减缓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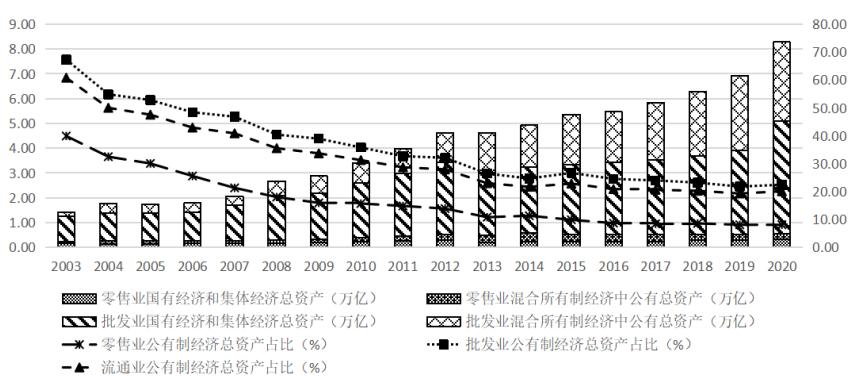


图1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总资产及占比

$$\eta_K = \frac{\Delta Sale}{Sale} \times \frac{K}{\Delta K} = \frac{Sale_{t-1} - Sale_{t-2}}{Sale_{t-1}} \times \frac{K_t}{K_{t-1}} \quad (6)$$

其中, η_K 为资本产出弹性, $Sale$ 为销售额, K 为总资产量, 由式 (6) 可得:

$$Sale_t = \frac{Sale_{t-1}}{1 - \eta_K \times \frac{K_t - K_{t-1}}{K_t}} \quad (7)$$

在已知各类型所有制经济的总资产量、资本产出弹性和前一期对应销售额的情况下, 通过式 (7) 即可估算各年不同所有制经济对应的销售额。在此参考杨新铭和杨春学 (2012) 的估算思路, ^① 假定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出弹性以及销售额增加量与资产增加量之比, 同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应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平增加量之比相等。在此前提下, 要估算各年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销售额, 关键在于确定基期即 2003 年的销售额。由式 (6) 可得:

$$Sale = \frac{\Delta Sale}{\Delta K} \times \frac{K}{\eta_K} \quad (8)$$

所以, 混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成分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对应的销售额分别为:

$Sale_{mp} = \frac{\Delta Sale_{mp}}{\Delta K_{mp}} \times \frac{K_{mp}}{\eta_{Kp}}$ 和 $Sale_{mn} = \frac{\Delta Sale_{mn}}{\Delta K_{mn}} \times \frac{K_{mn}}{\eta_{Kn}}$ 。又由于 $\frac{\Delta Sale_{mp}}{\Delta K_{mp}} \approx \frac{\Delta Sale_p}{\Delta K_p}$ 、 $\frac{\Delta Sale_{mn}}{\Delta K_{mn}} \approx \frac{\Delta Sale_n}{\Delta K_n}$, 故有:

$$Sale_{mp} = \frac{\Delta Sale_p}{\Delta K_p} \times \frac{K_{mp}}{\eta_{Kp}} \quad (9)$$

$$Sale_{mn} = \frac{\Delta Sale_n}{\Delta K_n} \times \frac{K_{mn}}{\eta_{Kn}} \quad (10)$$

其中, $\Delta Sale_{mp}$ 和 $\Delta Sale_{mn}$ 分别表示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所对应的销售额增加额, $\Delta Sale_p$ 和 $\Delta Sale_n$ 分别表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应的销售额增加额。根据式 (9) 和 (10), 可估算出 2003 年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所对应的销售额。^② 基于以上计算结果, 并结合式 (7) ^{14.00} 即可得到各年批发业和零售业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对应的销售额及占比, 结果如图 2 所示。

总体上看,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销售额总量呈现波浪递增趋势, 且主要由批发业中公有制经济销售额的变化引起, 而其占比表现出总体下降趋势,

表 2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资本产出弹性

时间	流通业		批发业		零售业	
	η_{Kp}	η_{Kn}	η_{Kp}^w	η_{Kn}^w	η_{Kp}^r	η_{Kn}^r
2003	0.68	0.37	0.72	0.30	0.40	0.49
2004	0.84	0.69	0.86	0.65	0.68	0.81
2005	0.90	0.84	0.93	0.84	0.69	0.85
2006	0.91	0.77	0.95	0.70	0.60	0.93
2007	0.86	0.66	0.88	0.62	0.66	0.77
2008	0.84	0.83	0.84	0.82	0.79	0.85
2009	0.93	0.72	0.93	0.69	0.93	0.79
2010	0.91	0.80	0.91	0.80	0.92	0.82
2011	0.92	0.80	0.92	0.83	0.86	0.68
2012	0.93	0.80	0.93	0.81	0.87	0.78
2013	0.91	0.71	0.94	0.79	0.58	0.47
2014	0.77	0.59	0.80	0.61	0.45	0.50
2015	0.64	0.68	0.65	0.70	0.46	0.60
2016	0.57	0.71	0.59	0.71	0.32	0.68
2017	0.59	0.69	0.61	0.75	0.34	0.50
2018	0.56	0.86	0.57	0.89	0.49	0.73
2019	0.56	0.85	0.56	0.92	0.56	0.55
2020	0.79	0.80	0.82	0.82	0.38	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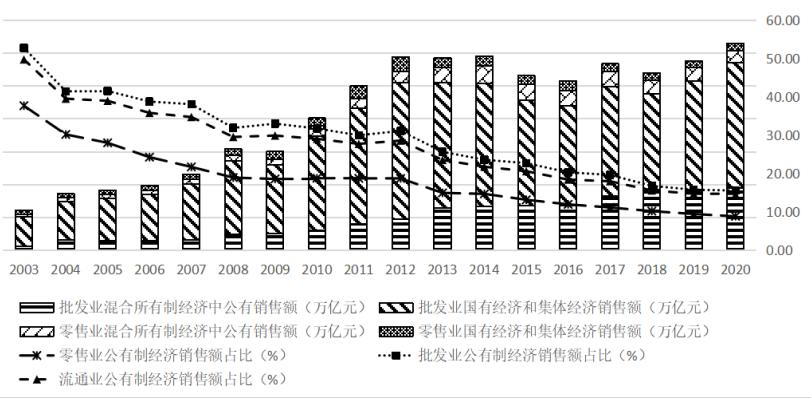


图 2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销售额及占比

① 杨新铭、杨春学:《对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现状的一种定量估算》,《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

② 估计值和实际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 在此通过估计值与实际值的比值对估计值进行调整。以零售业为例, 基于公式估算得到 2003 年零售业中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应的销售额分别为 1338.21 和 3339.08, 估计总额为 4677.29。而实际总额为 4669.56, 估计值与实际值存在误差。本文根据 $4677.29/4669.56=1.0017$ 进行调整, 调整后零售业中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销售额分别为 1336 和 3333.56。

近年来稳定在 18% 左右。从不同构成部分看，在零售业中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对应的销售额相对更多，而在批发业中公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实现的销售额相对更多。相较于总资产，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销售总额的变化表现出新特征：一是销售额总量波浪式递增趋势更为明显，且上升过程经常发生在市场冲击之后，如 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19 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公有制经济销售总额增加且其占比有所回升，反映出公有制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小。二是公有制经济多样化实现形式发展趋势明显，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经济实现销售额的重要形式，尤其在零售业中，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经济实现销售额的主要形式。

(四) 公有制经济规模：从业人数

借鉴杨新铭和杨春学（2012）的方法，^① 基于产出就业弹性对流通领域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成分所吸纳就业量的估算，本文从销售额的视角估计不同所有制类型经济的产出就业弹性，即分别用销售额和从业人员数表示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并由此得到销售就业弹性（其可代表实现一定销售额的就业创造能力）。为此构建如下模型：

$$\ln E_i = \alpha_0 + \alpha_1 \ln Sale_i + \alpha_2 \ln Wage_i + \varepsilon_i \quad (11)$$

式 (11) 中， E 表示就业量， $Sale$ 表示销售额， $Wage$ 表示工资水平， α_1 为需估计得到的基于销售额的产出就业弹性。同资本产出弹性估计过程类似，分行业和所有制分别得到各年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四类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产出就业弹性，然后以对应的销售额为权重，分别计算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产出就业弹性，再进一步以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应的销售额为权重，计算得到流通业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产出就业弹性 η_{Ep} 和 η_{En} ，^② 结果如表 3 所示。

由结果可知，总体上看，流通业中公有制经济的产出就业弹性小于非公有制经济，表明相较于非公有制经济，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就业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小，该结论在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均成立。同时，零售业的产出就业弹性总体上大于批发业，反映了零售业就业创造能力大于批发业。该结果同国有企业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和批发业属于较高层次中介地位有关。国有流通企业更具有重资产特征，^③ 因而相对于非国有流通企业而言，其销售额的实现对劳动的依赖性更低。相较于零售业，批发业具有大规模商品集散功能，能够通过相对较少的劳动实现较大规模商品的集散。

同理，进一步根据产出就业弹性的定义，在假定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产出就业弹性以及就业量增加量与销售额增加量的比值，同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应的产出就业弹性和增加量的比值相等的前提下，计算各年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制成分所对应的就业量，并最终得到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对应的就业量及其占

表 3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产出就业弹性

时间	流通业		批发业		零售业	
	η_{Ep}	η_{En}	η_{Ep}^w	η_{En}^w	η_{Ep}^r	η_{En}^r
2003	0.77	0.80	0.76	0.83	0.81	0.76
2004	0.64	0.83	0.62	0.83	0.82	0.85
2005	0.53	0.84	0.50	0.83	0.84	0.87
2006	0.51	0.89	0.48	0.88	0.78	0.90
2007	0.49	0.88	0.46	0.86	0.77	0.97
2008	0.60	0.85	0.58	0.84	0.79	0.90
2009	0.56	0.91	0.55	0.89	0.70	0.96
2010	0.53	0.87	0.51	0.83	0.73	1.00
2011	0.50	0.89	0.47	0.89	0.80	0.90
2012	0.48	0.90	0.45	0.89	0.70	0.95
2013	0.45	0.88	0.43	0.88	0.76	0.90
2014	0.42	0.85	0.40	0.84	0.70	0.90
2015	0.52	0.85	0.50	0.82	0.74	0.94
2016	0.71	0.81	0.71	0.78	0.79	0.93
2017	0.65	0.83	0.64	0.79	0.85	1.01
2018	1.14	0.86	1.17	0.85	0.73	0.90
2019	1.09	0.79	1.12	0.77	0.70	0.89
2020	0.34	0.84	0.33	0.81	0.59	1.00

① 杨新铭、杨春学：《对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现状的一种定量估算》，《经济学动态》2012 年第 10 期。

② 计算思路同资本产出弹性类似，限于篇幅，未给出计算公式，备索。

③ 谢莉娟、王诗杼：《国有企业应该转向轻资产运营吗——工业和流通业的比较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8 年第 2 期。

比, ^①结果如图 3 所示。

总体上看,与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总资产和销售额表现不同,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对应的就业量及其占比均呈现递减趋势,^②且就业量占比低于总资产和销售额占比。通过相对较少的劳动投入实现相对更多的商品销售,体现了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存在相对劳动生产率优势。从不同行业来看,

批发业中公有制经济吸纳的就业量大于零售业,且其占比也相对较大。在批发业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就业吸纳量则稳中有进。在零售业中,存在较为明显的波动,2012 年之前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吸纳就业量大于混合所有制经济,而在 2012 年以后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公有制经济吸纳就业的主要形式。

二、进一步的效率分析

从量的角度看,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所对应的总资产、销售额和从业人员数的绝对量有增有减,但三者占比均表现出下降趋势,且近年来均维持在某一水平上平稳波动。这表明我国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已基本完成大幅调整阶段,进入平稳、优化发展阶段。在公有制经济的比例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流通领域既要求保有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更要求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考察也不能简单依据量的多少进行评价,而要综合公有制经济质的方面进行把握。下文将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对流通领域公有制企业效率进行测度,^③并比较分析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利用 DEA-Malmquist 指数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其中投入指标为从业人员数和总资本,产出指标为销售额。^④由于 Malmquist 指数是一个相对值指标,反映的是相邻两期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在此参考程惠芳和陆嘉俊(2014)的做法,^⑤将 Malmquist 指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绝对量,结果如图 4 所示。

总体上看,流通领域公有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递增趋势,且存在明显的相对效率优势。同近年来我国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相对量适度平衡发展相对应的是,公有制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波动中不断提升。这表明我国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对量的调整阶段转向更注重质的发展阶段。具体考察各类型公有制企业发现,样本期内混合所有制企业效率上升趋势稳定,而国有企业在 2013—2016 年间出现短暂下降后呈现波动上升趋势,集体企业则经历稳步上升之后表现出下降趋势。相比非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相对效率优势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近期则相对平稳发展的趋势。混合所有制企业表现出较小的效率优势,但该优势存在扩大的趋势。因此,要持续推进国企改革,优化公有制经济结构布局,释放更多效率潜能,以便更好发挥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

^①计算思路同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销售额及占比类似,限于篇幅,未给出计算公式,备索。

^②考察期内,流通业吸纳的就业人数总体上是递增的,流通业从业人员数由 2003 年的 406.78 万人(其中批发业 178.67 万人,零售业 228.11 万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1234.97 万人(其中批发业 595.73 万人,零售业 639.24 万人),故流通业是创造就业的重要行业,但主要通过非公有制经济部门实现。

^③通过资本产出弹性可以初步判断资本单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但流通组织是多要素投入的经营过程,单要素产出效率无法综合评价企业的经营效率,故本文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进行分析。

^④本文不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所估算得到的相关量直接测算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原因在于,企业是不同所有制经济具体的存在形式,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对资源配置效率会产生直接影响。

^⑤程惠芳、陆嘉俊:《知识资本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4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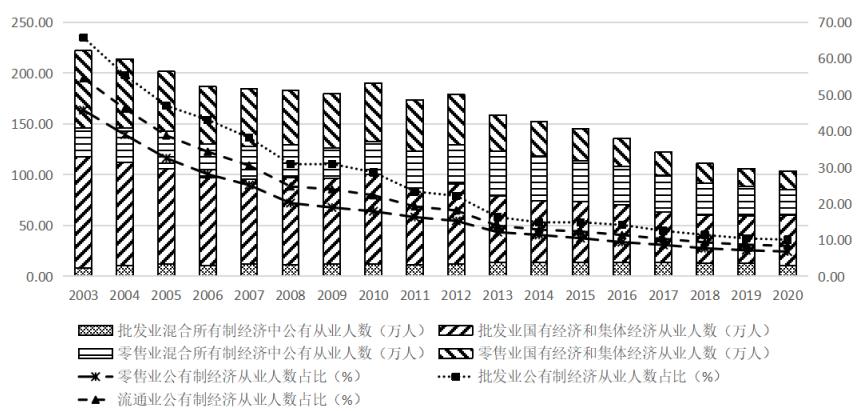


图 3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从业人数及占比

图5进一步给出了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各所有制类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情况。总体上看，在批发业和零售业中，公有制企业的相对效率优势依然存在，且在批发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不同类型的公有制企业则存在不同的表现。批发业中公有制经济相对效率优势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中，而零售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效率优势愈发明显。由此表明，相较于执行大规模集散商品职能的批发业而言，在直面消费者并满足消费者多样化和复杂化需求的零售业中，混合所有制经济更易满足现实需要，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公有制经济提质增效。因此，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提升零售业效率，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有效措施。对批发业而言，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同时，要推动公有制企业深化改革，以释放更多潜在效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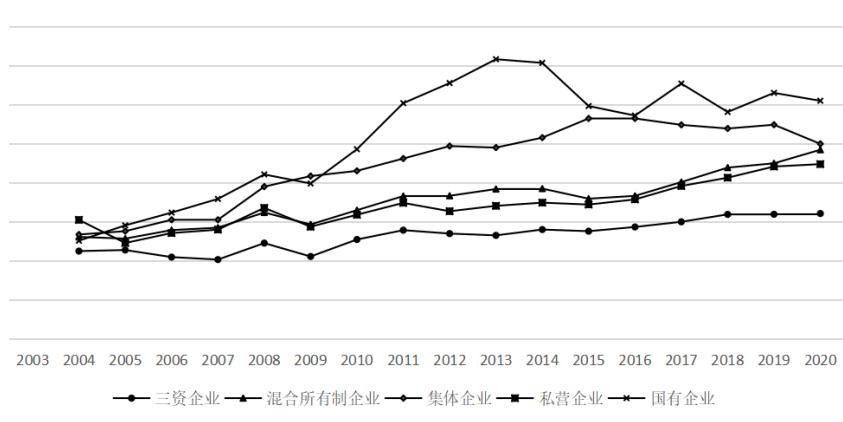


图4 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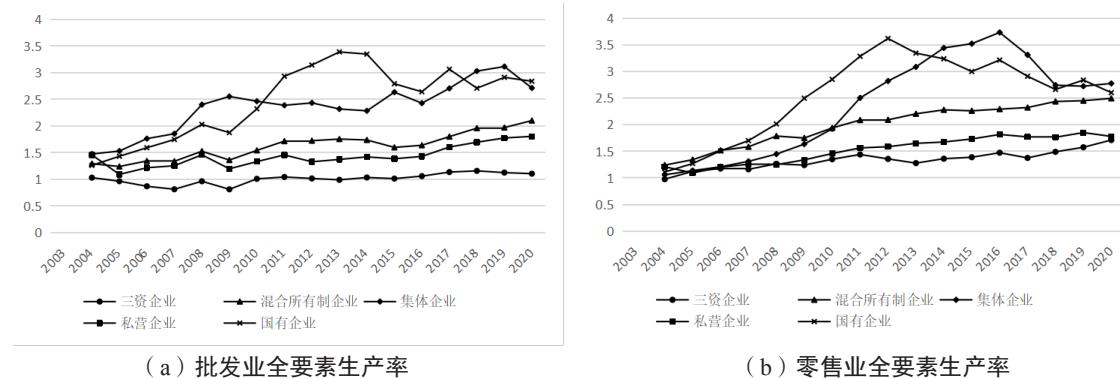


图5 批发业和零售业全要素生产率

三、结论与展望

发挥公有制经济主体作用，除了要求保有一定比例的公有制经济，更要求公有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2003—2020年全国层面的流通业数据，从总资产、销售额和从业人数三个视角对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量进行估算，并结合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分析流通领域不同所有制经济的效率。结果发现：(1) 我国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在量的层面总体实现了适度平衡发展。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对应的总资产、销售额和从业人员数的绝对量有增有减，但三者的占比在经过一段时期的下降后表现出平稳发展的趋势。(2)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且在零售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3) 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具备效率优势，其中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效率优势经过较大波动后趋于平稳，且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对效率优势逐渐凸显。基于此，为更好坚持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助力建设安全、可控、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在保有一定比例公有制经济不动摇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和创新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继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且，要推动流通领域公有制经济优化布局和结构调整，引导以国有资本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更多向关系国计民生、牵涉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商品流通领域转移。

责任编辑：张超

撤县设区是否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

——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李尚蒲 程丹 钟文晶

[摘要]作为国家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行政区划调整涉及地区资源和权力的再配置，对土地利用尤其是耕地征收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03—2019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数据，构建准自然实验，分析撤县设区改革对耕地征收规模的影响发现：（1）撤县设区改革在短期内显著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且结果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其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和粮食主产区更为明显。（2）围绕土地利用变化以及土地监管等方面的机制分析表明，撤县设区改革促进了建成区扩张，建成区扩张对改革效果具有遮掩效应；改革通过推高一级土地市场价格、增加城投债的发行规模、提高土地管制等途径抑制了耕地征收。本文重新审视了行政主导型城镇化模式的土地利用效应，有助于为强化耕地保护提供新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撤县设区 建成区扩张 地价 城投债 耕地征收

[中图分类号] F2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097-08

一、引言

耕地保护事关粮食安全和国家稳定。我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耕地数量锐减。仅在2009—2019年期间，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就减少了0.14亩。其中，建设占用是我国耕地减少的主要根源。^①在2015—2020年新增的建设用地中，约有66.43%来自耕地征收。^②从已有发展轨迹来看，我国城市化的实现机制主要是由行政主导，基本特征表现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其中，行政区划调整是政府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政策工具。^③行政区划调整是国家进行分级管理，实施国土和行政权力的空间再配置，并提升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是最重要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之一，其直接效果是增加了地级市的市辖区数量，扩大了地级市的市区管辖规模。国家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2019年，我国共撤销141个县，同期增加市辖区110个。我国撤县设区改革大体经历了“管制—管制放松—管制”的阶段性调整，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严控撤县建市设区”。中央对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信息、社会网甄别与耕地质量保护技术采纳”(7217304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乡土地市场耦合与农地租金决定”(18FGL025)、广东省攀登计划项目“行政区划调整对耕地征收的影响——基于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pdjh2023b009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尚蒲，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程丹，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钟文晶（通讯作者），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510642）。

① Yang Zhou, Xunhuan Li, Yansui Liu, “Cultivated Land Protection and Rational Use in China”, *Land Use Policy*, vol.106, 2021, p.105454.

② 匡文慧、张树文等：《2015—2020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制图及时空特征分析》，《地理学报》2022年第5期。

③ 唐为、王媛：《行政区划调整与人口城市化：来自撤县设区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

撤县设区的态度及其变化，体现了央地博弈过程中中央对地方政府土地利用行为的及时引导、纠偏与调整。

已有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撤县设区改革的成效，如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促进经济发展，助推区域性大都市和城市群形成，改变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好，促进贸易交流和要素流动，提高创业活跃度和企业创新活动等。同时，部分研究也关注到了撤县设区改革的风险问题，包括改革后众多地区以更低地价实施“逐底性”的“土地引资”竞争、以“招拍挂”的方式获取土地溢价以提高土地财政收入、实施改革的地区显著扩大城投债等债务融资规模、隐含着危害财政可持续性与金融稳定性的潜在风险等。^①撤县设区改革是否促进了耕地保护，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主流文献认为，撤县设区以扩大地市级政府的管辖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谋求土地控制权的动机。无论是通过土地引资的方式做大GDP以推进工业化，还是获取土地财政以推进城镇化，抑或以土地出让未来收益谋求城投债发行规模增大等，都会不可避免引发耕地的占用。但必须注意到，撤县设区及其行政建制变化，既弱化了县级政府对土地资源管理的积极性，又使得土地出让权由县级政府上移而强化了地级市政府的控制权。显然，这一转变往往具有双重效果：一方面，撤县设区通过建成区扩张机制增加了耕地征收规模；另一方面，撤县设区通过整合土地一级市场、改善价格生成机制、提升土地金融效率等减少了耕地征收规模。此外，由于地级市对土地利用的监管相对更加规范，撤县设区带来的行政隶属变化可能有助于抑制耕地的征收规模。因此，撤县设区是加剧还是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仍是悬而未决的议题。

本文基于2003—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撤县设区对耕地征收的影响机制及其效果。可能的创新在于：一是从耕地征收视角考察撤县设区对耕地资源利用的影响，以丰富撤县设区改革的研究文献；二是探讨撤县设区改革对土地利用（土地资源、土地价格和土地金融）以及土地监管的影响，揭示其对耕地征收的作用机制。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撤县设区改革并不是行政区划的简单变化，而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目的在于提高城市化水平，改善行政管理，促进经济发展。改革的核心在于政府职能和权限的变化，即地级市上收经济管理权限并获得县域资源控制权。县与市辖区的主要差异体现在：（1）政府职能差异。区与县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为城市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后者需要兼顾农村发展。（2）政府权限差异。县是一级行政机构，拥有相对独立的权限，尤其是拥有较为完整的财政预算体系和管理权限，能够自行制定县域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县改区后，其财权、事权与人事权将接受市里的统筹安排，自主权缩小，新设区政府在土地和财税权的独立性明显弱化，尤其是没有独立的土地管理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政策经历了从“集中发展中小城镇”到“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合理布局的城镇体系”到“以城市群发展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再到“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阶段性转换。撤县设区改革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国家战略和城镇化政策变迁基本同步，大体经历了起步探索、蓬勃发展、基本停滞和重新繁荣四个阶段。（1）探索阶段（1983—1996年）。撤县设区改革是伴随着撤地设市进行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且分布较为离散。（2）蓬勃发展阶段（1997—2002年）。1997年以后，撤县设区成为地方政府谋求城市扩张的主要手段，年均改制数量约15个，除了东部频繁调整外，中西部地区也有调整个案。（3）基本停滞阶段（2003—2010年）。针对“假性城市化”、市县矛盾加剧、城市粗放蔓延等问题，中央强化了地方改革的申请审核，年均改制数量降为3个左右。（4）重新繁荣阶段（2011—2021年）。此阶段的改革遍布全国，年均改制数量约为8个。一方面，新型城镇

^① 乔俊峰、黄智琛：《地方政府债务为何持续扩张——基于撤县设区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21年第6期；刘潘、祁毓、张兆强：《行政主导型城镇化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以撤县设区为观察视角》，《财政研究》2022年第7期。

化战略旨在优化市辖区结构和推动区域一体化，中央对撤县设区的管制相对宽松；另一方面，2009年开始推进的“省直管县”新政，激发了地级市维护自身利益而加快改革的积极性。^①

（二）理论分析

1. 廉价土地出让、撤县设区与建成区扩张。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激励了地方政府做大GDP的行为努力，因为推进经济增长既能够表达政府政绩，又有助于扩大税基。竞争性资本的进入部分依赖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于是，耕地占用与廉价出让工业用地成为了普遍现象。^②理论上，工业用地价格可视为城市聚集的经济成本，较低用地成本有助于实现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资源流入区域性中心城市，将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工业用地时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推行产业政策和引导企业发展的抓手，主要体现了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等属性。事实上，我国工业用地价格长期低于《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存在着工业用地资源闲置、资源错配等问题。

撤县设区改革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建成区扩张。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解决了主城区发展空间饱和、经济发展用地紧张等问题，将改制后的新区主要围绕二、三产业进行布局，通过变更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来增加建设用地供给。另一方面，建成区工业用地的扩张，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以及其他低门槛准入进行“招商引资”提供了竞争优势，而土地资源错配与低效率使用，又为扩大耕地征收规模提供了粗放扩张的路径依赖。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撤县设区改革促进了建成区扩张，进而加剧耕地征收。

2. 地租理论、撤县设区与土地一级市场价格。撤县设区能够提升被撤县的地区位优势，通过“土地城镇化”来改变土地的极差地租。一是撤县设区提升了被撤县的区位条件，并转化为级差地租Ⅰ。一方面，撤县设区缩小了被撤县与中心城区的经济距离。改革有助于激励地级市加大对被撤县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而交通设施的改善提升被撤县的可达性，形成极差地租Ⅰ。另一方面，撤县设区缩短了被撤县与中心城区的行政距离，既有助于降低行政协调的交易成本，又降低劳动力的流入门槛，提高了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进而形成级差地租Ⅰ。二是撤县设区后，地级市的统一规划和资本涌入将提高被撤县的土地开发程度，改善要素配置的聚集效应与规模经济性，带动被撤县土地价值增值，形成级差地租Ⅱ。

地价是地租资本化的体现，级差地租的提升必然带来地价上涨。土地一级市场所决定的价格（下文简称“地价”）生成机制，表达了土地资产化对耕地征收的影响效应。一是新世纪以来各地发展经济的方式通常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尽管招商引资竞争使得工业用地地价始终很难提高，但商住用地凭借着供给的垄断性拉高了整体地价。地价指标所隐含的不同类型土地出让的结构性特征，体现了撤县设区改革后地方政府对土地运营策略的变化。二是地价上涨本身包含着除了土地财政之外的其他因素，由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决定，是城市人口增加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三是相比于土地财政指标，地价避开了土地出让规模等因素干扰，既体现了土地资产价值，又表现出价格信号的穿透力，影响着征地成本。

撤县设区带来的地价上涨，有可能减少耕地的征收面积。一方面，城市土地市场与农地市场具有耦合性，城市地价影响农户对耕地价值判断和农地租金，^③升值预期可能增加征地的直接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冲突、诉讼等间接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城市产业布局与城市地价息息相关，攀升的地价将倒逼产业结构向土地利用效率高的第三产业转型，第三产业的集聚性则有助于弱化土地扩张，从而抑制耕地征收规模。^④据此，提出假设2。

^① 吴金群、廖超超等：《尺度重组与地域重构：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40年》，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71-378页。

^② 罗必良：《分税制、财政压力与政府“土地财政”偏好》，《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③ 李尚蒲、胡凝、罗必良：《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农地租金研究》，《制度经济学研究》2019年第1期。

^④ 黄忠华、李书萱、杜雪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下城市地价时空格局及影响机制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22年第2期。

假设 2：撤县设区改革推高了地价，进而抑制耕地征收规模。

3. 土地金融、撤县设区与城投债发行。土地是优良的质押品，土地金融是地方政府从耕地征收后的土地利用转化中获取资金，即地方政府把土地相关的收入资本化并且成倍放大以获取贷款和各类资金。这既包括将土地注入地方性融资平台所获得的资金，也包含着将土地未来收益作为抵押从银行和其他渠道借入的资金。在“耕地征收—土地出让—土地抵押（或隐形担保）”模式中，各地积极利用土地金融化的杠杆效应，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资金需求，推动各地经济增长。持续上涨的地价是土地金融进行信用创造的前提。前期研究表明，地价、房价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呈现强相关性，在限制房价地区的土地收入下降时，城投债规模随之下降。^①这意味着土地金融存在着系统性风险，一旦地价下降，土地出让收入减少，这可能使得融资平台面临严峻压力。地方性融资平台举债依赖于土地资产的注入。一是为应对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地方性融资平台井喷式爆发。地方政府选择了以隐性担保的方式大量注入土地，通过扩大融资平台资产来借入大量基建资金。二是城投债提高了投资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又提升了土地价值，这使得城投公司能够进一步融得更多资金，并且清偿原有的债务。三是地方政府积极通过隐形担保或者显性财务支持等获取债务融资。土地出让收入被视为地方政府信用质量的信号，各地偏好以非正式的安排作为支持融资平台的隐性担保。^②在城投债首次发行前，各地会增加对融资平台的土地资产注入，旨在提高信用评级并获得更多金融资源。

关于撤县设区的土地金融效应的前期研究较少。有研究认为，地方债投资改善了基础设施，其最终成果可能惠及民众；也有研究指出，歧视性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诱导地方政府将债务压力转移给失去土地的村民。本文猜测撤县设区改革可能强化土地金融的杠杆效应，进而影响耕地征收行为。一是改革后地级市对土地出让收入的统筹能力增强，土地和地产等优良抵押物有助于城投债等发行。尤其是 2015 年修订后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可以合法使用政府管理资金中的土地销售收入来偿还地方政府债券，这部分增强了地方财政自主权。二是“银根连着地根”。土地金融的信用创造过程依赖于地价上涨，地价上涨减少了征地规模，获得同等体量的信用资金所需要的土地抵押数量降低。据此，提出假设 3。

假设 3：撤县设区改革增加了城投债发行规模，进而抑制耕地征收规模。

4. 撤县设区与土地监管重构。撤县设区将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由县域尺度上移至地级市尺度。一方面，改革后财权和土地审批权向地级市集中，增加了地级市对土地管理等的权力，而强化土地管制水平则会起到有效保护耕地的作用。另一方面，这会降低行政管理碎片化所产生的信息成本。例如，在实施“省直管县”的体制安排中，县级财政资金滥用的数量往往更多。^③另外，县级政府受到的监管力度相对较弱，可能更易出现违规用地行为。因此，在撤县设区改革的基础上强化土地监管，有助于提升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一是国家土地督察力度的不断强化使得土地违法被查处的风险提高。由此，基于对土地违法增加土地财政收入的公共利益与承担查出风险的私人成本间的权衡，地方政府官员将大大弱化违法征地的行为动机及其积极性。此外，对被撤县土地的分散督察转变为对地市级的集中督察，亦有助于提高管理效率，从而抑制耕地的违规征收行为。二是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审计与绩效考核，已经进一步延伸到包括环境保护和基本农田保护等多个维度。这有助于激励政府官员降低土地违法行为、限制对高污染产业或低附加值企业的供地。因此，土地督察、环保督察等制度的实施都提高了土地违法成本，减少了辖区内不利于土地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从而起到保护耕地的作用。据此，提出假设 4。

假设 4：撤县设区改革提高了土地管制水平，进而抑制耕地征收规模。

^① Joseph Gyourko, Yang Shen, Jing Wu, Rongjie Zhang, “Land Finance in China: Analysis and Review”,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76, 2022, p.101868.

^② 刘守英、王志锋、张维凡、熊雪峰：《“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20 年第 6 期。

^③ Bo Shiyu, Yiping Wu, Lingna Zhong, “Flattening of Government Hierarchies and Misuse of Public Funds: Evidence from Audit Programs in China”,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179, 2020, pp.141-151.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一) 数据与变量选择

耕地征收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撤县设区数据源于民政部官网，其他相关数据则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土地市场网和政府官网。本文选取2003—2019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并做如下处理：第一，剔除样本期内出现地级市行政区划调整的样本；第二，对耕地征收面积的极端值进行98%的缩尾处理；第三，对外商投资水平和实际外商投资额等指标进行汇率换算，并对所有价值量指标进行平减处理。

被解释变量：选取耕地征收面积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采用基于线性差值补齐的耕地征收面积、耕地征收面积占比和土地征收面积等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已省略）。

解释变量：设置撤县设区改革虚拟变量，观察期内发生撤县设区的城市在改革当年及以后赋值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1）产业结构，使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表征。（2）土地财政依赖度，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总收入之比衡量。（3）金融发展水平，使用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进行测度。（4）财政自给率，使用财政预算收支比衡量。（5）人口密度，选取城市地均人口的对数值来衡量。（6）交通情况，使用公路网密度作为反映城市交通便利程度。（7）经济水平，使用实际人均GDP并取对数表征。（8）外资利用水平，使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并取对数衡量。

(二) 模型设定

为了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耕地征收的影响，本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的基准模型：

$$Y_{i,t} = \alpha + \beta D_{i,t} + \theta X_{i,t} + \mu_i + \lambda_t + u_{i,t} \quad (1)$$

其中，下标*i*代表城市，*t*代表时间， $Y_{i,t}$ 表示城市耕地征收面积， $D_{i,t}$ 为是否实施撤县设区改革政策的虚拟变量， α 、 β 、 θ 均为待估计参数。本文重点关注撤县设区改革对耕地征收面积的平均处理效应 β 值。 $X_{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_i 为城市固定效应， 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u_{i,t}$ 为随机误差项。为了解决潜在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报告的是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借鉴温忠麟^①提出的逐步回归法，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土地属性以及监管的影响，并测算其对耕地征收的中介效应：

$$M_{i,t} = \alpha_2 + \beta_2 D_{i,t} + \tau X_{i,t} + \omega_i + \epsilon_t + \psi_{i,t} \quad (2)$$

$$Y_{i,t} = \alpha_3 + \beta_3 D_{i,t} + \sigma M_{i,t} + \vartheta X_{i,t} + \pi_i + \varphi_t + \xi_{i,t} \quad (3)$$

其中， $Y_{i,t}$ 表示耕地征收面积， $M_{i,t}$ 为一系列中介变量，包括建成区扩张、地价、城投债以及土地监管水平。改革的总效应为 β ，直接效应为 β_3 ，间接效应为 $\beta_2\sigma$ 。若 $\beta_2\sigma$ 与 β 符号一致，则中介变量 $M_{i,t}$ 强化了撤县设区改革对耕地征收面积的直接影响效果，若 $\beta_2\sigma$ 与 β 符号相反，则中介变量 $M_{i,t}$ 弱化（遮掩）了改革政策对耕地征收的直接影响效果。

四、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1表明，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抑制了各地耕地的征收规模，有利于耕地保护。其中，第(1)—(3)列分别汇报了OLS模型、控制城市的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第(4)列汇报了以城市聚类的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改革过的地级市的年均耕地征收面积比未改革组减少0.962平方公里。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从产业结构来看，二、三产业的发展会增加耕地征收面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倒逼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来看，土地财政激励地方政府增加耕地征收规模，土地财政依赖度与耕地征收面积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此外，

①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年第5期。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撤县设区	-1.011*** (0.258)	-0.974*** (0.339)	-0.962*** (0.351)	-0.962** (0.478)
产业结构	-0.003 (0.022)	0.040 (0.029)	0.056* (0.033)	0.056 (0.044)
土地财政依赖	0.920* (0.528)	1.212** (0.559)	2.135*** (0.726)	2.135** (0.854)
金融发展水平	1.699*** (0.191)	0.692** (0.343)	0.310 (0.501)	0.310 (0.713)
财政自给率	0.476 (0.816)	1.828 (1.459)	2.104 (1.573)	2.104 (2.234)
人口密度	0.052 (0.259)	-0.585 (1.434)	-0.246 (1.377)	-0.246 (1.671)
交通情况	-0.209 (0.316)	-0.177 (0.365)	0.153 (0.489)	0.153 (0.698)
经济水平	0.057 (0.354)	0.597 (0.530)	0.762 (0.604)	0.762 (0.686)
外资利用	0.208*** (0.081)	0.122 (0.084)	0.161* (0.086)	0.161 (0.100)
常数项	-15.749*** (1.992)	-7.958 (8.646)	-9.223 (9.473)	-9.223 (12.107)
年份固定	NO	NO	YES	YES
城市固定	NO	YES	YES	YES
观测值	2515	2501	2501	2501
R ²	0.260	0.615	0.620	0.620

注：***、** 和 * 分别表示 $p < 1\%$ 、 $p < 5\%$ 和 $p < 10\%$ ；第(1)—(3)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第(4)列括号内为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下同(后文仅报告城市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金融发展水平等变量的回归系数的方向符合理论预期，却未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是保证政策评估有效性的前提。借鉴唐为(2019)的做法，^①以2003年的样本为基准组。图1表明，改革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并无显著的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改革实施在短期(4年内)产生显著差异，即撤县设区改革后的耕地征收规模显著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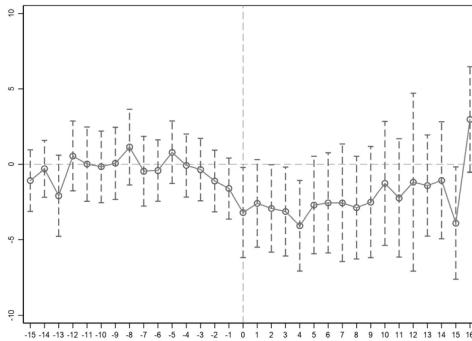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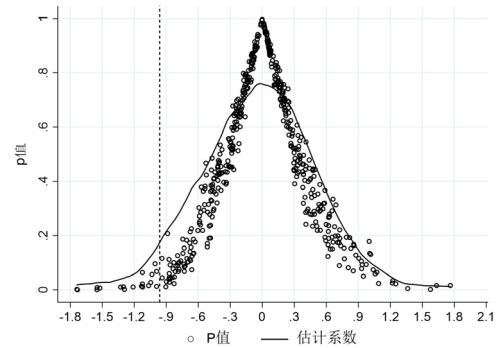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

2. 动态效应检验。参考Zhi Li等(2021)的做法，^②本文选取改革实施后的前6期来考察撤县设区政策的动态效应，从而充分反映撤县设区改革后一个完整的官员任期内的政策效应。由表2第(4)列可知，改革在实施当年和实施后2—4年显著减少了地级市的耕地征收面积，这说明撤县设区改革对耕地征收面积主要为短期影响。

3. 安慰剂检验。首先，随机生成实施撤县设区政策的“虚拟”城市名单，生成错误的估计系数，将此过程重复进行500次。其次，将生成的错误估计系数可视化。图2表明，实验组回归系数均值在0值附近，表1第(4)列基于真实数据回归的系数存在差异，说明估计结果不是撤县设区以外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

① 唐为：《分权、外部性与边界效应》，《经济研究》2019年第3期。

② Zhi Li, Ruyi Yan, Zuo Zhang, Yue Sun, Xiaogang Zhang, “The Effects of City-County Mergers on Urban Energy Intens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18, no.16, 2021, p.8839.

4. PSM-DID 检验。将基准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先使用 Logit 回归对处理组进行 1:1、1:2、1:3、1:4 逐年最近邻匹配得到新样本，再使用逐年 PSM-DID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3 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改革抑制了地方政府的耕地征收行为。

5. 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表 4 表明，在控制了其他政策的干扰后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第（1）列为删除 2003 年之前发生过撤县设区改革的城市样本，第（2）列为

加入城乡增减挂钩试点政策的虚拟变量，第（3）列为增加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改革的虚拟变量。无论是剔除样本，还是加入其他政策虚拟变量，撤县设区改革依然能够显著抑制耕地征收规模。

6. 地区异质性分析。（1）撤县设区改革对我国东部的耕地征收呈现显著负向影响。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征地成本上涨等影响，东部地区“以地谋发展”的模式难以维继，政府征地积极性逐渐下降。2010 年以来，“中部崛起”与“振兴西部”的区域发展政策给予了中、西部地区相对充足的建设用地指标。上述政策因素在抑制东部地区耕地征收的同时，并未改变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利用相对粗放现状。（2）改革在粮食主产区显著减少耕地征收面积。新世纪以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了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业发展以及耕地保护问题，2010 年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还明确规定限制粮食主产区的城镇化建设等，而对产销平衡区和粮食主销区的限制则相对较少。

五、机制分析

第一，建成区扩张对耕地征收的遮掩效应。表 6 第（1）列显示撤县设区改革对建成区面积有着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改革推动了建成区的扩张。第（2）列汇报了将建成区面积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回归且通过检验的结果，即建成区扩张对于加剧地方耕地征收呈现中介效应，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结果。对比表 1 的总效应，表 6 第（1）—（2）列所计算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符号相反，即廉价土地出让对改革抑制耕地征收的政策效果具有遮掩作用。

表 2 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post0	-0.842(0.526)	-1.224**(0.535)	-1.145**(0.533)	-1.145**(0.579)
post1	-0.573(0.530)	-0.666(0.461)	-0.584(0.464)	-0.584(0.516)
post2	-1.030**(0.480)	-0.993**(0.426)	-0.975**(0.434)	-0.975**(0.462)
post3	-1.369**(0.645)	-1.157*(0.615)	-1.204*(0.621)	-1.204*(0.683)
post4	-2.095***(0.639)	-2.057***(0.659)	-2.193***(0.680)	-2.193***(0.732)
post5	-0.948(0.671)	-0.749(0.584)	-0.829(0.596)	-0.829(0.634)
post6	-0.359(1.083)	-0.579(0.955)	-0.680(0.988)	-0.680(1.083)
常数项	-20.866***(3.626)	-6.766(8.547)	-8.227(9.528)	-8.227(12.461)
年份固定	NO	NO	YES	YES
城市固定	NO	YES	YES	YES
观测值	2513	2499	2499	2499
R ²	0.282	0.620	0.625	0.625

表 3 PSM-DID 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1:1	1:2	1:3	1:4
撤县设区	-1.090 (0.754)	-1.357* (0.698)	-1.166* (0.631)	-1.407** (0.6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633	898	1059	1179
R ²	0.614	0.615	0.627	0.619

表 4 排除其他政策影响结果

变量	(1)	(2)	(3)
撤县设区	-0.981* (0.538)	-0.981** (0.479)	-0.925** (0.464)
城乡增减挂钩	-	-0.426 (0.516)	-
集体建设用地入市	-	-	-0.606 (0.87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NO	YES	YES
城市固定	NO	YES	YES
观测值	1213	2501	2501
R ²	0.138	0.621	0.621

表 5 异质性检验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主产区	平衡区	主销区
	(1)	(2)	(3)	(4)	(5)	(6)
撤县设区	-1.586** (0.61)	0.464 (0.61)	-0.318 (0.97)	-1.002* (0.57)	-1.164 (1.79)	-1.325 (0.8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YES	YES	NO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NO	YES	YES	YES
观测值	1117	811	577	1578	399	508
R ²	0.597	0.678	0.456	0.606	0.589	0.655

第二, 土地

一级市场价格对耕地征收的影响。表6第(3)列显示撤县设区改革对土地一级市场价格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撤县设区改革提高了地价。第(4)列显示地价对于抑制耕地征收呈现中介效应,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结果。对比表

表6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建成区面积		地价		城投债		监管水平	
	(1)	(2)	(3)	(4)	(5)	(6)	(7)	(8)
撤县设区	0.188*** (0.011)	-1.457*** (0.367)	0.615** (0.435)	-0.941* (0.524)	0.008*** (0.002)	-0.768* (0.454)	-0.189** (0.084)	-1.129** (0.519)
建成区面积	-	2.764*** (0.558)	-	-	-	-	-	-
地价	-	-	-	-	-0.237*** (0.044)	-	-	-
城投债	-	-	-	-	-	-17.613 (18.048)	-	-
监管水平	-	-	-	-	-	-	-	0.321** (0.11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462	2500	3909	2121	4492	2501	3971	2143
R ²	0.969	0.625	0.632	0.646	0.543	0.622	0.522	0.641
Sobel 检验	0.491*** (0.099)	-0.236*** (0.062)	-0.194*** (0.074)	-	-0.022 (0.019)	-	-	-

2的总效应,表6第(3)—(4)列显示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符号一致,说明由地价表征的土地资产属性强化了改革的直接影响效果,即改革增加了区域的级差地租以及地租资本化的地价,抑制了耕地征收。

第三,城投债发行规模对耕地征收的影响。表6第(5)列显示撤县设区改革对城投债发行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改革提高了城投债发行规模。第(6)列将城投债发行规模作为中介变量回归,发现城投债发行额对耕地征收规模具有抑制作用。对比表2的总效应,表6第(5)—(6)列计算的间接效应符号与总效应的符号一致,说明由城投债表征的土地金融强化了改革的直接影响。当撤县设区改革强化了土地资本化效应时,地方政府能用较少的土地撬动金融资源。同时,土地信用创造过程依赖地价的持续上涨和地方政府的隐形担保,政策调控与土地市场价格波动均影响信用创造。土地金融的不稳定性和隐含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可能起到反噬效果,对耕地征收的抑制效果有限。

第四,土地监管水平对耕地征收的影响。表6第(7)列显示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土地监管(使用土地监管水平的反向指标)的显著促进作用。第(8)列将土地监管作为中介变量,其显著抑制了耕地征收规模,却未能通过中介效应检验。由于年鉴数据仅报告了省级土地监管水平,数据获取受限可能影响了土地监管水平对耕地征收规模的机制检验过程。检验证明,撤县设区对监管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表明土地监管水平对撤县设区改革的中介机制成立。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实证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在其改革开始的4年内最为有效,能够显著抑制耕地征收规模且结果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这种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或者粮食主产区更为明显。围绕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监管等方面的机制分析表明,撤县设区改革促进了建成区面积扩张,加剧耕地征收但同时也推高了地价,增加了城投债发行规模,提高了土地管制水平,抑制耕地征收。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第一,推动形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将行政力量与土地市场化有机融合。第二,因地制宜实施撤县设区改革。改革前应综合考虑地区差异和市县等级关系差异,精准施策。第三,考虑到地价上涨可能部分抑制耕地征收,如何平衡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如何科学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如何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作用,亟需顶层设计进一步引领。第四,切实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提高地方政府的土地违法成本。建立健全生态资源资产评价体系,合理利用撤县设区政策工具带来的组织与动员优势,形成体制性的制度红利。

责任编辑:张超

历史学

从细节看抗战：华南正面战场若干具体史实之探讨^{*}

左双文 曾钰雯

[摘要] 华南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都是发生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作战的基本形态是防御，但也有对日军的轮袭和出击。国民党军队上报的战绩存在一定的水分，须仔细鉴别。国民党军的装备、后勤保障、官兵体质、官兵增补、各部之间的协调配合等方面均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在对日作战中，官兵的意志是否顽强与民众是否支持均极为重要。

[关键词] 华南抗战 正面战场 第七战区 余汉谋 战斗详报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105-18

全面抗战开始之后，日军对华的军事进攻路线大体上是沿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这样的作战顺序逐次推进。当其发动对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进攻，攻占广州，国民党军（以下均简称“国军”）从武汉撤退后，中国抗战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战略防御进入到战略相持的阶段。除了派出成建制部队出省在其他战场作战，华南地区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相持阶段之后。对于华南正面战场，此前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①但关于作战的一些细节问题，似还较少涉及。近期笔者在接触若干资料后，认为这些细节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对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华南正面战场的全貌，获知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颇有价值。故本文在略作宏观的叙论之后，将更多地从细节方面，来加以叙述和探讨。

一、华南正面战场的战略价值及其特点

从整个中日战争的全局来看，日军在华南作战的主要战略意图与之前在其他区域有所不同。首先，这是其切断中国外援通道总战略的组成部分，是为了包围封锁中国，使中国军队丧失抵抗能力，以尽快结束所谓“中国事变”。1938年10月攻占广州、截断广九铁路，1939年2月攻占海南、6月攻占汕头，很大程度上均是基于这一目的，即所谓“中日战争陷入长期持久的阶段后，连结中国与列国间的补给连络线之截断问题，便成为日军对华战略的重要课题。”将“封锁”作为其“特别重视的战略”。^②为此，在1940年2月发动“香韶作战”再次占领淡水，封锁大亚湾与大鹏湾；3月进行了以封锁广州湾为目的的雷州至北海的“扫荡”作战；4月发动了“扫荡”汕尾沿海的“C3号”作战；5月在惠淡一带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南抗战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6ZDA13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左双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曾钰雯，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广东 广州，510631）。

① 参见沙东迅：《试论粤北第一次会战》，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广东抗战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梁山、王付昌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广东正面战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张晓辉：《论抗日战争中的广东国民党战场》，《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②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三），朝雲新聞社，1973年。中译本：《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第60、461页。

进行了制压中国守军反攻的“东江作战”(中方称“惠博战役”)。其次，是出于华南局部战局作战的需要。1939年11月第一次进攻粤北，是为了对在广州外围不时袭扰的余汉谋部进行“扫荡”，并在出兵桂南时，使该部不能抽调兵力支援广西(攻占南宁也是为了切断外援通道)。在1940年1月初突然撤出战场，是因为需要将兵力迅速转用于桂南战场。1940年5月第二次进攻粤北是“欲扩占广州外围据点”，^①“打击当面的中国军战力，以利尔后警备之容易”。^②1945年1月第三次进攻粤北是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打通粤汉铁路。从几次作战来看，日军的具体作战意图都有所实现，广东守军从沿海退到粤北，又从粤北退到赣南。

但华南战场的坚持，又起到了与日军胶着、对峙，从而牵制的作用。“国军”退到粤北之后，日军就基本上失去了海军的优势，后勤输送的能力也有所削弱，“国军”与之对峙并拉锯的战力明显增强。日军一般要放两个半至三个半师团在广州及其附近，“国军”则有近20万(余汉谋报告是18万多)军队在广东支撑，^③以分减其他战区和大后方的压力，也多少消耗和牵制了日军的一些力量。反之，如果广东部队不是在粤北坚守，或者甚至像汪精卫叛逃初期所期待的那样，追随他投降日本人，那会是一番什么景象？而事实是，广东的将领几乎全部拒绝跟随汪精卫，全部反对他投降。对此以及广东将领的气节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和评价。第七、第九战区，一个顶住南面(粤北)压力，一个顶住北面(湘北)压力，致使日军无法利用粤汉铁路南段，同时与四战区的广西连结，构成西南大后方的一道重要屏障。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44年底。而在敌人的一号作战打下长沙、衡阳、曲江，打通粤汉铁路，桂柳会战“国军”失利后，敌人就能够长驱直入，到达独山，威胁重庆了。可以说在广州沦陷之后，华南正面战场是全国抗战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只要华南这个战场还一直维持，只要这支军队还继续存在，其战略支撑点的作用就不会消失，对日军就具有一定的牵制和威慑作用。

与正面战场其他战区相比，华南正面战场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是基本都是发生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后，中国国民政府军队实行全面抵抗，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从此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但日军在华南尚未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直到1938年10月日军正式发动侵粤战争，广东都是处在全国已进入战时但广东只有零星接触的特殊时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1938年10月之后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个阶段的到来，是以广州、武汉的沦陷为标志。换句话说，华南国民党军在惠广抵抗的失利成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起点之一，华南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上是在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这是华南正面抗战第一个显著的特点。

华南正面战场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一战区近7年的作战基本上都由本省部队承担，而基本没有“中央军”和其他地方派系的部队加入，在军队的地域构成上，是一种独力承担、“自卫自守”程度较高的状态。当然，余汉谋、李汉魂等在械弹、经费、粮食接济等方面会频频向蒋介石提出要求，有大量要求补充、要求拨款、要求减免洋米进口关税或调运外省粮食的函电、报告，蒋介石、何应钦、孔祥熙等一般也会部分给予满足，但除了第一次粤北会战后期派出54军助战外，基本没有粤系部队之外的身影。这与一战区、三战区、五战区、六战区、九战区、中印缅战区等其他战区以中央军为主力或占有相当分量的情况有明显不同。这固然有其优点，即分减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派部队的压力；内部较有团体意识，便于掌控(虽有严重的派系分歧，余汉谋与张发奎、李汉魂、邓龙光等都一直明争暗斗，但因为余汉谋部是基本部队，故军队内部冲突相对较小)；环境、气候与生活习惯上容易适应，与民众

① 《第七战区重要战役经过概况与检讨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455。

② 防衛厅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戰』(三)。中译本：《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第295页。

③ 1941年底余汉谋报告军令部，七战区所属正规军各部队，编制人数为231798名，现有182347名，截至当年9月下旬止，共缺兵额计49451名。牵制的当面之敌为21军7万多人加伪军3万多人。《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4653。

容易交流与沟通。但本省部队本省作战也有明显弊端，其中较为严重的是士兵易于逃逸而不愿誓死抗战，此点将在下文述及。

华南正面战场的第三个特点，就是主要作战形态都是日军主动进攻，“国军”被动防守。但其间“国军”也有小的、局部的主动进攻，如曾发动对敌军的袭扰，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署，实施对日军的“轮袭”和“出击”。这是由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虽存在若干具体战役情形的转换），在战略上、在全局上，中日战争是敌人入侵，中国防守；日本侵略军是攻势，中国军队是守势。华南正面战场的作战基本形态也是守势，即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队防守，日方是主动，中方是被动，中方基本上是打的防御战，几次大的战役都是这样。例如，1938年10月12日至21日的惠广战役（败退）；1939年11月27日至1940年1月8日的第一次粤北会战（恢复阵地）；1940年5月13日至6月12日的第二次粤北（良口）会战（恢复阵地）；1945年1月18日至2月3日的第三次粤北（曲江）会战（败退）；1945年5月26日至7月2日的赣南会战（在粤北、东江及江西龙南、虔南、定南三南地区，基本恢复阵地）。但在具体战斗、具体战术上，中方也有主动，有进攻。如1939年11月的第一次粤北会战，62军军长黄涛就提出日军主力深入粤北，“国军”应该派出部队南下进攻广州，击其虚弱，或者在良口截击敌军，拊其侧背。余汉谋采取了第二个方案，黄涛部队出击之后，果然对日军造成一定的打击和威胁，是第一次粤北会战整个战役打得较好的一次战斗。

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要求，粤系部队1939年4月起开始派“出击队”“杀敌队”主动出击敌人。又有1939年的冬季攻势，其后有各军师抽派部队对日军进行“轮袭”，骚扰和袭击敌人，有1941年年中的轮袭，1941年底抽调部队准备配合英军在香港的作战。直至1944年，各军还轮流派出团级作战单位出击。例如65军187师560团在1944年4月5日“接替军出击团任务后，以两营守备马牯跳墙、百步梯、并风云岭之线。一营驻李婆洞，为指挥所预备队。第一线营除各约以步兵两连担任物资封锁及警戒外，其余集结于各该营附近为机动部队，经常对当面之敌袭击。”^①

关于组建出击队之动因及组建方式，从有关参战部队编制的计划来看，这是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各部队须派出小股官兵承担不断向敌主动袭击的任务：“第一线各部队应遵照委座电令，将原有之出击队（突击、快速、便衣等队）每队兵力尽可能加强至一营，并就地区部队之所许，正规部队与挺进纵队、地方团队彼此互相配合，轮流担任向预定之目标攻击”。并具体要求各袭击队抓住一切机会，用尽各种手段达成目的，每个地区5日至10日间施行一次或两次，每月不能少于6次。^②

具体来看，1939年4月，第12集团军抽派力量组成出击队向敌人发动进攻，“至九月十三日止，前后共发动四次出击，诱敌至山地予以严重打击，达成消耗战之目的，并牵制敌兵力之转用，其战绩应予重视。”^③对这一战役，日军战史的记载是：“昭和十四年八月下旬，中国军第一二集团军（军长余汉谋）的夏季攻势，给予日军相当的冲击，为击退与扫荡花费不少时日。”可见华南“国军”的出击确实予日军以有效的打击。^④1940年10月8日，蒋介石手令各战区对日军主动发起攻势，不可敷衍应付了事，要求如实上报战况、地点、战绩。蒋介石认为，当时的出击队未能达到他期望的成效，是由于各方长官没有落实好任务，于是手令要求：“嗣后对于各战区实施情形应于月底将作战经过、地点、战绩分别详报以备考核。仰勿再如过去因循塞责，负国误公，以自失革命军人之天职也。”^⑤

暂不论是否含有水分，余汉谋的不少战斗详报还是遵循了蒋介石的要求，细致地上报各项情况，例

^① 《第一八七师五六〇、五六一团在广州外围及花县等地战斗详报》（1944.4-1944.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28。

^② 《闽粤赣边区军三十年六、七两月轮流袭击计划》（1941年6月），《第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1941.10-1941.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4653。

^③ 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史》之《粤闽边区作战》（二），1981年，第157页。

^④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戦』（三）。中译本：《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第107页。

^⑤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机密日记》（1940年10月4日至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3493。

如 1941 年的轮袭和袭击计划，要求第一线之 62、63 军各组成三个袭击班，每班兵力一营至一团，每月对敌伪各种目标至少发动轮袭 6 次，东江指挥所部队亦抽出一个团，对敌人经常发动袭击。要求各部“果敢深入敌后游击，对敌伪军事，政治，经济，交通，通信机构等目标，实施最有效最猛烈之袭击破坏，造成恐怖之局面。”^①各部按照该计划，综计战斗 58 次，攻占新街、龙口、龙翔、西岭、福和、朱村、坳顶山等处敌阵地 14 次，破坏桥梁 8 座，营舍两座，公路十余里，俘获敌伪军官两员，士兵 15 名，军犬两头，伤毙敌伪官兵 1847 名，缴获轻机枪 3 挺，步枪 40 余支，手枪 4 支，单车 8 辆，以及弹药、电话机、符号、日记本等战利品 20 余种。“现仍督饬各部继续遵令积极实施，并严定奖罚，以期倍予敌人重大打击，藉增疲困、消耗敌人之效果。”^②

据余汉谋报称，战区还派出便衣队潜伏广州市郊，连续数月袭击敌伪机关及破坏敌伪军事、经济设施。1941 年 9 月 17 日晚，以炸弹同时轰炸西濠口大德、新华两戏院及大同酒店、福大汽车站等处，伤毙敌伪重要军官及士兵数十名，日敌恼羞成怒，于 9 月 30 日起连续派机空袭韶关，并散发传单，称连日空袭韶关，是对“国军”便衣队 17 日晚间于广州市郊投掷炸弹之报复行动，威胁如再有此项情事，“定以数十倍炸弹还诸韶关等语”。潜伏潮汕之便衣队，9 月 20 日也在市区袭击了敌人。^③

1941 年 12 月 22 日，蒋介石又致电余汉谋派兵援助香港英军作战，该次作战是“国军”打算与英军第一次联合作战，关乎国际形象，也是粤系部队对日军一次重要的主动出击，蒋介石十分重视，根据此前“国军”的战场表现，特别要求“我各级将领身先士卒，发扬蹈厉，严督全体士兵，共同一致，有我无敌，有进无退之精神以赴之。”^④12 月 24 日，余汉谋复电称已令 65 军出动，先行加入进攻，以策应英军固守香港。^⑤但因驻港英军很快投降，而“国军”尚未到达指定作战位置，故计划中的第一次中英联合军事行动并未如期实施。

二、华南地区“国军”战报的真实性问题

关于华南地区“国军”战报的真实性及余汉谋等人上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作战电报的可信度问题，笔者在阅读第七战区各级的战斗详报、自己编写的战史以及余汉谋等人向蒋介石报告战况的电报时，常常会生出一些疑问：这些报告可信吗？真实度有多少？有没有水分？有多少水分？由于这些报告十分繁琐，且数量很多，进一步加剧了甄别的难度。例如，战区部队与最高统帅部的联系显得非常程式化，事无巨细均直接报告蒋介石，华南地区的作战，张发奎、余汉谋、李汉魂、王俊、邓龙光，都有可能致电蒋介石。有些报告非常琐碎，比如 1944 年 2 月 15 日余汉谋向蒋介石报告粤桂江防司令部所属水雷队一次小的布雷行动的战报，为使读者感受其详尽程度，特摘录于下：

我水雷队为破坏敌人控制佛山至九江交通的企图，决定派员将敌正在修建的碉堡及附近桥梁炸毁，“乃于亥辰日派水雷员李祺佳会同顺德县水藤乡长陈少蔚前往侦察，亥有日侦察毕返队。亥感日会派水雷员梁始兴、李祺佳，副军士长陈深等三员携地雷二具，改装海戍式废雷一具，驳壳手枪三枝，十字镐三具，圆锹三把，由步二中队梁分队长率兵四名，配轻机枪一挺，驳壳手枪五枝，掩护深入并知会当地挺三暂编独立第五大队长陈窝率同该队士兵一班协助。于亥俭晚在该江佛公路沙滘乡附近敌建营房埋置改装海戍式废雷一具，并于该路沙滘军桥脚埋置地雷二具，于是晚十二时完成，即行按掣轰炸，当将该建造将成之营房及炮楼及沙滘军桥全部炸毁”。^⑥

①《第十二集团军三十年六、七月轮流袭击计划大纲》(1941 年 6 月)，《第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1941.10—1941.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4653。

②《第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1941.10—1941.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4653。

③《第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1941.10—1941.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4653。

④《蒋中正电余汉谋等增援香港关系国军成败望注重作战纪律合作精神》，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300-00016-025。

⑤《余汉谋电蒋中正以六十五军先行加入继续进攻策应英军固守香港等》，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103-00011-056。

⑥《第七战区一五四师粤汉铁路南段设置地雷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1941。

蒋介石读到余汉谋连携带了“十字镐三具，圆锹三把”都会呈上的具体而微的报告，不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这种情形应该是早已有之。1939年1月13日，蒋介石就曾要求侍从室人员每天给他选送的军事、政治、情报类的重要公文各以10份为限：“贺主任、陈主任：每日呈阅之情报应选择其最关紧要者十项为最多……又每日所呈军事与政治公文选其最重要者最多各以十件为限，其余应由各处主任负责处理，如其中仍有不能自行独断判决者则可随时呈请办法，不限此十件之内也。以后呈阅公事当照此处理，以省批阅时间也。”应该是侍从室对蒋介石这一要求未严格执行，16日，蒋介石又诘问侍从室何故未做到此点：“呈阅公文为何不照我前日批示实施？”^①一方面可能是蒋介石喜欢事无巨细都直接过问，要求各战区详尽报告，一方面也是地方愿意做此联络，争相邀功表现。

各级报告都可能有水分，有夸大己方战绩、缩小敌方战果的情况。或许是出于防止下属虚报战功的考虑，蒋介石要求提供战绩的具体证明材料，这说明蒋介石对一些战报并不轻易相信。例如1943年7月31日，余汉谋向蒋介石转报一份粤桂江防司令黄文田的战报，报告该部水雷分队长李北洲等26日晨在江佛公路密设地雷，炸中一辆载有30多名日军的军车，伤日军约20名。电文末特别提到已饬该部“速连同证件报核及分呈渝委座、桂主任”。估计是接到上峰要求提供该战报属实的相关证据的指令，李北洲即致函作战地境的顺德县请求帮助提供旁证，顺德县长高鼎荣于8月15日复函答称，该县自卫第二中队长梅洛派队协助李队长等在龙山附近江佛公路轰炸敌军车一案，“当经查明属实转报层宪查核在案”。23日，余汉谋再电蒋介石，对该次出击做了更为详细的转报，并称粤桂江防司令部已附呈江佛公路龙山乡王府桥布地雷位置图两份，“除电复及抽存外，谨检具原附件一份随电附呈察核。”^②也即按要求提供了这次出击取得战果的佐证材料。

1939年11月至1940年1月的第一次粤北会战，余汉谋等部所上报的歼敌人数是17163名（不包括第九集团军数据），^③这个数据是否属实？有没有夸大？该数据是张发奎汇总各部的情况统一上报蒋介石的，但后来在其口述自传中张发奎却说：“根据余汉谋呈交给我，而我又转呈给中央的报告，我们在粤北打了一场大胜仗。事实上我们被打败了，尽管余汉谋印了一本小册子《粤北大捷》。”^④实际上是“击毙了日本1000余人，俘虏日军军官数人和士兵58人”。^⑤李汉魂的回忆也称：“粤北战役结束后，日寇除在北江两岸遗留下一千多具尸体、数十辆军车、五十多个战俘之外，一无所获。”^⑥

张发奎的报告提交日期是1940年2月18日，战役刚结束不久的2月4日，余汉谋自己也给蒋介石一份报告，数据如下：“查职部廿八年冬季攻势开始迄本元月微日止，全战役敌我伤亡……我伤官二二七，兵三九二五，亡官一三七，兵六四二六，失踪官七十，兵二八七六，马十余，敌伤亡一五一六四员名，马千二百余。”^⑦这个15164少于17163，应该是因为当时还未将余汉谋部从四战区分开单独成立七战区，余汉谋只上报第12集团军而非整个第四战区的战绩。该役参战部队中陈章152师上报毙伤敌1600余人，林廷华158师上报毙伤敌1000余人，^⑧梁世骥154师上报毙伤敌450余人，^⑨

① 《蒋中正手令贺耀祖等手令登记》，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559-001。

② 《第七战区一五四师粤汉铁路南段设置地雷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1941。

③ 《张发奎电蒋中正第四战区冬季攻势自去年十一月杪至本年一月底止参战各部队及敌我伤亡武器损失及俘获数目》（1940年2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200-00063-042。

④ 《张发奎口述自传——中华民国第四任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台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公司，2017年，第423页。

⑤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3页。

⑥ 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页。

⑦ 《余汉谋电蒋中正何应钦等所部二十八年冬季攻势开始迄本元月五日止全战役敌我伤亡损耗概数》（1940年2月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200-00063-086。

⑧ 《第一五二、一五八师冬季攻势于广东银盏坳附近战斗详报（1939.11-1939.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9314。

⑨ 《第一五四师及九一九团粤北战斗详报》（1939.12-1940.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9335。

也就是说有可能各级部队都层层加码上报战绩。而余汉谋去台之后所编的《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仍称这次会战“毙敌军官 236 员，士兵 9800 余名。伤敌军官 87 员，士兵 3700 余名。俘敌军官 4 员，士兵 58 名。虏获敌火炮 10 门，炮弹 800 余颗。重机枪 12 挺，轻机枪 33 挺，步枪 330 枝，子弹 35000 余颗。夺获敌军马 80 匹，伤毙敌马千余匹，及其他军用品甚多。”还是维持会战刚结束时的数字。^①余汉谋年谱这个数据，敌官兵伤亡加起来一共为 13823 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敌军官被毙就达 236 名，伤 87 名，加上俘获 4 名，一共 327 名，如果属实，这是一个很辉煌的战绩。

该役据日防卫研究所的战史，称“依照第二十一军司令部的记录”，日军亡 293 人（军官 39 人），伤 1281 人（军官 57 人）。^②这个数字与余汉谋上报的数据相差悬殊，而比较接近张发奎、李汉魂后来所认可的说法。但是不是完全准确呢？也有疑问。该次日方进攻的部队为 104 师团、18 师团、近卫混成旅团，其中 104 师团的战报，是战死 302 人（军官 18 人）、负伤 725 人（军官 38 人），伤亡合计为 1027 人。^③18 师团的战报，战死 62 人（军官 5 人）、负伤 162 人（军官 8 人）、生死不明 1 人，伤亡失踪合计为 225 人。^④两项相加，日军亡 364 人（军官 23 人），伤 887 人。不算近卫混成旅团的伤亡人数，阵亡数就超过了上述战史记载数 71 人。虽然总数还是在伤亡 1000 多名之内，但说明日方战报同样也是有误差的，具体原因何在，则待考。此前 1939 年 4—9 月的出击作战，余汉谋报告的战绩是第一次出击敌军死伤 2700 人，“国军”死伤 1100 人；第三次（报告称第二次双方伤亡都不大）敌军死伤 2100 人，“国军”死伤 784 人；第四次敌军死伤 3800 人，“国军”死伤 1600 人；三次一共歼敌 8600 余人，而取得这样的战绩“国军”伤亡人数是 3500 人。有飞机、大炮助战，装备和机动明显好于“国军”的日军，伤亡人数反而大多大于“国军”。^⑤1940 年 5—6 月的第二次粤北会战，余汉谋报告的敌军伤亡人数是 6000 余人。^⑥1942 年 4 月余汉谋、王俊报告自 1941 年 2 月至 1942 年 2 月第七战区的惠淡、芦苞、清花、惠博、四邑等战役战斗的情况，敌军共伤亡 8500 余人，其中明确说击毙的 2000 余人（报告称毙伤敌数百人的，均算 300 人）。三项相加，共歼敌 23100 余人。^⑦如果加上第一次粤北会战的 17163 人，这两年多的作战共歼敌达 40263 人。日军在广东正面战场是否有这样大的人员伤亡呢？

而其中 1941 年 5 月 8—23 日的惠博战役，参战部队有 160 师、153 师、独九旅及独二支队、挺六纵队、保八团等地方武装，七战区报告整个战役敌伤亡共约 1500 余人，淹毙 200 余人，毙马百余匹，但缴获极少，只有“俘敌兵须田与一一名，获步枪二枝，太阳旗一面，作命一份。”^⑧歼敌这么多，缴获却这么少，本来就有点不好理解，但参与该役的 160 师（师长莫福如）一个师的记录，却是“先后于白茫茫、平山、横沥等地区与敌血战经旬，毙敌二千余。”^⑨毙敌数反而超过了整个战役的敌军伤亡人数。同是 1941 年 5 月的惠博战役，第 12 集团军的报告（称作战日期为 10—21 日）就更令人振奋了：“卅年

① 黄仲文编纂：《民国余上将汉谋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 年，第 47 页。

② 防衛厅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三)。中译本：《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第 111 页。

③ 「14. 翁英作戦 / 第 1 期」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13031771800、第 104 师团作戦一覧図 昭和 13 年 10 月 12 日～15 年 6 月 4 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④ 第 18 师团翁英作戦戦闘詳報 昭和 14 年 12 月 14 日～15 年 1 月 10 日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附表第 1 死傷表」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13031763600。

⑤ 《第十二集团军廿八年一月至十月作战经过概况》(1939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8542。

⑥ 《余汉谋电蒋中正何应钦等此次战役敌约伤亡六千余》(1940 年 6 月 19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200-00062-329。日军战史称该次作战的主攻部队第 38 师团阵亡 251 人，负伤 548 人。未见 18 师团、104 师团的数据。但其先头出击良口的 38 师团 229 联队受到重创，尤其最前端的第二、第四中队“在连日的激斗中失去了其过半数之兵力”。防衛厅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三)。中译本：《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第 295-296 页。

⑦ 余汉谋、王俊：《第七战区重要战役经过概况与检讨报告书》(1942 年 4 月 1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455。

⑧ 余汉谋、王俊：《第七战区重要战役经过概况与检讨报告书》(1942 年 4 月 1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455。

⑨ 《陆军第一百六十师抗战期间行动概见表及要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662。

五月十日，集结于增城、石龙、石滩、稔山之敌伪军共约三万，藉空军掩护，分六路先后向我响水、博罗、石马、平山等处攻击”，我 160 师、独立第九旅、保八团等部与敌交战，“十八日，我独九旅六二七团克横沥，廿日，一六 0 师四七九团一部克复平山，廿一日克复惠阳，敌分向博罗、增城、石龙、淡水退却，我军逐次恢复原有阵地。计是役敌伤亡约七千名，马三百余匹，我伤亡官兵七百余名。”^①这里报告的敌我伤亡比是 10 比 1，敌 10 我 1。整个抗战正面战场的作战，能够达到如此伤亡比例的，估计也是绝无仅有。七战区的司令是余汉谋，12 集团军的司令也是余汉谋，160 师的顶头上司还是余汉谋，同一个系统，同一批部队，同一场战役，上报的敌军伤亡数据相差却如此之大。这种悬殊的误差，如果体现的是这支军队的作风、品格和风气，那它在民族斗争中所能承担的任务必然是有限的。

还要略作补充的是，七战区这次战绩报告相互矛盾的作战上报至军委会后，蒋介石亲自将其批转各战区作为负面战例要求尽量研究并拟具意见上报。蒋介石的批令称，该战（一）我攻略淡水行动迟疑不决；（二）战场准备不周；（三）战斗指导错误，而无计划，“俟敌进犯，遂无所措手足。及至敌包围圈形成，尤斤斤于淡水之攻击，既未利用内线向敌一路出击，又不即设法向敌之外翼转移攻击，致所受损失甚重。”这与所报敌我 10 比 1 伤亡的说法完全相反。张发奎在按蒋介石要求提交的分析报告中，则直截了当称是分析该战“我军失败之原因”。^②

三、“国军”的官兵伤亡与弹药消耗

关于华南正面战场“国军”的伤亡、弹药消耗情况，有个现象颇值得注意，就是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很大，但战绩和缴获却很小，很不成比例。

例如第一次粤北会战的官兵伤亡、弹药损耗情况，该役参战的部队有：第 12 集团军 151 师、152 师、153 师、154 师、157 师、186 师、独 20 旅另一团；第 9 集团军 158 师、187 师、独 9 旅；第 35 集团军 156 师；暂 2 军 7、8 两师；54 军 14 师、50 师、76 师，及游击队、地方团队等一部。伤亡情况：我方：我官伤 312 名，兵 6139 名；阵亡官 171 名，兵 8265 名，生死不明官 86 名，兵 3417 名，马损失十余匹。敌方：敌官兵死伤 17163 名，俘获台籍翻译官 1 员，日籍兵 4 名，马 23 匹，毙马 120 匹。（敌军伤亡数不含第 9 集团军数据）。中方弹药消耗：损失重机枪 55 挺，轻机枪 280 挺，步枪 4393 支，驳壳手枪 465 支，步马枪 16 支，信号枪 2 支，刺刀 412 把，步枪弹 2748004 颗，重机枪弹 99534 颗，轻机枪弹 2841831 颗，手榴弹 96906 颗，迫击炮弹 82 颗，驳壳手枪弹 254489 颗，山炮弹 713 颗，信号枪弹 2228 颗。^③

该役日方的记载是“国军”投入兵力 122930 人，“遗弃尸首 16312，俘虏 1196”，虏获“迫击炮 9，重机枪 33，轻机枪 188，高射机枪 2，步枪 1720。”^④这与上述四战区上报的数据有出入，四战区上报的阵亡数是 8436 人，就算加上生死不明数也只有 11939 人，还相差 4373 人。但报的武器损耗数却大于敌军缴获数，重机枪多了 22 挺，轻机枪多了 92 挺，步枪多了 2673 支。在作战中损耗数大于敌军缴获数肯定是正常的，因为还会有被炸坏、烧坏、使用时损坏、遗失、士兵携枪潜逃等因素，但轻重机枪数相差这么大，而这又是可以向军政部要求补充的，不知其中是不是有别的考虑。

这么多部队参战，这么大的弹药消耗，如果真取得了 12 集团军等部所上报的歼敌战果，那还是很可观的。但如前所述，这个数据的水分不小。而从具体作战部队的战报来看，消耗与虏获不成比例，比如 1939 年 12 月 17—20 日林廷华 158 师银盏坳战斗：参战人马：军官 447 人，士兵 5893 人。战死：军

① 《第十二集团军作战经过概况及经验教训》（1940—19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176。

② 《军委会和第七战区部队将领对惠博两地作战检讨研究之文电》（194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46。

③ 《张发奎电蒋中正第四战区冬季攻势自去年十一月杪至本年一月底止参战各部队及敌我伤亡武器损失及俘获数目》（1940 年 2 月 18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200-00063-042。

④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三）。中译本：《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第 111 页。另据日军 104 师团战斗详报，翁英作战打死中国军人 6378 人。日军在战场使用了毒气弹，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使用九四式山炮发射赤 B 弹 10 发，黄 B 弹（毒气、路易氏混合毒剂炮弹）294 发。第二次进攻粤北时，敌 104 师团打死中国军人约 3455 人。可以说日军在华南战场同样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

官 10 人，士兵 896 人；战伤：军官 12 人，士兵 939 人；下落不明：军官 1 人，士兵 116 人。弹药消耗：3 天，6000 余人，步枪弹 26496 颗，机枪弹 136865 颗；迫击炮弹 410 颗，手榴弹 1499 颗，手枪弹 4395 颗，弹药损耗 3460 颗。虏获：俘虏无；六五步枪 1 支；六五子弹 120 发；手榴弹 2 颗；货币：军票 2 张（1 张 5 元，1 张 1 元）。1939 年 12 月 18—22 日第 187 师的虏获：钢帽 1 顶，手榴弹 1 个，胶鞋 1 对，文件 1 束。^①两个师四五天的战斗，得此虏获，实在是难称体面。据 158 师战斗详报的解释，是因为“敌对于死者之搬运掩埋及伤者之救护极为迅速，故所能虏获者甚少。”^②

据 154 师参与该战的战报，弹药的消耗除了交火时的正常发射，有些是因为敌机的轰炸造成的。报告称作战期间天气晴朗，有利敌机之活动，加上风高物燥，敌每利用飞机投掷燃烧弹，“国军”阵地附近之草木多被焚烧，造成阵地暴露，守兵无从掩护，受到极大威胁，“被敌机炸毁及火毁械弹甚多”。^③这一类的损耗在战场上应该是比较常见的现象。

但“国军”的作战，战况不佳，战绩不良也是常态，而不仅是粤北会战。例如与此几乎同时的桂南会战，据陈诚言：“此次桂南作战，无论在兵力上及其他一切，我均占绝对优势。以兵力言，敌人所使用之部队，最多不过十二个团，而我之兵力，则在二十七个师以上，平均两师对敌一团。故我实有歼灭敌人、造成较湘北、粤北更大胜利之可能。乃结果造成大溃败，此悉由于我本身犯有缺点所致。”^④

“国军”作战中，弹药消耗之大，与取得战果不成正比，该点在余汉谋 1941 年底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坦白承认：1941 年 9 月的四邑及清远、花县方面战斗，共计伤毙敌 2524 名，消耗步、机弹 388973 颗，手榴弹 5001 颗，迫炮弹 671 颗，平均统计毙敌或伤敌一名，需用步机弹 150 颗，手榴弹 2 颗，迫炮弹 0.27 颗，完全没有做到蒋介石在南岳会议上提出的“一弹要作二弹用”之精神。余汉谋称这是因为对平时训练与作战纪律要求不够，“步枪射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官兵，没有瞄准就发枪，使用手榴弹的时候，亦未等到有效的距离，就随意投掷”。^⑤独 9 旅在战后总结中也特别提到，由于“射击技能不纯熟，故每役消耗弹药多而杀伤敌人少”。^⑥而且是否真伤毙了敌军 2500 多人，也是疑问。

还有一种消耗是中方报告中不曾记录的，就是为日军所虏获。前述敌 18 师团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的战斗详报，记录虏获的“国军”械弹主要有：步枪 1217 支，轻机枪 38 支，重机枪 13 支，手枪 18 支，迫击炮 8 门。步枪弹 6917437 发，轻机枪弹 10520 发，重机枪弹 1211000 发，手榴弹 16261 发，迫击炮弹 3458 发，山炮弹 420 发，机关炮弹 28000 发，高射炮弹 1510 发，等等。^⑦敌 104 师团的虏获有：迫击炮 2 门，机枪 13 支，轻机枪 64 支，步枪 611 支，手枪 38 支，重机枪弹 43320 发，步枪弹 473025 发，轻机枪弹 556 发，手枪弹 10500 发，手榴弹 2088 颗，精米 430 袋。^⑧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大量宝贵的军火物资，落入敌军的手中，这还未包括敌近卫混成旅团的数据。

此外，有的弹药损失尤其不属战场上的正常消耗，而是因为指挥不当，撤退仓促，来不及搬运就将之炸毁、烧毁。广州失守时，广州军械库所存械弹，其中步枪弹一项至少就有数百万发。时任南海县自卫团主任的高鼎荣反映，曾向上面申请 20 万发弹药，结果只获批 10 万发废弹，令自行改造应用。“迨

① 《第六十五军及一五八、一八七师冬季攻势于源潭、琶江、横石、高田等地战斗详报》（1939.12—1940.0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9315。

② 《第一五二、一五八师冬季攻势于广东银盏坳附近战斗详报》（1939.11—1939.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9314。

③ 《第一五四师及九一九团粤北战斗详报》（1939.12—1940.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9335。

④ 《陈诚呈蒋中正桂南战役经过概要与检讨报告书》，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103-00040-002。

⑤ 《第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1941.10—1941.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4653。

⑥ 《独立第九旅广东淡水各战役战斗详报》（1942.2—194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49。

⑦ 第 18 师团翁英作戦戦闘詳報 昭和 14 年 12 月 14 日～15 年 1 月 10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附表第 2 収獲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1763700。

⑧ 「14. 翁英作戦 / 第 1 期」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1771800、第 104 师团作戦一覧図 昭和 13 年 10 月 12 日～15 年 6 月 4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二十一日再至军械库时，目睹大宗械弹搬运不及，库兵已奉令全部炸毁而不容领运矣。观此可知余之颟顸及所部办事之黑暗矣。”^①甚至有情报称“粤方在广州白云山军火库，存机枪及炮价值二千七百万元，又未装及已装飞机四十九架，均为日方掳获”。“增城原有战车炮一百四十门，亦未调用。”^②

这种非正常消耗，在一年之后的第一次粤北会战时又重演了。1939年12月下旬，北犯的左路敌军迫近英德县城，右路敌军陷新丰梅坑，迫近沙田和青塘。12月26日，驻扎翁源三华圩的余汉谋12集团军总部在撤退时，故技重施，“将英德县青塘、官渡及翁源县城所存弹药、器材、粮食、被服等的仓库烧毁。烧毁弹药仓库时，子弹、手榴弹、炮弹爆炸声隆隆，烧毁器材、被服、粮食仓库时黑烟冲天，远近见闻，误以为敌军窜犯英德青塘和翁源三华圩总部所在地，对于军心和民心影响甚大。”^③战时军火物资本来就紧缺珍贵，余汉谋一再向上面叫苦，呈报消耗了多少万的弹药，要求补充，但却一再误判敌情，指挥失误，接战不久就仓皇撤退，大量烧毁军火物资。而且在给蒋介石和军委会的报告中绝不提及，并虚报战果，对上报告和对外宣称歼敌1万多人，大搞庆功祝捷。也可以说，余汉谋对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是连蒙带骗的，很是狡黠和绝对不忠诚，蒋介石对此也并非不知情，“第四战区粤北之役，虽能转败为胜，但丧师折兵，遗弃仓库辎重，损失至巨。”^④

但蒋介石对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将领也不能要求太高和控制太紧，也得连哄带拉。因为一是要把他们联合在继续抵抗的阵营里面，让他们尽量出力卖命。另一方面，也怕要求严了，逼得紧了，这些人被汪精卫集团拉拢过去，那对抗战损失更大。因此对于某些事情，蒋介石恐怕也只能视而不见，经费、械弹还得尽量保障，使他们能够继续抵抗。打几仗，消灭千余日军，总比叛变当汉奸反过来打“国军”要强。因为汪精卫出逃后，一个很重要的策反目标，就是这批广东军人。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要求余汉谋这类将领，要求他们抗战又坚决，意志又顽强，战略战术又正确，又不虚报战绩，又廉洁奉公不贪污，官兵平等。他们无疑是有各种毛病、各种缺点、各种问题的，但他们能坚持在抗日阵营，坚持抗战，这个基本点还是值得肯定的，我们既不要把他们过于拔高，也不要对他们全盘否定。

进而言之，日军第一次粤北会战的企图，是要“将在广东北方蠢动的余汉谋广东军主力，捕捉于翁源以南地区，加以痛击，一举使全敌军瓦解。”^⑤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就算全按日方的统计口径，“国军”12万多部队，付出16000多人的代价，只打死打伤日军1000多人，但毕竟粉碎了日军瓦解全部华南“国军”的战略意图，战线得以恢复至战役前的状态，华南“国军”的有生力量基本保存，其作为战略支撑点的作用依然存在，这无疑也是一个胜利。且该次作战，是在惠广战役仓皇败退一年后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国军”的表现已比前大有改观。日方也说，“本次作战期间所遇到的敌人，不论在兵力上还是阵地的坚固程度上，都远胜于我师团此前作战中所遇之敌，各部队在攻击敌军据守要地的战斗中，打得异常艰苦。”^⑥在日军战报中，也多次提到守军的顽强。1939年4月在狮前市及花县以北的战斗，“敌军抵抗逐渐顽强”，“隘路内遇到不少敌军的抵抗”。4月的狮岭战斗，“国军”英勇作战，敌第170联队第一大队长根东中佐也被击伤，“国军”先已战死500余人，余下的“约有一个连，占据密林中的房子，进行顽强抵抗，被杀光。”1939年7月花县以北的作战，“国军”300多人袭击敌牛姑山阵地，“战斗极其激烈……敌军（指‘国军’）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和迫击炮的支援，先后进行了三次反攻。……大队长山内中佐在（‘国军’的）第三次反攻中，站在最前线进行指挥，在前进时不幸腹部中

① 《军参院参议李为之摭陈惠广失陷之由及粤政得失所在书》（1938.11.0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8418。

② 《孔祥熙电蒋中正江电》（1938年12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504-202。蒋介石认为此说不可信，但据日军战地新闻照片，有大量缴获粤军的苏制反坦克炮展出。

③ 林伟俦：《牛背脊、吕田战斗》，《粤桂黔滇抗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④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43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第170页。

⑤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支那事変陸軍作戦』（三）。中译本：《欧战爆发前后之对华和战》，第108页。

⑥ 「10.（自昭和14年11月19日至昭和15年1月13日）翁英作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13031773400、第104師団戦闘経過及教訓集 昭和13年10月中旬～15年6月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弹，最后壮烈牺牲，军官和士兵也不断出现伤亡。”“敌军的抵抗极其顽强，我方战死和伤者不少。”^①

另据当时中共方面的印象，“年来在广东实际支持前线，而且始终坚持于主阵地者只是余部。故其部队之损失与疲劳都有相当严重，尤以此次粤北之战，一八六师与一五一师为最（损失过半）。”余部自广州失守北撤后，大收青年学生，扩大政治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故其部队作战勇气与战斗能力尚能相当保障。如此次粤北之战，未因敌之猛进与损失重而瓦解，反而表现相当坚决，紊乱中尚能适时反攻（虽然主要是敌人自己撤退）。”^②肯定了余汉谋部在对日作战方面这样一些趋于积极的变化。因广州沦陷后，中共有120多名党员、数百名抗先队员先后进入余汉谋部工作，对该部情况的报告应该基本上是来自于在其内部的观察。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工作人员对余汉谋政治立场的观测并不十分准确，对这些地方实力军人随时应变的多面性估计不足。

四、“国军”的装备、后勤保障及指挥协同问题

（一）“国军”装备上的差距。战时“国军”的装备问题，应该是一个时时困扰着前线部队的问题。由于“国军”的装备来源多样、制式不一、配备不规范、补充不及时、保养不善等原因，常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影响作战效能的发挥。例如在具体战斗中，有时甚至会出现手榴弹半数甚至八成都不能爆炸的情况。“各种手榴弹有半数不能爆发，影响战斗之最后关头极为重要。”^③独9旅则报告，由于对弹药保管及效能未能注意，“至攻击时始发觉八二迫击炮弹及手榴弹等只有十分之二爆炸。”^④1944年第187师在水口岌岌一役的情况也很糟糕：“我预伏花生田之突击队目击我急袭火力奏效后，即投掷手榴弹（十六颗仅爆发五颗），乘机向敌冲锋，意图夺取战利品，卒因手榴弹未能奏效，而当面之敌及西岭等据点之敌又对我猛烈射击，难以接近。”^⑤因手榴弹质量太劣，以至于耽误战机，未能扩大战果，最后只能按原定路线撤回，可见弹药的质量十分不稳定。

“国军”由于装备欠缺而导致的攻坚能力差，差到甚至连剪断铁丝网的钢丝钳都不能满足需要，一个师只有20把左右：“攻坚困难。我军装备不健全，敌深沟高垒，我无法攻入。例如神冈、太平场、龙口等敌之据点，有铁丝网五至七重，我军每师铁丝钳亦不过二十余把，故屡次攻击敌据点，已无炮兵协力，又因铁丝钳无多，至滞敌火网下过久，而牺牲过大，无法达成任务。”^⑥这种情况，应该是令人很难想象的。在两次粤北作战等的耗损之后，余汉谋12集团军每个连平均轻机枪4—5挺，每个团重机枪16挺，迫击炮4门，步枪约500—600支。^⑦

通信不好，也常常会贻误战机。这个问题惠广战役时就已经出现，但始终未能得到解决。63军战后检讨称因“通信联络不灵，致指挥未能掌握。”^⑧该军在1939年底第一次粤北会战的战后检讨中，指出通信联络仍是一个大问题：“我部队通信器材缺乏，每在战斗最剧烈时，失却联络，以致不能掌握指挥。”在冬季攻势的战后检讨中，也提到通讯网未通，只能用步行来传达联络，结果“未能适时将敌人退却情况通报已占领谋人山之九一零团第一营迅即进出石榴花顶附近，以遮断敌之退路，以致攻击

① 「3.（自昭和14年4月5日至昭和14年4月8日）獅前市及花縣北方地区的戰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1772700、第104師団戦闘経過及教訓集 昭和13年10月中旬～15年6月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7册，佛山：广东省供销学校印刷厂，1987年，第73页。

③ 《陆军第一五二师抗战纪实》，“八、江西省定南、龙南诸役（1945年6月14日至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64。

④ 《独立第九旅广东淡水各战役战斗详报》（1942.2-194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49。

⑤ 《第一八七师五六〇、五六一团在广州外围及花县等地战斗详报》（1944年4月-1944年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28。

⑥ 《第十二集团军廿八年一月至十月作战经过概况》（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8542。

⑦ 《徐景唐呈蒋中正视察前方部队及各线防务情形并具申意见三项》，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526-081。

⑧ 《陆军第六十三军八年来抗战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49。

未克奏功。”^①因为通信手段落后，不能及时沟通联络，在第一次粤北会战的追击阶段，还发生了前来增援的中央军与粤军发生误会，自己人打成一团这种在电影中才会看到的场景：“中央军来了，他们也未获得通知，看见前面有人，便问‘边个’（谁）？对方答说‘打日本的’，这边一听，听成了‘大日本的’，因此立即散开，机关枪、迫击炮连连打过去，中央军也同样回击，打了半个钟头，双方从枪炮声中辨别出是自己人的误会，才停下火来。”^②

1944年7月第159师在英德、花县一带与敌作战时，因为已设置的电话线容易被敌人监听破坏，曾经电请长官改善线路，但“唯以时机迫促，该线尚未改善，线料尚未领得，致常因迁就请长官加以改善并请发给线料话线，使指挥位置不适战术要求。迨敌占领水边后，对上之电话通信即告断绝。专赖无线电报连络，耗时误机，莫此为甚。”^③直到1945年初在始兴的作战，通讯问题还是影响作战的重要因素：“通信联络不良，且通信器材缺乏，致战事发生，连络则中断，指挥不灵”。^④1945年赣南会战的战后总结也提到，“五、我军通信不灵活，致命令传达失时。如六五军攻击大塘铺、金钟山之役，一六零师行动未能协调，致失时机。”^⑤由此可见，通讯问题从始至终就是一个短板。

装备明显不如日军的另一表现是运输能力薄弱，这直接影响到作战能力的充分发挥和重武器的安全转运。比如在粤军部队中本来就配备不多的炮兵，因此大受影响，即无法很好保障炮兵的作战能力。

首先，在缺乏运输车辆的情况下，运输人手也供不应求。如战车防御炮营在1945年初曲江城防作战时发生的情况，为了能及时运输笨重的战防炮，需要“每连派载重汽车四辆、营部二辆共十辆以利机动敏捷，否则每连拨给运伕一百二十名，全营共二百五十名”，却逢第12兵站分监部暨各部队机关同时转移，运输人手不足，以至于“影响机动，发生绝大障碍。”如果遇到配赋弹药辎重数量过多，运伕来不及运输，“即以战斗兵充当力兵，弹未能携带，且增加士兵疲劳，影响战斗力量。”

其次，使用运伕运输有许多弊端，一是“战防炮如用伕运则须拆卸，但该炮拆卸则射击精度失效，且影响大炮寿命及有遗失零件之虞，故典令严禁拆卸。故派伕运输不若派车辆送为佳。”二是运输速度慢且炮易受损，尤其是在山岳地带，“战防炮之曲轴须以四人拽抬于羊肠小径，行道危险实甚，尤以夜间山地行军更不可能，若以运伕搬运因其不明火炮机构，任意冲击，则火炮易于损坏。故行运迟滞，每日仅行三四十华里。”^⑥因此，该炮营在曲江城及乌石、马坝附近的战斗及后来的转移中受运输的制约而发生诸多困难和危险，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反观日军方面则“运输迅速，利用优越交通工具、工兵器材，对于水陆运输，甚为迅捷。”^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二）作战协同问题。关于内部的指挥协调问题，惠广战役时就已经存在。当时的说法是部队成立不久，“致各级部队长缺乏协同一致作战之精神”。^⑧在第一次粤北会战时，依旧如此：“此次敌人北犯，广州附近寇兵抽调一空，而我西、北两江部队未能集中全力予敌以最大之打击。虽期间因作战指导上未能切合机宜，但各部缺乏互信心，彼此观望，致行动迟缓，未能缓急相应。殆难讳言。即在各军、各师

^①《第一五二、一五八师冬季攻势于广东银盏坳附近战斗详报》（1939.11—1939.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9314。

^②林廷华：《抗日战争时期“粤北第一次大捷”的真相》，《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广州：广东人民印刷厂，1963年，第144页。

^③《陆军第一百五十九师战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61。

^④《陆军第六十三军八年来抗战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49。

^⑤《第七战区抗战纪实及附录》（原档案署1938年9月30日，文件内容为整个抗战时期，因此可能为1948年9月30日之误），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72470-00020-001。

^⑥《第十二集团军战车防御炮营于曲江城及乌石、马坝附近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67。

^⑦余汉谋、王俊：《第七战区重要战役经过概况与检讨报告书》（1942年4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455。

^⑧《陆军第六十三军八年来抗战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49。

中此种心理亦极普通，以致团结未能十分巩固，一遇战事激烈，官兵即率尔脱离掌握，各自行动。此次一八六师良口之役即其一例。此后本军应如何加强团结心理，增高掌握能力，以发挥协同一致之效力，实为不可再缓之要图。”^①到第二次粤北会战时仍存在这样的情况，“我军协同动作，甚不确实，敌攻一点，毗邻部队，每多观望，予敌各个击破之机会。”而敌军“各兵种协同良好，连络确实。步炮协同及与空军连络甚为确实。”敌空军常在战斗前负责侦察任务，帮助核实“国军”部署、移动情况，作战时则配合对“国军”阵地及部队进行轰炸，对“国军”构成严重威胁。^②敌步炮之间常以约定的信号对“国军”的重要火力点进行攻击：“敌人向我攻击前进时，常以三角小白旗对空联络，如发现我轻重机位置时即插小白旗指示方向，后方敌之炮兵即对我轻重机位置猛烈射击。”^③

陈诚在日记中也提到他们不能配合：“粤军优劣点及应注意事项：一、优点：有决心，军民尚能一致，能得地利。二、缺点：没办法，统御办（事）差（各级均脱离掌握），不能协同（如北江作战，而东、西两江之坐视），情报不明，执行命令不确。”此外，还存在将领之间互相牵制的情形，“余汉谋对于邓龙光积不相容，亦须予以调整，不然恐误事也。”^④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部是第四路军内“旧四军系”将领中实力最为雄厚的，对此余汉谋始终存有戒心，企图削弱其势力。粤军内部团体的畛域之分，多少会影响到战场上的协同配合。协同不力也与兵力部署存在一定关联。桂南会战后，邓龙光向蒋介石抱怨，两阳和四邑的防务虽有兵力部署，“然实际每一单位实力，或仅两营或不足一营，有名无实……控置于四会附近暂二军之一旅，战区又不准调用，事实上守备兵力自两阳以迄清远以南绵亘四百余公里之正面，正规防军只六十四军六个步兵团而已，仅此六个步兵团虽任何巧妙部署，均难期其适当。”因而“恳准将调驻英德之暂二军一师一旅，归还集团指挥。”^⑤

五、“国军”士兵的体质与征兵弊端

对于“国军”士兵而言，对日作战除了比之前国内军阀间的战争更为残酷和危险，生活也异常艰苦。一份档案显示，粤军正规部队的主要给养中，只列了两项，一项是大米，另一项是“盐”，叫作“军盐”，^⑥其余的副食则很难保障。因为生活差，士兵体质不好，影响战斗力，一般士兵作战三天之后体力基本上就难以坚持了。“我官兵体力欠健，战三日以后精神疲乏，士气顿减。嗣后我军对于平时之营养及锻炼问题亟应注意。”^⑦

余汉谋曾报告：“查士兵多患疟疾及烂脚，每周约百余名。且物价高昂，韩江米价巨涨，每元仅购三斤余，士兵食粥度活，营养益觉不足。”^⑧后来也常常报告缺粮问题：“粤省素为缺粮省份，军粮筹补多仰给于邻省，故对本战区部队现品补给在二十八及二十九两年度或以屯粮缺少未能照额付拨或拨付地点遥远，运输困难，而代金自购部队更以米价高涨购买复极困难，因难两饱，颇足影响作战指导。”^⑨

① 《粤北战役经过概况》（1940年1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701-00065-001。

② 余汉谋、王俊：《第七战区重要战役经过概况与检讨报告书》（1942年4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455。

③ 《第六十五军及一五八、一八七师冬季攻势于源潭、琶江、横石、高田等地战斗详报》（1939.12-1940.0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9315。

④ 《陈诚先生日记》（一）（1940年1月7日、8日），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324页。

⑤ 《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1941.10-1941.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4653。

⑥ 见《民国三十四年元月二十六日第十二集团军战车防御炮营第一连粮秣损失表》，《第十二集团军战车防御炮营于曲江城及乌石、马坝附近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67。该表附注称：大米之外，“职连军盐原有数系九月份领一0六市斤，卅二年度领周转盐七五市斤，合共一八一市斤。除元月份官兵已食军盐廿六天外，计尚存九十九市斤九两六钱，元月廿六号晚奉令突围，以夜间行军不便，故当场焚毁。”

⑦ 《陆军第一五二师抗战纪实》，“八、江西省定南、龙南诸役（1945年6月14日至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64。

⑧ 《余汉谋电蒋中正陈报盘据广州之敌沿粤汉路北犯，与该六二军在银盏坳、源潭附近相持，及该部给养补给兵员缺乏等近况》（1939年12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200-00054-294。

⑨ 《七战区余汉谋军事情报及作战计划等文电》（1941.10-1941.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4653。

邓龙光 1942 年 11 月 3 日给蒋介石的函呈中也提到物价太高，士兵生活艰苦。邓龙光说他奉命校阅战区的 64 军、暂 2 军，官兵精神及学术尚好，“惟以物价高昂，官兵营养不足，体力甚差，引为深忧。”^①

平时供应尚不充裕，在作战过程中，后勤保障也不能适应战斗部队需要，对作战影响较大。159 师 1944 年 7 月粤北英德作战时，常连续几天断炊，“此次师进出禾云、大洞后，盐粮补给即感不继，而副金代金常逾多时始行补发，于官兵健康及战斗精神影响至巨。尤以战地之空舍清野，常数日不得粒粟”。^②有时又因为来不及撤退而焚毁军粮、军盐，在曲江保卫战中，第 12 集团军战车防御炮营第一连所焚毁的粮盐差不多是原库存的一半左右，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供应的短缺，直接影响到官兵的生活。^③

在卫生健康方面，由于部队的疏忽，加之药品缺乏，以至于“给养不足，冻饿病伤者充斥于途，对于士气上影响甚大。”^④1940 年 8 月，新任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徐景唐出巡前方部队后向蒋介石报告，士兵患病者在 5%—10% 以上，主要是疟疾、痢疾、溃疡、夜盲四种，前两种如果说是战争环境饮饮食水不卫生所导致，后两种则完全是因为营养不良引起的，且医护和药品也均缺乏。试想一下，部队经常夜间作战和行军，夜盲患病之人，何能适应？而且营养好免疫力强的话，前两种疾病也将大大减少。据徐景唐报告，当时每兵每月主副食费规定为 7 元，1 元可购米 2 到 3 斤，即使全部用于购米，也只有 21 斤。被服方面，夏衣平均不到两套，且质料薄劣，破烂甚多，至于蚊帐、军毡、棉衣则十缺七八，过冬棉衣有的要到次年四五月才能领到。至于“将来如何补充，多谓迭呈军政部请示，未奉回复。”^⑤士兵处在这种缺衣少食、缺医少药的条件下，要承受体力与意志均要求极高的对日作战，在穷凶极恶的敌军的飞机、大炮、燃烧弹轰击的枪林弹雨之下，拼死奋斗，其艰难困迫之程度，不难想见。

“国军”在战斗总结时均称己方士气旺盛、斗志高昂。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反映了许多国民党爱国官兵在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但另一方面，因为战争的残酷性和危险性，部分士兵的征集带有强迫性，当然也因为国民党军队内部在征集方式、教育、管理、训练、官兵关系等等问题上存在的缺陷，“国军”士兵潜逃数量较为惊人，似乎与上面的总结并不吻合。

据余汉谋给蒋介石的报告，其所部的减员非常厉害，至于减员的原因，一般人可能想不到，排在第一位的居然不是因为战斗伤亡，而是“潜逃”。排第二位的，似乎是“开革”（开革的原因待考）。第三位是“疾病”。下面是余汉谋 1941 年给蒋介石的一份报告：

职战区 8、9 月份伤亡损耗情形汇呈如下：甲、8 月份。子、十二集团军：一、六二军负伤 3 名，阵亡 1 名，潜逃 667 名，开革 124 名，病故 63 名；二、六三军负伤 30 名，阵亡 38 名，失踪 9 名，潜逃 844 名，开革 486 名，病故 15 名；三、六五军潜逃 816 名，开革 168 名（含在医院数），病故 104 名；四、独九旅潜逃 101 名，开革 48 名，病故 48 名。乙、9 月份。子、十二集团军：一、六二军负伤 89 名，阵亡 68 名，失踪 21 名，潜逃 696 名，开革 138 名，病故 34 名；二、六三军潜逃 715 名，开革 443 名，病故 157 名；三、六五军负伤 37 名，阵亡 683 名，失踪 51 名，潜逃 810 名，开革 464 名，病故 79 名；四、独九旅潜逃 141 名，开革 25 名，病故 87 名。丑、闽粤赣边区军：一、预六师负伤 96 名，阵亡 83 名，失踪 4 名，潜逃 825 名，开革 64 名，病故 12 名；二、独立廿

^①《邓龙光呈蒋中正报告校阅高要四会等地驻军和暂编第二军相关情形》，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102-00083-009。

^②《陆军第一百五十九师战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61。

^③《第十二集团军战车防御炮营于曲江城及乌石、马坝附近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67。

^④《粤北战役经过概况》（1940 年 1 月 8 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701-00065-001。

^⑤《徐景唐呈蒋中正视察前方部队及各线防务情形并具申意见三项》，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526-081。这次视察，余汉谋、徐景唐均有报告上呈蒋介石，军政部批复自 8 月份起，每兵增发主食补助费 8 元，情形略有改善。只是战时物价上涨过快，尤其是在 1940 年之后，故这个补助很快就失去实效。其后粤省粮荒严重，米价更像脱缰的野马飞涨，官兵的补助始终滞后于物价。战时财政太困难，上下皆难。

旅，负伤 24 名，阵亡 21 名，潜逃 62 名，开革 28 名，病故 28 名。^①

按照这份报告，余汉谋部 12 集团军及闽粤赣边区军 8、9 月份潜逃人数为 5677 人，开革为 1988 人，两项合计平均每月近 4000 人，如果每月均是如此的话，则一年高达 4 万多人（七战区员额为 23 万，实际上 18 万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1942 年 3 月，独 9 旅旅长容干向蒋介石报告该旅 1、2 月兵员情况：“子月份士兵开除四二名，病故五二名，潜逃一八一名。”^②“丑月士兵开除三八名，病故三六名，逃亡一一九名。”^③

除了士兵，一些军官畏战避战，甚至临阵潜逃就更为恶劣。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第 186 师师长赵一肩畏战提早脱离战场，后被撤职他调。157 师 940 团三营营长陈超明战斗打响后失踪，部下报告其阵亡，结果半年后发现人在湖南，是临阵逃跑了。^④在日军北进突破“国军”第一道防线之后，余汉谋 12 集团军八九个师的主力，除黄涛 62 军在牛背脊腰击敌人，使敌人退路和给养受到威胁之外，其余大部退避到英德、佛冈间的大山中打转，昼伏夜行，不与日军接战，放敌长驱直入，直逼曲江、韶关。在银盏坳之战中，“国军”因避免与日军接触，给日军留下了撤退之机，“英德、佛冈山区间国民党九师之众，没有一师在敌人后撤时进行追击。困在英德东部大镇一带大山中的部队有士兵看见日军由大镇向河头行动，架起机枪准备袭击，有军官则以未奉命令加以阻止，还说万不能让敌人发现目标，自找苦头。”^⑤可见当时英德、佛冈山区间的“国军”心理。在桂南会战后，粤系将领、第 37 集团军总司令叶肇亦因违令避战，贻误战机，被取消集团军番号并撤职。^⑥

究其原因，除了贪生怕死之外，张发奎认为是由于在本省作战，容易逃亡返乡，提出应与他省交换壮丁：“两粤子弟，赋性强悍，过去在外转战，本属所至有声，惟近来各在本省应役，流弊渐滋，一经战斗，甚至挟械伙散，各归乡里。影响作战实力至巨。职意在两粤参战部队缺额最好由其他军区拨补，而将粤桂两军区征募兵额拨补其他战区部队，庶戢逃风而增战力。如蒙俯允，恳饬部照办。”^⑦

关于在本乡作战不如异地作战易于督率激励，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李为之在调查惠广战役失利原因的报告中也指出，粤军在本省语言相通，想去哪里都方便，回家乡变卖装备还可换钱。如果去到外省，语言不通，人生地疏，自然不敢轻易离开，“如昔之十九路军，今之薛李叶（指出省作战之薛岳、李汉魂、叶肇）等部，且多为粤中新兵，其作战成绩彰彰可纪。此无他，盖身入重地，得良好指挥督战，认真实行连坐法，有进无退，固势所必至也。”但惠广战役的失败与各级官佐贪生怕死、毫无斗志有很大关系，据从惠州、淡水等地逃亡回来的士兵说，他们连草鞋都没穿好，一听到枪声，长官已经不见了。又听闻有连长对排长说自己要去要子弹，就再也没有回来，或是有连长说自己去找船一起渡河，结果自己坐船先跑了，更别说底下的营长、团长。“盖各人腰缠既丰，又无长官督战，且平日军纪不修，缺少国家观念，无怪有此现象也。”^⑧关于“国军”兵役中存在的问题，李为之作为桂南会战后派赴该战区的点验主任委员，向蒋介石报告了这样的情形：“查各师之补充兵由师管区拨补，既多孱弱不堪，复无相当训练，自各乡征募归来，即禁锢于营内，如监犯然。拨补部队则长途跋涉，露宿风餐，疾病乏药，寒暑

①《余汉谋电蒋中正第七战区 8 至 10 月各部队官兵伤亡、失踪、潜逃、病故等损失情形》（1941 年 11 月 21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200-00071-049。

②《容干电蒋中正报呈独立第九旅一月份士兵开除病故潜逃阵亡等情形》（1942 年 3 月 8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200-00074-289。

③《容干电蒋中正该旅二月份士兵开除病故逃亡等情形》（1942 年 3 月 26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200-00074-214。

④李友庄：《伯公坳与牛背脊战斗》，《粤桂黔滇抗战》，第 111 页。

⑤林廷华：《第一五八师银盏坳之战》，《粤桂黔滇抗战》，第 114 页。

⑥《白崇禧电蒋中正已电张发奎办理惩处桂南作战不力及奖赏有功将领》（1940 年 3 月 7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291-035。

⑦《张发奎呈蒋中正两粤部队缺额请由他省军区拨补等》（1940 年 8 月 3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25-174。

⑧《军事参议院李为之摭陈惠广失陷之由及粤政得失所在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8418。

无衣，沿途倒毙。结果部队接收时，约得半数，再除老病外，实得壮丁三分之一。公家费巨量金钱，所收效果若是。”他认为必须改变此种拨补方式，以“减少士兵逃亡”。^①故前述“开革”类减员，有部分很可能就是因为老病体弱、不符合最基本要求者。

“国军”兵员征补中本身存在的弊端，是造成士兵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据战时在广东曾任岭南及普丰师管区（负责招募增补）司令的曾其清回忆，入营士兵里40%以上是“猪仔兵（兵痞流氓）”，不断地冒名顶替然后逃亡，以此为业。其他入营的壮丁也是被迫的，也想逃跑。军政部虽然有对冒名顶替别人当兵为业者的处罚措施，仍不能挽救新兵的逃亡风气。于是“视新兵如囚犯，严加看守，甚至捆绑，以防其逃亡。接兵部队对新兵越加虐待，壮丁越害怕当兵，新兵越想伺机逃亡，互为恶性因果，征兵工作更加困难，弊端也更多。”^②

生活艰苦，温饱亦不能保障，或者是士兵逃亡的另一原因。据余汉谋称，米价昂贵，士兵吃不饱饭，“乃饬各师在结余项下月增主食费三元，亦仅一粥饭，未能果腹。而各部结余之款，亦垫发殆尽。入秋不雨，米价益昂，每元仅及二斤。……月来各部士兵逃亡相继，若非速谋救济，恐难维系军心。”但对于余汉谋的说法，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主任的李济深似并不完全认同，他就此事给蒋介石的电报表示：“查桂前线粮价不高，后方亦有屯积，军粮充足，补给不成问题。惟粤方部队补给较难，究其原因，殊不单纯。遵当征集余长官、陈总监、军政部桂林办事处等各方意见，俟核实拟具妥确解决救济办法后，再行呈核。”^③原因究竟如何不单纯，李济深未明说。不过此前在余汉谋部的经费来源问题上，曾养甫曾话里有话地报告蒋介石，说他自1936年任广州市市长兼省财政厅厅长以来，兢兢业业，为余汉谋提供了大笔经费，从未怠慢，“综计每月拨付军费为粤币四百九十余万元，临时特别各费在外，又救国公债经募国币一千六百余万元，除解中央五百万元外，概留充粤省国防之用。又本省国防公债国币一千五百万元，购械费募得国币七百余万元，亦全数拨充粤省国防经费，其余由省库支出国防币款尚约四五百万元。”^④但这些钱究竟有多少投入了国防建设？有多少用在了加强广东的防务上？余汉谋部的经费使用情况真相如何？虽然这些现在已很难查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给蒋介石的报告不可能全是真话。多年之后，战时的省主席李汉魂在其回忆录中，就称粤省的军粮问题有不少是由军方（指余汉谋七战区及第12集团军）人为因素造成的，如在1942年春夏之交，军方“在我已交军粮十万大包之后，又要省府收购十二万大包粮食。人民实在已经无力负担，而省府高价购进，低价供给军方，每年又亏折数千万元，也难以承担。更叫人难以容忍的是，军方不仅虚报名额，而且出卖军粮牟取暴利。经我多方周旋、上诉，委座电令粤省军方不许再向本省征购军粮。”^⑤当然，李汉魂的话也不能全信，自其1939年初回粤主持省政之后，就与余汉谋明争暗斗，“乘掌握财政税收，师管区等，都限制余之补充。在粤北战役后更加大骂余无用……甚至倡解散余部。李又亲到战区巡察，到处散布反余空气，用救难赈灾削余威信，扩大自己影响。”^⑥可以说他们是各有私心，各有盘算，相互掣肘。这对广东正面战场的抗战，不免会造成消极影响。

“国军”如此，日军的情况又如何呢？日军是在异国作战，不大可能发生拖枪逃跑卖钱，或者顶替应征，寻机潜逃的情况。但他们的兵员补充也有问题，如第一次粤北会战日军18师团的战斗详报就

^①《李为之呈蒋中正报请充实各师员兵清查旷饷及提高官兵待遇及改善拨补办法》（1940年9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26-033。

^②曾其清：《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广东兵役》，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5辑，1962年内部发行，第153-154页。

^③《余汉谋呈蒋中正有关全军命脉民生至计者之米粮粤钞等点呈核等文电》（1940年10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80200-00526-117。

^④《曾养甫致蒋介石报告广州失陷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8433。

^⑤王杰、梁川主编：《枕上梦回——李汉魂吴菊芳伉俪自传》，第76-77页。

^⑥《张文彬关于广东工作报告》（1940年3月7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37册，第104-105页。

称他们士兵的体质较差：“8月补充的补充兵体格极为不良，体重50公斤，身高只有大约1.5米。”他们的粮弹配备则较优：“弹药小型枪每人120—180发，根据体型适当调整。粮食精米3升（1天5合，6天的量），压缩干粮1天的量。盐20天的量，味噌粉15天的量，各人携带行进。”“人均负担量约为30公斤以下”。^①这里可以看出弹药的配备相当充足，不是弹药不够，而是看体能能负重多少。可见日军的情况比“国军”要好，但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强大，从这批新兵的体质来看，就非常一般。另外，这种配备能够持续作战的时间大约是一周左右，超过一周，粮弹即不能保证。

七战区在与敌周旋一段时间之后，也渐渐掌握了敌人的规律，在应对上积累经验做出调整，抵抗能力有所增强，称敌人这种战法为“流窜战法”，清楚知道“窜敌携带粮秣约为一周，至其补给仰诸空军，则为数甚微，仰诸就地征补，又因为深入流窜，究为一线前进，征集尚难，且意在迈进，迫于时间，亦难频事抽征与停住搜集，兼以我之空室清野，敌亦难再行取得，故其生存力，仅约一周耳。”而根据相关经验总结出了较为切实的应敌之策，提出此后师以上各级指挥部，均应力求控置强大预备队，团以下各部队，均应力求纵深配备，采用“逐次抵抗与诱敌深入诸手段”，以内线作战之要领，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打击，或逐途消耗，俟其分窜至顶点，已精疲力竭之际，而集中我之兵力，予以围歼。”^②

六、华南正面战场形势的变化与民众对军队的态度

1939年底第一次粤北会战时，“国军”的感觉是“敌人攻击精神相当旺盛，其欲攻击某一点，不惜艰难险阻任何牺牲，足为我军之模范。”^③1942年初独9旅与日军作战时，已发现敌军“士卒衣物均破烂不全，足征敌经济日渐贫乏。”^④而到1945年上半年在粤北赣南的作战，“国军”的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日军“兵力装备较劣，战斗能力较差……敌兵士气颓丧，多怀厌战心理。”而我方则“各部队能独立作战，士气旺盛；我守备部队能沉着应战，达到迟滞敌前进之任务；我官兵能刻苦耐劳”。^⑤

1944年，广东部队第一次得到空军配合作战，取得战场主动，对士气鼓舞很大。之前的战报几乎每次都是日军作战有飞机、火炮配合，“国军”阵地因此被毁，明显处于被动和劣势。而自1944年7月三水老鸦冈之役开始，“国军”作战开始有空军支援，这种变化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当时粤汉南段的日军企图策应湘北作战，于是占领北江西岸老鸦冈、鹿和沿江一带据点掩护其东岸部队，159师留守西江之476团于7月8日派兵一营，与156师466团之一营围攻老鸦冈敌重要据点，该部利用空军掩护及轰炸一举攻占敌阵，将老鸦冈略取。毙敌小队长以下30余名，战利品有轻重机步枪等。“本师抗战八年得空军之直接协助此乃第一次，对士气之振奋特大。”^⑥

这些转变的到来，也表明日军在中国的横行肆虐已是强弩之末，离侵略者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

在屡次战斗中，“国军”逐渐意识到发动民众的重要性，在调整策略后，其作战也得到了民众的配合与帮助。首先是民众武装和自卫队的积极配合。如1939年9月，日军发动对广州外围的扩张作战，1日上午3时，敌步骑炮2000余由蛇头岭向蒋村、棠下开进，到达潭村，拟将“国军”901团围困。时任国民党增城县长周天禄派出地方游击武装集结第三中队与“国军”协同作战，敌攻击开始后，“国军”正规部队与游击武装分头迎击，在鸡心岭一带激战至天明。2日在凤凰山、狮岭一带，增城集结第一中

①「第4.集中及永漢攻略戦並茶壺附近の戦闘（自12月14日至12月22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1763100、第18師団翁英作戦戦闘詳報 昭和14年12月14日～15年1月10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敌流窜战法之研究及对策》，余汉谋、王俊：《第七战区重要战役经过概况与检讨报告书》（1942年4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455。

③《第六十五军及一五八、一八七师冬季攻势于源潭、琶江、横石、高田等地战斗详报》（1939.12-1940.0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9315。

④《独立第九旅广东淡水各战役战斗详报》（1942.2-194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249。

⑤《三十四年六月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广东翁源、连平、和平暨江西三南战役》，见《陆军第六十三军八年抗战纪实》，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49。

⑥《陆军第一百五十九师战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761。

队协同“国军”904团守凤凰山，敌进攻时沿途所经各乡，“均遭我壮丁队、自卫团、杀敌队截击。”^①

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民众踊跃帮助军队截击日军，“此次民众自动起来袭击敌人的事迹很多，敌人败退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有赖于各地民众不断的四处截击。如佛冈的某村乡民，截击敌人，曾俘获敌兵及枪械，连大炮也缴获一门，打死敌人甚众，而乡民壮烈牺牲者，亦有六七十人。”^②第四战区在战后总结中称，军民合作是胜利的主要原因，“本省军政长官数月以来致力于军纪整饬、民众训练，军民间情感日臻密切。故此次作战虽在交通运输极端困难之时，犹能使军食无缺，轻重伤兵官兵多数转运于后方，端赖一般民众远道输将。”在作战中民众直接间接参加杀敌者甚多，琶江一带有3000余民众随同军队作战；翁源某村虽仅有步枪三四支，亦英勇抗敌，至死不屈。当敌人撤退时，民众到处予以袭击扰乱，使敌人遗弃大量军械，发生混乱，“所加以精神上之打击，尤为此次胜利最大之收获。”^③

其次是战地救护和战地勤务等方面的配合。在第二次粤北会战中，“国军”186师在从化鸡笼冈战斗中取得了歼敌250多人的胜利，负责具体指挥的副师长张泽深后来回忆，“我们在鸡笼冈作战的整个半天，很感谢和睦之乡全乡老百姓，送粥送茶送饭到火线。”^④战后，第62军军长黄涛也向余汉谋转呈了该部157师（师长练惕生）关于水头、天西两乡民众积极辅助军队作战的情形：自5月24日作战开始，该师即以水头军民合作站为办理一切后方勤务、前线一切供应及收容救护输送招待伤兵的总机关。自5月24日起，至6月10日止，水头乡参加战时服务的民众，有输送队671名，担架队375名，向导15名，卖给军队食米9475斤，募赠慰劳薯干1017斤，制送担架、竹床56张。天西乡有输送队619名，担架队288名，向导13名，卖给军队食米5100斤，募赠慰劳薯干931斤，制送担架、竹床48张。“且该输送民夫，一经派遣来部，即踊跃挑运子弹粮食赴前方，并多有一日运两次者，毅力热忱，实足矜式。此次本师血战经旬，卒能摧毁顽敌，达成任务，揆厥原因，一方固有赖于前方将士用命，他方实亦有赖于两乡民众之协力。”^⑤

再次是道路破坏与交通修复等方面的大力配合。第七战区在关于两次粤北会战能取得一定胜利的总结中，认为除了针对敌军的进攻战略分别做出相应的战略战术的应对之外，“所有助于致胜者，则为交通破坏之彻底，与空室清野、军民合作诸事耳。”^⑥这个总结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因为在日军的战斗详报中，也多次提到中方的交通破坏对于其作战造成了极大的困扰，1939年9月在花县鳌头圩的作战，“师团彻夜追击，因为道路及桥梁被破坏，追击迟缓，不能前进。”该部在战后总结时特别提出要注意兵要地志尤其是作战线路的调查，“中国军队对道路进行彻底的破坏，因此我们在制定作战计划前，要对此进行周密的调查。”因为该次该师团主力在确定作战路线时，使用的还是4月份作战时收集的路况调查资料，而未能了解到“（国军）已经挖开了道路、破坏了桥梁，设置了一百多处障碍，给追击带来极大妨碍”。^⑦日军的进攻，多次因道路破坏受到阻延。第一次粤北会战时，敌18师团在进攻筹备阶段就提到“眼下增城以北的主要道路皆被粉碎破坏”，“为了快速突破被粉碎破坏的险路，参照以往的经验，不借助工兵等的援助，各队伍必须在行进过程中修补道路，各部队需编成若干作业队伍，并负责人员的训练。”“永汉沿线道路的修补由工兵5中队（工兵第12联队及独立工兵第15联队）负责，基于工兵团

① 《第二游击区第二游击纵队第五次出击战斗详报》，广州市番禺区档案馆藏，档案号：A1.4（1）/1/16。

② 李汉魂：《粤北大捷与政治动员》，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粤北会战中公务员与民众》，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第二科，1940年，第4页。

③ 《粤北战役经过概况》（1940年1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文物，008-010701-00065-001。

④ 张泽深：《干戈集》，台北：1983年印刷，第14页。

⑤ 《奖励良口附近各乡绅民协助战役》（1940年），台北“国史馆”藏，行政院档案，014-090501-0903。

⑥ 《第七战区重要战役经过概况与检讨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6455。

⑦ 「9.（自昭和14年9月2日至昭和14年9月9日）夏季作戦に於ける花縣及鰲頭墟附近の戦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1773300、第104師団戦闘経過及教訓集 昭和13年10月中旬～15年6月4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长的判断，完成需要 5 日。”^① 日军专门的工兵部队也需要 5 天才能修复这一路段，亦可见破坏的显著效果。敌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也报告“牛背脊圩—吕田墟之间的主要道路约有十米几乎都被破坏得不留原形”，^② 而交通破坏主要依赖民众和地方的配合。第 12 集团军的战后总结即谈到民众配合的重要性：“我军于作战行动中，关于给养品之调办，粮秣之运输，道路之破坏或修复，以及行军向导等，有赖于民众协助者至多。”^③ 面对共同的民族敌人，民众对于上阵杀敌的抗日部队，确能做到同仇敌忾，热心帮助，甚至躬冒矢石，踊跃输将。这也是华南正面战场能够长期坚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七、结语：“细节决定成败”？

现代战争是国与国之间实力的全面的、全方位的较量。就中日战争的全局、中日两国的国运与未来走向、中日两国人民的福祉而言，战争的性质，总的、全局性的战略，宏观的运筹和谋划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的。但就某一个区域某一个阶段的作战，某一场战役、战斗而言，具体的战术，具体的装备水平与能力，参战各单位的配合与协调，官兵的基本素养、意志、训练与体力，后勤保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其他具体而微的方方面面，就显得极为重要了，甚至是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细节决定成败”。

从华南正面战场作战的种种具体细节来看，“国军”与日军相比，尽管也有不少优点，但不得不看到，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相当差距。这既有由于两国实力不同导致的大型、重型装备，运输机动，武器制式性能等客观方面的差距，例如每次作战日军一般均有飞机、大炮、燃烧弹（“国军”多支部队提到燃烧弹对阵地的严重威胁）的配合，在火力上构成明显优势，对“国军”造成极大压力，日军一般有装甲车、汽车、机动船艇、马匹输送，机动性较强，通讯联络装备明显优于“国军”等。也有因为军事素养、军事技能、军事训练不足，精神意志不顽强，派系纠纷所导致的差距。在战术的谋划与安排上，在很多细节上，准备与执行不精心、不细致、不严谨、不到位，而往往丧失主动、功亏一篑，不能达成具体的作战目标。

本文的基本史料，是华南地区“国军”不同层级的战斗详报，就笔者的阅读体验，战区指挥官、集团军的报告比较宏观和全面，固然需要重视，但各师、旅、团、营等中层以至基层作战单位的战斗详报和总结，也有不少生动鲜活的内容，能够透露一些比较真实的细节。阅读战史资料，千万不要轻视基层单位的战斗详报。这些战斗详报，都是“国军”各作战单位在战斗结束后的总结和分析，是对每次作战成败得失、优劣短长的归纳比较，有的总结比较客观到位，对于我们了解作战部队的具体作战过程、战场情况与敌我优劣，提供了比较直观的内容。尽管不一定全部可信，但经过仔细甄别和比较，还是可以找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从细节的比较上，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国军”在哪些方面有优势，哪些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与差距，哪些方面容易受损吃亏。也使我们能够读到另一个侧面的、较为真实鲜活的抗战历史。

（这篇文章得以完成，华南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语系副教授吴佩军，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陈柏成、硕士生黄芷馨也有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 「第 4. 集中及永漢攻略戦並茶壺附近の戦闘（自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2 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31763100、第 18 师団翁英作戦戦闘詳報 昭和 14 年 12 月 14 日～15 年 1 月 10 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② 《炮兵第二联队战斗详报》翁英作战战斗详报（第 21 号），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藏，JACAR（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 C13070246800，1939 年 12 月 18 日至 1940 年 1 月 5 日。

③ 《第十二集团军作战经过概况及经验教训》（1940—19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七八七—10176。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

——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尉佩云 郝 平

[摘要]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历史意义 历史文化 历史理性 叙事主义 约恩·吕森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4-0123-08

一、引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为标志，发生在史学理论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导致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被不断消解。进而，历史统一体概念、对过去的整体性解释也被小写历史、历史意义的多元化解释所替代。譬如，在意义问题上，海登·怀特就说：“如果我们生活的意义不是一种而是不同的多种意义，那么我们能够生活的更好”。^①“语言学转向”以来史学理论的发展一方面拓展了历史思考的领域，使得那些原先不证自明的预设前提被历史学家所重视和批判；但另一方面，由此而来的对过去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解释的坍塌，导致我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始思考“人类共同体”的“共同命运”时，显得词不达意——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甚至说：“谁言及人类，谁就在欺骗”。^②这在今天是一个如此现实的问题，历史研究在现代社会整体性的价值考量、人类对自身命运走向的整体性反思，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语境。

作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阵营一员的安克斯密特也坦言，我们不该忽视的是后现代史学理论在两个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族意志视野下德国历史理论的变迁研究”(21CSS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尉佩云，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郝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太原，030006)。

①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5, no.2, 1966, p.134.

② Sarah Pourciau, “Bodily Negation: Carl Schmitt on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sue*, vol.120, no.5, December 2005.

面是失败的：首先是对表现物及其表现之间关系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它并没有发展出一套技艺精湛且成熟可用的实践理论；其次，后现代理论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现代主义最为重要的信条，即过去一个世纪当中形成我们经验世界和我们用来理解世界的知识、理论、语言、叙事等所有的康德哲学及其变体形态。^①而怀特的自述是对上述安克斯密特所指出的第二条恰切的证明，他说：“我将自己的研究纲领看做是现代主义的。我所有的思想结构、我自身的发展都是在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②

德国史学理论家约恩·吕森（Jörn Rüsen）作为大陆哲学知识背景的代表性学者，秉持着德国历史哲学传统，历史意义（Sinnbildung）和理性逻辑依然是他史学理论体系的拱心石。^③对“语言学转向”以来的总体性学术语境，他颇诙谐地说：“现今几乎没有比思考历史意义并与理性（Vernunft）具有密切关系更不适合时代潮流的了。这两者看来已经信誉扫地，以至于任何力图将它们作为历史思考的范畴并恢复其名誉的尝试显得没有出路，也就是说，这种尝试既无意义，也不理性。”^④吕森认为，当代史学理论中，一方面是科学理性主导的认识论的诉求，另一方面是审美和诗化策略与文本性的发展。就这两方面关系而言，体现为一种失败的“两性结合”（hermaphrodite）和文化功能的中断。^⑤如何消解这种“精神分裂”并重塑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文化活力，成为当代史学理论的重要议题。

二、历史意义的出现

就史学理论研究而言，历史意义是一个传统的中心问题。^⑥我们所理解的整体的、本体论的“历史”过程已经通过事件的排列、时间的安排以及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和精神结构参与形成了一个意义过程。这个意义过程同时是一个具有选择性的过程，涉及历史学家的主观选择和什么能够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之中并被整合起来，反面的例子就是历史时间中那些没有姓名、没有痕迹的普通人和大众，而他们确实曾经成为历史塑造的积极主体。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的前言中说：“社会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已经表明，普通大众虽然是历史过程的牺牲品和沉默的证人，但他们也是历史过程的积极主体。因此，我们必须发掘‘没有历史的人民’的历史——‘原始人’、农民、劳工、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少数族群的鲜活历史。”^⑦在此，沃尔夫语境中的“历史”很明显是一个包含意义的历史过程的表达。他之所以认为“没有历史的人民”应该被书写，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真实又原始的历史进程中不存在，而是在一个具有意义赋予的历史过程中没有留下存在过的痕迹。这样一来，没有意义的历史过程或时间进程并不成为一个后来历史学家处理的对象，也就成为“没有历史的人民”。这些“没有历史的人民”的活动和苦难痕迹随着时间的流逝进入“万古如长夜”的状态之中。

① Frank R. Ankersmit, “Die drei sinnbildungseben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 in Klaus E Müller, Jörn Rüsen (Hg.), *Historische Sinnbildung—Problemstellungen, Zeitkonzepte, Wahrnehmungshorizonte, Darstellungsstrategien*, Reinbek, Rowohlt Enzyklopädie, 1997, S.115.

② [波兰] 埃娃·多曼斯卡主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页。

③ 历史意义的德文表达一般为四个语义表现形式：Sinnbildung,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r Sinn, Historische Sinnbildung。在这些概念中，其核心词干都是 Sinn。涉及跨语言和语境的历史术语翻译时，英文写作中一般将 Sinn 翻译为 sense 或者 meaning。在吕森组织的“历史基本概念反思”（Conference on Basic Terms of Reflecting History）系列项目论文中，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

④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in Klaus E Müller, Jörn Rüsen (Hg.), *Historische Sinnbildung—Problemstellungen, Zeitkonzepte, Wahrnehmungshorizonte, Darstellungsstrategien*, S.17. 后来收入 Jörn Rüsen, *Zerbrechende Zeit. Über den Sinn der Geschichte*, Köln: Böhlau, 2001.

⑤ Jörn Rüsen, *History: narration—interpretation—orientation*,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5, p.130.

⑥ 关于国内学者对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研究，可参见何兆武《历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刘家和在《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一文中对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历史理性问题做了分析，他在文中区分的“历史理性”和“史学理性”可以视为是和德文的“Vernunft”与“Verstand”相对应的概念。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有：韩震：《论历史理性主义》，《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彭刚：《历史理性与历史感》，《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陈新：《简论历史理性与历史叙事》，《学术研究》2012年第12期；董立河：《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理性与史学实践》，《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⑦ Eric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p.2.

所以，历史意义包含着人类的欢乐悲伤等主观的感情活动，进而言之，它更包含着人类的目的意志和主观期望，历史意义的存在和人类的主观目的意志是分不开的，意义天然地具有历史目的论内涵。^①约恩·吕森为《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撰写的“历史意义”词条就写道：“历史意义被理解为人类历史时间进程中的一种特性，由此让客观发生的事件、行动者和参与者的主观目的及与解释它的历史学家联系起来。在回忆的文化实践中，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论证和命名对于过去的人类行为的意义预设性，意义源泉首先便是宗教、道德和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要求。”^②

然而，历史意义在现代社会和历史哲学本身的发展中，不断的祛魅和现代性的发展逐渐使其成为一个问题。对此，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但是现在，人们对待意义就像对待具体特殊的行动目的样，用意向机制和有组织手段的机制来追求它，结果是，似乎意义本身从人的世界分离出来了，人什么也没剩下，除了一条无休止的目的链条之外，在其过程中，所有过去所成就的意义都不断被未来目标和意图取消了。”^③分析阿伦特的论述，可以看出意义由于“从人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导致“让那个整体的无所不包的过程变成了无意义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意义具有了主体性，从而使得其从先前这个未经质疑的、预设性的、历史统一体之中，作为其中一个维度分离开来。意义成为一种被从世界整体中提取出来的、具有分离性的一个存在，一个单独的人类命题。而此处意义存在的悖论是，正是因为意义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出了问题，所以它才作为一个单独的命题在历史哲学层面被提出来。如果没有近代哲学在主客体上做出的区分和现代社会的祛魅带来的建构性的冲击，意义原本是人类历史统一体中不需要被单独对待或者证明的问题，它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存在。

那么，我们看到对历史意义的论述，都建立在这个理论前提之上：历史意义已经从历史统一体中分离出来并且具有了主体性特征，正是因为意义被单独对待并具有了主体性之后，才可能成为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的对象性存在。在一般的和广泛的哲学层面上，约恩·吕森给意义的经典定义是：“意义指的是人类世界的时间延展在主观性模式中得到的诠释，任何转变看起来都是有意图的，仿佛他们受到了目的意志的影响。意义概念与意图和目的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目的性则将人类的行动作为一个能进行思维和反思的主体活动凸显出来。”^④

意义总是和宗教具有天然的联系，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对世界的偶然性变迁和整体性的时间过程赋予了一个万全之神的主体特征，同时这个神在近代进入了人类历史思维的结构之中。历史统一体便表现为人类所有单独的行动作为全体人类动态的时间过程的一部分。也即是说，个体的活动可以从整体的时间方向中获得相应的意义。^⑤在历史意义仍然没有从历史统一体过程中分离出来之前，人类的活动以及人类的苦难总是能够得到解释，但并不会单独地被视为“意义”，而是将之诠释为“上帝的眷顾”（providentia Dei）或者“神的意志”（göttlicher Wille）^⑥——在此，宗教本身就呈现为一种目的论意义模式。这种宗教性思维不可避免地带有普世性的特点，因而，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一个超时空的、本质主义的人类生活的理性安排被塑造出来，并且被安置在历史经验领域之中。而在史学理论领域中，吕森认为类似的历史思考模式依然存在，比如兰克的“人类和文化的理念”，^⑦或者作为理性的展开，作为进步和发展；消极的历史意义比如历史的堕落、退步和衰亡等等。这些概念都以非常形象的形式表达了历史过程中人类活动的意义源泉和整体性赋予。

① Jörn Rüsen, *Historik. 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Köln: Böhlau, 2013, S.103-107.

② Stefan Jordan (Hg.), *Lexiko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Hundert Grundbegriffe*, Stuttgart, Reclam, 2002, S.264-265.

③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enguin Books, 1993, pp.78-89.

④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18.

⑤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18.

⑥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18-19.

⑦ Leopold von Ranke,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historisch-kritische-Ausgabe* (Aus Werk und Nachlass, Bd.2), hg.v.Theodor Schieder u.Helmut Berding, München, 1971, S.80.

三、历史统一体的分离

随着现代社会祛魅过程和历史经验的丰富或异化，历史目的论解释体系逐渐失去了原先的效力。在这个过程中，原先“前意义的意义模式”逐渐被“历史意义”这个概念所取代。正是“历史意义”的出现，彰显了它成为一个现代学术术语并且以问题和议题的形式取代了宗教、进步、理性、文明等原先不证自明的前意义模式。吕森将这种历史意义的凸显和转换称为“理念论对历史主体特征的原始信任的丧失”。^①这个过程也是近代学科分化的结果特别是历史哲学祛魅的结果：“(历史主体特征)原始信任的丧失是伴随着历史哲学的萎缩 (Abdankung) 而发生的。历史哲学把从认识领域占有过去这一学科领地让渡给了历史的专门学科，自己仅限于研究和反思作为证明这种意义占有机制的学科本身。然而这些学科却无法接受这种保证，因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过程并不会获得将过去标示为传统历史意义的性质。反而，这种传统的意义性质是方法论本身无法逾越的前提”。^②

所谓的“历史哲学的萎缩”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历史统一体的分化在学科领域内的表现，^③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近代学科分化的结果。我们用英美分析历史哲学体系的学术史演变来印证，这个历史哲学的萎缩过程就是沃尔什 (W.H.Walsh) 所谓从思辨 (speculative) 到分析 (analytical) 的演变，在整个演变过程中，历史哲学研究的主题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由此，认识论被迫从统一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各个专门的学科领域的研究对象。譬如地区史、近代史、社会史乃至新文化史等都会专长于自己的领域，并且，直至今日，在这些学科领域中对真相和认知性的历史知识的需求依然占据着主要内容并且是其学科评价的主要诉求。这也就是为何在这些专门的学科领域中，对方法论规则、材料的批判运用与阐发、论据的可靠性依然孜孜以求的原因，“历史学的学科家法”在这些领域中得到了长足且充分的展现。由此，历史哲学的认知性维度被让渡出去，从而成为专门的研究反思和理论批判领域；而在前意义的模式中，历史哲学本身承担着对过去认知性解释。但这个分化过程造成的结果是，由于认知性过程的介入导致了认识论的主观性和经验的客观性相分离。这种单独的认识论过程的分离导致历史意义被消解为关于过去的具体的物性。这些通过认知性得来的客观“事实”不再具有对“现在”的历史意义，而是通过事后，从认知活动的主体方 (即“现在的历史学家”) 出发，赋之于以意义的方式才获得对于现在的历史意义。这就是阿伦特所谓的“意义永远不可能是行动的目的，而是在行动终止之后，意义就不可避免地从人类的活动中产生了”，^④历史意义成为一种“事后意义”。

德国的史学思想史中，伴随着事件的发生，历史意义的本质在于“不可预想性” (Unvordenklichkeit des Sinngeschehens)。^⑤其意所指，意义在人类生活的时间过程中，在它本身被反思之前是一直生效的。这个过程在人类的历史意识中一直在发生，并在它本身成为历史思考的一个对象物之前。这种历史意义的“先在性状态” (Unvor-) 也可以被描述为“直觉性” (Unmittelbarkeit)，因而这整个历史意义的状态在历史思考的过程中具有预设性和直接性 (康德在“审美直觉”上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而现在的情形却是，历史意义成为一种可预先构想的，或者说像阿伦特所说的“被当作人类行动目的并且依靠意向机制和有组织手段机制来追求”的东西。这样一来，历史思考的主体和客体就分离开来，并且在认识论

①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20.

②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20.

③ 吕森所谓的“历史哲学的萎缩”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谓的“超验的萎缩”，见 Jürgen Habermas,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Suhr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8, S.59.

④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enguin Books, 1993, p.78.

⑤ 这个词的用法因其生涩而被伊格尔斯 (Georg G. Iggers) 所提及，伊格尔斯在评论文章中对吕森的德语写作评价道：“但我遗憾的是对吕森表达的晦涩的语言理解不到位，这个复杂的语言在德国哲学里有其传统；从黑格尔、海德格尔到阿多诺皆如此。他们都想用晦涩性来表其深奥，因而我只能部分地理解他想说的——比如 die Unvordenklichkeit der Geschichte 下的部分，这个短语不能被翻译为英语因为其并没有清晰的意义。当然吕森对它是做了某些理解，这需要以更清晰的语言来表达。”一般而言，Unvordenklichkeit 中文可以直译为“不可预想性”。见 *Erwägen, Wissen, Ethik*, vormals *Ethik und Sozialwissenschaften* (Eus) *Streitforum für Erwägungskultur*, Jg.22/2011 Heft 4, p.533.

介入以后，历史统一体将原先整体的意义蕴含释放到认识论的主观性之中。上述活动的思想结果便是，一方面，历史经验本身变得没有意义了（“单纯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历史经验又需要被意义诠释，意义性质解除了其经验性的成分。^① 原先蕴含在历史统一体中、混沌但又具有稳定性、不证自明的意义和经验的合体，在历史思考的主体和客体分离之后，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也被隔离开来。主体和客体的分离也就是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的分离，并且，意义被冠以主体性认识论特征，经验被冠以客体性物性特征。这也成为 19 世纪西欧史学职业化的哲学基础和动因，历史学家和他们的事实对象分开了。

我们将上述的论证放在一个学科发展的一般情境中来理解，在此，物性的历史经验和主观性的历史意义需要被勾连起来的话，就需要人类的理性从中实现。甚至，在现代主义的史学思考模式中，理性本身上升为历史意义的一部分需要而实现。然而，无论如何，在现代史学中，理性是一个稳固的、可靠的维度，这也保证了现代史学思考的稳定性基础。而在后现代史学思考中，理性这个原本可靠的概念被不断冲击、解构，原先在意义和经验中加以实现和起到沟通作用的理性失去了其原有的效力。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的分离更加明显并成为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论证出发点，同时也成为它以后的发展症结。进而推论，在原先的历史统一体中，意义和经验是合一的，并且历史意义具有充足的经验性保证。由此在我们诠释人类过去的时候，理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将带有经验性的意义从历史统一体中发掘出来。现在的情形却是，由于历史哲学将认识论让渡给了专门的历史学科，由于意义和经验的分离导致经验具有客观性，从而在人类的文化生存渴求中诞生了认识论的需求，即我们需要可靠的历史知识。此时的历史学科想要保持自己的理性需求并且宣称自己具有主体间的（intersubjektive）意义效力或效能，显然是不可行的，因为认识论作为一个普遍性维度横亘在意义和经验之间，或者说横亘在所有的历史思考模式之间，它隔断了原先在历史统一体中不需要加以证明就可以对“现代”（即目前人类生活的世界）起作用的意义标准和模式。

现在由于认识论的隔离，过去那些带有理性特征的意义规范与现在有了时间距离（或其他形式的逻辑差异）。因而，吕森就此说，这个主体间的意义需求被元理性机制（meta-rationale instanz）所承担。^② 吕森在此所谓的元理性机制就是具有本体论特征的理性，或者说是上升到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的层次。在此，我们还有普遍的意义需求时，普遍理性便化身为“世界精神”一类的带有主体性的存在，将整个历史过程和个体的活动、人类的欢乐悲伤的情感特征等所有的一切事物都诠释为普遍理性或者“世界精神”的实现。这个理性或者作为其变体的“世界精神”便是吕森所谓的“元理性”。“元理性”通过这种霸权性的占有能力，将过往的人类世界和历史过程的意义诠释为历史理性的展开本身。

历史思考的主客体的分离导致元理性的分离，元理性在关涉过去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时，便蜕变为认识论层面的理性。认识论理性是以对一整套研究体系和方法论的确认而立身的。这种认识论理性或者“次属理性”依然想要执行元理性层面的意义标准或意义需求时，我们却只能获得关于过去的经验知识产品，“次属理性”无法再完成原本元理性所具有的从过去经验中获得意义并且具有不证自明的特征的能力，这也是史学职业化之后，对“真实”和“客观”的追求成为学科合法性的基础的原因。

对于历史意义的目前处境，吕森坦言：“目的论历史哲学的结束意味着意义的丧失……此类历史哲学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专门的历史学科无法将历史哲学纳入自己的范畴并整合到众多的解释方案中去。而是归因于时间经验。在这种时间经验中，目的论预设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意义关联被打破。历史思考被灾难性的偶然所占据。自 19 世纪晚期以来现代化危机越来越具有方向性需求，而传统的目的论历史哲学方案很难满足这些需求。历史思考将这种由经验而产生的批判性目标对准了自己，从而使得传统的历史意义陷入困境……具有理性意识和意义可靠性的历史思考被看做构成历史发展本身的有效因

^①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20-21.

^②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21.

素，而正是历史的发展对历史的思考提出了质疑。”^①

意义和经验从历史统一体中的分离、元理性向认识论理性的转变、历史哲学的萎缩，在吕森看来都是源自于现代性的历史经验的发展。历史经验不断促使我们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模式和方式。历史本身被历史所否定，这种自我否定中，前一个历史指的是具有理性和意义的历史统一体，后一个历史指的是经验性的历史发展。这就是说，现代性的新的历史经验需要我们改变、调整、重新思考传统的目的论历史哲学的范畴、解释效力、作用和理论价值。

四、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中的意义

“语言学转向”的出现，使目的论历史哲学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思想阵地，因为后现代主义将历史意义阐发为一种“事后之意”，这使得传统历史意义探讨的意义“先在性”无法发挥而消解。后现代语境中，过去来到现在，其本身携带的经验性依然存在，而意义则无可避免地从中“逃逸”了，意义成为诠释过去的主观功效。由此，在整个历史思考层面而言，历史思考成为人类历史意识的一个象征性存在，并且使它的认识论功效被强调。此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当我们运用历史意识和语言诠释人类世界时，历史意识具有的理性和语言的创造性为人类过去的时间过程“制造”出了一种意义性质，这就使得人类过去的历史进程“被”赋予了意义，并且成为对于现在的人类而言的“历史”。这个思想逻辑非常典型地体现在怀特及其叙事主义史学理论中。

艾克·鲁尼亞 (EelcoRunia) 在《在场》(“Presence”) 中说：“历史哲学家长久以来都被‘意义’这个概念引入歧途——起先是不断追随，后来是断然抛弃……在最近的三四十年里，历史哲学家们试图肃清他们的（也是我的）学科内力图确立意义的企图。”^② 鲁尼亞所谓近三四十年内历史哲学家们对历史意义的肃清，指的正是以海登·怀特和弗兰克·安克斯密特所领衔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阵营对历史意义的立场。论及历史意义问题时，怀特态度鲜明地将历史意义归结为历史叙事和情节化解释，怀特写道：“通过鉴别所讲述故事的类别来提供该故事的‘意义’，这就叫做情节化解释”。^③ 再者，“历史叙事作为编年史的反面，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已经被假设性地‘完备’、结束而且至今没有消融或分崩离析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历史事实戴着意义的面具，这个世界的完整性 (completeness) 和完成性 (fullness) 我们只能想象，从来都不是经验性的。”^④ 安克斯密特同样说：“叙事是一个工具，一个行之有效的工具，来给我们生活的世界赋予意义。”^⑤ 因而，历史意义形成的前提是一个“完备的世界”。可是经验表明，这个“完备的世界”往往是非经验的、想象的结果。按此逻辑，既然作为意义形成前提的“完备的世界”是想象的结果，那么，作为其产物的历史意义本身也就是一种“虚构”的产物。所以，历史事实只能“戴着意义的面具”出场，对于现在生活的人们而言，历史意义往往是一种假象和自我蒙蔽，是人创物、可操作物，是“当前的我们”加之于自身的悬壶，更是一种“历史的重负”。如果说历史还有意义的话，那么只有在历史叙事中，通过历史学家的情节化编排和组织，历史获得了一种貌似“过去的意义”。而本质上讲，这种意义却是历史学家后发诠释的结果。

不论是怀特还是安克斯密特，与吕森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历史意义从来并不具有“先在性状态”或“直觉性”。这个世界在我们到来之前并不具有意义，或者说并不具有明确的历史意义，过去从来不曾讲述自身，正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即历史叙事和历史编撰赋予“历史”以“意义”。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事后意义”的阐发。可是上述叙事主义的意义生成是有逻辑悖论的：既然过去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历史事

①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22-23.

② Eelco Runia, “Presence”, *History and Theory*, vol.45, no.3, 2006, pp.1-29. 该文后来收入 Eelco Runia,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引文出自第 49 页。

③ 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9 页。

④ Hayden White, “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 vol.7, no.1, On Narrative, 1980, pp.5-27.

⑤ [波兰] 埃娃·多曼斯卡主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第 93-94 页。

实只能戴着意义的面具出场的话，那么作为“现在的我们”如何可能赋予过去以“历史（的）意义”——特别是，历史学家的本质工作和对象从来都是面对过去时？

面对叙事主义中的这个逻辑悖论，鲁尼娅揶揄地说：“怀特学派的表现主义就像童话里梦想成真的那个人，看到他具备了点石成金的能力——只是，当他发现连嘴边的食物也变成了不可食用的金属宝贝时，他才会感到绝望。”^①鲁尼娅意在指出怀特的叙事理论在面对意义、伦理问题上的尴尬境地，因而他提出用“在场”作为核心概念来替换原来那个已经失去活力的目的论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意义。鲁尼娅提出要回到一种“鲜活”的历史哲学，要面对真实的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发问。在人类的“过去”与“现在”之间，无论我们做出何种诠释，历史学的本质工作（或者“客观效果”）就是将过去混沌的人类生活的质料和符码转化成为一个意义结构。这个意义结构可以呈现为各种形式和各种内容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比如神学史观，循环论历史观，以及进步论线性历史观；在形式上，主要呈现为历史叙事和历史文本，也可以呈现为关于上帝和天使的宇宙全景的图式。在所有的这些形式和内容的转化中，总有一个“扭结”统摄了“过去”和“现在”，^②统摄了“过去发生的事”和“现在表达的事”；统摄了历史学和历史事实。这个“统摄物”既是鲁尼娅所谓的“在场”，也是传统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意义”。鲁尼娅力图弥合传统历史意义和怀特叙事主义阵营的意义困境，提出了“在场”，并说“意义的传递是以在场的传递为前提的”。^③

吕森对此说：“明确的是：这个意义并非真正的历史的意义。如果‘历史的’意味着意义自身的经验性的话，那么它就处在超越经验界限的文学与审美的意义产物对立面。而历史的意义则处在经验界限以内，它表现为与审美的意义产物的虚构性互为补充。”^④“语言学转向”之后产生的历史意义作为一种逻辑结果具有缺陷，由于失去了经验性而沦为一种“文化产物”。因而只能在现在经由主体的回忆功能来体验过去，意义成为一种主观性的思想功效而存在于当前的历史研究中。

五、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

我们是否可以断言，“语言学转向”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整体性的历史意义来支撑我们的现实理解和未来导向呢？显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一方面，元理性和历史统一体已经无法发挥思想功效，在现代社会中无法满足新的经验解释的需求；另一方面，现代历史意义形式有诸多不足，从个体和群体层面来讲，我们需要持续性历史意义来给予我们的现实生活以时间方向和生存的导向需求。在综合考量这两种思想情境后，在当代社会需要一个兼顾的历史意义存在形式，这种历史意义既具有可靠的经验性携带而能满足人类生活导向的需求，又能经得起历史理性的检验和批判，同时对当代的历史经验具有解释能力。吕森给出的方案是“文化的转向”（Wendung zur Kultur）。文化在学科性的历史研究中成为主导的诠释范畴，并且文化的转向可以被理解为意义寻求的活动。吕森提出“历史文化”概念，可以视为历史统一体和元理性主导下的历史意义的一个现代变体形式。这就是说，在当代经验领域和思想范畴中，整体意义并不是不需要了，而是以“历史文化”（Geschichtskultur）作为其变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经验世界和历史世界中。^⑤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就是在当代思想语境和现实经验中，意义所具有的主观性和经验性的调适过程。在“文化转向”之后，吕森将文化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诠释如下：“文化是人类在研究自身和世界的过程中主观诠释功效的综合。这与（理念论的）精神过程中意义赋予或者意义形成完全一致，没有这一过程，人类的生活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人们想要在行动上把握世界，就必须从文化上对世界作出阐释。意义是人类在其实践生活中所提供的东西，它赋予世界及其人类自身以一种主体

① Eelco Runia,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p.53.

② 这个“扭结”鲁尼娅称之为“Knit”，见 Eelco Runia,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p.59；而吕森则将其称之为“knotenpunkt”，见 Jörn Rüsen, *Historik. Theorie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S.96.

③ Eelco Runia, *Moved by the Past, Discontinuity and Historical Mutation*, pp.69-83.

④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24.

⑤ “历史文化”概念的理论诠释可参见尉佩云：《历史文化：当代德国史学理论界中的一个范畴》，《学术研究》2018年第10期。

性，没有这种人类的主体性，人类就无法同他生活的世界交流，无法理解人类的行动和苦难。”^①

在人类理解自身和世界的时间过程中，人类的理性本能要求我们将外在世界和内在自身放置在一个可以理解的模式之中。我们在理性支持下对世界和自身赋予了主体性，之后人类与世界的交流沟通可以看做是两个主体间的活动。但是，这个人类和世界的主体交流是一种人类理性构建的过程。由此，如何将外在世界理解为一个主体对象呢？这就要求我们在理性构建世界的过程中将之赋予一种可理解的思想特征，传统上这种思想特征是由理念论的意义核心所赋予的。在当代，文化或历史文化作为一种解释维度或一个思想范畴就具备这种思想功能，由此世界和我们自身就具备了交互性。

从学科发展层面来看，在德国的史学思想传统中，历史研究作为一门寻求意义的解释性学科而存在。比如在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那里，历史研究是一门“精神科学”（Geistwissenschaft），而这个“精神基础”（geistige Grundlagen）是基于理念论的历史解释学拓展而来的，所以，历史研究就是赋予这个世界和自身以意义的过程，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人成为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此，历史学就是一种编织（经验世界和历史世界的）意义之网的方式。可是，随着现代性的“祛魅”和理念论中心在本体论层面的衰落，单一的意义核心也存疑了，历史学无法再以传统的方式来编织世界的意义，或者说，这种编织出来的意义产物已不被当代和受众所采信。我们需要一套新的解释方式给予这个世界以生存导向性和史家工作本身的价值赋予，由此“文化”就成为一个核心概念，当代的人可能无法在理念论“意义核心”的延展中开展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可以在世界的文化性理解中实践自己的生活并拓展自身。由此，历史学也由传统的“精神科学”转变为“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文化承载历史学的当代意义和世界图式的展开，并获得了合法性认同。在此过程中，历史学是通过缩减自己的解释领域和解释权而得来的，因为在当代世界，文化成为和政治、经济、社会等诸范畴并列的范畴之一，不再具有对历史世界和经验世界（以及它们之间关系）唯一的、优先的解释权。但也正是这种解释权的缩减，历史学在知识论层面上保证了自己的合法性和对当代世界的思想有效性。

吕森通过对历史文化概念的阐述和分析，代替了德国史学理论传统中的历史意义。历史意义作为理念论思考方式的衍生物，具有唯一性和预设性；现代史学的发展和意义的多元性拓展，促使吕森不得不对历史意义这个德国史学理论传统的核心概念进行现代化反思。在吕森的理论体系中，不同于他的精神导师德罗伊森，历史学由传统的“形成意义”的学科，转变为“赋予文化”的学科。“赋予文化”的过程，就是史家将偶然、断裂、创伤进行学术化处理，将历史的困顿和压迫转化为认知的过程，从而能够保持历史研究和史家工作本身的人文性质和伦理性质。最终，由于历史文化的多元性、非本质主义和去本体论的思想特点，它成功契合了当代历史思想的发展并完成了理论转换。

历史文化在现代社会成为一种认识论对象领域中的思想产物。作为意义的存在领域，历史文化具有认识论的“客观性”或者“对象性”。而意义作为文化的产物，附加在文化领域中成为一种“过去的意义”，因为作为意义产出地的文化本身因为认识论的介入而具有了“过去性”时限。^②“文化转向”后作为意义变体形态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的历史意义具有根本的区别：现代的历史文化形态不再具有传统历史哲学中统一体的“不证自明”的特征，它的意义整体是解释性质的。“历史文化”概念在当今德国史学理论界、国际历史教育界的广泛传播表明，历史意义的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

责任编辑：郭秀文

① Jörn Rüsen, “Was heißt: Sinn der Geschichte?” *Historische Sinnbildung*, S.25.

② 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传统文化”，一旦我们用“传统”来理解、诠释某种“文化”时，它必然就来自于“过去”，因为它是“传统的”。吕森对此旗帜鲜明地说：“在现今的史学理论领域内，在历史意义生成问题上的主导性观点是建构论的方式。过去的意义被认为是归属于过去，过去本身却对该意义并没有影响。但我认为，过去本身已经以历史发展的结果的方式呈现为现在，在此过程中，历史思考得以展现并且也深受其影响。这个现在（或‘在场性’‘展现’）可以称之为传统（‘This presence can be called tradition’）。在历史学家对过去进行构建组织之前，过去已经自我构建为现在作为过去发展结果的方式呈现于现世中。因而，在过去被主题化诠释为历史之前，传统在历史思考中具有持续有效性。”见 Jörn Rüsen, “Tradition: A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Sense-Generation and its Logic and Effect in Historical Culture”,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51 (Dec. 2012), pp.45-59.

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研究

——新的转向、方法与议题

杨 凡

[摘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男性气质研究作为专门的学术领域在西方学术界兴起。通过从研究转向、核心取向以及重大议题这三个层面梳理当代男性气质研究的种种面向，可以呈现研究者的多元视角。这个学术领域的兴起，并不只是针对女权主义作出的回应，其关注的焦点也并不局限于性别解放的议题。该研究弥补了传统女权主义研究对男性身份不加区别的分析，同时也修正了早期“父权制”讨论中单一侧重制度与生产关系的考察。围绕男性气质展开的讨论，深受当代西方众多学术思潮的启发，开启了男性研究的新方向。多数学者认为，男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文化基础。作为一项分析工具，男性气质被嵌入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史、文化史、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其他文化研究之中。

[关键词]男性气质 女权主义 社会性别 后现代 父权制

[中图分类号]C9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4-0131-11

一、导言

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经典的问题，“女人是什么？”她声称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非常具有意义。与之相反，她认为男性永远不会著书立说去讨论他们的特殊处境，因为男性代表了正面的和中性的。然而，波伏娃没有料到的是，在半个世纪之后，男性气质研究却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相关著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约翰·麦克因斯调侃地评价了波伏娃的观点，“似乎每个男人和他的狗都在写一本关于男性气质的著作”。^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对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进行了介绍与研究，这些理论综述几乎都认为这一学术领域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笔者则认为，严格意义上该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代表了男性研究的新方向。而更偏向于自然科学或者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仍然是传统的“男性研究”，它们并没有专门论述“男性气质”这一问题。^②该研究与“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流行大体一致，

作者简介 杨凡，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上海，200433)。

^①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H. M. Parshley trans., London: Lowe and Brydone LTD., 1956, pp.14-15; John MacInnes, *The end of masculinity: The confusion of sexual genesis and sexual difference in modern society*, UK: McGraw-Hill Education, 1998, p.2.

^② 国内学者的综述与介绍，可参见方刚：《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理论概述》，《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舒奇志：《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研究发展概述》，《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刘岩：《男性气质》，《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詹俊峰：《性别之路：瑞文康奈尔的男性气质理论探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隋红升：《跨学科视野下的男性气质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这些综述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的相关表述，她在《男性气质》中，系统地梳理了男性相关的学术研究如何从临床医学知识发展到社会学关注的焦点。这样的划分，对于不熟悉该领域的其他学者，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实际上，康奈尔自身也将

它伴随着性别研究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向而发生。^①

新的学术突破主要来自社会学、社会史与文化史、文化人类学、文学与艺术批评、文化研究等领域。当然，在“男性气质”概念出现之前，社会科学并非不关注男性议题，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很早便开启了对“父权制”的深入讨论。然而，“父权制”问题作为“现代性”的重要范畴，其宏大叙事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那么，这门称为“男性气质”的研究，缘何兴起，又新在何处？与“父权制”命题有何不同？又为新的性别书写开辟了哪些重大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阐明该研究的核心关照，供感兴趣的学者商榷、讨论。

二、男性研究的转向

人类对男性的系统知识，最初来自古代解剖医学。此外，形形色色的伦理学、道德训诂以及规范男女行为的礼仪学说，都会讨论男女性别在社会层面的差异。然而，这些观念几乎无一例外地建立在性别的生理基础之上。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关心解剖学的医学家与哲学家已经对性别差异进行了本质论描述。到了中世纪，由于神学禁锢，解剖学知识几乎没有进展。文艺复兴之后，伴随着现代解剖学的确立，男女有别的观念在科学话语中被进一步强化。^②

自19世纪末起，随着精神分析科学的建立，学术研究对于性别的认识由生理基础转向内在人格。除了身体特征之外，性别意识的差异引发了学者的关注。弗洛伊德突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在性别化人格机制中的作用。他认为人的成长，需要克服童年阶段对于母亲的依恋，逐渐摆脱对于父亲的仇视，最终认可父亲所代表的一整套社会秩序。这一过程如果出现偏差，将导致负面人格甚至精神障碍。荣格拒绝了以性本能解释行为的观点，但他却比弗洛伊德更关心两性的人格差异。荣格提出了一对与性别相关的内在人格：“阿尼玛”与“阿尼姆斯”，前者是男性心目中被压抑的女性化倾向，后者则潜藏在女性的人格深处。二者都被集体的社会意识压抑，不同于外在的“人格面具”。精神分析关心性别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参与人格意识。学者认识到，性别不仅仅建立在解剖结构之上，更与个人经历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③然而，精神分析所谈论的“社会化”，又有别于后来的“社会建构”理论。它并没有逃脱本质论的窠臼，仍包含着某种先天预设的性别，也没有挑战对于两性既定角色的认识。

无论是解剖学或是精神分析的研究，都倾向于假设在所有文化系统中，个人基于性别经历着相同的社会体验，因而难以完全解释性别在文化系统中的差异。相关知识的突破最初源自人类学领域，它伴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扩张而完成。因此，在某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下，早期人类学家带有偏见地忽视了这种差异，而倾向从社会功能层面论证既有性别模式的合理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性别角色理论，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将性别定义为规范化的社会角色。它认为性别来自外在的“社会期望”，而不是精神分析所谓的“人格压抑”。通过家庭、学校、军队以及大众传媒，价值化的性别观念塑造了既定的社会角色。^④比起非历史化的精神分析，这种理论更受到社会学家的青睐，因为它暂时解释了性别角色

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新研究，称为“新的社会学方法”，参见 Raewyn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2nd edi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3-45.

① 相关术语的词频统计数据可查阅网站，见 <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 2021年7月1日。

②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与罗马时代的盖伦，对此都有丰富的著述，详见 Thomas W.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参见 S. Freud, “The Ego and the id”, in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SE)*, vol.19, London: Hogarth, 1961, pp.3-66; “The infantile genital organization”, in *SE*, vol.19, pp.141-145; “The dissolution of the Oedipus complex”, in *SE*, vol.19, pp.173-179; E. Jung, *Animus and Anima*, New York: Spring Publications, 1969; E. Jung, *Aspect of Masculin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更多心理学家的讨论，可参见 Raewyn Connell, “Psychoanalysis on masculinity”, in Harry Brod and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1-38.

④ “性别角色”理论代表性观点，可参见 Talcott Parsons, *Family, Socialis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53; Joseph Pleck, “The male sex role”,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76, vol.32, pp.155-164. 更多详见 Raewyn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pp.21-27.

的社会变迁。然而，性别角色理论只观察男女在社会中各自承担的功能，并认为角色分配是与生俱来的规范，同时也是有益的社会秩序；却不思考角色为何基于性别被建构，因此同样没有超越“本质论”。

上述观念造就了一种现象：性别一旦偏离既定的“规范”与“标准”，就会被遗传学定义为“变异”，被精神分析诊断为人格“失衡”，被角色理论看成是实现特定身份的“障碍”。这些理论方法，后来被激进的遗传理论、优生学以及社会生物学广泛应用，以生物基础系统地解释两性的社会行为。在流行的畅销读物中，性别本质化的论调无处不在，强化了“性别来源于自然”的保守观念。^① 严格意义上来说，上述涉及男性的研究，并没有专门研究“男性气质”问题，而是就某种“规范”与“刻板”的男性身份，从“科学”的角度论证两性差异的合理性，却并不考虑性别与历史、社会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

身体与相关的性别特征是一种天然的结合，同性恋研究最早挑战了这种观念。许多学者宣称，在历史上的许多社会中，那些与“同性恋”类似的群体，尽管有时也被道德诟病，但其男性气质却并未遭受系统性地审查。从中世纪开始，他们开始面临宗教所的审判，而到了近代，又开始接受精神病院的治疗，甚至监狱的禁锢。^② 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包含着一种大胆的预设：规范的男性气质，是某种强制性权力的产物，通过系统性的机构暴力得以维持。然而，最初的同性恋研究，并未独立提出“男性气质”的研究命题，也没有思考异性恋男性何以垄断它。

到了八九十年代，“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一类的术语，才逐渐成为热门的学术议题。这些概念的流行，也意味着自身的窘境。当下学术在讨论“男性气质”之时，更多是在“危机”与“终结”之类的语境中展开。严肃的理论不再迷信男性赋予自身的那些传统形象：阳刚、自信、坚不可摧……而经常将其描述为催化战争、犯罪、等级与压迫的诱因。处于这场危机中心的正是西方本土的白人异性恋男性，他们在长达数世纪帝国主义扩张中形成的自我与他者的叙事，被抨击暗含着男权主义、种族主义、阶级偏见以及西方中心论的成分。^③

这种变化源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的文化转向。回看 19、20 世纪之交的女权主义先驱，与其他声援边缘群体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在其争取自由、进步的言论中，并没有直接攻击男性，也没有明确反对男性气质。相反，她们甚至致力于推动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性别角色。在第二波女权主义中诞生的激进派别，不再满足于在选举、教育与工作上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转而批判基于性别被强制施加的社会秩序。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直言不讳地宣称：“一个人并非生而为女性，而是成为女性”，她号召“拒绝接受永恒的女性”（the eternal feminine）观念。^④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女性的奥秘》中，同样认为社会建构的角色才是女性被压迫的根源，它阻碍了女性成为完整的公民。弗里丹指出，社会对逾越规范的个人施以严厉的惩罚，而对遵循期待的女性倍加奖励。^⑤ 对男性气质的质疑

^① 该类畅销书，可参见 J. Gray,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1979; D. Kevles and L. Hood, *The code of codes: Scientific and social issues in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B. Sykes, *Adam's Curse: A Future Without Ma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② “同性恋”是近代医学概念下出现的身份，相关研究可参见 John A. Symonds, *A Problem in Modern Ethics Being an Inquiry into the Phenomenon of Sexual Inversion*, Glasgow: Good Press, 1891; M. Hirschfeld, *The Homosexuality of Men and Women*, 1914, translated by Michael A. Lombardi-Nash,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0;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The Use of Pleasure*, trans. by R. Hurley, New York: Parthenon Books, 1985; David Halperin, *One Hundred Years of Homosexuality: And Other Essays on Greek Love*,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15-40.

^③ 男性气质的“危机”，参见 Lynne Segal, *Slow motion: Changing masculinities, changing men*,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7 (first edition 1990), xvii-xviii; 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Herb Goldberg, *The Hazards of Being Mal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6. 男性气质的“终结”，参见 John MacInnes, *The end of masculinity*, 1998; John Stoltenberg, *The End of Manhood: A Book for Men of Conscience*, New York: Dutton Press, 2000. 危机中的“白人异性恋男性”，见 Sally Robinson, *Marked men: white masculinity in cri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Michael Kimmel, *Angry white men: American masculinity at the end of an era*, UK: Hachette, 2017.

^④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p.273, p.14.

^⑤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Dell Publishing, 1963, pp.12-27.

也随即开始，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中指出，日常文学中充斥着大男子主义，将男性与“力量、残酷、冷漠、自负和财产紧紧连在一起”。她呼吁，唯有抛弃真实或虚幻的男性气质，性别压迫的制度才可以摆脱其情感与文化的授权。^①

女权主义使得建构理论成功地引入了性别领域研究，也开启了持续反思传统的思潮，并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形形色色的后现代理论形成合流。一些左派的思想者开始谴责那些仍然坚持“现代性”的派别，称他们为“新殖民主义”“家长统治”“国家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人类中心主义”……在这些常见批判术语中，自然也包括“男性沙文主义”。他们指出，在近代思潮下形成的“男性气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性别立场上的正义。可以说，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男性气质”研究，建立在后现代主义与女权主义共同挑战性别秩序的基础上。在这种语境下，权力为男性所垄断的社会结构遭受质疑，男性气质被定义为有待颠覆的“传统”、遭受挑战的“权威”、深受质疑的“真相”。^②基于这样的理论，各领域的学者开始重新定义基于性别而产生的社会身份。在新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框架下，男人的身份不再是“生理性别”（sex），而更侧重“社会性别”（gender）。^③它首先关注社会文化如何定义、认识以及表现男性，思考“他”与道德、法律、科学、宗教以及社会习俗的关系。

学者对于男性气质的定义莫衷一是，然而，形形色色的阐释中又包含着相似的看法，它被理解为系统的“意识形态”、稳定的“话语型构”、无所不在的“符号象征”以及依附于行动的“表演”。更通俗地讲，它是某种假想的“身份认同”、强制性的“社会期待”，以及饱含成见的“刻板印象”。^④总之，新的研究反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立场，主张将性别身份理解为“权力”与“话语”的“建构”。男性气质是一种语言现象，而非传统道德所笃定不移的生物属性。^⑤所谓“雄性特征”（maleness）属于生物学关注的领域，而“男性气质”则属于社会学、历史学与其他文化研究的范畴，有必要充分考虑性别与阶级、亚文化、年龄、族裔以及其他因素的关系。男性在全球层面来说，从来没有分享过相同的男性气质，它在各自的文化中以不同的方式被解释、扮演与体验。^⑥

在这种视野之下，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文化研究不再拘泥于考察某种剧本式单一的男性气质，而是呈现男性气质与社会文化之间具体而又丰富的关系。人类学家大卫·吉尔默（David Gilmore）的研究，首次将男性作为某种社会中现实的身份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他认为，“作为文化上施加的典范，男性气质不仅仅是个人心理学上的简单反应，更是社会公共文化与集体表现的一部分。”^⑦吉默尔利用人类学、弗洛伊德心理学以及女权主义研究的方法，调查了不同文化中的“男子气概”（文化认可的理想的男性气质）何以根深蒂固地确立了统治地位。在他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性别不再是一种

① Kate Millett, *Sexual Politic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16-22.

② 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启发，可参见 Linda Nicholson, *Femi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Routledge, 1990; Brian Taylor, *Responding to Men in Crisis: Masculinities, Distress, and the Postmodern Political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2005.

③ Maurice Berger, Brian Wallis, and Simon Watson, *Constructing Masculinit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p.1-6; 关于社会性别理论与性别的建构论，更多可参见 Rachel Alsop, eds., *Theorizing Gender: An Introductio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2002.

④ 对于男性气质的不同定义，见 M. Mac an Ghaill, eds., *Men and Masculinities: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Practice*,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2003, pp.4-5; Harry Brod and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p.1-10; Nigel Edley, *Men and masculinity: The basic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22-52; R. Adams and D. Savran, eds., *The Masculinity Studies Reader*,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2, pp.1-8; Connell, *Masculinities*, xi-xxv; Reeser, *Masculinities i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pp.20-49.

⑤ Raewyn W. Connell, *Masculinities*, pp.67-71; MacInnes, *The end of masculinity*, pp.14-16; Todd Resser, *Masculinities in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2011, pp.51-52.

⑥ John Beynon, *Masculinities and culture*, UK: McGraw-Hill Education, 2002, p.3.

⑦ D. Gilmore, *Manhood in the Making: Cultural Concepts of Masculin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4-6. 人类学研究，也可参见 Andrea Cornwall and Nancy Lindisfarne, eds., *Dislocating masculinity: Comparative ethnographi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由多种社会结构共同影响的丰富变量。除了这种横向比较，一些致力于历史研究的学者开启了纵向的变量考察。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抛弃了线性演化的路径，不再试图勾勒出它在每个时段中的具体型态，而是将其作为分析工具，嵌入妇女史、家庭史、后殖民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之中。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考察男性气质如何被“定义”与“建构”。^①

这些理论与方法重新建构着“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主流”与“另类”之间的关系。这种新的转向意味着要完全理解男性气质，需要关注权力的“边缘地带”——劳工阶层、同性恋、有色人种、移民等群体，当然还包括作为男性“完全意义上”对立面的女性。只有去倾听这些被主流男性气质湮没的故事，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某种“完全意义上”的男性霸权：我们所耳熟能详的西方社会历史上惊人的“伟大成就”，如何被本土出生、中产阶级的、白人、异性恋、男性所创造。这种理想始终排斥着主流男性之外的群体，制造着纠缠不休的社会“焦虑”。^②这种从边缘反观中心的视角，为打破单调、枯燥的男女二元对立提供了可能；又从另外的角度提醒研究者，男性气质并非总是与男性身份相关，但它始终与权力发生着关系。

三、关注权力与压迫的路径

对于男性身份背后权力的思考，最早是在反对“父权制”的语境下发展而来。而“母权制”“父权制”一类术语，最初是由研究血缘组织、劳动分工与社会形态的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提出。他们从宏观层面考察家庭、国家、社会的立法原则，以及权力演进的发展规律，对身份政治的话题则触及甚少。^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父权制”概念被引入女权主义理论，其中海蒂·哈特曼（Heidi Hartmann）著名的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结合》颇具影响。哈特曼弥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性别盲点，同时也批评了激进女性主义的阶级盲点。她尖锐地指出，在批判父权制的两大流派间“婚姻”是不平等：“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合二为一，那就是马克思主义。”那些将二者结合的当代理论，几乎都是将女性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中，将女性定义为劳动阶级，使得性别关系被置于劳资关系之下，在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中加以分析。哈特曼认为，资本与私有财产的确会给女性带来压迫，然而却并不是她们作为“女性”被压迫的全部原因。仅仅是资本与私有制的终结，未必会消除对于女性的压迫。当女性走向社会，享受与男性相同的劳动权利时，她们身上的家庭负担并没有解除，甚至还增加了来自公共世界的压力。哈特曼因此呼吁，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需要更有力的结合，性别范畴不能简单地置于阶级分析之下，而需要在生产关系之外寻找更多分析父权制的路径。^④

哈特曼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也鼓舞了更多学者去考察性别运作的机制，如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出版了《男性统治》一书来探讨性别的再生产体系。布尔迪厄严格

^① 传统历时分期的方法，见 Peter Stearns, *Be A Man! Mal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9; Clyde W. Franklin, *The Changing Definition of Masculinity*, Berlin: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1984, pp.3-8; Herbert L. Sussman, *Masculine identities: The history and meanings of manliness*, Santa Barbara: ABC-CLIO, 2012; 历史学的新方法论，见 Karen H. Alexandra S., “What Have Historians Done with Masculinity? Reflections on Five Centuries of British History, circa 1500-1950”, i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44, no.2, 2005, pp.274-280; John Tosh, “The History of Masculinity: An Outdated Concept?” in Arnold, J. H. and S. Brady, eds., *What is Masculin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7-34; Simon Yarrow, “Masculinity as a World Historical Category of Analysis”, in *What is Masculinity?* pp.114-138.

^② Michael Kimmel, *Manhood in America: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p.6.

^③ 早期学者对父权制的经典讨论，见 Bachofen, Johann Jakob, *Mother Right: A Study of the Religious and Juridical Aspects of Gynococr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as Mutterrecht*) (1861),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2006; Lewis Henry Morgan, *Ancient Society: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1877),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3; Friedrich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188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ress, 1972.

^④ Heidi Hartmann,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 In *Capital & Class*, vol.3, no.2, 1979, pp.1-33. 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对父权制的分析，还可参考 Øystein Gullvåg Holter, *Gender,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A social forms analysis*, Oslo: Work Research Institute, 1997.

意义来说并非女权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却对社会中权力的动态关系尤为感兴趣。他重新反思一个在阶级斗争视角难以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不平等的象征秩序在现实中受到广泛的尊重，甚至受到那些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尊重？布尔迪厄认为，性别不平等为这种悖论提供了丰富的例子，他发挥了他有关“阶级品味”“文化资本”的理论，认为性别构成了阶级类似的范畴。除了传统叙述强调的“制度结构”(structure of institution)外，他还格外重视两性在“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上的差异。那些看似是个人偏好的“趣味”(taste)、“性情”(disposition)与“习惯”(habitus)，本质上是社会根深蒂固的身份标识。^①因而，所谓“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背后是一整套维护财富与权力地位的再生产策略，它们将妇女排除出“严肃的事情”“公共事务”，尤其是“与经济相关的事务”。其中，高度性别化的知识技能、文化观念、教育机制以及社会网络，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布尔迪厄与哈特曼一样，过于侧重制度分析，而相对轻视语言在性别建构中的核心地位。基于这种新的认识，后结构主义者进一步聚焦话语在主客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开始强调主观的认识、信念、欲望、能动性，而非客观的物质基础、经济条件、社会结构。这种分析的模式使得性别结构变得更为散漫，充满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人类的性别表达被固化为“同性恋”“异性恋”的身份，是19世纪医学与法律话语定义的结果。遗憾的是，他本人并没有过多涉足性别与规训的讨论。然而，这种理论却启发了大量学者，他们转而研究作为“主体性”的男性气质。这种方法强调性别身份的流动性，关注人类的思想结构与语言模式如何建构身份的主体性。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男性/女性的稳定的二元结构，与福柯所言的同性恋/异性恋的划分一样，同样是语言所赋予身体的象征符号。此外，他还关注行动在性别生成中的作用，提出了性别的“表演”理论。她认为，性别是被男性和女性“完成”的，而不是“拥有”的。结构化的性别认同，需要通过持续的风格化“表演”(Performance)，最终被断定为与生俱来的身份。^②

男性的经验与意识不再被置于本质化的“父权制”体系中，其主体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与重塑中。这种视野为多元的男性气质理论打开了契机。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Raewyn Connell)不再简单地将权力与男性划等号，指出男性与“霸权”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灵感源自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将“霸权”的概念从阶级斗争挪用到性别统治上。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阶级统治合法化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劝说，而不是直接的暴力。精英阶层要实现政治行动中的霸权，需要与不同群体展开斗争与联合。康奈尔由此提出，在一定的社会与历史中，总有一种“霸权的”男性气质为文化所歌颂，为父权制提供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理想间存在着“霸权”“依附”“共谋”“边缘”等多重关系。康奈尔并不是机械地理解阶级、种族与性别的关系，即认为在这些范畴中占据越高等级的个人，就一定拥有更大的权力。她指出，拥有机构权力或者大笔社会财富的男人，在个人生活中可能与“霸权”相距很远。只有当文化理想与机构授权相互一致时，“霸权”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其他社会成员在自身“被支配”的同时，通过对其“模仿”“挪用”，甚至与之“共谋”，享受着父权制排斥女性所带来的“红利”。^③

^① 布尔迪厄的讨论，详参见Pierre Bourdieu, *Masculine Domination* (1998), trans. by Richard Nice, Redw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关于“制度结构”“认知结构”“文化资本”“象征资本”以及“习惯”等概念的讨论，可参见pp.13-18, pp.55-56, pp.92-93, pp.83-88, pp.104-106.

^② 巴特勒的理论可参阅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Judith Butler, *Undoing gender*,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③ 康奈尔“霸权型男性气质”理论，重点参见Raewyn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67-86; 更多可参见R. Connell, *Male Roles, Masculinity and violence: A Culture of Peace*,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00; Mike Donaldson, “What Is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vol.22, no.5, 1993, pp.643-657; Demetrikis Z. Demetriou, “Connell's concept of hegemonic masculinity: A critique”, *Theory and Society*, vol.30, no.3, 2001, pp.337-361; James W. Messerschmidt, *Hegemonic masculinity: Formulation, reformulation, and amplifica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8.

康奈尔代表了受到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后结构主义者。相比之下，杰夫·赫恩（Jeff Hearn）则代表了那些吸收、借鉴了后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性别是社会的建构，这与大多数后结构主义者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相比康奈尔对于男性权力的解构，赫恩则坚持认为，男性在集体层面上应该被视作某种“性别阶级”（gender class）。尽管他也承认白人异性恋男性群体要比其他群体占据更高的地位，但他并不主张用男性内部结构的差异，去替代马克思主义对普遍父权的批判。因为就整个体系而言，无论个体的男性地位如何，也无论他们是否直接参与压迫，总体来说，所有男性都从性别的身份上获利。赫恩指出，承认男性间的联合与差异固然重要，而认识到男性作为一个性别阶级，其内部存在着看似复杂但却单一的结构，几乎同样重要。他呼吁有必要从讨论“霸权的男性”，重新回到“男性的霸权”上来。^①

与上述批判男性气质的声音不同，另外一些学者则避免发表过于激进的言论。马歇尔·考夫曼（Michael Kaufman）在《超越父权制》的序言中，意味深长地呼吁，需要重视男性气质对瓦解父权制可能发挥的潜在价值。他指出，这种颠覆性的力量有着漫长的道德传统，“我们也不应该被男性气质的主流定义所愚弄，忽视许多男人同样关心和投入的养育和爱。”在之后的研究中，考夫曼将压迫的感受转向男性自身，在父权制体系下，男性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同样体验着痛苦。一个男人能否与男性气质建立联系，并不简单取决于他的性别，而取决于他作为男性行使和控制权力的能力。在成功的道路上，个人需要面对着世俗性的力量。情感的淡漠，增加了男性追逐权力的社会资本，却也强化了男性压制内在人格的信念。^②

后来的很多批评家，显然并没有留意考夫曼的忠告，而逐渐走向性别政治的对立面。达米安·里奇（Damien Ridge）点破了对女权主义的厌倦情绪：“日常的生活现实，似乎与这种论述并不一致。正如唐纳德·特朗普成功当选的事实表明，许多被剥夺权力的白人异性恋男子，似乎认为自己并没有权力。他们生活在一个绝望的地方，远离精英们所认同的世界秩序。”当代保守主义领袖、施特劳斯派代表人物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C. Mansfield），从政治学与历史传统的角度为男性气质进行辩护。在其一贯的保守主义论调中，却不难读出更深层次的写作意图，即对自由主义及其催生的女权主义政治保持警惕。^③保守主义的复兴，触发了对于女权主义的抵制。大批作家开始纷纷强调，男性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受到刻板印象的束缚，被女权主义者与其他左派思想界误解、诋毁与恶意攻击。然而，这些保守主义者对权力问题往往避而不谈，也很少关注遭受不公待遇的“他者”。^④

① 对话语理论的吸收，参见 Hearn, “Theorizing men and men’s theorizing: varieties of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men theorizing of men”, in *Theory and Society*, vol.27, pp.781-816. “性别阶级”的概念，更多可参阅 Hearn, *Men in public ey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1992; Hearn and D. Collinson, “Theorising unitis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between masculinities”, in H. Brod and M.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Sage, pp.96-118; Hearn, “From hegemonic to the hegemony of men”, in *Feminist Theory*, vol.5, no.1, 2004, pp.49-72.

② Michael Kaufman, ed., *Beyond patriarchy: Essays by men on pleasure, power, and change*,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xvi; Michael Kaufman, “Men, feminism, and Men’s Contradictory Experiences of Power”, in Brod and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pp.142-164.

③ Damian Ridge, “Games People Play: The Collapse of ‘Masculinities’ and the Rise of Masculinity as Spectacle”, in J. Barry, etc.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Male Psychology and Mental Health*, Champaig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p.205. 保守主义的代表，可参阅 Harvey C. Mansfield: *Manlin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④ “男性权利运动”强调男性自身困境与被忽视的权利，参见 Herb Goldberg, *The Hazards of Being Male*; R. Doyle, *The Rape of the Male*, MN: Poor Richard’s Press, 1976; G. Gilder, *Sexual Suicide*, New York: Bantam Press, 1973; 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95. “解放论者”认为，男性气质同样伤害男性，参见 Sawyer, “On male liberation”, in J.H. Pleck and J. Sawyer, eds., *Men and Masculinity*, New York: Prentice Hall, pp.170-173; M. Fasteau, *The Male Machine*, New York: McGraw-Hill, 1974; W. Farrell, *The Liberated M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4; D. David, R. Brannon, *The forty-nine percent majority: The male sex role*, Random House, 1976; “守约者”认为，男女应当遵守宗教传统与社会习俗，参见 D. Claussen,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The Promise Keepers and the Revival of manhood*, Cleveland, OH: Pilgrim Press, 1999; J. Bartkowski, *The Promise Keepers: Servant, Soldiers and Godly Me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许多学者开始同样将男性看作父权制的受害者。一些使用新荣格主义方法的学者，强调权力并不仅仅造成肉眼可见的伤害，应当关注男性气质制造的精神创伤，由此扩宽了对于性别“压迫”的理解。由罗伯特·贝莱（Robert Bly）开启的“神话诗歌”流派，是其中不得不提的代表。他所写的《铁人约翰》一书，并不是严肃的学术性著作，更像是一本神话诗集。书中以铁人约翰的童话为象征，讲述了一个小男孩如何在“野人”的带领下，重新找回“金球”的故事。贝莱借此寓意男性重新审视精神世界的过程。他认为工业革命打断了父子共同劳动与相处的模式，男人由此陷入现代社会个人主义的激烈竞争。这打破了荣格所谓“阿尼玛-阿尼姆斯”平衡，使得男性的内在人格更多地偏向女性意识。然而，世俗社会又呼唤阳刚、正直、充满抱负的男子汉。^①“神话诗歌”中的怀旧忧思，在那些聚焦权力的学者看来，虽然富有诗性，却也尤不实际，因为正是权力与痛苦的怪诞结合，造就了男性内在的主观体验。

无论争议如何，贝莱强调的精神分析的方法，迥异于那些重视“客观性”的社会学研究。与他正好相反，维克多·塞德勒（Victor Seidler）则从社会与历史层面，考察男性的“内在生活”。塞德勒认为，男性饱受的精神创伤，是在社会建构身份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他拒绝了贝莱有关人格“原型”的荣格理论，将研究重点转入历史分析。与那些批判启蒙思想的女权主义产生共鸣，塞德勒认为18世纪以来“理性”的建构是高度性别化的：启蒙时代的精英将“智力”“理性”授予男性气质，而将“情感”“非理性”归为女性气质。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这种现代观念如何支持性别不平等，而是如何塑造现代意义上公共与私人分离的空间概念，它使得性别意识更为对立。塞德勒指出，在绝大多数西方的社会中，除了愤怒之外，男性并不被期待在公共生活中流露其他情感。这种性别化的情感机制，被启蒙时代以来建构的知识模式不断强化，同时又与历史上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相契合。^②然而，塞德勒的理论方法，却又忽视了精神分析学科在性别能动性方面作出的有益探索。

四、性别书写的新议题

男性并非与生俱来的性别，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立足于这一认识，男性气质研究展开了一系列新议题的讨论。不同于精神分析关注个人成长的经历，新的研究所讨论的“社会化”与男性的“生命历程”，更侧重社会文化与外在机制。社会所认可与期待的“标准”男性，“他”是漫长的社会教育与培养的产物。安妮·伦巴第（Anne S. Lombard）的《制造男子汉》利用了个人日记、法庭记录与医学文献等资料，考察新英格兰定居的清教徒培养男子汉的社会机制。成为男性并非只意味着生理发育的成熟，而被看作是某种摆脱所依赖女性、走向可效仿男性的过程。社会为男性树立了成熟的榜样，那些克制个人情欲、努力为家庭和国家作出贡献的男性，受到了社会的集体崇拜。杰拉尔德·汉德尔（Gerald Handel）以更为微观的视角，聚焦了一个普通工人社区中的男性，如何在人生各个阶段经历着角色的蜕变。这项研究细致地展现了普通白人男性“成为男性”而非“生为男性”的各种社会场景。^③

在私人化的场域中，男性的家庭角色引起研究者极大的兴趣。研究者对于父亲身份的理解，在新的学术话语下发生了变化。社会越来越期待男性打破刻板的家庭形象，如迈克尔·兰布（Michael E. Lamb）等人的研究发现，父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这种描述下，父亲的角色被理解为

^① Robert Bly, *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 Mass.: Addison-Wesley, 1990; 荣格的研究，参见 E. Jung, *Animus and Anima*, New York: Spring Publications, 1969; E. Jung, *Aspect of Masculin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神话诗歌”流派，还可参见 John Rowan, *The Horned God: Feminism and Men as Wounding and Heal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7.

^② Victor Seidler, *Man Enough: Embodying Masculinities*, UK: Wiltshire, 1997, pp.14-16. 对历史上“主观性”的研究，见 Seidler, *Rediscovering Masculinity: Reason, Language and Sexual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Seidler, *Unreasonable Men: Masculinity and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94; Seidler, *Man Enough: Embodying Masculinities*, UK: Wiltshire, 1997.

^③ Anne S. Lombard, *Making manhood: growing up male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Gerald Handel, *Making a life in Yorkville: experience and meaning in the life-course narrative of an urban working-class man*,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0. 人生历程与社会化，可参阅 Joseph Kett, *Rites of passage: Adolescence in America, 1790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John Demos, *Past, present, and personal: the family and life cours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自由建构的身份。不同的社会都强制地形成法律与制度，促成男性有别于女性的家庭身份，它涉及婚姻制度、劳动分工以及性生活等领域，深刻影响着规范性男性气质的建构。^① 男性气质同样获得了性经验、身体与同性恋研究的关注。男性气质被认为与厌女症和恐同症相关，它通过对身体与性行为的严格控制，将异性恋男性定义为专门的类别。为了使身体、性经验与性别建立固定的意义，需要形成强制性的异性恋文化。性别在规范性行为的标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异常的性行为多种多样，然而社会却强制界定性别与性行为的关联。其他的“异常”行为，并没有形成如此稳定的身份认同。夏娃·塞奇维克评论说，“他或她必然被分配为男性与女性，现在也被认为必然可以被分配为同性恋与异性恋，这种二元划分充满了歧义，无论多么令人困惑……却没有在文化中留下任何商讨的空间。”^②

新的研究将性别从男女之间的私人领域转向了阶级、种族、国家等更多公共维度。盖儿·彼得曼（Gail Bederman）的《男子气概与文明》揭示了美国社会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的关系。她以黑人拳击手击败白人所引发的社会骚乱为个案，揭示了种族主义者在面对挑战时流露的性别焦虑。其后，她又追踪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男性理想，阐释了这些观念如何服务于美国主流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利益。亨利·弗伦奇（Henry French）等人的《男性庄园》是第一部专门针对英国拥有地产的绅士阶层的研究，使用的资料是1680至1900年间英格兰全境19个家庭的4000多封信件。其中记录的不是冠冕堂皇的道德训诂，而是历史学家近年来感兴趣的主观经验。艾丹·贝蒂（Aidan Beatty）对比了英语、爱尔兰语以及希伯来语中不同的档案资料，追溯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如何汲取犹太人反抗种族压迫的经验，重新塑造自尊并且高度性别化的政治形象。^③

男性气质何以在公共领域确立权力，公民权与性别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杰夫·赫恩的《公共视野中的男性》探讨了公共权力与男性统治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父权制的考察，不应当局限在男人对女人确立的统治，而应着眼于公共领域如何确立对私人领域的统治，后者使得性别问题有机会上升到对国家政治的考察。马克·凯南（Mark E. Kann）在《男人的共和国》中指出，美国的建国一代立志打造民主与平等的“男性共和国”，又担心那些“闲杂男性”会威胁它的建立与稳定。于是，他们在政治与社会活动中，频繁使用“家庭男性”的典范形象。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男性被赋予公民权，而与

^① 强调父亲的育儿角色，见 Michael E. Lamb, *The role of the father in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1981; Samuel Osherson, *Finding our fathers*,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父亲身份的建构，见 Ana Jordan, *The new politics of fatherhood: Men's movements and masculinities*, New York: Springer, 2019; Barbara Hobson, ed., *Making men into fathers: Men, masculinities and the social politics of fatherh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Thomas Johansson and Jesper Andreasson, *Fatherhood in transition: Masculinity, ident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Springer, 2017.

^② Jeffery Weeks, *Sexuality and its discontents: meanings, myths & modern sexualit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5, p.190;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p.151; Eve K.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2. 性经验及同性恋最新研究，可参考 Robert J Corber, *Homosexuality in Cold War America: Resistance and 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Giovanni Vitiello, *The libertine's friend: Homosexuality and masculin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Sean Brady, *Masculinity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Britain, 1861-1913*, Berlin: Springer, 2016.

^③ Gail Bederman, *Manliness &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Leonore Davidoff, and Catherine Hall, *Family fortunes: Men and women of the English middle class 1780-185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7; Aidan Beatty, *Masculinity and power in Irish nationalism, 1884-193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种族、阶级与国族认同，更多可参阅 Thomas R Metcalf, “Colonial Masculinity: The ‘Manly Englishman’ and the ‘Effeminate Bengali’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in *Victorian Studies*, vol. 39, no.4, 1996; Ann McClintock, *Imperial leather: Race,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 London: Routledge, 2013; Martin Anthony Summers, *Manliness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Black middle clas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sculinity, 1900-1930*,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4; Henry French and Mark Rothery, *Man's estate: landed gentry masculinities, 1660-19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Richard Smith, *Jamaican Volunteer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Race, masculin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Matthew basso, Laura McCall and Dee Garceau, eds.,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culture of manhood in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之共同奋斗的社会底层被剥夺了公民权。露丝·布鲁赫 (Ruth H. Bloch) 追溯了男性气质如何排斥妇女参政。她发现，18世纪的美国盛行着“共和母亲”的修辞，女性被视为共和美德的重要来源。这并不代表妇女政治地位的显著提高。现代共和政体不再区分那些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正直男性”与那些仅仅追求个人利益的“势利小人”。美德被视为权力之外的特征，在这一时期它不再为男性气质所独有，而成为女性气质最好的隐喻。^①

男性气质如何维持机构化的国家机器，如何依靠政府、军队、工厂、监狱、学校、体育获得权力，这方面研究成果颇丰。达娜·布里顿 (Dana M. Britton) 等人的研究表明，尽管军队提供了滋生同性性行为的场域，也尽管性行为对象与战斗能力的关系很小。然而，军队成为最严厉镇压同性恋的机构，这表明国家机器将男性气质看作维护武装力量的重要途径。迈克尔·布朗的《像一只忠诚的军队》展现了维多利亚时期公共医疗机构中的工作者，挪用男性气质的军事修辞，提高自身社会地位，他们同贵族的私人医生展开竞争，在公共卫生事业中发展了现代医生新形象。乔克·菲利普 (Jock Phillips) 的研究发现，政府机构也经常利用男性气质来治理社会。20世纪初，新西兰移民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性别失衡，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在不同时期，政府通过使用男性气质的不同修辞，对社会暴力、军事动员、家庭与社区管理进行操控。克里斯汀·休厄德 (Christine Heward) 描绘了英国的学校通过校规、服饰、学术等级以及体育运动等方式，塑造受人尊敬的男性气质以及中产阶级家庭对待性别与阶级的态度。^②

相对于机构化的权力而言，知识结构的男性化显得更不易察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知识生产中积累了难以跨越的性别壁垒，而男性气质悄悄渗透到了学科与知识建构的基础中。在《旧情人：女性、艺术与意识形态》中，格里塞尔达·波洛克 (Griselda Pollock) 并不满足于提醒人们曾有大量被遗忘的女性艺术家，而是思考“艺术”与“艺术家”如何成为一个完全男性化的概念。她指出，在构成艺术史的话语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女性艺术家被描述为男性同行的追随者与学生，她们的作品缺少某种男性“艺术家”创作的核心价值。女性制作的“装饰意义上”的作品，不足以被保存、策划、展览以及解释。玛丽·迪根 (Mary J. Deegan) 的研究表明，通过垄断或者重新定义男性气质，男性确立了在学术内部的优势地位。她指出，芝加哥学派的女性学者最早倡导社会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但在后来的学术史中，这种方法及其背后的科学意识逐渐与男性气质联系在一起。^③

① Jeff Hearn, *Men in the public ey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public men and public patriarch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Mark E. Kann, *A republic of men: the American founders, gendered language, and patriarchal politic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1998; Ruth H. Bloch, *Gender and Morality in Anglo-American Culture, 1650-180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男性气质与公共生活，更多可参阅 Stefan Dudink, Karen Hagemann and John Tosh, eds., *Masculinities in politics and war: gendering modern hist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Stefan Dudink, Karen Hagemann and Anna Claek, eds., *Representing masculinity: male citizenship in modern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Robert B. Donald, *Manhood and patriotic awakening in American Civil War: The John E. Mattoon letters, 1859-1866*, Maryland: Hamilton Books, 2008; Marjorie Levine-Clark, *Unemployment, Welfare, and Masculine Citizenship: So Much Honest Poverty in Britain, 1870-1930*, Berlin: Springer, 2015.

② Dana M. Britton, and Christine L. Williams, “‘Don’t Ask, Don’t Tell, Don’t Pursue’: Military Polic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eterosexual Masculinity”, i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vol.30, no.1, 1995, pp.1-21; Michael Brown, “‘Like a devoted army’: medicine, heroic masculinity, and the military paradigm in Victorian Britain”, in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49, no.3, 2010, pp.592-622; J. Phillips, “Mummy’s boys: Pakeha men and male culture in New Zealand”, in P. Bunkle and B. Hughes, eds., *Women in New Zealand Society*, Aileen & Unwin, 1980, pp.217-243; Phillips, “Rugby, War and the Mythology of the New Zealand Male”,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1984, vol.18, pp.83-103; Christine Heward, *Making a Man of Him: Parents and their Sons’ Education at an English Public School 1929-50*, London: Routledge, 1988. 更多男性气质与代理机构，可参阅 Varda Burstyn, *The Rites of Men: Manhood, Politics, and the Culture of Sport*,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David G. Barrie, Susan Broomhall, *A History of Police and Masculinities, 1700-2010*, London: Routledge, 2012; Matthew Maycock, Kate Hunt,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Prison Masculiniti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③ Griselda Pollock and Roziska Parker, *Old Mistresses: Women, Art, and Ideology*, New York: Pantheon, 1981; Griselda Pollock, *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Histories of Ar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Linda Nochlin, *Women, Art and Power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8; Mary J. Deegan, *Jane Addams and the*

在制度与知识结构之外，男性气质还通过形形色色的艺术表现，建构虚构中的美好形象。琼·兰德斯（Joan B. Lands）的《让国家视觉化》敏锐地注意到革命视觉文化中男性化的政治宣传。大革命时期，国家被描绘为理想的女性形象，使得爱国主义中融入了男性集体的政治意识。尽管政治领导层怀疑女性气质的危险，并担忧视觉图像的诱惑力，却仍然借助广泛传播的女性形象，破坏专制主义传统男性气质背后的国家形象。杰森·索林格（Jason Solinger）的《成为绅士》考察了一系列涉及男性气质的文本，将“成为绅士”视作文化资本进行的话语斗争。对性别、阶级和劳动的现代概念，是伴随着重新定义绅士的过程而出现的，它通过与男性行为相关的书籍、小说、诗歌与流行杂志而被民众所接受。^①

五、结语

当代西方男性气质研究借鉴了女权主义的有益经验，也很大程度上克服了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既往的研究一味针对男性霸权进行批判，而忽略权力构架更为复杂的关系。性别不仅仅是“男性”对于“女性”的关系，它也是男性与“自我”以及男性“内部”之间存在的复杂结构。“成为”男性，意味着获得某种性别层面上的霸权，但这一过程往往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并非所有男性都获得了同等权力，绝大多数成员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少数女性甚至会因为与男性气质间的关系，占据某种容易被忽略的优势地位……这些新视野拓宽了父权制命题下性别的传统叙事，促使研究者思考权力运作的其他可能维度，涉及到国家、阶级、种族以及其他社会与文化的重要范畴，也由此推动了性别研究从私人领域转向更多公共领域的话题。作为一种权力分析的工具，男性气质引起越来越多学科的广泛关注。

另一方面，男性气质研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性别研究更侧重女性议题的现状。相关领域的学者仍然以女性为主，其研究的立场也大多基于女性视角展开。而男性学者的参与，以及男性问题的讨论，虽然取得了明显进步，却仍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在关注男性群体在社会文化中真实处境的同时，学术研究应当避免仅仅关注男性的自我利益而压制女性诉求的倾向。新的学术成果同样触及了过往研究中的性别盲点，为搭建客观多元的学术研究，以及男性重新参与讨论提供新的契机。

责任编辑：郭秀文

men of the Chicago school, 1892-1918,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Mary J. Deegan, *Annie Marion MacLean and the Chicago Schools of Sociology 1894-1934*,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更多学科建构，可参阅 Charlotte Hooper, *Manly States: Masculiniti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Heather Ellis, *Masculinity and Science in Britain, 1831-1918*,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① Joan B. Lands, *Visualizing the nation: gender, representation and revol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Jason Solinger, *Becoming the gentleman: British literatur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masculinity, 1660-1815*, New York: Springer, 2012. 更多相关研究，可参阅 Joseph A. Kestner, *Masculinities in Victorian painting*, UK: Scholar Press, 1995; Andrew P. Williams, ed., *The image of manhood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Viewing the male*, Connecticut: Green Press, 1999; Karl M. Kippola, ed., *Act of manhood: the performance of masculinity on the American Stage, 1828-1826*,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Karen Bourrier, *The Measure of Manliness: Disability and Masculinity in the Mid-Victorian novel*,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 Jachinson Chan, *Chinese American Masculinities: From Fu Manchu to Bruce Lee*,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关于《世说新语》元刊本的几个问题^{*}

宁稼雨

[摘要]《世说新语》元刊本是现存版本中仅晚于宋本的较早刊本，学界关注较少。近年逐渐引起学者注意，陆续有相关成果发表，但很多问题仍然未能澄清释疑。在参照吸收前人成果并全面梳理元刊本的基础上，可以就元刊本底本问题、与唐写本及尊经阁藏宋本关联问题、与其他宋本关联及版本价值问题、元刊本本身卷帙问题、元刊本刘辰翁评点作伪问题等进行考索探析，以促使元刊本相关问题研究向前推进。

[关键词]《世说新语》 元刊本 刘辰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142-11

《世说新语》元刊本是现存版本中仅晚于宋本的较早刊本，学界关注较少。近年逐渐引起注意，潘建国和周兴陆教授陆续有相关成果发表。^①这些研究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笔者近来在研究中发现，关于《世说新语》元刊本，乃至整个《世说新语》的版本研究，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这里仅就元刊本的几个相关问题做些论述，期盼方家指正。

一、元刊本自然面貌与递藏过程

元刊本《世说新语》见于以下文字记录：(1)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五子部小说类：“《世说新语》……又，元椠本，昌平学藏。”^② (2)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世说新语》……刘辰翁批点之本分为八卷，亦因是书分析卷帙也。元至正务本书堂刻本则据陆本，明正德仁实堂本则依刘本。明万历王世贞刻本则出于仁实堂本者也。吴郡袁粲万历中所刊者则以务本本为渊源者也。”^③ (3)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子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八卷，元刊本。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须翁刘辰翁批点，刘应登序。”^④ (4)日本阿部隆一《中国访书志》：“《世说新语》八卷，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元]刘应登校，题宋刘辰翁批点。[元·建]刊[元]修，八册。”^⑤ (5)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子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八卷八册，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点，元至元二十四年刘应登原刊元坊肆增刊评语本。”^⑥ (6)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子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17ZDA25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宁稼雨，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①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刘辰翁”评点实系元代坊肆伪托》(以下简称《〈世说新语〉元刻本考》)，《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后收入作者《古代小说版本探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周兴陆：《元刻本〈世说新语〉补刻刘辰翁评点真伪考》，《文艺研究》2011年第11期。

② 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12页。

③ 贾贵荣辑：《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3册，第336页。

④ 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57-758页。

⑤ [日]阿部隆一：《增订中国访书志》，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第528页。

⑥ 台北图书馆编印：《“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子部，台北：台北图书馆，1986年，第650页。

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八卷八册，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批点，元坊刊本。”^① (7) 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小说家类：“《世说新语》八卷，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评。元刊本，共四册。内阁文库藏本，原河本立轩，昌平坂学问所等旧藏。按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五著录昌平学藏元刊本《世说新语》八卷，即此本，其识文曰：‘刘辰翁批点删略注文。’”^②

据以上记录，元刊本现存以下三种版本。

一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即森立之、王国维、严绍璗记录之本。该本八卷，四册。首册封面题“世说新语元板一之二”，上钤“日本政府图书”藏印，中间贴三枚内阁文库藏书签。首页为“耘庐刘应登”序，钤有“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书籍馆印”“日本政府图书”等收藏印章。该序大字写刻，半叶五行，行十三至十五字。正文卷一首页首行顶格题“世说新语卷第一”（后七卷除卷四此处失题外，余均同此），第二、第三两行均低四格，题署“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须溪刘辰翁批点”，第四行低两格，刻“德行第一”。正文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注文小字双行，低一格，行十七字。各卷末顶格题“世说新语卷×”，卷八末题“世说新语卷八终”。各卷批文以阴刻“批”字引领，批文插在注文中，字更小。书中撰注、批点人姓名惟卷三、卷七、卷八尚存，余皆剜去，注亦删削过半。另有若干页字体与全书不合，应为补刻。综上所述，内阁文库本应非原版，而是经过剜改的后印本。

二为台北图书馆藏本，即阿部隆一、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记录之第一种（台A本）。该本八卷，八册。原书无封面，内封一贴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书签。内封二为清代学者叶昌炽光绪十一年（1885）墨书跋语。后为原书正文，首为刘应登序四页，首页钤有“元本”“馀园藏书”“云川许氏怀辛斋书籍”等藏印。“馀园”其人未详。“云川许氏怀辛斋”为近代藏书家许厚基。序后为正文。正文首页钤有“酈燕緝收藏经籍印”“濂亭”“张裕钊图书印”“怀辛居士”“怀辛所见宋元秘籍”“吴兴许氏怀辛斋藏”“博明怀辛主人藏书印”等藏印。酈燕緝即晚清著名藏书家查燕緝。张裕钊（1823—1896），号“濂亭”，近代藏书家。“怀辛”为许厚基号。从刘序开始，该本内容与日本内阁文库本基本相同，所不同处为其中四卷（卷一、卷二、卷四、卷六）卷首失题，说明二者为同一版本。但根据版本差异，潘建国判断该本的印刷时间要晚于日本内阁文库本。^③

三为台北图书馆藏本，即阿部隆一、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记录之第二种（台B本）。该本亦八卷八册，钤有“天尺楼”“寒云秘笈珍藏之印”“芹圃藏书”等藏印，分别为近代、民国时期藏书家刘世瑷、张芹伯、袁克文藏书印。该书版式、行款和题署文字均与内阁文库本和台A本相同，但刘辰翁批语的字体与内阁文库本和台A本有别。潘建国判断该本为书贾用明正德四年（1509）赵俊刻本撤去跋语，冒充元刊本。^④

从以上版本记录情况看，三个元刊本各有不同递藏过程。

内阁文库本。该本没有中国藏家藏印，从该本的藏印来看，先后经过了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内务省文库、日本政府图书藏书几个阶段。

台A本。该本所留藏印共11枚，主要涉及晚清近代藏书家和台北图书馆。入台之前，该本实际上基本只有两位藏主，先为查燕緝，后为许厚基。查燕緝（1843—1917），清末藏书家，字翼甫，号櫩亭。其先为浙江海宁袁花人，居于江苏苏州。咸丰庚申（1860）之乱，避乱迁徙至武昌，拜张裕钊为师，后被聘为纂修《湖北通志》。查氏世有藏书之风，先祖查升、查慎行等，均为前清藏书名家，他亦受其濡染，藏书日富；与叶昌炽为知交，叶昌炽在其《缘督庐日记》中曾多次记载到其书斋中观宋元本之事。该本前叶昌炽题识即当为至查氏书斋时所为。查燕緝藏书处为“木渐斋”，藏书印为“日精草堂”“家在苏州

① 台北图书馆编印：《“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子部，第650页。

② 严绍璗编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子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53页。

③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古代小说版本探考》，第57页。

④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古代小说版本探考》，第57页。

望信桥”“查燕下字翼夫”“查燕煦（绪）收藏经籍印”等。著有《櫺亭诗文集》《群书异话》等。该书“濂亭”“张裕钊图书印”均为张裕钊藏印。以二人关系视之，查燕绪师事张裕钊，当以所藏善本分享于张，张得以盖其藏印纪念。该本在查燕绪之后的藏主为许厚基。许厚基（？—1958），字博明，号怀辛，别署怀辛阁主人，一作许博明，近现代藏书家。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居于苏州。家世饶于资，广收宋、元、明本古籍。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袁氏“五研楼”、姚氏“咫进斋”等家藏书零星散出时，他购得若干明刻本和名人精校本，在上海古书流通处等书肆又购各藏书家散出旧籍。曾编有藏书书目，录宋元明善本149种（此本当在其中），明清抄本近百种，经藏书名家缪荃孙、傅增湘过目审定。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占苏州，许厚基所藏部分善本古籍被上海来青阁书店杨寿琪所购，后又被中央研究院图书馆购得，并于1949年迁入台湾，该本当随此路径流入台北图书馆。

台B本。该本三个藏印，“天尺楼”为刘世瑷藏印。刘世瑷生卒里籍未详，民国时期藏书家，文献学者。著有《征访明季遗书目》，编有《天尺楼丛钞》。以生活年代看，刘世瑷应为该本三位藏家之第一位。“寒云秘笈珍藏之印”为袁克文藏印。袁克文（1890—1931），民国著名收藏家、藏书家，字豹琴、豹岭，一字抱岑、抱存，因得宋王晋卿《蜀道寒云图》而取号“寒云”。河南项城人，袁世凯次子。虽家世显赫，但有志于学，颇富收藏。曾师从方尔谦、李盛铎学版本古籍收藏，花重金购藏善本古籍。先后得卢文弨、莫友芝、徐坊、吴昌绶、杨守敬、邓邦述等藏书大家的宋元明精椠数百种。其藏书印有“寒云秘笈珍藏之印”等三十余种。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其家道日衰，晚年居上海，以抵押珍藏善本、卖字、卖文为生。所藏珍本部分为傅增湘、丁福保、叶德辉、刘承干等藏书家所购。袁氏所藏元刊本《世说新语》流入上海大藏书家张乃熊之手。张乃熊（1891—1942），字芹伯，号莲圃，浙江湖州南浔人，“芹圃藏书”为其藏印。张氏为上海藏书世家，其父张均衡（字石铭）刻有“适园丛书”，其“适园藏书”奠定张氏藏书雄厚基础。张乃熊为均衡长子，继承其父藏书，又继续扩大。编有《莲圃善本书目》，收宋本88部，元本74部，明本407部，清乾嘉以来藏书名家黄丕烈校并题跋者101种。抗战时南浔沦陷之前，张乃熊将全部藏书运往上海，并于1941年底经郑振铎和徐森玉介绍全部售给当时的中央图书馆。1949年迁入台湾，成为台北图书馆善本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元刊本底本蠡测

刘应登在刊印元刊本序中说：“丙戌长夏，病思无聊，因手校家本，精划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明年以授梓。”^①可知底本为其家藏本。但此本已经过刘应登的“精划其长注，间疏其滞义”，所以今传元刊本已非其原貌。因该本今已不存，其原貌不得而知，但倘能在蛛丝马迹中摸索原貌一二，对深入研究《世说新语》元刊本的原貌和价值，乃至整个《世说新语》的版本研究，都很有意义。

学界首先提出元刊本底本问题的是潘建国。他在对比元刊本与宋本、湘中本、袁襄刻本这三种与《世说新语》宋代版本关系甚密的版本后认为，元刊本与湘中本应同属一个版本系统。其论证过程和主要依据是：一方面，有18例元本与湘中本相同而与宋本、袁本相异的情况；另一方面，有八例湘中本与其他三本不同的情况。前者是元刊本与湘中本同属一个版本系统的根据，后者则是湘中本刊刻时校改所致。^②潘氏此说第一次提起元刊本底本的问题，而且搜集了不少证据材料，证明元刊本与湘中本同出一源的可能性，给人以很大启发。但目前仅凭这些材料，还不足以证明元刊本与湘中本同源同版。首先，八例湘中本与其他三本不同的情况，与元刊本和湘中本同出一源之说相左，将其解释为湘中本刊刻时校改，显然不够充分。这只能说是一种可能性，但同时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如果其他可能性的可信度更大，那么这些材料就要反过来用了。其次，潘氏提出此说之前，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一种可能性：元刊本底本的来源，只能从尊经阁本、湘中本、袁襄本（陆游本）当中寻找。这也值得商榷。事实上，尊经阁本、湘中本、袁襄本（陆游本）只是我们今天能够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世说新语》宋本版本面貌。

① 转引自刘强：《〈世说新语〉资料汇编》上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20年，第214页。

②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古代小说版本探考》，第60页。

这并不是说，除了这些版本材料，就没有其他可以寻找宋代或之前版本的渠道和可能性。

在笔者看来，尊经阁本、湘中本和袁裴本（陆游本），这三个版本代表了迄今为止《世说新语》存世文字的三种重要形式，它们分别为：以尊经阁本为代表的完整存世宋本；以袁裴本为代表的经明人整理后刊印的陆游宋本；而所谓湘中刻本原藏传是楼，20世纪初尚存世，但后来不知去向，所幸清初以后有若干藏书家曾用该本对袁本、刘辰翁本、博古堂本进行校勘，留下很多批校，这些批校大致反映出湘中本的版本面貌，所以目前湘中本是一个以批校形式存世的《世说新语》版本系统。除了以上三种版本形式外，尚有其他版本形式。其中唐写本残卷世所共知，也广为使用，遗憾的是唐写本只是断简残篇，并非全豹。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版本形式却为校勘学者和研究者所忽略，这就是元代之前的唐宋类书和各种注疏中保留的《世说新语》佚文。经笔者检索，在《文选》李善注和唐宋时期重要类书如《初学记》《白氏六帖》《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海录碎事》《事文类聚》等中存有大量《世说新语》佚文。我们知道，尊经阁本的刊刻时间是宋绍兴年间，而以上类书和注疏作者除《事文类聚》编者祝穆略晚于绍兴年间，《海录碎事》编者叶廷珪为绍兴年间人外，其余均在绍兴年间之前。也就是说，这些类书和注疏所引《世说新语》文字，时间上均早于尊经阁本。所以，这些文献是考察《世说新语》早期版本面貌的重要渠道，是上述三种《世说新语》早期版本形式之外的一个重要版本研究资源，同时也是研究元刊本《世说新语》底本问题的重要文献资源。

笔者用元刊本部分文字与唐宋类书和注疏进行校勘后，发现大量与现存《世说新语》早期版本具有校勘价值的文字。这些文字足以改变我们对元代之前《世说新语》版本情况的认知，并且能够给《世说新语》元刊本的底本问题带来新的答案。具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元刊本与尊经阁本、湘中本、袁本相同，诸类书本与之不同。如例1：文学3“郑玄家奴”条，元刊本与宋本、袁本均作“复有一婢来”，《白氏六帖》作“复有一婢”，^①《初学记》作“一婢”，^②《艺文类聚》作“一婢”。^③例2：文学3“郑玄家奴”条，元刊本与宋本、袁本均作“薄言往憩”，《白氏六帖》作“薄言往诉”。^④例3：文学13“诸葛玄年少”条，元刊本与宋本、袁本均作“诸葛玄”，《北堂书钞》作“诸葛恢”。^⑤例4：文学17“初注《庄子》”条，元刊本与宋本、袁本均作“旨要”，《文选》李善注引作“指要”。^⑥这种情况表明，在现存宋本、元刊本和据宋陆游本整理而成的袁本之外，还有其他版本的文字材料存世。第二种情况是，元刊本与宋本、湘中本、袁本之间有文字歧异，类书等文献与这些歧异或异或同。如例1：德行7“客有问”条，“客有问”三字，元刊本作“或问”，宋本、湘中本、袁本均作“客有问”，而《艺文类聚》作“客问”，与诸本皆不同。例2：德行24“郗公”条，宋本作“郗”，元本作“鄮”，《蒙求》卷下注引《世说》作“郗”，《白氏六帖》卷六引作“鄮”，《太平御览》卷三六七、四八六、五一二引作“郗”，刘辰翁批“‘郗’误作‘鄮’，后同”，冯舒校“‘郗’应作‘鄮’”，沈剑知校：“按《北堂书钞·太尉》、《初学记》卷十一、《事类赋注》‘燕’引臧荣绪《晋书》作‘鄮鉴’。《元和郡县图志》二十五‘郗’亦作‘鄮’，皆误。”^⑦例3：德行33“谢奕”条，元本作“著”，宋本、袁本作“箸”，《太平御览》作“着”。^⑧例4：德行37“晋简文”条，元本、宋本、湘中本作“悦”，袁本作“说”，《事文类聚》作“悦”。^⑨例5：德行38“范宣”条，元本、宋本、湘中本作“晖”，袁本作“暉”，《太平御览》卷四二六和卷六九六分

① 《白氏六帖》卷六，静嘉堂藏宋本。

②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64页。

③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35页。

④ 《白氏六帖》版本同上。

⑤ [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卷九十八，天津：天津古籍书店，1988年，第411页。

⑥ [梁]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一颜延之《五君咏·向常侍》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04页。

⑦ [明]张自烈、[清]廖文英：《正字通》，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

⑧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一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348页。

⑨ [宋]祝穆：《事文类聚后集》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别作“裈”和“裯”，^①《事文类聚》作“禅”。^②以上两类情况充分证明，在现存宋本和宋本演变本（湘中本和袁本）之前，唐宋类书及注疏文献中还存有大量《世说新语》佚文。这些佚文所使用的版本往往与现存本有较大出入，因而具有重要校勘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类书本身所征引《世说新语》文字就不止一种版本，从而为现存宋本《世说新语》之前的版本认知提供了重要渠道线索。

对于元刊本来说，这些唐宋类书与注疏文献的《世说新语》文字不但具有重要校勘价值，而且为元刊本的底本追溯提供了新的渠道和范围。先前因为见不到其他版本而把元刊本底本的追溯范围锁定在宋本、湘中本、陆游本当中的预设也就因此而可以解除了。因为，唐宋类书等文献中不但具有诸多与今传宋本不同的佚文文字，而且还有能够直接支持它们中的某些版本与元刊本之间存在渊源关系的证据。这些证据的直接表现是：元刊本与三种宋本系统不同，但与唐宋类书所引文字相同。例如德行 6 “陈太丘”条，“膝前”二字，元刊本作“膝前”，宋本、湘中本、袁本均作“鄰前”，而《白氏六帖》正作“膝前”，与元本相同。由此可见，有直接证据证明，元刊本的底本渊源，并非出自湘中本，而是出自唐代类书所征引的《世说新语》版本。关于元刊本底本出自湘中本，以及湘中本的反例现象系刊刻时校改所致的说法，还有重新考察的必要。虽然元刊本的底本在唐宋类书中已经有蛛丝马迹可寻，但因为这些类书未明示引书版本来源，故而其所据底本具体为何仍然难以确指。所幸汪藻《叙录》综述了当时经眼所见的若干《世说新语》版本，笔者在《日本尊经阁藏〈世说新语〉版本文献价值》一文中，曾将这些版本胪列为 15 种版本。汪藻为作《世说叙录》用力甚勤，其所见《世说新语》版本在当时号称最富，如无意外，元刊本所据底本当在这 15 种版本当中。

三、唐写本《世说新语》与现存宋元刊本的版本关联

从上文可见，元刊本的祖本，应该在现存几种宋本系统之前唐宋类书及注疏征引之本中，可能在汪藻《叙录》所述 15 种版本中，但具体何种版本已不详。不过，可以通过与元刊本相关的几种文献对比较勘，大致梳理元刊本在《世说新语》版本演变过程中的位置和作用，从而评价其版本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唐写本与宋元刊本之间版本关联的考察。

从唐写本与宋元刊本的关系来看，虽然唐写本只是断简残篇，但通过现存文字与宋元刊本对校可以发现，从唐写本到宋元刊本，《世说新语》的文字发生了重大调整和改变。这些调整和改变不是简单的个别文字版本歧异问题，而是大面积主动的文字调整修饰。唐写本中很多冗繁的字词在宋元刊本中被简化精炼，一些错字、漏字被修改补足（见表 1）。对比之下，能够明显看出，整理润饰之后的宋元刊本文字更加准确精炼，是《世说新语》版本演进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化和飞跃。这些事例的共同特点是，宋本、袁本、元刊本对于唐写本的改动都完全一致。由此可以产生这样的推测：倘若宋本、袁本、元刊本三者是唐写本之后的第一次改写整理，那么三者不可能如此大面积文字一致。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在唐写本之后，宋本、袁本、元刊本之前，已经存在一个将唐写本版本系统进行系统整理润饰的、几乎接近《世说新语》定本的版本（下简称“定本”）。所以三种版本才会出现大面积文字相同的情况，而这个版本应该就在汪藻《叙录》所胪列的 15 种版本当中。

但是，如果继续追踪，又会发现新的情况，那就是对于唐写本进行整理润饰的工作似乎并未结束。三种版本在承袭定本的同时，也都存在继续对唐写本（或者是唐写本的整理定本）进行调整改进的现象（见表 2）。例 1-3 说明：有些地方定本未改，宋本和袁本承袭定本未改，而元刊本（或其底本）作了改动；例 4 说明：有些地方定本未改，宋本、袁本和元刊本（或其底本）则分别做了不同的改动。以上四例不仅证明定本之后各本文字部分歧异情况，同时也证明元刊本的底本应该与宋本、袁本（应当还包括湘中本）不同，是另外一个版本系统，这也是元刊本底本并非出自湘中本的另外一个旁证。

①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四二六，第 1964 页；卷六九六，第 3018 页。

② [宋]祝穆：《事文类聚后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表1 《世说新语》宋元刊本对唐写本字词的改动

序号	出处	唐写本	元刊本	宋本	袁本
1	规箴 14	翹須	丞相翹須	丞相翹須	丞相翹須
2	规箴 16	可从	请从	请从	请从
3	规箴 21	伦伍	论成	论成	论成
4	规箴 26	并弄权要	并上下权要	并上下权要	并上下权要
5	规箴 26	为作此歛歛	为此歛歛	为此歛歛	为此歛歛
6	规箴 27	文静	文靖	文靖	文靖
7	捷悟 3	魏武曰	魏武乃曰	魏武乃曰	魏武乃曰
8	捷悟 3	不如	不及	不及	不及
9	捷悟 3	卅里觉	乃觉三十里	乃觉三十里	乃觉三十里
10	夙慧 1	丘问之炊何留	太丘问炊何不馏	太丘问炊何不馏	太丘问炊何不馏
11	夙慧 1	今皆成糜	今成糜	今成糜	今成糜
12	夙慧 1	佛记之	鬱志之	鬱志之	仿佛志之
13	夙慧 3	异昨日之言耶	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	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	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
14	夙慧 3	举目则见日	举目见日	举目见日	举目见日
15	夙慧 5	著	且箸襦	且箸襦	且箸襦
16	夙慧 5	儿云	乃云	乃云	儿云
17	夙慧 5	不复须裈	不须复裈也	不须复裈也	不须复裈也
18	夙慧 5	儿云	答曰	答曰	答曰
19	夙慧 5	火在斗中而柄尚热	火在熨斗中而柄热	火在熨斗中而柄热	火在熨斗中而柄热
20	夙慧 5	故云	故	故	故
21	夙慧 6	年十三四	年十二	年十二	年十二
22	夙慧 6	体	圣体	圣体	圣体
23	夙慧 6	夜静	昼动夜静	昼动夜静	昼动夜静
24	夙慧 7	桓武	桓宣武	桓宣武	桓宣武

表2 《世说新语》宋元刊本对唐写本字词的改动(续)

序号	出处	唐写本	元刊本	宋本	袁本
1	规箴 27	谢混曰	谢混諫曰	谢混曰	谢混曰
2	规箴 26	大不平	太不平	大不平	大不平
3	夙慧 1	不	否	不	不
4	捷悟 3	未可言	姑未可言	卿未可言	卿未可言

四、元刊本与其他宋本系统的关联及其版本价值

除了在唐写本与宋元刊本系统的对应关联中能够看出元刊本的一些版本特征价值外，元刊本(或其底本)的版本价值应该在与现存其他宋本系统(宋本、湘中本、袁本)的校勘对比中呈现出来。

第一，元刊本与湘中本、袁本校勘宋本(见表3)。表3诸例中，例1-2、例5-8均为字形相近讹误，例3-4为分段歧异。如例3：宋本本条与下条“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合为一条，元刊本、袁本以下均为两条。《艺文类聚》卷六五、卷八三，《事类赋》卷九，《太平御览》卷四〇九、卷七六四、卷八一、卷八二四，《太平广记》卷二三五，《事文类聚》续集卷九，诸书引此均独立成条。《太平广记》卷二三五作“魏管宁与华歆友善，尝共园中锄菜”。傅增湘录蒋篁亭校：“‘管宁’，宋本提行。”^①孙毓修辑沈宝砚校：“‘管宁’，提行起，连下王朗为一条。”^②佚名录沈宝砚校：“当析为二，‘管宁’，宋本提行起。”^③邓邦述校略同。冯舒校：“馏本另起一条。”^④案，“馏”同“刘”，谓刘应登元刊本。

①傅增湘过录蒋篁亭校，出自国家图书馆藏周氏博古堂本《世说新语》三卷，下同。

②孙毓修录沈巖校，见涵芬楼刊印《四部丛刊》本《世说新语》，下同。

③佚名录沈巖校，见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陈寅恪旧藏本《世说新语》，下同。

④冯舒批校，见国家图书馆藏明嘉趣堂刻本，下同。

何煌校：“‘管宁’，俞氏藏本另起。”^①戴熙芝校：“惜荫轩本误连上文。”^②管大勋本佚名校将本条分为两段，校：“管宁误行。”^③例4：宋本本条与上条连段，元刊本以下提行另起。戴熙芝录沈宝砚校：“‘王朗’，宋本连上。”傅增湘、佚名录蒋篁亭校略同。何煌校：“‘此条俞氏藏本误连一段。’以上两例元刊本与湘中本、袁本以及唐宋类书所引校正宋本分段讹误，为其版本价值的重要体现。

表3 元刊本与湘中本、袁本校勘宋本

序号	出处	元刊本	宋本	湘中本	袁本
1	德行4	高自	高目		高自
2	德行4	为己任	为己任	为己任	为己任
3	德行11	独段	连段	独段	独段
4	德行12	独段	连段	独段	独段
5	言语47	贊拜	替拜		贊拜
6	言语47	振腕	扼腕		振腕
7	言语47	竖刁	竖刀		竖刁
8	言语70	勤邦	勤王	勤邦	勤邦

第二，元刊本与宋本、湘中本校勘袁本（见表4）。表4诸例中，例1-8、例10亦为字形或字音相近讹误，其余例9、例11-15均为“绝”“殊”二字歧异出校。据潘建国考证，原文应为“殊”，“绝”乃晏殊校定该本后为避晏殊本人名讳所致。则作“殊”者，为来自未经晏殊校定的陆游本系统之袁本，而作“绝”其他三本则是经过晏殊校定之后的晏本系统。^④这与前文所述元刊本底本应为唐代类书征引《世说新语》所据本之说貌似相左，因为晏殊校本晚于唐类书所据本。这个问题可从元刊本、宋本、湘中本三本与晏殊校本关系来考虑。三本虽然均同晏殊本，但各有所本。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来自不同版本系统的元刊本、宋本和湘中本，均使用晏殊本校勘，并采用了晏殊本的部分内容。于是才会产生三本既保持其原底本的基本样貌，又吸收了晏殊校本一些做法的情况。^⑤

表4 元刊本与宋本、湘中本校勘袁本

序号	出处	元刊本	宋本	湘中本	袁本
1	德行6	载著	载著	载著	载箸
2	德行6	绲	绲	绲	餽
3	德行7	何天下	何天下		荷天下
4	德行10	俨若	俨若	俨若	严若
5	德行17	刘仲雄	刘仲雄	刘仲雄	刘仲雄曰
6	言语11	勑见	勑见	勑见	敕见
7	言语13	馆	馆	馆	館
8	言语17	吃	吃	吃	喫
9	言语107	绝迹	绝迹	绝迹	殊忤
10	政事19	閼	閼	閼	閼
11	文学56	绝不及	绝不及	绝不及	殊不及
12	文学96	绝可观	绝可观	绝可观	殊可观
13	识鉴18	绝有	绝有	绝有	殊有
14	赏誉46	绝未	绝未	绝未	殊未
15	赏誉58	绝为	绝为	绝为	殊为

① 何煌校，混杂于沈校本和蒋校本中，版本同上。

② 戴熙芝校，出自国家图书馆藏明刻《世说新语》三卷，下同。

③ 管大勋校，出自其万历七年（1579）所刻《世说新语》三卷，国家图书馆藏。

④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古代小说版本探考》，第60-61页。

⑤ 按一般避讳文字重新校刻时应改原文，但如果把三本都视为从晏殊本所出，又无法解释三本其他文字歧异之处。姑存疑待考。

第三，元刊本与另三本交叉校勘情况（见表5）。表5诸例分两种情况：其一，例1-4分两组，元本与袁本一组，宋本与湘中本一组，两组文字不同；其二，例5-12湘中本与其他三本不同。潘建国认为这些情况为元刊本底本出自湘中本的反例现象。但如果结合前四例以及上文其他文例来看，就会发现湘中本与元刊本的文字歧异现象，是四种版本文字诸多复杂现象的表现之一。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把湘中本与元刊本的文字歧异仅仅解释为湘中本刊刻时校改所致，恐难成立。这种文字歧异，既是《世说新语》版本复杂的表现之一，也是元刊本本身版本特征的具体呈现。

表5 元刊本与另三本交叉校勘

序号	出处	元刊本	宋本	湘中本	袁本
1	德行 17	掖人	不夜人	不夜人	掖人
2	德行 26	祖纳	祖讷	祖讷	祖纳
3	言语 70	商鞅	卫鞅	卫鞅	商鞅
4	言语 101	功越	功超	功越	功超
5	文学 53	共笑之	共笑之	笑之	共笑之
6	方正 53	时为会稽	时索会稽	时索会稽	时为会稽
7	识鉴 15	必兴愍恻	必兴愍恻	必兴愍恻	必兴愍恻
8	赏誉 57	亦小倦	亦小倦	体亦小倦	亦小倦
9	品藻 55	何如安石	何如安石	何如安万	何如安石
10	任诞 27	温发口鄙秽	温发口鄙秽	发口鄙秽	温发口鄙秽
11	假谲 7	年减十岁	年减十岁	年裁十岁	年减十岁
12	尤悔 11	必当蒙祐	必当蒙佑	必当蒙佑	必当蒙祐

五、关于元刊本的卷帙问题

现存元刊本分八卷，这个卷数与《世说新语》最早的版本著录一致。《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均著录两种《世说新语》，一为八卷本，一为十卷本。八卷本均署刘义庆，十卷本则署刘孝标。学界一般认为，八卷本为刘义庆原书，十卷本则为刘孝标加注之后的版本。但从绍兴八年（1138）董弁重新编辑整理《世说新语》，将原来的八卷本改为三卷本之后，三卷本成为通行版本。传统的八卷本和十卷本逐渐湮灭。所以，在宋人书目中，一方面还抄录旧书目之八卷本和十卷本，另一方面，三卷本开始逐渐崭露头角，并成为主流定本。瞿本《郡斋读书志》只著录十卷本《世说新语》，袁本《郡斋读书志》则同时著录十卷本和三卷本，至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宋史·艺文志》，则只有三卷本了。

因为从宋代开始三卷本成为通行版本，所以元刊八卷本的问世，一来流传不广，二来因与主流版本不合，颇受非议。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世说新语》三卷。宋刻《世说》三卷，刘辰翁批点刊行，元板分为八卷。……此书经须溪淆乱卷帙，妄为批点，殆将丧斯文之一端也欤！”^①因三卷本的主流地位在人们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钱曾把八卷本视为异端加以贬斥，称之为“淆乱卷帙”。潘建国认为宋代《世说新语》诸多版本纷呈，八卷本乃为恢复原书卷帙的一种尝试，无关“淆乱”。^②笔者基本赞同此说，但以为还有阐发的余地，尤其是对元刊八卷本渊源的认识，又能回到八卷本的底本是湘中本还是另有所本的话题上来。从“淆乱卷帙”的表述似乎可以令人揣测，钱曾本人好像并不了解八卷本才是《世说新语》原始版本数量的背景，所以只是把三卷本视为《世说》版本正宗。这一误解到《读书敏求记》的校证者章钰那里更加严重，他在为钱曾“淆乱卷帙”所作校证补遗中说：“《新唐书·艺文志》刘义庆《世说》八卷，晁公武《读书志》亦云八卷。则宋时已经淆乱，非须溪之过。”^③所谓“淆乱”的逻辑关系应该是：三卷本是《世说新语》正宗，所以八卷本等其他版本是对正宗三卷本的“淆乱”。

① [清]钱曾原著，管庭芬、章钰校证，傅增湘批注：《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52页。

②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古代小说版本探考》，第62页。

③ [清]钱曾原著，管庭芬、章钰校证，傅增湘批注：《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第252页。

如果这个理解不错，那么问题是：须知欧阳修等人修撰《新唐书》时，刊刻三卷本《世说新语》的董弁尚未出生。董弁刊刻三卷本《世说新语》是在南宋绍兴八年。如果说“淆乱”，是谁“淆乱”了谁，答案也是不言自明的。按照章钰的逻辑，最早“淆乱”的不是《新唐书·艺文志》，而是《新唐书·艺文志》所抄录的《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那才是八卷本“淆乱”的始作俑者。

既然《世说新语》原本为八卷，三卷本为宋人重编，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八卷元刊本到底是不是唐宋史志中著录的原始八卷本？潘建国认为元刊八卷本是将三卷本拆改重组的结果。^①此说言之成理，可备一说。尤其是在人们心目中《世说新语》最早现存完整版本只有三卷宋本的时候，这个说法应该更加合乎逻辑。不过，这个问题似乎还应该可以有其他寻找和考虑路径的可能。首先，除了宋本之外，现存唐写本也是《世说新语》重要的早期分卷参考资源。现存唐写本残卷自《规箴第十》至《豪爽第十三》，凡 51 则。尤为重要的是，唐写本残卷卷末署“世说新书卷第六”。据此，学界一般认为唐写本为带有刘孝标注的《世说新语》十卷本，而现存元刊八卷本的《豪爽第十三》在卷五。据《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八卷本为刘义庆原书，十卷本为刘孝标注后的注本，而元刊八卷本恰恰正是基本没有刘孝标注的版本。按十卷本和八卷本的大致卷数比例来推测，八卷本处于卷五位置的“豪爽”类，与十卷本处于卷六位置的“豪爽”类，应该是总卷帙排列的相同位置顺序。因此，有理由认为，元刊八卷本底本来源有可能是唐代尚存的八卷本原本《世说新语》。这样解释虽然也未必能够成为定论，但应该比元刊本底本来自湘中本更有可信度。其次，认为元刊八卷本的底本来自唐代尚存的八卷本，还有一个比较有力的旁证，即上文所引元刊本与他本（宋本、湘中本、袁本）不同，却与唐代类书文字相同的两例。这两例应该是元刊本底本出自唐代尚存本的一个重要有价值证据。当然，因为类书引文零散，其所引原书原貌仍然不得而知，以至还不能确定该原本的原貌情况。这还有待于继续发掘材料，掌握更充分证据，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六、关于元刊本刘辰翁评点作伪问题

从版本形态看，元刊本之前的《世说新语》版本，除了原文，基本上只含有刘孝标注，或含有残存的敬胤注。元刊本在版本形态方面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大量删削原书刘孝标注，二是增加了刘辰翁评点和刘应登批语。增加的两种文献为《世说新语》的版本内容增添了新的元素，是元刊《世说新语》版本形态的一个重要亮点。

近年关于该本一个热点话题是刘辰翁评点是否书贾作伪的问题。最早提起这方面话题的是叶昌炽跋语：“此书旧有二刻：一王弇州本，一袁粲本，皆三卷。此本八卷，耘庐刘应登刊。旧注删节，十无一二。间有应登自注，随文训释，无所发明。其《自序》：‘丙戌长夏，病思无聊，手校家本，明年授梓。’书中遇宋讳缺笔，应登当为宋人。丙戌，理宗宝庆二年也。然中有须溪刘辰翁评。辰翁，宋末人。宋亡上距宝庆丙戌，计四十年，其评未行，应登无由采之。反复审谛，乃知后来所窜入。何以言之？前二卷题名划去未刊，卷三始题云‘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为一行，‘须溪刘辰翁批点’为一行。此必原刻撰人、注人分列二行，后并为一行，即以所空一行补刻刘辰翁姓氏。前二卷偶脱之，或是补刻不坚，随即损落。评语皆在各条末行，挤到末行无空，则移上方，亦有竟划去本文，重为挤刻，以留余地，无越行者，此尤补刊之迹，显然可认。原刻颇精，补入之字不堪寓目。盖宋元之际，辰翁评本如《少陵诗》之类盛行于时，坊肆藉以炫售尔。”^②他提出元刊本中刘辰翁评点并非原书所有，而是后人补刻篡入。其理由有三：一是刘应登自序谓其手校家本的时间是“丙戌”，该“丙戌”为理宗宝庆二年（1226），此时刘辰翁评尚未问世，刘应登也不可能见到；二是版刻有明显挖改痕迹；三是书商借刘辰翁各种评本盛行机会牟利。三条理由中，第三条只是推测，并无证据。第二条明显有挖改痕迹，确如其言，说明刘辰翁评点文字为后来补刻进去的，原书并非如此。至于第一条，是叶昌炽自己搞错了。刘应登自序所谓

①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古代小说版本探考》，第 62 页。

② 台北图书馆藏元刊本 A 本所附。

“丙戌”，并非宋理宗宝庆二年，而应该是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①

尽管叶昌炽发现元刊本刘辰翁评点为后人补刻所加，后面“坊肆藉以炫售”似乎也有该评点为伪作的暗示，但他终未明确指出刘评为伪作。潘建国在叶昌炽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刘辰翁的评点乃为元代坊肆伪托。其理由有三：一是版刻明显挖补情况，即叶昌炽所发现者；二是从刘辰翁与刘应登的交谊来推测；三是从刘辰翁评点文字内容来证明。^②潘建国此说受到周兴陆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首先，“补刻”与“伪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其次，部分刘辰翁评内容明显是针对刘应登批；再次，刘辰翁评点与其对其他著作评点的惯例基本吻合。^③笔者基本支持刘辰翁评点非伪托说，除了周兴陆提出的几个理由外，还有以下两点补充意见。

第一点，关于古籍剜改通例与作伪之间的关系。剜改是古籍刻印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其中有些做法与作伪相关：一为剜去原书年代较近的序文，保留年代较早序文，冒充古本；二为剜去原序文中所署年份，隐蔽真实年份，以利编造更早年份；三为剜改原书牌记刊印者和年份；四为剜去出版者，冒充他本；五为剜去书口上年代或补刻页，以充原刻或更早版本；六为剜改目录和卷数，用残本冒充全本。以上六种情况，均为全书个别局部部位操作，出力少，获利大，可谓一本万利。像元刊本刘辰翁评点这种大面积补刻的情况，需要投入相当大的人力财力。如果仅从获利的角度看，有些得不偿失，或利润较少。所以采用这种大面积补刻来作伪的做法好像没有先例。周兴陆文中提到，元建安熊氏刻本《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即在该书宋本空白处补刻了刘辰翁评点。这种情况与元刊本《世说新语》补刻刘辰翁评点情况相同，以其工程浩大，目的只是为了增补刘辰翁评点，非为作伪获利计。故元刊本补刻刘辰翁评点，乃为正常补刻行为，不可以作伪视之。

第二点，衡量判断是否作伪的最后根据应该是这些评点文字是否为刘辰翁本人所作，如果是，就谈不上伪托的问题。只有能够明确断定这些评点文字确非刘辰翁本人所作，才谈得上伪托。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点已经问世八百余年，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对其作伪性质重视的原因，应该是没有人认为这个评点与刘辰翁其他评点非同一人所为。盖因评点之道，非常人所能为。看似不过为寥寥数语，随意为之，实际上却需要深厚才学积累和眼光见识，以及精妙的语言表达。历史上著名的评点大家，从刘辰翁，到李卓吾、金圣叹、脂砚斋，莫不如此。道学冬烘，酸腐秀才，倘入此道，则原形毕露。因此，测试该评点是否伪托，试将其评点拎出，加以品鉴，是业内高手，还是村野腐儒，是刘辰翁本人，还是伪托者李鬼，应该不难判断。限于篇幅，兹举几例说明。

首先，刘评善于移用诗文评笔法评点《世说新语》。如：“殷浩始作扬州，刘尹行，日小欲晚，便使左右取襆。人问其故，答曰：‘刺史严，不敢夜行。’”（《世说新语·政事》）“便使左右取襆”上有眉批：“襆，如今人包袱之类。”这句看似不起眼的解释词语的批语，却泄露出背后的几个玄机：一是此处刘孝标注未加注，但“襆”字已为宋元人所不解，故须加注。这说明批语者十分清楚六朝时词语与宋元当时语言差别，知道该在何处出注。二是解释词语这种形式看似简单，实为诗文评点所常用，而刘辰翁本人恰恰是诗文评点的专家。他曾评点过唐代很多诗人作品，也评点过《史记》《汉书》等史传作品，对评点一道轻车熟路。又如：“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故事通过支遁在养马一事所体悟出来的生活的抽象哲理意义胜过其现象价值的认识，表现魏晋士人“道优于器”理念指导下的“神超形越”人生态度。刘辰翁批曰：“高视世外。”这种评点方式一语中的，正是诗文评点高手的点睛之笔。

其次，稔熟故事内容背景，委婉批评刘应登批语。如：“王子敬语王孝伯曰：‘羊叔子自复佳耳，然亦何与人事！故不如铜雀台上妓。’”（《世说新语·言语》）此条文字简单，但背景错综复杂，颇显人物

① 参见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序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 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古代小说版本探考》，第75页。

③ 周兴陆：《元刻本〈世说新语〉补刻刘辰翁评点真伪考》，《文艺研究》2011年第11期。

品德性格。本来，该条刘孝标注两条，一引《晋诸公赞》，略谓羊祜“以清德称”，以及“南州人闻公哀，号哭罢市”；一引曹操临终前所留《遗令》，略谓“以吾妾与妓人皆著铜雀台上……月朝十五日，辄使向帐作伎”。两条注文前者交代羊祜清德威望之高，令百姓敬仰；后者则以曹操生前对死后安排铜雀台乐事，与羊祜形成鲜明对照。因刘应登将两条刘孝标注删除，造成读者对故事的因果始末难以深入了解。为弥补这一缺憾，刘应登自己加了一句批语：“此亦戏言，谓羊公清德自佳而已，不如铜雀台上妓，可以娱人耳目。”刘应登把王献之这句话理解为“戏言”，其实未能搔得其痒，一是羊祜清德并非“自佳”，刘孝标注引文清楚交代羊祜逝世后南州人“号哭罢市”，足以说明影响甚大；二是王献之之所以贬低羊祜，抬高曹操，乃与琅琊王氏与泰山羊氏两家恩怨有关。^①正因为看到刘应登批语的失当，刘辰翁才予以提示纠正。只是原书该处刘应登批语已经占据较大版面，所剩空间有限，所以他只能在剩余有限空间补刻了简练却重要的评点：“此正堕泪之言，人不能识耳。”“堕泪之言”，正是指被刘应登删除的刘孝标注所引《晋诸公赞》所云羊祜去世后南州百姓的号哭，以及建碑立庙之举。“人不能识”则是委婉批评刘应登批语未能了解这个历史背景，竟然将王献之诋毁羊祜之言视为“戏言”，故为“不识”。了解了这些复杂原委，就不难看到，刘辰翁这段评点虽然短短十一个字，但堪称火眼金睛，字字千钧。这种学养和见识，绝非射利书贾和腐儒所能及。

再次，从小说艺术创作规律角度对《世说新语》给出专业评价。作为六朝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面世于中国小说的雏形时期。经过唐代传奇和宋代说话艺术的探索和积累，到刘辰翁所在的宋末元初，小说艺术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实践。这为元刊本《世说新语》的评点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艺术经验，使刘辰翁评点能够针对《世说新语》作出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小说艺术规律方面的探索。其中主要包括：小说文体的认识、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说故事情节的构想等等。小说文体认识是指以宋元时期的小说观念甄别辨析《世说新语》中的小说文体表现。如：“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世说新语·尤悔》）故事以桓温本人自白写其野心，入木三分。历代评家多于此落墨，发轫者则为刘辰翁评点：“此等较有俯仰，大胜史笔。”这是对《世说新语》文本价值属性的重大突破。此前《世说》虽然列入子部小说家，但论者习惯以史家来认知评价，未免隔靴搔痒，未得其真，唐代刘知几就曾对《世说新语》一类小说大加挞伐。放在这一背景下，才能意识到刘辰翁的“大胜史笔”对于小说文体的价值认识和评价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出于对《世说新语》小说属性的定位，刘辰翁评点有很多对于小说人物形象刻画成就的评价和总结。如：“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世说新语·德行》）看似为夫妻讨论子女教育问题，实际事关玄学理论中“名”“实”关系的探讨。谢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教育方法注重教育之“实”，而后代理学、礼教盛行，往往以“名”代实。刘辰翁对此深恶痛绝，故批曰：“使人想见其良，益叹其真。后人矜饰旷废，皆当愧世。”此批由对谢安行为的赞美肯定，延伸到对该条故事描绘谢安形象的艺术方法及其阅读效果，堪称本色当行。以记言为主的志人小说，本不以情节曲折见长，但《世说新语》部分故事也有比较生动的故事情节。作为稔熟唐宋以来文言白话小说各种手法的刘辰翁，不肯放过以成熟小说情节故事为审美追求的标准眼光，敏锐发现《世说新语》的故事情节描写，给予肯定评价。如《世说新语·文学》“张凭举孝廉”条，评曰：“此纤悉曲折可尚。”可见其对《世说新语》中故事情节描写的敏感和高度评价。

纵观以上精彩评点，给人感觉非须溪不能道。若非须溪，亦必高人。既然高人，何必冒他人之名？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发现之前，笔者还是认为刘辰翁为其评点所有者的传统说法，不宜推翻。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详见《世说新语·识鉴》“王夷甫父义为平北将军”条，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89-390页。

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及其变革^{*}

吴肖丹

[摘要]《水浒传》是日本江户时期传播最广的中国小说，有最多浮世绘作品。作为平民的版画，浮世绘推动“水浒热”从文化精英走向平民阶层，也因深入水浒的世界发生了变革。梳理日本江户时期《水浒传》的11部绘本、近1600幅插图和锦绘，可见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历近百年发展，在视觉转化上采用了日本文学常用的“翻案”手法，以模仿、替换、省略和增益等策略对中国插图进行技术性的改编。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奠定了“武者绘”的典范，创新中日文化传统融合的路径，塑造符合江户平民价值的英雄。水浒的题材和浮世绘的变革体现了文学和艺术深层联动。

[关键词]《水浒传》 浮世绘 变革

〔中图分类号〕I242.4; J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23)04-0153-09

明清小说及其插图对日本江户时期的通俗文学和浮世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浮世绘除了与中国版画技艺的关系值得探讨，^①作为文学的副文本及跨文化交流产物也值得深入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这些浮世绘，探讨它们与小说文本的关系，^②日本学者则较早梳理了部分明清小说浮世绘插图本，探讨了插图的风格，^③由于这些研究对明清小说浮世绘插图本版本搜罗未全，在明清小说对浮世绘的影响、浮世绘对明清小说的图像转化等问题上还有很大探讨空间。^④浮世绘的影响可见一斑，而中国小说题材在浮世绘发展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实有必要深入讨论。

宽永十六年(1639)《水浒全传》被德川幕府收藏，随后《英雄谱》《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等成为日本文人学习中国白话语的课本，^⑤历百余年才相继出现了训点本、译本和绘本。中村幸彦指出：“在明治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日本江户时期浮世绘对《三国演义》的接受与重构研究”(GD21CZW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肖丹，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420)。

① 郑振铎、永田生慈、藤悬静也等学者都认为浮世绘的发展受到中国版画的深刻影响。郑振铎：《中国版画史图录》自序，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2年；[日]永田生慈：《关于中国木版技法与浮世绘的思考》，《苏州版画》，东京：暇暇堂，1993年；[日]藤悬静也：《浮世绘的研究》，东京：雄山阁，1944年。

② 如王永东：《明清小说与日本浮世绘的界面研究》，《外国语文》2014年第4期；杨森：《论〈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对〈绘本西游记〉插图的互文性影响》，《明清小说研究》2017年第4期；程国栋：《晚明版画〈水浒〉的兴衰及其在日本浮世绘中的“嫁接”》，《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2期等。

③ 如[日]上田望：《〈三国演义〉在日本的接受(前篇)——以翻译和插图为中心》，《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2006年第3期；[日]井上泰山：《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日]渡边由美子：《关于〈绘本通俗三国志〉插画和成立情况》，《文学论藻》1994年第2期；[日]高岛俊男：《水浒传与日本人》，东京：大修馆书店，1991年。

④ 宋丽娟：《中国古典小说西译本插图的生成与演变(1761—1911)》，《文学遗产》2017年第5期。

⑤ [日]清田詹叟：“俗文之书虽多，但如能读通《水浒传》，其余则势如破竹。”转引自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

以前最深入、广泛渗入我国民间的外国小说是《水浒传》。”^①水浒题材浮世绘深受文学传播影响，也对文学传播贡献甚巨，它的出现稍晚于三国题材，自安永六年（1777）始演变亦历近百年，据笔者搜集统计，绘本有11部以上，绘本插图和锦绘的数量近1600幅，数量、质量总体高于三国题材。^②江户时期，正如高岛俊男所说：“‘水浒传’几乎已经成为普通名词。意为‘强悍男性群体登场的波澜壮阔故事’，甚至‘勇壮活泼的故事’‘浮沉变化的故事’。”^③《水浒传》向日本民众输入了一类英雄豪杰题材，以水浒为题材的浮世绘确立了一种类型武者绘的典范，是文学文化与艺术的深层联动。浮世绘“并非仅以鉴赏为目的而绘制的‘美术品’，而是具有向都市民众传递各类信息的‘媒体’功能”，^④加之浮世绘巨匠葛饰北斋和歌川国芳等也是通俗文学家，阐释作品有独立的见解，这些创作特点决定了画师对文学阐释的高度参与，水浒题材给画师带来了挑战，也成就了艺术革新。

一、“水浒热”与水浒题材浮世绘的演变

浮世绘是“水浒热”扩展到一般大众间的推手，“水浒热”带来的市场需求又转而推动浮世绘精益求精，呈现“绘本→水浒热→绘本、锦绘”的递进影响模式。据中村幸彦总结，江户第一次“水浒热”于享保到宝历间（1716—1762）产生于有识者间，第二次“水浒热”在文政到天保间（1818—1831）扩散到一般大众间，^⑤水浒题材的浮世绘是水浒的二次传播接受，产生于两个热潮之间，鼎盛于第二次“水浒热”。它的发展经历了开端、鼎盛、尾声3个阶段，受到文教政策、商业竞争等影响，也与水浒说话、水浒戏等密切相关。

开端：节译、小说梗概与黄表纸。18世纪70年代到18世纪末，是水浒题材浮世绘的起步阶段，重要契机是江户通俗读物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小说，将节译内容或小说梗概配以全新插图，以黄表纸的形式出版。^⑥黄表纸以通俗易懂的平假名搭配浮世绘特性是“作者的构想可能有一部分在叙述中给出，还有一部分通过插画来表达”，^⑦作者和读者都必须同时认真对待文本和插图，兼擅文学和绘画两种艺术的作家尤为突出，代表即为山东京传。这一时期的绘本有：1、鸟山石燕编绘《水浒画潜览》3卷3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安永七年（1777）京都出云寺和泉掾出版，共26幅插图，止于“武松打虎”的草图。2、山东京传译、北尾重政绘《梁山一步谈》《天刚垂杨柳》各3卷3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宽政四年（1792）江户茑屋重三郎出版，共32幅插图，止于鲁智深遇林冲。这些绘本在作者创作生涯中出现带有偶然性和转折性，鸟山石燕出身宫廷狩野派，于《百鬼夜行》三部曲完结次年转向舶来的水浒题材，绘本仓促完结，虽内页广告“后编近刊”，实难以继续。山东京传作为画师名号为北尾政寅，师从北尾重政，他于前一年创作妓院题材黄表纸经历拷手之刑，于水浒绘本出版当年召开约两百人的艺术家和文人集会，从此“致力于改良黄表纸的文学基调，编写含有道德情节的书”。^⑧水浒绘本为京传主导编绘，是其改变的开端，为后来师徒合作水浒改编小说《忠臣水浒传》做了准备。这一时期水浒戏、改编水浒的小说开始发展，^⑨宫廷画师和通俗读物画师同时注意到水浒题材，但从出版情况看，编绘难度很大。

①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东京：中央公论社，1984年，第221页。

② 锦绘是指多色木版印刷的浮世绘，在中国套色木刻基础上发展出来，因精美如锦缎而得名。[日]藤悬静也：《增订浮世绘》，东京：雄山阁，1973年，第103页。

③ [日]高岛俊男：《水浒传与日本人》，东京：大修馆书店，1991年，第132页。

④ [日]辻惟雄：《图说日本美术史》，蔡敦达、邬利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83页。

⑤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第247页。

⑥ 黄表纸是江户通俗读物草双子的一个类别，黄色封面，一般限制为3卷，尺寸通常由半张美浓纸对折装订，原则上一卷为5张纸或5张纸的倍数，每页由浮世绘画师画插画，插画周围是小字。见[日]铃木重三：《绘本与浮世绘》，东京：美术出版社，1979年，第20、40页。

⑦ [日]田岛志一、大村西崖：《日本浮世绘精选集》，赵闻悦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8年，第373-374页。

⑧ [日]梅本钟太郎：《浮世绘备考》，东京：东阳堂，1898年。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⑨ 大阪的小川吉太郎于安永五年（1776）上演“和训水浒传”的水浒戏。

鼎盛：全译、小传与读本、锦绘。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是水浒题材浮世绘的鼎盛时期。葛饰北斋和歌川国芳，通过读本插图和系列锦绘将创作推向高峰。这一时期，通俗文学的发展、平民的阅读需求等催生了以读本形式出版的水浒绘本，^①文字篇幅更长、插图更精美，同时读者也热衷欣赏有人物小传、名号的绘本和锦绘，浮世绘从紧扣叙述走向了注重写人，折射出作者、读者对水浒英雄的接受和评价。这一阶段的绘本有：1、曲亭马琴译初编、高井兰山译二至九编，葛饰北斋绘《新编水浒画传》九编90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江户角丸屋甚助（初编）、大阪河内屋茂兵卫等（二至九编）于文化二年至天保九年（1805—1838）出版，^②一般为四至八页文字间二页图，插图多为双页连式，共311幅；2、山东庵京山译前六编，柳亭种彦译七至九、十三编，笠亭仙果译十至十二、十四至十七编，松亭金水译十八至二十编，歌川国芳绘《稗史（国字）水浒传》二十编40册（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由鹤喜屋右卫门、茑屋重三郎、大黑屋平吉等于文政十二年到嘉永四年（1829—1851）出版，^③每页皆为环绕文字的插图，共430幅。3、署名葛饰为一（北斋）绘《绘本水浒传》（《北斋水浒传》）画册2册（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藏），江户万笈堂于文政十二年（1829）出版，共有人物图54幅，风格与《新编水浒画传》如出一辙。4、署名卧龙园编、葵冈北溪绘《本朝狂歌英雄集》（《水浒传彩色英雄画集》）画册1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文政十二年（1829）出版，卷首4幅全景图与北溪《水浒画传》相同，人物图30幅，与《水浒画传》不同，与明治二十三年（1893）再刊署名溪斋英泉《绘本水浒传》（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2册内容相同，后者有人物图79幅，此书水浒人名多有错误，与北斋、北溪他作不同。5、柳川重信绘《狂歌水浒画传集》画册1册（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藏），琴树园二喜于文政十三年（1830）出版，插图侧有狂歌，共有人物图45幅，是目前所见绘全好汉108人的画册。6、柳水亭种清编、葵冈北溪绘《水浒画传》3册3卷（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江户甘泉堂于安政三年（1856）出版，彩色插图本，有33位好汉小传及插图，文图双页间开，插图空白附解释，全书插图共39幅。锦绘有：1、歌川国芳《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之一个》系列锦绘共79幅，《水浒传豪杰百八人内》约5幅，由江户加贺屋吉右卫门于文政至天保年间（1827—1844）出版，人物神态动作夸张，衣饰奇特华丽。2、歌川国芳锦绘《水浒传豪杰百八人地煞星》8幅、《水浒传豪杰百八人天罡星》4幅（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江户大黑屋平吉于天保十四年（1843）出版。3、歌川国芳《狂画水浒传豪杰一百八人》共10幅，由江户加贺屋吉右卫门于天保年间出版，刻画以水浒命名的日本市井庶民。此外《小仓百人一首》《和汉准源氏》《风流人形书》《风俗大杂书》等画册收录了8幅国芳的水浒锦绘，其他单幅版画见知有国芳的弟子歌川芳晴2幅，北斋2幅，北斋的弟子岳亭春信3幅。

绘本出版波折不断，马琴和北斋是享有盛名的“读本二人组”，《新编水浒画传》初编出版后，因刻工米助与出版商的债务纠纷，牵连马琴被告上公堂，马琴与出版商解除合作，版权也易手，并改由高井兰山编译，他只是据冈岛冠山的译本将片假名改为平假名，北斋对其翻译的评价是“远不如马琴翻译的”，绘图也全按自己的意愿“创新”，^④因为翻译不到位读者甚至要靠插图结合说书、川柳等来了解故事。^⑤《稗史水浒传》也有类似的情况，山东庵京山是山东京传的弟弟，因翻译效果不好，出版商

^① 读本是日本江户后期流行的通俗读物，一般为长篇小说，以5卷或10卷为一编，文字与插图分开排版，文字篇幅多于插图，每卷约5幅插图。见[日]铃木重三：《绘本与浮世绘》，第70-74页。李树果认为：“读本小说的唯一特点是翻改中国的白话小说。”参见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第2页。

^② 《新编水浒画传》的版本复杂，初编十册板元（版权）为众星阁（江户角丸屋甚助），后转给万笈堂（江户英平吉），最终转给群玉堂（大阪河内屋茂兵卫），二至九编的参与出版商数次更换，主板元一度为万笈堂、文溪堂所有，终归群玉堂。笔者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等藏本统计。

^③ 《稗史水浒传》的版权较为复杂，净色和花纹纸封面的板元（版权）按牌记仙鹤堂（鹤屋喜右卫门）、正荣堂、天寿堂、耕书堂（茑屋重三郎）、永寿堂、长松阁、松寿堂（大黑屋平吉）七家。锦绘封面按牌记一至十编板元为耕书堂，十一至二十编板元为松寿堂。笔者据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专修大学图书馆等藏本统计。

^④ [日]饭岛虚心著，铃木重三校注：《葛饰北斋传》，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82、85页。

^⑤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第223页。

终止了合作，转交给柳亭种彦翻译并更名《国字水浒传》，种彦对这一题材不感兴趣，中途交给弟子笠亭仙果，最后三编又由松亭金水编译，止笔于原书三十五回左右，国芳的插图事无巨细皆予叙述甚至增加内容，读者借此以理解情节。绘本和系列锦绘是水浒“在地化”的特殊作品，与优秀的绘本插图同时期出版，刻画精美，满足了读者对水浒英雄品评欣赏的需求。这一时期的水浒题材浮世绘艺术上成就突出，北斋自此创作了大量中国文学题材作品，如《西汉演义传》《西游记》《唐诗选》等，国芳仅凭借五幅水浒人物锦绘奠定了“武者绘”能人的地位。与浮世绘出色的新创相呼应的，是这一阶段水浒热引发水浒狂歌、水浒读本等的突出成就，翻改水浒故事的读本，至少有 28 种，如性别转换系列的《女水浒传》、读本《忠臣水浒传》等，数量上远超三国、西游题材。

尾声：缩略本与图册。19 世纪中后期，江户幕末到明治初期水浒题材浮世绘落幕时期，正如松亭金水声称的，时人开始关注西洋学，对水浒的兴趣下降。^① 作品数量大幅下降，绘本主要是人物简介、故事缩略本，锦绘虽精美，但创新不多。这一时期主要的绘本有：1、钝亭鲁文编、歌川国久绘《肖像水浒铭々传》四册存 2 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江户文苑堂等嘉永三年（1850）出版，存插图 60 幅；2、江境庵花川编、月冈芳年绘《绣像水浒铭々传》3 册（日本专修大学图书馆藏），有插图 114 幅，江户小田原屋弥七于庆应三年（1867）出版；3、清水市次郎编，月冈芳年、水野年方绘《绘本忠义水浒传》18 册五十五卷（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江户法木德兵卫于明治十五到十七年（1882—1884）出版，插图多为半页，共 204 幅。锦绘有：1、歌川国芳的《百八狂画图式》，吉田金兵卫明治十八年（1885）出版；2、月冈芳年《豪侠水浒传》《美勇水浒传》《和汉百物语》《月百姿》等水浒题材 16 幅。这一时期水浒题材的浮世绘进一步往日本市井趣味发展，既有国芳以日本市井庶民滑稽面目解构英雄的漫画，也有芳年夸大怪诞色彩的锦绘。与此呼应的是各种思潮的涌动，如日本民间暴动故事被写成《天魔水浒传》《天保水浒传》等。

二、“翻案”文化与水浒题材浮世绘的创作策略

“翻案”是日本接受中国小说的方法，尤盛行于江户时期，清水茂说：“日本接受中国小说，有两个方法：翻译和改写。所谓改写，即把中国故事改作日本故事，写成新的小说。”^② 这种改写日本学界称为“翻案”，王晓平指出：“‘翻案’是日本历代文学家迅速利用中国小说艺术成果的独特形式，就是以中国小说（或故事）为原本，取其主题、情节、人物关系等，换上日本的名称。或改以日本历史环境为背景，重新联缀成篇。”^③ 读者需借助浮世绘对故事加以理解，浮世绘要描绘画师未见之事与物，创作策略更近于翻案。从图像构成看，画师将中国人物、事物改为日本读者所易理解的风格，参考对象包括且不限于中国小说的绘画、版画，特别是图谱，如杜堇《水浒人物图谱》、陈洪绶《水浒叶子》等，还包含反映中国物质文化的书籍、日本的绘卷、歌舞伎表演等。浮世绘直接参考对象是《水浒传》明刊本的插图，通过中日图像的比较，可见有以下四种基本创作策略。

1、模仿。翻案的核心是取中国小说的主题、情节、人物关系等，水浒题材浮世绘特别是绘本插图的核心任务是向读者“叙述”故事。浮世绘主要在描述性内容上模仿明刊本插图，甚至沿袭了这些图像中文本所未具的细节。首先，互文性突出。像《新编水浒画传》311 幅插图包含了明刊本插图常见的题材，“林冲风雪山神庙”是将容与堂刊本极富张力的林冲听陆谦等人密谋、袁无涯刊本林冲报仇，时间线上一前一后两个场景都刻画出来，让读者能清楚了解情节，构图思路也接近明刊本。其次，宏大叙事带来的丰富情节，让画师在呈现上面临极大的挑战，浮世绘对情节的呈现，服务于“叙述”这一核心，并模仿明刊本阐释了故事的内涵，正如莱辛认为：“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从这一顷刻中得到最清楚的理

① [日] 松亭金水：《稗史水浒传》第十九编序。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② [日] 清水茂：《中国文学在日本》，《文史知识》1996 年第 1 期。

③ 王晓平：《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上）》，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 302 页。

解。”^①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节顷刻的选择，袁无涯刊本突出了鲁智深的计谋，容与堂刊本突出了他的勇猛，《新编水浒画传》讲鲁智深的出场故事用了28幅插图，在这一情节上却未两图兼用，而是选择同容与堂刊本相同的顷刻直接叙述，着力刻画围观者的反应，将他们的视觉聚焦于英雄的“勇力”，并于前页刻画遇金翠莲父女事，交代清楚来龙去脉，突出他的“义”。其三，模仿中国版画有而文本无的细节，更多着眼于“描”而非“述”，呈现描绘性、装饰性的内容，跟情节叙述关系不大，但包含了画师对故事人物的理解。像书中史进本头戴一字巾，陈洪绶的《水浒叶子》给史进设计了牛角盔，以示复古趣味，这些版画被翻刻在水浒译本的卷首，《新编水浒画传》卷首史进的单幅肖像也模仿陈洪绶，设计了兽首盔，兽首造型接近辅首之龙第九子椒图，加上九龙纹身，融进了画师的阐释。

2、替换。浮世绘要让读者易于理解书中的人、物、景等，要将明刊本版画的人物、服饰、器物等换成中日杂糅或日本的样式，正如高罗佩《秘戏图考》指出江户画师更改了中国版画的周围器物，“使之形成日本味道和习俗”。^②大部分水浒题材浮世绘的人物面貌极尽夸张，呈现出非日非中的外表，屋舍、器物、衣物等杂糅了中日形制。首先是将人物的面貌和装束进行了转换。浮世绘将人物面貌统一从中国版画的扁平柔和替换成立体夸张，大部分豪杰都接近林冲在小说文本描写上的“豹额燕领，环目虬须”。特别是注重刻画人物的锦绘，百八豪杰造型各异、姿态横生，已完全脱离了文本，像卢俊义“目炯双瞳，眉分八字，身躯九尺如银”，国芳的锦绘（图1）把他画成面如重枣的猛士，由护心镜上的白麒麟交代他的外号。《新编水浒画传》衣饰形制是变形的中式，在国芳的锦绘中豪杰的装束如中国的门神版画，但头盔、铠甲、衣料造型奇特。其次是屋舍、器物等物质的替换。亭台楼阁多为日式形制，如《新编水浒画传》“东京百姓元宵观花灯”宫殿前是“唐破风”及其他装饰，“梁山伯诸将出阵”等场景的城门是日式城门。其他事物也多如此，乘轿呈现为日式的“驾笼”，大多数宴饮场景，人物都跪坐在席子上。在风景环境的刻画上则代以浮世绘的趣味，如《新编水浒画传》“吴用与阮氏三雄在水阁畅饮”（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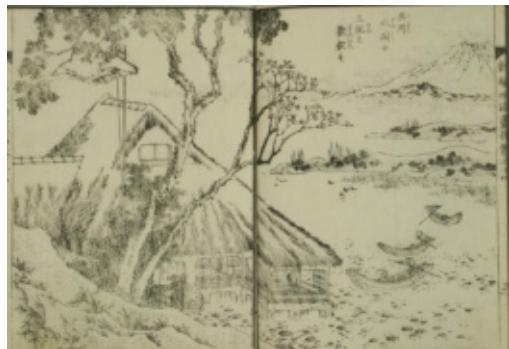


图1 《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之一个·玉麒麟卢俊义》 图2 《新编水浒画传·吴用与阮氏三雄在水阁畅饮》

3、省略。浮世绘将小说文本中日本人不感兴趣或难以理解之处省略、简化，如未突出个体人物形象的战役、谋略阵法和复杂场面。最典型的是打祝家庄四回情节，人物关系较为芜杂，也未突出忠义，《新编水浒画传》删减文字，省略了整体的攻打场面，只有8幅插图交代几场打斗，其中2幅是扈三娘作战场面，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武大潘金莲一节故事约三回，《新编水浒画传》用了13幅插图，详细交代了整个过程。战术的讨论和交战的场面，难以向读者解说清楚引发读者的兴趣，往往加以删减，像在明刊本插图中刻画得较为清楚的多场交战，打曾头市、大名府，两破童贯，三败高俅等，《新编水浒画传》多刻画个别人物，简略交代战场，只有“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仔细绘出了带八卦符号的阵列。其他如“吴学究双掌连环计”等运筹帷幄的“文戏”，明刊本插图以戏台表演的象征手法来表现计谋施展与调兵遣将，没有中国戏曲欣赏经验的画师难以理解和照搬，又如“宋江大破连环马”等重骑兵特殊战争场面，缺乏相关知识的画师也难以模仿并用画面解释给读者，故予以省略。

① [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3页。

② [荷]高罗佩：《秘戏图考》，杨权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6页。

4、增益。增益策略多运用在装饰性的事物上，传达了画师个人或江户时期的文艺趣味，部分与小说的阐释相关，部分出于浮世绘作为装饰艺术的特点。首先是增加文本有中国版画无但能引发当时日本平民兴趣的事物，多为鬼怪、杀戮、情色等内容。从晁盖夺青石宝塔事可看出江户画师一以贯之的兴趣，北斋画了一个靠在树上的女鬼，由肚皮上的鬼脸透露鬼魅的身份，国芳的锦绘画了一群鬼怪，到了芳年的版画（图3），则进一步夸张为大鬼带领众小怪，大鬼滑稽的大口占据了画面主体，色彩奇诡。除突出怪异的事物，画师或给女性加上江户游女华丽的装扮，或刻画文中所无的女性作为画面的装饰，这种手法在《新编水浒画传》《稗史水浒传》中不胜枚举，像环珠围翠的潘金莲，满身锦绣的仇申妻子鬼魂等，甚至在宴饮场面描绘妖娆的侍女。水浒有不少杀戮场面，出于叙述的必要，像扬雄杀妻、武松祭兄等情节，在讲求节制中庸的中国版画中会交代人物的行为，不做渲染，但浮世绘的兴趣则放在对暴力的描绘，往往给予文本一笔带过的叙述特写，如琼英祭奠母亲未斩杀田虎三兄弟，《新编水浒画传》刻画她斩首三人，并给鲜血喷涌的头颅做了特写。其次，画师根据故事逻辑或美术装饰的需要添加文本未交代的事物，突出情节戏剧性，烘托人物。中国讲究文人意趣的水浒全页式插图，一般是描绘中景，适当留白，善用象征手法叙未言之事，浮世绘的全页插图则更多表现近景或远近对比，充分夸张，并通过添加事物渲染画外之意。像朱贵接引林冲上梁山，《新编水浒画传》除了突出他射箭的姿势外，还以俯视的视角重点刻画了水亭旁大群的飞雁，以烘托箭声，带来出色的美术效果；又如小李广梁山射雁（图4），除了羽箭穿颈而过雁行内第三只，漫天惊飞的大雁构成了画面的主体，俯视低处渺小的人群，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则是惊起一群乌鹊。为烘托豪杰的勇力，国芳在锦绘中增加不少文本没有的东西，像中箭虎丁得孙斗巨蟒，铁笛仙马麟斗猛兽等。画师又为文本中无纹身、锦袍的豪杰添加华丽的装饰，薛永、曹正等15人都添加了纹身图案。



图3 月岗芳年锦绘《托塔天王晁盖》



图4 《新编水浒画传·小李广神箭射雁》

水浒题材浮世绘的创作策略，基于画师对水浒的接受及再创作时的改造，顺应了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优秀的改造不仅是对小说视觉转化的技术性操作，还是跨文化的文学艺术碰撞，被广泛接受的图像从模仿到创新，为江户后期的浮世绘带来了变革。

三、水浒题材与浮世绘的变革

水浒作为“明治以前，最广泛、最深入渗透到日本国民之间的外国小说”，^①其推广得益于浮世绘的成功视觉转化和广泛传播。出色的画师北斋、国芳面对题材带来的挑战积极应对，深入平民英雄的精神世界、融合中日文化传统，树立了武者绘的典范，给19世纪初的浮世绘，以及个人的艺术生涯带来深刻变革。

1、武者绘的典范。首先水浒给浮世绘带来的是题材的变革，影响了浮世绘的重要分支武者绘的生成发展。武士（ぶし）是一个社会阶层，受家族（武家）控制，拥有武士道精神。武者（ぶしや）强调

①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第221页。

个体，泛指习武之人，没有武士的荣誉和内涵。武士都是武者，但武者并不都是武士。武者绘在人物身份和精神面貌上，范围要广得多，而打破这层界限的关键是水浒。从浮世绘的流变史看，最初发源于描绘游女、役者的浮世绘，多描绘平民生活，很少用来刻画属于不同阶层的武士，武者绘这一题材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期菱川师宣的版画《大和武者绘》。^①而武者绘真正开始创作已是18世纪中后期，对其产生影响的画师依次是鸟山石燕、胜川春章、北尾重政，至19世纪葛饰北斋、歌川国芳达到顶峰，他们的武者绘代表作基本是上文列出的水浒作品。严格来说，武者绘作为浮世绘的一种类别独立出来并备受关注，是水浒及翻改水浒的浮世绘流行所带来的。

其次，武者绘是在水浒题材浮世绘的发展中确立典范的，并因北斋、国芳成功的水浒作品广受欢迎而确立典范。放在当时的画坛看，从《新编水浒画传》到《水浒传豪杰百八人之一个》呈现了重要的艺术变革。在北斋之前的画师刻画中国小说，尤其是小说中的武者，多沿用流行的通俗读物风格，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对中国插图进行技术性的处理。北斋借由水浒体现了艺术变革的自觉，他深入水浒精神，创造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并在1830年左右将这种风格完全凸显出来。他出版时间稍早的日本武士故事《绘本忠臣藏》(1802)画面雅致、线条柔和，与北尾重政的水浒作品相近，未见创新。在此类题材画风同质化的情况下，“(水浒)这个主题似乎吸引并激发了北斋的想象力”，^②《新编水浒画传》极具冲击力的近景特写、夸张的人物动作设计、版面黑白色块对比的大胆运用和劲健有力的线条，在艺术上异峰突起，高岛俊男称赞他的画作“令人震撼，在古今所有水浒画中是无与伦比的”，^③引发平民的狂热推崇也在情理之中。将他出版时间稍晚的《椿说弓张月》(1807—1811)拿来比较，明显带有水浒作品的风格，可以说水浒影响了北斋武者绘的创作，北斋所呈现的“奇想”和有力的线条又影响了当时其他画师，像葛饰戴斗就照搬他的笔墨去刻画三国题材，柳川重信、葵冈北溪乃至月冈芳年等刻画中国和日本武者都学习了他的人物设计和顿挫有力的线条。

如果说北斋解决来自中国的武者如何刻画的问题，国芳进一步解决日本武者可以如何刻画并打通中日二者的问题。国芳是北斋精神的追随者，他并未直接模仿北斋创作的范式，而是进一步发挥浪漫的奇想。他的水浒锦绘构图自成一派，以色不同的人物造型、充满动态的叙事、富有戏剧感的场面和奇异锦绣的装饰别开生面，是力与美的交融。值得注意的是国芳文政年间与水浒题材同时创作的少量日本武士作品，如《隐岐次郎广有》，构图风格已几乎与水浒作品无异，与日本传统的武士绘不同，未能引起关注，1827年他出版五幅水浒锦绘大获成功并在1830年左右风格成熟，又以同样的风格创作了日本武者绘，深受好评。国芳日本武士作品前后不同的遭遇，揭示了在国芳武者绘风格接受上，水浒题材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习惯传统典雅风格武士绘的读者，更能够接受外来的水浒题材以大胆的方式创新，而当水浒作品确立了一种风格典范被普遍接受后，读者进一步接受了用同样的风格刻画日本武士。

2、中日传统的融合。《水浒传》对于文人画师而言是杰作也是挑战，在迎接难题成就典范的途径上，安格斯·洛克耶说：“他(北斋)遵循着将中国和日本相结合的实践传统。”^④饭岛虚心说：“(国芳)悉心学习元明时期的中国画。”^⑤他们都不为现实局限所束缚，融合了中日传统文化。

北斋、国芳由创作水浒作品走向融合中日传统的开阔格局，中日传统融合是他们艺术变革的重要转折和手段。19世纪初北斋出于艺术追求创作了许多中国小说绘本插图。这一时期他减少为畅销的日本通俗读物绘制插图，不断接手中国题材的创作，即便在1833至1836年日本全国性大饥荒中，极端贫困的他还写信恳求出版商请刻工江川留吉来为水浒等插图制作雕版，确保他的绘画线条能得到忠实再现。

^① 菱川师宣虽然确立了浮世绘的样式和体系，但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大和绘而非浮世绘，以之刻画武士并未打破绘画观念。[日]田岛志一、大村西崖：《日本浮世绘精选集》，赵闻悦译，第104页。

^② [英]提摩西·克拉克编：《葛饰北斋·超越巨浪》，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08页。

^③ [日]高岛俊男：《水浒传与日本人》，第176页。

^④ [英]安格斯·洛克耶：《北斋的思想》，见[英]提摩西·克拉克编：《葛饰北斋·超越巨浪》，第31页。

^⑤ [日]饭岛虚心著，玉林晴朗校注：《浮世绘师歌川列传》，东京：中央公论社，1993年，第135页。

水浒题材不仅为北斋提供了素材，还让北斋借此传达他的认知，表达他领悟到的跨文化的奥义，饭岛虚心批评北斋的图“实际上混杂了和汉”，^①但不否认他深受读者好评。在某种程度上水浒题材的浮世绘与画师是互相成就的关系。歌川派门徒众多，擅长役者绘和通俗读物插图，国芳在这些领域耕耘多年寂寂无闻，因加贺屋吉右卫门大胆邀请他创作了五幅水浒英雄锦绘，就迅速以武者绘能人的名声跻身名画师行列，他在后续创作中为刻画不同人物表情姿态苦恼，经长期学习和揣摩才完成系列作品，“具体言之，北斋的武者绘中体现出的更多是中国趣味，国芳在此基础上还加入了西洋画风的元素，从而形成自家新面目”，^②西洋画只是提供了元素，而深入中日文化传统才是国芳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次，画师实现中日融合的途径，是将中日文化元素以极具美感的形式组合加以创新，并表达他们对这种融合的理解，从视觉效果上是非中非日又自成一体。他们参考明清版画、水陆画，也学习役者绘、日本传统绘画，并深入文化以成新创。曲亭马琴指出《新编水浒画传》的插图“以《兵录》的108人画像为基础，或以两本《圣叹外书》中所画的宋江以下40人为模版，或以李卓吾评点的《全像》20页，加以润色画出，且模仿《武备志》房屋、器械、衣服的外形”。北斋的版画中“人物的衣服，室内的装饰，是日本和中国都没有的，他画了一种新风格”。^③通过对水浒世界的描述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像“鲁智深剃度”“宋江听智真长老说禅”等刻画华丽的法堂、繁美的器物，是他对佛教仪轨的解释，又如“晁盖梦见北斗七星直坠屋顶”一图，新创了七位仙人形象，集合中国官僚、僧人、弁财天、顶蛇三面佛等，跟他本人信奉唐代传入日本的“折衷了道教的密教北辰北斗信仰”相关，^④也属于对文化交融的独特解释。国芳则将役者绘舞台华丽服饰风格与中国文化图案结合起来，传达对水浒人物的理解评价，如浪子燕青“一身雪练绣了这身遍体花绣，却似玉亭柱上铺着阮翠”，未指明纹身具体内容，国芳绘上“唐狮子牡丹”刺青，因传闻狮子畏毛发生虫，牡丹露水能杀虫，相伴相生，无所畏惧。又如张青纹的是孙悟空，裤子上还有猴子的纹样，段景住身上纹护法金刚，林冲蔽膝上是佛画的骷髅纹样，李忠蔽膝上是十二生肖图案，杜兴举起的大钟上有多闻天王、迦陵频伽画像等。画师本人喜好奇装异服，这些图案大多取材自中国绘画，也构造了极富美感的水浒世界。

3、平民英雄的气质。中日传统融合向外导向艺术形式的变革，向内则塑造了艺术品的新内涵。作为平民艺术的浮世绘与日本传统文人画不同，武者绘也与传统的武士绘不同，水浒题材塑造平民英雄形象也与武士不同。北斋、国芳理解水浒的趣味，并塑造了一种兼有平民生命力和武士荣誉的英雄气质。

从作品的内涵看，水浒题材肯定平民的抗争，同时为武者绘注入了一股平民的生命力，并为平民所认可接受。正如中村幸彦指出：“在这个时期已经预感到维新的气息。……渴望得到力量、正义和侠义的要求，恰好在小说史的发展中出现了《水浒传》，大概就这样受到欢迎吧。”^⑤传统物语描写贵族生活作因果解说，江户前期怪谈兴起，中期关注平民世情，却沉湎于爱欲、金钱和人伦关系。高度写实的水浒英雄却带来了域外的平民社会生活，平民也是可以是英雄，充满抗争的力量。深入水浒精神对英雄进行刻画，使画师的作品充满生命力，并为平民所认可，北斋的插图“所到之处无不引起称赞的浪潮。由于他通俗易懂，无论是哪个阶层，就连被称之为熊公、八公毫无教养的庶民，也以花和尚和黑旋风自许，纹身的哥儿们竟装作是九纹龙”。^⑥直俊彦就指出国芳的武者绘一改传统浮世绘陈腐、颓废的味道，带来了健康、强大的生命力，^⑦岩切友里子认为他的武者绘：“通过对人物动态的强调，及刻意安排背景事物

① [日]饭岛虚心著，铃木重三校注：《葛饰北斋传》，第85页。

② [日]菅原真弓：《武者绘的研究：作为“历史画”视点的一考察》，《哲学会志》，1999年，第56页。

③ [日]饭岛虚心著，铃木重三校注：《葛饰北斋传》，第82、83页。

④ [日]麦谷邦夫：《道教与日本古代的北辰北斗信仰》，《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3期。

⑤ [日]中村幸彦：《近世比较文学考》，第251页。

⑥ 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第204页。

⑦ [日]直俊彦：《歌川国芳的生涯与作品》，东京：东京美术株式会社，2016年，第2页。

使之形成内在的动势，把画面的跃动感发挥到极致。”^①想象力、动感、戏剧张力、生命力，从以上评论家的观点足以看出，从形式到内涵的创新不是继承自以往日本传统的绘画，而是源自水浒开始的平民英雄蓬勃的生命力，这种艺术的变革不是流于表面地完成水浒叙述的技术性设计，而是画师从精神世界到艺术形式接受并高度写实展现水浒豪杰的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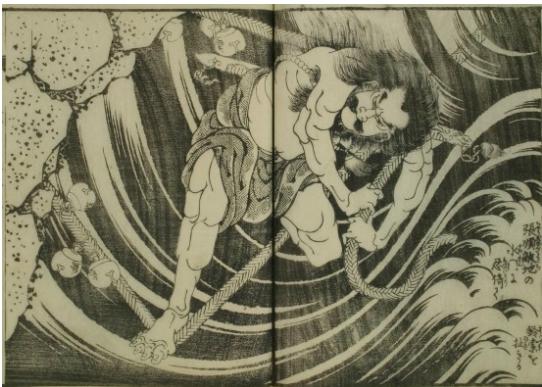


图5 《新编水浒画传·张顺金涌门》



图6 《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之一个·张顺》

其次，是英雄气质的重塑。平民与武士的界限已被打破，平民英雄有崇高的形象，武士也有强烈的现实感，忠义的水浒英雄与传奇的歌舞伎武士形象结合在一起，造就了图像的杰作。“浪里白条”张顺形象硕美，英勇牺牲，死后魂魄又附身兄长得报大仇，是画师喜爱的人物形象，画师选择了张顺一更扯动水底铃索的顷刻作为他四更魂归的前奏，北斋（图5）将张顺放在黑白色涡纹和粗绳上，又刻画他披散的发须、紧张的五官、虬结的肌肉，极富动感和冲击力，背景预告了难以挣脱的命运，但人物的动作极具反抗色彩。国芳的锦绘（图6）将张顺扯动铃索夸张为扯开铁窗棂，和被飞箭攻击的顷刻合并在一个画面，英雄牺牲的宿命感愈加强烈，他用袁无涯刊本插图的兽首装饰水阐，为人物加上歌舞伎年轻武士的头饰。至此中日的表意图案和英雄的内涵实现了融合，叙事上带有中古武士绘中的无常观与物哀的美感，但与武士绘文雅静穆的风格不同，画面充满动感和现实感，蕴含平民的生命力与抗争。

综上所述，水浒题材的浮世绘并非仅提供“异域之眼”的观察，而是深入接受的产物。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平民的艺术与平民的英雄产生了碰撞，深刻地影响了画师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创新。画师融合中日文化传统的笔端，塑造了融合平民与武士气质的英雄，创造了武者绘的典范，为浮世绘带来了变革。作为题材的水浒和浮世绘的变革体现了文学和艺术深层联动。

责任编辑：刘青

^① [日]岩切友里子：《浮世绘武者的源流》，见[日]佐佐木守俊、泷泽恭司编：《浮世绘大武者绘展》，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2003年，第126页。

稀见日藏与美藏和刻本“小说三言”考论^{*}

花宏艳

[摘要]和刻本“小说三言”是18世纪中叶“三言二拍”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最早译本，现分别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属于稀见域外汉籍。“小说三言”在翻刻的过程中，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本的基本形制，其封面、牌记、序言、目录、正文、钤印等都延续了明刊本的版本特征。另一方面，和刻本“小说三言”又有创新性，《小说精言》和《小说粹言》的牌记形式和内容比明刊本更为丰富，功能更为完善；和刻本“小说三言”在训读方法、行款和插图等方面都与明刊本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稀见和刻本“小说三言”的版本考证与研究对于“三言二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和刻本“小说三言” 《小说精言》 《小说奇言》 《小说粹言》

[中图分类号] I2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162-08

“和刻本”又称“日本本”，指日本翻刻的中国古籍，是中国古代文献在日本流传的一种特殊形式，也是汉籍在域外传播最活跃、最发达的一个系统。

18世纪中叶，江户时代日本学者冈白驹和泽田一斋从明代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中选择了部分篇目，加上训读符号进行翻刻。和刻本“小说三言”分别是冈白驹于宽保三年（1743）选编的《小说精言》和宝历三年（1753）选编的《小说奇言》以及他的弟子，风月堂主人泽田一斋于宝历八年（1758）选编的《小说粹言》，日本学界将这三部明代白话小说选本统称为“小说三言”。^①和刻本“小说三言”是“三言二拍”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最早译本，对于研究“三言二拍”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目前，和刻本“小说三言”在国内属于稀见汉籍，王宝平主编的《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中未见收录，学界对该书的全貌知之甚少，相关的版本研究还未见到。因此，笔者依据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藏四卷本《小说精言》、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五卷本《小说奇言》和五卷本《小说粹言》为研究对象，同时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喻世明言》《醒世恒言》、日本早稻田大学馆藏《警世通言》、哈佛大学馆藏《绣像拍案惊奇》等“三言二拍”的明刊本为参照对象，研究和刻本“小说三言”的版本内容、版式特征并与明刊本的异同进行比较。

一、和刻本《小说精言》版本概述

《小说精言》四卷本，冈白驹译，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现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据沈津《书城挹翠录》，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亦有藏本。^②

《小说精言》第一册扉页牌记第一行题“龙洲先生译”，下两行分列“小说选言、小说奇言、小说恒言、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历代小说刊印文献汇考与研究”（15ZDB07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花宏艳，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① [日] 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第531页。

② 沈津：《日本刻本〈小说精言〉》，《书城挹翠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385页。

小说英言嗣出”。^①说明冈白驹原拟定将“三言二拍”作为一个系列进行翻刻，但除《小说精言》外，译者只完成了《小说奇言》五卷本。龙洲先生即日本江户时代被称为“稗官五大家”之一的冈白驹。冈白驹（1692—1767）字千里，称太仲，号龙洲，江户时代汉学家，曾翻译多部中国白话小说。冈白驹曾弃医从儒，“是时京师已有悦传奇小说者，千里兼倡其说，都下群然传之，其名噪一时”。^②冈白驹的主要译著有《水浒全传译解》（写本，3册）、《文心雕龙》（校订）、《论语征批》（1卷）、《小说精言》（4卷）和《小说奇言》（5卷）等。

《小说精言》扉页牌记左侧为刊刻者风月堂主人泽文拱的一段话：“小说亦一家已，葑菲胡累于下体。海舶攸贡，年以百住。俚言骇人，微直爱居之钟鼓也。龙洲先生所译，意义涣释，宛乎如面听西人瞽欵，粤寿梨枣，以广其传，据此蘋之，三隅其庶矣。风月堂主人泽文拱识。”^③

《小说精言》4卷以冯梦龙《醒世恒言》为底本，选择了其中卷三十三、卷八、卷二十一和卷九的4个故事翻译而成，分别是：“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张淑儿巧智脱杨生”“陈多寿生死夫妻”。

《小说精言》第一卷卷首刊有译者冈白驹的序言一篇，文末附有冈白驹钤印两枚。其中，上方为“冈白驹印”的朱文方印，下方为“冈千里印”的白文方印。序言因其重要，全文照录如下：“小说者，史之裂也。马贵与列诸子家，盖以其为一家已。讨厥源流，则昉乎燕丹子，次之曼倩《神异》《洞溟》诸记。茂先《博物志》，令升《搜神记》，彦升《述异》，休文《齐谐》，学者多称焉。《汉武内传》《飞燕外传》，虽曰别史，亦古之小说也。自此已还，如《虬髯》《红线》《隐娘》《白猿》诸传，虽近诬诞乎，辞资于史汉，总厥归途，则皆史之流亚也。南宋孝宗以天下养太上皇，倦勤之余，牵黄臂苍，不足以娱其心。乃命侍从，日访民间奇事，以给逍遙之具。于是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夫小事不足以动听，即衍而广之，引而伟之。机杼缘饰，遂成一场奇闻矣。或快人情所欲，或洩众心所愤，无聊之极思，其间彰善瘅恶，劝戒与夺，树之风声，实良史之遗意也。蚕蟹鄙谚，取乎礼典，狸首淫哇，或可箴戒。迂谈见志，因事道治，列诸子家，诚亦非妄置矣。历载邈矣，言亦变迁，文辞之变无穷。南史有楼罗，北史称人力，弇洲以为稗官小说，微独纪传陋也。雅变之俚，简衍至冗。于是乎，看雅俗朝市之言矣。唐制曰，勿太俗，勿太文。欲榜谕律令，上下易通晓也。于是乎，有官府律令之语矣。善夫讳辟换文，转借成义。至乎销绢不识是何物也。快子眠桅，船人家言。谓下拜剪拂，军家创语，皆辟其所讳。而换其所尚也。而犹可考之掌故焉。独至乎平常俚言，不啻耳之侏离，即载之笔，亦谓之鳩舌。惟攻诸象胥，学者不讲。夫国音自资用，奚必华音，而至读不能句，实学人之大阙也。虽然，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文辞源于典漠，流而入俗，虽俚言鄙语也，岂出于字故固。亦弗深思已属者有释小说者。余译以付之。又别为之译义，曰叙小说所繇，读者求诸字故以此为一隅，思则过半矣。宽保癸亥春三月望西播冈白驹序。”

“小说者，史之裂也”，冈白驹将小说看作历史的一个分支。从源流来看，小说起源于志怪，从功能来看，“彰善瘅恶，劝戒与夺，树之风声，实良史之遗意也”，小说所具有的教化作用与良史所发挥惩恶扬善的作用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序言中“蚕蟹鄙谚，取乎礼典，狸首淫哇，或可箴戒”一句显然化用自刘勰《文心雕龙》“谐讔篇”。冈白驹在1743年完成《小说精言》之前，曾于1731年校订了《文心雕龙》，可见他对《文心雕龙》重视“谐讔”这种文体的意图必然是有所领悟才会化用在《小说精言》的序言之中。^④除受《文心雕龙》的影响外，冈白驹的小说观念还受冯梦龙等人的直接影响。冯梦龙在《醒世恒言》序言中开篇即提出“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⑤而明代崇祯年间抱瓮老人在“三

^① 关西大学藏《小说精言》卷首有缺字，根据沈津所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本，这一行字为“小说选言、小说奇言、小说恒言、小说英言嗣出”，参见沈津：《书城挹翠录》，第385页。

^② 严绍璗、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34页。

^③ [日]冈白驹译：《小说精言》，宽保癸亥京师风月堂印本，关西大学图书馆藏，索书号：L23-D6336。

^④ 参见严绍璗、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第335页。

^⑤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页。

言二拍”的选本《今古奇观》的序言中也明确提出“小说者，正史之余也。《庄》《列》所载化人、偃偻丈人等事，不列于史。《穆天子》《四公传》《吴越春秋》皆小说之类也”。^①

从选文的内容来看，《小说精言》对于《醒世恒言》中的四个故事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第一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冈白驹删去了故事开端作为引子的魏生的故事，删减篇幅多达 700 字。第二卷“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则删去了小说中的风月情节。第三卷“张淑儿巧智脱杨生”仅删除了第一段 56 字的开场诗。第四卷“陈多寿生死夫妻”删除了开头一大段比喻棋局的议论，共计 391 字。从总体上来看，《小说精言》对《醒世恒言》原文进行的删节并不影响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同时使得选本内容较之原文更为紧凑。

从形式上来看，《小说精言》删去了《醒世恒言》明刊本中的全部眉批，但却在每卷正文结束后都附录了日文的“译义”，即用日文解释小说中的白话词语。第一卷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卷末“译义”包含了“去那城中”“有个官人”“消折去了”“齐眉”“再过几时”“难道”“应付”“经纪”“就里”“只得”“无端”“一觉”“家火”“挣扎”“推一推”“朝着里床”“手脚活动”“扯条单被”“停当”“次早”“追不着的”“挨上路去”“搭膊”“则个”“蹊跷”“闲帐”“不是话头”“勒揹”“心虚”“和开着”“委是有的”“没巴臂”“苦死”“通同作弊”“巴不得”“不合”“凌迟”“巴巴结结”“买路钱”“毛团”“压寨夫人”“瓦罐不离井上破”“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执证”“斩加等”“决不待时”“断狱失情”等 50 个词语和短句。

概而言之，《小说精言》不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进行了符合日本读者阅读习惯的删改，并增加了训点、译义等和刻本版本特有的内容。

二、和刻本《小说奇言》版本概述

和刻本“小说三言”的第二部是出版于宝历三年（1753）的《小说奇言》，现藏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由于译者和刊印者都相同，因此《小说奇言》与《小说精言》的行款基本一致。《小说奇言》五卷，冈白驹译，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每卷卷首标注“西播冈白驹译”，并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钤印。第五卷卷尾标注出版时间和刻印者为“宝历三年京都风月堂庄左衡门”。

《小说奇言》没有扉页牌记和序跋，但其故事来源较之《小说精言》更为丰富。其中，前四卷故事来源于冯梦龙的“三言”：第一卷“唐解元玩世出奇”选自《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缘”；第二卷“刘小官雌雄兄弟”选自《醒世恒言》第十卷；第三卷“滕大尹鬼断家私”选自《喻世明言》第十卷；第四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选自《醒世恒言》第七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奇言》第五卷“梅屿恨迹”不是来源于“三言二拍”，而是选自清代白话短篇小说《西湖佳话》第十四卷。《西湖佳话》又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作者署名为“古吴墨浪子搜辑”，该书成书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小说奇言》第五卷收录的是讲述才女冯小青悲惨命运的“梅屿恨迹”，虽然译者没有说明编选这篇小说的具体缘由，但是第五卷卷首冈白驹的一段话，大致可以推断出译者选编的原因：“小青之事，可怜可悲，又可惜。读之令人酸鼻。或曰，原本此事，文人才子，殊构巧思。作为此事，故比它小说不同。非独其事能使人酸鼻也，其文能使人感。可谓奇文奇事矣。因标出于此，原见于《西湖佳话》。”^②文人才子的故事，不仅仅因为故事感人，更因为文字足以感人。因此，“梅屿恨迹”不仅是和刻本“小说三言”里唯一一篇“三言二拍”之外的小说，同时也是唯一一篇写文人才女故事的短篇小说。

与《小说精言》对明刊本的删节一样，冈白驹在《小说奇言》中继续对故事内容进行了或多或少的删节。其中，少的只删除一两段，而长的则删除正文开端篇幅长达上千字的故事。例如第一卷“唐解元玩世出奇”，删除了《警世通言》底本中的描写阊门的一段话共计 30 字。第二卷“刘小官雌雄兄弟”删除了从开场诗：“衣冠未必皆男子，巾帼如何定妇人？历数古今多怪事，高山为谷海生尘。”到桑

① [明]抱瓮老人：《今古奇观》，明吴郡宝翰楼刊本，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4259。

② [日]冈白驹：《小说奇言》，宝历三年京师风月堂印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索书号：TJ-5750-7627。

茂假扮女子伤风败俗的故事共计 1100 多字。第四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冈白驹在不影响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删除了开场诗：“渔船载酒日相随，短笛芦花深处吹。湖面风收云影散，水天光煦碧琉璃。”同时大幅度压缩原文中介绍太湖地区地理环境的文字，“这首诗是宋时杨备游太湖所作。……南北一百二十里，周围五百里，广三万六千顷……科头宴起吾何敢，自有山川印此心”。^①原文中这一大段描写太湖的文字约为 400 字，而《小说奇言》中仅仅压缩为一句话：“话说吴郡大湖中，洞庭两山最大，欲游两山，必假舟楫，往往有风波险。”

和《小说精言》相比，《小说奇言》删除了所有明刊本的眉批，同时每卷卷尾的“译义”也没有保留。不过，作为和刻本特有的正文每行汉字旁边的训点符号始终保留。

三、和刻本《小说粹言》版本概述

和刻本“小说三言”的第三部是风月堂主人泽田一斋于宝历八年（1758）出版的《小说粹言》。日本学者盐谷温认为冈白驹门人泽田一斋不仅是书店主人，还是江户时代著名的汉学家：“泽文拱，讳重渊，字文拱，号一斋，又叫奚疑斋，通称风月堂。天明二年（当清乾隆四十七年）以八十二岁没。虽是书店底主人，但为风月堂中兴之祖，且以汉学者知名，为冈白驹底门人，以中国小说底译述著称。”^②《小说粹言》现藏于关西大学图书馆和哈佛大学图书馆。但笔者所见关西大学藏本仅有第一、二卷；而哈佛大学藏本为完整的五卷本。《小说粹言》扉页牌记标注出版时间和刊刻者为“宝历戊寅新刊，京师书坊风月堂梓行”。和《小说精言》《小说奇言》一样，《小说粹言》的刊行者都是京师风月堂，因此该书和前两部保持了同样的版式风格。

《小说粹言》为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第一卷有扉页牌记，第五卷有卷尾牌记，预告了风月堂已出和嗣出的系列图书。该书第一卷为译者奚疑斋主人的序言，落款为“宝历丁丑三月既望奚疑斋主人书”，并印有“奚疑斋”朱文方印和“重渊之印”白文方印。

《小说粹言》第一卷正文之前有译者序。与冈白驹在《小说精言》中的观点一致，泽田一斋认为小说可以补正史之不足，能够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天地剖判，万象森罗，二轮如梭，不知已历几东升西没也，而人处其间也，心思内感，耳目外接，是无日无时而未尝有事。乃有太史氏者出，悉笔之于策，以传将来。大则治乱盛衰，小则动静云为，其他彼为善是也，此为恶非也，褒贬事夺，毁誉将丧，确有援据，不可移易，所谓正史也。……余诵习暇日，耽小说家书，赏心触感，随抄随译，装为十回，旧藏帐中，以其汰淫媒猥亵，题曰《粹言》，皆奉削删，以广其传。……宝历丁丑三月既望奚疑斋主人书。”^③从该书的扉页牌记可以看出，泽田一斋原本打算从“三言二拍”中选译十篇小说，但最后完成的只有五篇。其中五篇已翻译的小说分别是：第一卷“王安石三难苏学士”选自《警世通言》第三卷；第二卷“转运汉巧遇洞庭红”选自《拍案惊奇》第一卷，原题为“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第三卷“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选自《警世通言》第五卷；第四卷“包龙图智赚合同文”选自《拍案惊奇》第三十三卷，原题为“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第五卷“袭私怨狠仆告主”选自《拍案惊奇》第十一卷，原题为“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此外，风月堂未出的另外五篇白话小说分别为选自《警世通言》第四卷的“拗相公饮恨半山堂”、《醒世恒言》第一卷的“两县令竞义婚孤女”、《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的“乐小舍拚生冤偶”、《警世通言》第三十二卷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小说粹言》五卷的底本虽然是《警世通言》和《拍案惊奇》，但实际上，泽田一斋在进行训点和翻译的过程中，更多参考《今古奇观》的底本。《今古奇观》是明末姑苏抱瓮老人从“三言二拍”中精选而成的一部拟话本小说集。《小说粹言》第三卷篇目为《吕大郎还金完骨肉》。该小说初刊于《警世通言》

① [明]冯梦龙：《醒世恒言》，第 99 页。

② [日]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孙俍工译，第 536 页。

③ [日]泽田一斋：《小说粹言》，宝历八年京师风月堂印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索书号：TJ-5750-3610。

第五卷，实际上，选本中的故事情节与《警世通言》的原文有较大出入，但却与《今古奇观》第三十一卷的内容完全一致，例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的情节，经过仔细比对不难发现《小说粹言》所选用的是《今古奇观》的底本，而与《警世通言》在细节上有较大差别。同样，在小说结尾部分，吕大郎的妻子与嫂嫂调换孝髻而阴差阳错没有被卖的情节也采用了《今古奇观》的底本而与《警世通言》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和刻本“小说三言”在刊刻的过程中，不仅使用了“三言二拍”的底本，同时也将“三言二拍”的明代选本《今古奇观》作为重要的参考底本。甚至当原著内容与选本内容出现差异时，日本汉学家更倾向于参考《今古奇观》的内容。例如，《小说奇言》第一卷“唐解元玩世出奇”就使用了《今古奇观》的题目，而舍弃了《警世通言》的题目“唐解元一笑姻缘”。《小说粹言》第五卷“袁私怨狠仆告主”基本使用了《今古奇观》的题目“怀私怨狠仆告主”而舍弃了《拍案惊奇》中的原题“恶船家计赚假尸银，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表1 和刻本“小说三言”选文篇目一览表

和刻本“小说三言”	卷数	回目	原出处	选本
《小说精言》 (四卷本)	第一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醒世恒言》第33卷	
	第二卷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醒世恒言》第8卷	《今古奇观》第28卷
	第三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醒世恒言》第21卷	
	第四卷	陈多寿生死夫妻	《醒世恒言》第9卷	
《小说奇言》 (五卷本)	第一卷	唐解元玩世出奇	《警世通言》第26卷	《今古奇观》第33卷
	第二卷	刘小官雌雄兄弟	《醒世恒言》第10卷	
	第三卷	滕大尹鬼断家私	《喻世明言》第10卷	《今古奇观》第3卷
	第四卷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	《醒世恒言》第7卷	《今古奇观》第27卷
	第五卷	梅姑恨迹	《西湖佳话》第14卷	
《小说粹言》 (五卷本)	第一卷	王荆公三难苏学士	《警世通言》第3卷	
	第二卷	转运汉巧遇洞庭红	《拍案惊奇》第1卷	《今古奇观》第9卷
	第三卷	吕大郎还金完骨肉	《警世通言》第5卷	《今古奇观》第31卷
	第四卷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拍案惊奇》第33卷	
	第五卷	袁私怨狠仆告主	《拍案惊奇》第11卷	《今古奇观》第29卷

四、和刻本“小说三言”行款与牌记的版本特征

和刻汉籍是中国古籍在日本的特殊传播形式，其最典型的版本特征是在原文中加入假名与各种符号注明词义的训点的方法，而与明刊本在行款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同时其装帧和版刻具有更为鲜明的日式风格。清末文人李慈铭曾见过这种带有训读符号的和刻汉籍：“见日本所刻书，行字之旁，皆有勾勒，或小注数目字”，^①不解其意，问日人冈鹿门，始恍然大悟。正是因为和刻本在每行汉字旁边带有特殊的训读符号，所以与中国本在行款上有较为明显的差别。《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的行款是统一的半页九行二十字。而“三言二拍”明刊本的行款都是半页十行二十字。笔者所见日本内阁文库本《醒世恒言》、日本早稻田大学本《警世恒言》、日本内阁文库本《喻世明言》以及日本法政大学图书馆藏《古今小说》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抱瓮老人的《今古奇观》的行款都是半页十行二十字。同时，为了标注训读符号的方便，和刻本多将明刊本中的栏线去掉。因此，直观上看和刻本“小说三言”比“三言二拍”的明刊本看起来更为疏阔。

除了行款的差别外，和刻本“小说三言”无论在装帧还是版式上，都既有对明刊本的摹仿，也有和刻汉籍特殊的版本特征。

从牌记的形式来看，和刻本“小说三言”基本沿用了明刊本的“牌记”形式。古籍牌记始于宋代，“宋

①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033页。

人刻书，有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刻一牌记者，以记刊印者姓名堂号，开雕时间地点，乃至所用底本、本书内容、校勘水平、版权归属等”。^①宋元刻书的牌记位置并不固定，较多的是见于卷尾和序跋、目录之后。但是元代后期至正十六年（1356）翠岩精舍刻《广韵》使用了封面牌记。此后，明清时期，一整版的牌记广告出现在封面和扉页的位置上几乎成了一种潮流。^②牌记的主要作用在于维护版权或者进行广告宣传，类似于现代图书的版权页。到了明代中后期，牌记在书籍中的使用日益广泛。例如，日本内閣文庫本的《喻世明言》和《醒世恒言》都有扉页牌记。其中，《醒世恒言》的牌记内容比较简单，仅仅刻录了书名和刊刻者，而《喻世明言》的牌记则较为复杂，左侧四行小字完整记录了《喻世明言》重刻以及命名的缘由：“绿天馆初刻古今小说十种，见者侈为奇观，闻者争为击节，而流传未广，阁置可惜。今板归本坊，重加校订，刊误补遗，题曰《喻世明言》。取其明白显易，可以开□人心，相劝于善，未必非世道之一助也。”^③在和刻本“小说三言”中，冈白驹和泽田一斋沿用了明刊本牌记的形制，同时其内容和形式更为丰富和多样。其中，《小说奇言》为单一牌记，牌记的位置在卷尾，注明“宝历三年京都风月堂庄左衙门”。而《小说精言》和《小说粹言》的牌记都是包含扉页牌记和卷尾牌记的复合牌记。其中《小说精言》的扉页牌记不仅有刊刻者风月堂主人的一段话，用以解释小说刊刻的缘由与价值，还预告了接下来将要出版的《小说选言》《小说奇言》《小说恒言》《小说英言》等一系列“三言二拍”的和刻本。同时《小说精言》第四卷的卷尾牌记，标注了小说的刊刻时间和刊刻者为“宽保三癸亥岁七月发行，京师书坊风月堂庄左衙门”。^④

《小说粹言》扉页牌记的内容更为丰富，不仅标注了刊刻的时间和刊刻者“京师书坊风月堂”，还对将要刊刻的十篇小说回目进行了预告。同时在该书第五卷的卷尾牌记中，泽田一斋进一步预告了京师风月堂书坊近期已出版和将要出版的和刻汉籍：

《小说精言》五回发行 《小说奇观》十回嗣刻
《小说奇言》五回发行 《西游记》百回嗣刻
《小说粹言》五回发行 《连城璧》十二回嗣刻
同六回至十回近日发行 《照世杯》四回嗣刻
《水浒传》十一回 以下近日发行

仅从《小说粹言》的这一则卷尾牌记的出版信息可以看出泽田一斋主持的京师风月堂书坊不仅选译和刊刻了“三言二拍”，还打算刊印《西游记》《水浒传》等长篇小说。这些江户时代的和刻汉籍说明冈白驹、泽田一斋及其风月堂对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的刊印和传播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和刻本“小说三言”中版画插图的缺失

作为“三言二拍”的日本翻刻本，和刻本“小说三言”在总体上继承了明刊本的基本内容，包括扉页牌记、序言、正文，甚至序言落款钤印都与明刊本一样。但值得注意的是，和刻本“小说三言”却舍弃了原著卷首的版画插图这一明刊本的重要内容。

中国木刻版画书籍，肇始于李唐，然而其昌盛时期，则在明代。据统计，现存历代插图古籍有4000余种，明本就占一半。^⑤尤其是明万历年间，“绘画雕刻，人才辈出，光芒万丈，遂达于艺术之最高峰”。^⑥这一时期，明代图书版画应用范围极广，几乎到了无书不刻的地步，其中尤其以小说和戏曲插图最多。因此，“三言二拍”的各种明刊本带有数量庞大的卷首插图不仅出于刊刻者商业竞争的

① 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述略》，《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页。

② 参见潘景郑：《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序》，《宋元书刻牌记图录》；施勇勤：《古书牌记的演变及类型》，《出版发行研究》2000年第12期；赵磊：《日本江户时代和刻本汉籍牌记研究》，《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21年第3期等。

③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日本内閣文庫藏，索书号：17912。

④ [日]冈白驹译：《小说精言》，宽保癸亥京师风月堂印本，关西大学图书馆藏，索书号：L23-D6336。

⑤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23页。

⑥ 刘季辰：《明代版画书籍展览会目录》，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1944年，第1页。

需求，更是时代风气使然。

“三言二拍”的明刊本常在第一卷目录后与正文前刊刻大量描绘故事情节的卷首插图。这些插图都以成对的形式出现，每卷两幅。例如，内阁文库本《喻世明言》共计48幅插图；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警世通言》共计80幅插图；内阁文库本《醒世恒言》共计74幅插图。哈佛大学藏清代消闲居精刊本《绣像拍案惊奇》共62幅插图，日本内阁文库本《二刻拍案惊奇》共计78幅插图。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吴郡宝翰楼刊本《今古奇观》也有80幅月光型版画插图。然而，《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和《小说粹言》都无一例外地省略了明刊本版画插图。如此数量众多，形式精美而富有高度艺术性的版画插图，为什么在和刻本中没有刊刻出来？这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关于艺术史和出版史的问题。

一套精美的绣像本图书的完成，除了有刊刻者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之外，还需要技艺精湛的画工和刻工的共同努力才能完美呈现。江户时代和刻汉籍省略中国本的版画插图，原因之一很可能是日本书坊的刊刻技术还无法达到明代书坊高超的版画制作水准。

和刻汉籍较少刊刻中国本原有的版画插图，即使有的书籍必须刊刻图像的，和刻本也不会按照中国本原有的图像形式进行覆刻，而是以日本绘画的技法重新绘制。这就使得和刻汉籍中所呈现的插图淡化了中国艺术的审美风格，而带有鲜明的日式风格。



图1 《新编水浒画传》之豹子头林冲、九纹龙史进



图2 《水浒全图》之林冲、徐宁

图1、图2两幅插图都是《水浒传》的人物绣像，且都有豹子头林冲。图1是江户时代日本翻刻的《新编水浒画传》，虽然该书是根据中国一百四十回本翻刻而成，但其插图成相却具有鲜明的日式风格。图2是清光绪六年广东藏修堂刊本《水浒全图》，该图虽然是清刻本，但却以明代杜堇的绘画上板，因此，该插图所显示的是明代《水浒传》人物画的一般画法。虽然两幅插图表现的是相同的人物形象，但在审美风格上，和刻本和中国本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图3 和刻本《唐诗选画本》



图4 明刊本《唐诗画谱》

图3、图4两幅插图都属于唐诗画谱，图3是日本江户时代刊印的《唐诗选画本》，该图所绘内容为沈佺期《古意》：“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白狼河北

音书断，丹凤城南秋夜长。谁谓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①诗歌与插图共同刻画了一位少妇在九月树叶纷纷飘落的秋季思念久戍边塞未归的丈夫。图4插图选自明代集雅斋主人黄凤池编辑的《唐诗画谱》，插图和诗歌所呈现的是题为柳宗元的《遗怀》：“小苑流莺啼昼，长门浪蝶翻春。烟锁颦眉慵饰，倚栏无限伤心。”^②图3、图4两幅图的内容都是闺怨题材，但从插图的艺术风格来看，和刻本插图使用日本浮世绘的技法，具有鲜明的江户遗风，而明刊本的插图则体现的是明代木刻版画的典型风格。

再如明治十六年（1883），日本服部扶松翻译了《今古奇观》中的四篇小说。同时，该书在卷首为每一篇小说各附录插图两幅，其中第二组插图描绘的是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情节。图像上方有两行字提炼杜十娘投水的情节：“义娼恨暖夫之薄情，忿然投宝货又自投水”。^③从图5可以看到，该书绣像插图的元素，不论是杜十娘的形象还是人物所处的背景以及绘画的表现技法都是典型的江户时代浮世绘的画法，而不是明代版画插图所具有的文人画风格了。

和刻本“小说三言”要将制作精美的明刊本“三言二拍”的版画插图重新绘制为符合日本人审美的浮世绘类的插图显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技术和经济成本。或许这正是和刻本“小说三言”中版画插图缺失的重要原因。

六、结语

“三言二拍”成书于明朝末年，在仅仅一百年后江户时代的宽保至宝历年间，冈白驹与泽田一斋就已经完成了《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和《小说粹言》的翻译和刊刻，这在东亚文化交流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传播事件。和刻本“小说三言”在刊刻的过程中，既继承了明刊本的形制和版本特点，又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和刻本”的版本特征，在装帧和行款上具有更为鲜明的日式风格。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道不行，乘桴游于海”，^④和刻汉籍不仅是中日典籍交流的文化成果，更是中国古籍在域外的特殊保存方式。正如清人黎庶昌在《刻古逸丛书序》中所说的，中国古籍往往借由和刻本而得以保存与传播：“余使日本之明年，得古书若干种。谋次第播行，属杨君星吾任校刻。惟夫古籍之仅存兵燹腐蠹之无常，其势不日趋散亡不止。学士大夫虽病之而无术以免，惟好之而既求，求之而既传，差足救弊于后。予非苟为其难也，古书之流遗，何幸复见于异邦，而自予得之且以付刊焉。”^⑤

对日本汉学界而言，《小说精言》《小说奇言》《小说粹言》出版后扩大了“三言二拍”等白话小说在日本文人间的影响，“小说三言”成为许多日本文人的案头读物。^⑥同时，也掀起了《劝惩绣像奇谈》《通俗醒世恒言》《通俗今古奇观》《通俗赤绳奇缘》等以“三言二拍”故事为底本的江户时代白话小说训点、翻改和刊刻的传播热潮。

责任编辑：刘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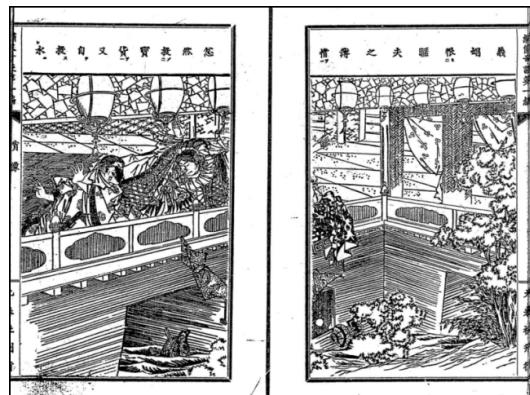


图5 和刻汉籍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插图

① [日]小林新兵卫：《唐诗选画本》，天明戊申刻本，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索书号：2536577。

② [明]黄凤池：《唐诗画谱》，明万历集雅斋藏板，日本内阁文库藏，索书号：15880。

③ [日]服部扶松纂评：《劝惩绣像奇谈》，明治十六年九春社印本，东京图书馆藏，索书号：特41-110。

④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页。

⑤ [清]黎庶昌辑：《古逸丛书》，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⑥ 参见周健强：《中国古典小说在日本江户时期的流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60页。

本维尼斯特语言学理论对罗兰·巴特 “中性”思想的启示^{*}

张 静

[摘要]罗兰·巴特的“中性”一词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诸多语言学家的影响，目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是索绪尔、布龙达尔、叶姆斯列夫、格雷马斯等，但实际上本维尼斯特对他的中性思想启发最大。回顾中性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罗兰·巴特的“中性”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而是希望达到的视野或方向：一是用话语取代语言，以期实现个人自由之欲；二是打破一切二元对立结构，去除隐含的权力。本维尼斯特有关话语和人称的研究，为巴特的“中性”思想提供了最有力的语言学支持。

[关键词]中性 话语 人称代词 本维尼斯特 罗兰·巴特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23) 04-0170-07

“中性”(le neutre)是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创作生涯的关键词。巴特的“中性”思想萌生于语言学，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诸多语言学家的影响，目前学界讨论较多的是索绪尔、布龙达尔、叶姆斯列夫、格雷马斯等，但鲜有提及本维尼斯特。实际上，巴特创作的黄金期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后，而这段时期对他影响最大的语言学家是本维尼斯特。^①巴特在多次访谈中说过本维尼斯特极大地推动了自己的研究。1970年，巴特应邀参加电视访谈节目“20世纪档案”，面对主持人蒂博多的提问：“您的符号学研究受到了哪些语言学著作或其他领域的科学著作的影响？”他回应自己曾受到索绪尔、布龙达尔、格雷马斯、雅各布森、叶姆斯列夫等人的启发，但他明确表示：“在我读过的所有语言学家的著作中，最高级别的就是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学的层面上，他带给我像水之沸腾般的颤动。他含蓄地展现出一种力量：这种将科学引向其他事物的力量，如你所知，就是我所谓的写作。”^②在巴特的心目中，本维尼斯特将他对语言科学的兴趣指引到了个人书写层面，同时，本维尼斯特的语言学模式也为巴特的核心词汇“中性”提供了操作指南。遗憾的是，现有的研究中有关本维尼斯特对巴特影响的研究资料并不丰富，关于他对巴特中性思想的启示则更近于空白。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此进行相关探讨，重点讨论本维尼斯特的两个核心概念——话语和人称代词——对巴特中性思想的启发作用，同时，也简单阐明巴特中性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中性思想在巴特文本中的具体体现。

一、中性的发展历程

*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罗兰·巴特的文学符号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21XNA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静，《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副编审（北京，100872）。

① Roland Barthes, “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aris: Seuil, 2002, p.858.

② Roland Barthes, “Répons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 Paris: Seuil, 2002, p.1033.

法国作家贝纳尔·科芒在《罗兰·巴特，走向中性》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巴特的中性思想“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的，并且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因为这种观念在巴特写作的不同阶段中不曾有过任何收敛”。^①巴特从结构语言学中发现了这一词汇，经过转换将它发展为自己独有的方法论。巴特最早挪用的是丹麦哥本哈根学派语言学家维戈·布龙达尔（Viggo Brøndal）的术语。据萨莫瓦约考证，巴特在1947年前后在罗马尼亚担任图书管理员时，就开始阅读布龙达尔的《普通语言学论集》。^②巴特也曾回忆道，他只是在1956年撰写《神话集》时才读索绪尔，他读过的第一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当属布龙达尔，“早在1947年我就读过一位‘小众’结构主义者布龙达尔，我从他那里接受了‘零度’的概念”。^③

在布龙达尔的概念中，中性与零度的含义是一致的。根据布龙达尔，将两极的项次表示为“正”（+）和“负”（-），在这两个对立的项次之间还可以插入第三个义素，它既不是正也不是负，而是中性的：正/中性/负。在某些情况下，这个中性义素也可以是正极和负极的综合：正/综合/负。如果用索绪尔的二元论语言模式表示，布龙达尔的中性可以理解为两层意义：A/B，一是既非A也非B，二是既是A又是B。^④1953年巴特出版第一部著作《写作的零度》时，即采用了布龙达尔的“零度”和“中性”术语。^⑤巴特认为，真正的作家生产一种白色写作，即“中性”或“零度”写作：“创立一种白色写作，它摆脱了特殊语言秩序中的一切束缚……我们知道，某些语言学家在某一极性的两项之间建立了一个第三项，即中性项或零度项……这种中性的新写作存在于各种叫喊声和判断之中，却又不介入其中，它形成了一种不在场的风格。”^⑥不过，巴特这里的中性不仅仅是布龙达尔语言学意义上的第三个义素，它更多地是指一种书写行为，这种行为是假设作家以缺席方式存在的语言的创新，使作家不再受到语言结构的禁锢。借助语言学的中性项，巴特表达了一种在对抗冲突关系和等级制、取消二元论框架下因差别选择而产生的结构性意义的愿望。此后，“中性”一词贯穿于巴特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巴特虽然是结构主义思潮公认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有一种因素使他的结构主义变得灵活起来，那就是总待在其背后的中性。即便是巴特在这段时期顺从于二元结构，但在《神话》等作品里依然保持着讥讽、标记着距离。相对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巴特在钻研语言结构本身的同时，仍持有对主导价值、公众舆论等解密的雄心。正因如此，20世纪60—70年代，巴特“中性”的含义逐步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从早期的“两边否定”转向了“多重肯定”，“中性”不再是对回归零度的想象，而是对现实更广阔的容纳与混同。在1971年《埃尔泰或字母艺术家》一文中，“中性”还是一个两边都否定的中性项：“在语言学上，理想的聚合包括四个项：两个极项（A对立于B），一个混合项（既是A也是B）和一个中性项或零项（既不是A也不是B）。”^⑦到1975年，巴特在《罗兰·巴尔特自述》中论及“中性”时，含义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为中性是破除一切聚合关系之物（paradigme，主要指二元对立的范式）的东西，“是一种与二律背反相反的东西……中性不是一种既是语义的又是有争执的对立关系的第三项——零度……它是一种新聚合的第二项”。^⑧这里巴特首次区分了“零度”与“中性”，而在之前的写作中，他总是将“零度”与“中性”合并谈之。“中性”已不再是布龙达尔在《普通语言学论集》中所定义的那个自由独立的“中性项”，而是更接近“混合项”。

巴特晚年对中性思想的详细阐释，主要体现在他教授的法兰西学院《中性》课程中。在该课程中，

① Bernard Comment, *Roland Barthes, Vers le Neutre*, Paris: Christian Bourgois Editeur, 1991, p.2.

② [法]蒂费娜·萨莫瓦约：《罗兰·巴特传》，怀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7页。

③ Roland Barthes, “Répons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 p.1033.

④ [法]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方法研究》，吴泓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9-31页。

⑤ 在《写作的零度》中巴特未提及布龙达尔，但在1965年的《符号学原理》、1970年的访谈 *Réponses*、1977年的短文“Question de temp”（时间问题）等中均有提及。

⑥ Roland Barthes, *Le degré zéro de l'écriture: suivi de Nouveaux essais critiques*, Paris: Seuil, 1972, pp.55-56.

⑦ [法]罗兰·巴特：《显义与晦义——批评文集之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27页。

⑧ [法]罗兰·巴尔特：《罗兰·巴尔特自述》，怀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巴特从语言学的语法概念“中性”入手，将其涵盖面扩大到文学、社会学和政治行为等不同领域，力图展示中性的非冲突性质对于各类话语体系的丰富意义。另外，巴特对中性的性质做了更为清晰的界定：“我把凡是破除聚合关系的东西都叫做中性……什么是聚合关系？它是指两个潜在的项次之间的对立，为了产生意义而显现二者之一。”^① 法兰西学院时期是巴特生前思想发展的最后阶段，中性的探索过程体现了巴特最旺盛的创造力。在该课程关于中性的全面阐发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巴特认为中性虽然脱胎于语言学，但该课程不再研究语言系统中的中性类别，而是研究话语实践中的中性现象；二是巴特在课程中始终强调，中性是一种与二元对立相反的东西。那么，巴特为何执意于研究来自语言学的二元对立与中性的关系问题？因为他认为由于语言无所不在，因此语言结构强加给人的二元对立以及暗含在其中的权力、武断和傲慢也就无所不在，^② 这就是为什么中性主要针对和要消解的便是语言中的二元对立。巴特这门中性课程的目的，就是要减弱寄生于语言中的权力，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讨论如何将语言中的权力中性化，如何让语言表达不带有傲慢。

在此，还有一个问题，巴特为何在访谈中宣称在有关“中性”等关键词研究中“最为心仪的语
言学家，唯有本维尼斯特”？^③ 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首先，在巴特看来，本维尼斯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是中性的。巴特在1972年为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撰写的评论《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中谈道，“本维尼斯特的天赋不仅仅是他的学识，还有他带有‘中性’风格的陈述方式”，本维尼斯特的遣词造句“适度、紧凑和严密，文字达到了豪放与简约的融合”。^④ 其次，巴特认为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学层面找到了一条摆脱二元对立的出路。巴特在1966年为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一版撰写评论，评价本维尼斯特最重要的三项研究都集中于“人”的因素，从而找到了摆脱二元对立的出路：“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学上确立了主体与语言的身份，这在许多当代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样的分析为我们指明一条出路，就是摆脱至今尚未被消除的二元对立，即主观与客观、个人和社会、科学与话语的悖论。”^⑤ 本维尼斯特围绕人的概念而开展的语言学研究，其文字充满了含蓄的中性话语，这些因素对于巴特来说是破除二元对立的有效途径。

回顾中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巴特的中性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中性是巴特希望达到的一个领域或方向：一是用话语取代语言，以期实现个人自由之欲；二是打破一切二元对立结构，去除隐含的权力。而本维尼斯特有关话语和人称的研究，为巴特的中性思考提供了最有力的语言学支持。

二、话语与中性

正如巴特所言，本维尼斯特将“人”引入语言系统，是突破结构语言学的一大创举。本维尼斯特对人这个主体话语的关注，始终贯穿于《普通语言学问题》各个篇章。他通过对“话语”（discours）的界定和研究展现人的交流方式，实现从语言结构到人际话语交流的转化。本维尼斯特的话语语言学对巴特的中性话语影响深远。

本维尼斯特观察到语言学有两个研究对象，即言语活动（langage）和语言（langues）。前者主要指人们使用语词的规则方式、语言结构，后者主要指个体的话语行为，前者需要通过后者的具体行为才能实现。举例来说，本维尼斯特认为代词“je”（我）在语言结构形式上只是词汇材料，但一旦被用于话语，它就把人的在场引入其中，如果没有人的在场，言语活动就无法实现。^⑥ 因此，本维尼斯特指出，语言

①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② [法]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③ Roland Barthes, “Vingt mots-clés pour Roland Barthe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858.

④ Roland Barthes, “Pourquoi j'aime Benve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514.

⑤ Roland Barthes, “Situation du lingu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2), Paris: Seuil, 2002, pp.815-816.

⑥ Benveniste, émil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2, Paris: Gallimard, 1974, pp.67-68.

学不仅要考察语言结构的形式问题，更要考察个体的话语行为。在这里，本维尼斯特就从索绪尔的语言结构研究过渡到了话语行为研究。巴特在《我为什么喜爱本维尼斯特》中也大力称赞本维尼斯特不仅仅是研究言语活动，而且是研究语言的语言学家，他推翻学界成见，将语言与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巴特认为本维尼斯特建立了一门新语言学——交谈语言学，以“我 / 你”(je/tu)形式接合在一起。^①

事实上，本维尼斯特始终努力实现在话语的框架下重建语言学的愿景。这里所说的话语，是由言说的人在主体间性条件下承担着的语言，也只有在这一条件下，语言交流才成为可能。作为“陈述理论”的创始人，本维尼斯特通过陈述的形式探索话语语言学的可能。陈述意味着从语言到话语的个体转化，而语言的语义学是其转化技术的核心所在。本维尼斯特1969年发表《语言符号学》一文，在语言的表意方式上突破索绪尔的框架，提出了语言的“符义学”(le sémiotique)与“语义学”(le sémantique)双重表意方式。“符义学”层面，符号只指向语言系统内部，而本维尼斯特增加的“语义学”层面，将符号的意义转化成一种话语行为，这就将原先封闭自足的语言符号引向了外部世界。^②通过形式的转化，语言就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系统，而且可以用来表达人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维尼斯特运用陈述形式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而话语成为陈述的外现。1962年，本维尼斯特在《语言分析的层次》中提出，语言中的一切无不首先存在于话语之中。音位、形素、词等是语言的形式符号单位，组合为结构和系统；句子是话语的单位，是语言在个体鲜活的交流中的显现。有了句子，就离开了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领域，进入作为交流工具的新的语言世界，其表达方式就是话语。只有在实现为句子的话语中，语言才得以形成。^③

本维尼斯特关于话语和语言分析层次的论述对巴特影响极大。巴特在1970年的《话语的语言学》一文中，效仿本维尼斯特关于语言的双重表意方式，将话语作为双层编码系统进行分析，提出除了第一层级的语言学原则对话语进行编码，还有第二层级的社会层面对话语进行编码，以达到信息传递和人际交流的功能。同时，巴特还发展出话语语言学的规则，认为句子属于语言结构的上限和话语语言学的下限，有了句子，我们才离开了语言结构的领域，进入具有交流功能的话语领域，句子在文本和话语之间架起了桥梁，从而大大拓展了语言学的范围。^④巴特对话语语言学的研究，也反馈于其对“中性”的思考。回顾巴特中性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性”由音位、形容词、句子直至话语的各个层级发展而来，在句子以下的层面，“中性”只是语言学的结构符号现象，在句子之上，则进入了话语人际交流的新世界。“中性”不仅是特殊的语言实践，也是特殊的文化实践。因此，依照本维尼斯特对语言和话语的定义，巴特将中性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的反映，它是一种话语现象，而不仅仅是语言结构单位。

巴特晚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中性》课程是其对中性话语最全面的阐发。他强调尽管中性一词来自语言学，然而中性要致力于观察和描写的并非在语言现象里，而是在话语现象里。正如托马·克莱尔所说，尽管巴特是从陈旧的语言学直觉出发，然而这门课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课程，即中性“并非是在语言现象里，而是在话语现象里”得到把握的。^⑤巴特认为，语言的规范是一些强制性的规则，是强制他人说话，而话语是依据社交的规则形成的，人在话语的状态下讲话是自由的，中性的目的是要用话语代替语言。话语开辟了一个无限的领域，能够还原在语言中衰退、在生活中别处存活的中性。话语经由

^① Roland Barthes, “Pourquoi j'aime Benvi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513. 需要说明的是，巴特在运用概念上有时会有含混现象，比如这里在论述本维尼斯特的语言 *langue* 这个概念时，默认其是已包含有话语 *discours* 意味的一种新语言学，但在其他场合谈及语言 *langue* 概念，比如说《法兰西学院就职讲演》等，则是指传统的语言学概念，未包含有话语意味。

^② Benveniste, émil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2, pp.43-46.

^③ [法]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197-198页。

^④ Roland Barthes, “La linguistique du discours”,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3), pp.612-613. 参见张静：《本维尼斯特语言学思想对罗兰·巴特“写作”主题的影响》，《学术月刊》2022年第9期。

^⑤ [法] 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法文版前言，第5页。

感受达至中性，中性这个范畴适用于一切靠意义结合起来的组合段：文学的、哲学的、玄学的，也包括社会行为和主体内心活动。尤其是人们应该研究人之所欲，或人之所惧，因此，中性也可以称为“中性之欲”（Le désir de neutre）。^①可见，巴特探讨中性课程的目的，不是针对某一具体学科，而是希望在语言、话语、动作、行为、身体等领域进行广泛探索。巴特吸收了本维尼斯特关于陈述和话语的研究，他所阐述的中性思想虽然是由语言学出发，但并不局限于语言学范畴，而是广泛涉及意义、意识形态、现实生活中的际交往等问题。

三、人称代词、极性与中性

人称代词是本维尼斯特和巴特都极为重视的焦点。巴特在1976年为本维尼斯特撰写的悼词中总结，本维尼斯特勾勒出一个关于人称代词的新语言学，其结果是研究陈述的语言学（即交谈、主体间性）取代了研究“死的对象”的语言学。^②

本维尼斯特认为，人称关系问题是陈述理论的根基，也是语言中的主体性得以显现的第一要素。他在《普通语言学问题》以及1968年的《语言的结构与社会的结构》一文中提出，无论在什么语言、什么社会或时代中，总少不了“我”与“非我”的区分。这种区分通过语言中的人称代词而实现，人称代词实现了双重的对应：“我”与“你”的对应，“我—你”系统与“他”的对应。在这双重的对应关系中，第一组“我”与“你”的对应关系为主体性关联，存在于个人对话结构；第二组“我—你”与“他”的对应关系，是把人称与非人称对应起来，称为人称性关联。第三人称“他”无法指涉自身，只是用来启动话语之外的事物，使其具有某种客观参照性。本维尼斯特在此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形态，这就是由人称代词所提供的两组对应关系。这个全新的形态从语用学角度将言说者纳入他的话语之中，从对人称代词的语言学分析过渡到对人、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从而把人作为参与者放置在社会中，人、语言、社会这三个元素终于真正地融合起来。^③本维尼斯特对人称代词的重视，使得“人”在语言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也让巴特从本维尼斯特身上看到摆脱二元桎梏的希望。

需要关注的是，本维尼斯特有关人称代词的另一个创新性术语“极性”（polarité）概念，对巴特的中性思想具有很强的启示作用。本维尼斯特有一个富有哲理的论断：“言说的‘自我’即存在的‘自我’。”^④这个论断体现了语言主体性的根本：人在语言中并且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唯有语言的存在奠定了“自我”的概念，主体性是由人称的语言学地位决定的，由此引出了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命题。本维尼斯特认为，人称的极性是言语活动的基本条件，只要是个体间的交流，就必然涉及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也就必然会有“我—你”作为人称的两极。“我—你”的人称关系必须同时存在、互相补充，但是两者的关系并不完全平等——“我”的地位总优越于“你”，不过“我—你”两者都不可或缺，必要的时候两者位置可以相互转换。每个说话者只有在包含他人时才可以自立为主体，这个他人与合作者是拥有同一语言的合作者。从语言的功能出发，并且依据着“我—你”极性，个人与社会就不再是互反的关系项，而是互补的关系项。

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概念，打破了老一套的“我”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分割为主客体完全对立或者完全平等的二元论，从关注语言学意义上的代词构成发展到关注“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关系。而巴特的中性与本维尼斯特的极性概念具有非常相似的内涵：尽管巴特摆脱不掉二元和理性的范式，但他总是在考虑能够破坏这些范式的力量，而且这种破坏并不过分激烈和彻底。他的方法是使对立的两极不再是互斥矛盾的关系，而是高低层次的含混关系——对优劣有所展示，但又有所包容，这一点与本维尼斯特的人称极性概念是异曲同工的。这种两极间含混的高低层次关系在巴特的主要文本中都

①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第335页。

② Roland Barthes, “Benviniste”, *Oeuvres complètes* (Tome 4), p.947.

③ 朱江月：《“人在语言中”：本维尼斯特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阐述》，《当代修辞学》2014年第4期。

④ [法]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普通语言学问题（选译本）》，王东亮译，第293页。

有体现，比如《神话集》中的直接意指—含蓄意指，《S/Z》中的引人阅读之文—引文写作之文，《明室》中的钝点—刺点等等。那么，巴特是如何展现这些高低层次的呢？萨莫瓦约认为，巴特找到了一种阅读与写作的方式，不让人停留在稳定的同一性中，不让言语活动停留在限定词之中，这种阅读与写作方式就是“中性”。正如贝尔纳·科芒在《罗兰·巴特：走向中性》中总结的：中性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折中的、减弱的形式，而是被理解为旨在避开语言限制所做的一种尝试，是尽力消除一种区别性。^①巴特吸收了本维尼斯特关于人称的极性概念，继而发展为中性书写方式，消解了文本写作中“作者”的权威，以“读者/作者”可逆的状态实现了对话的平等。

回顾巴特中性思想的发展过程，我们发现，尽管中性概念起源于布龙达尔，但到了后期尤其是巴特1978年在法兰西学院教授的《中性》课程中，已全然颠覆了布龙达尔。巴特在《中性》课程中阐明，从语言结构来说，中性不再是非A非B，也不再是A和B简单的组合，而是可以相互包容和转换的关系。他认为，应该颠覆布龙达尔的结构：延伸至话语的中性，不是“既非……又非”，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衔接和组合，而是“一起发生”“同时”或是“交替登场”。^②中性的结构由原来的二元对立转换为一种组合关系，即A/B→A+B，不否定任何一方，而是将两者组合起来，从非A非B，改为既是A又是B，让它们同时存在于主体之中。中性在语法上，在法语的性（genre）上不分阴性（féminin）和阳性（masculin），在动词上不分主动和被动式，不分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这种新的组合关系，正如本维尼斯特谈到的人称的极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尽管有高低之分，但是互相依存，互相包容，必要时还可以将身份和角色互相转换。

从非A非B改变为既是A又是B，说明中性已成为一个混合项，而且这个混合项不是两个极项的简单叠加或组合，这两个极项还可以相互替换。^③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巴特这些关于中性的表述，与本维尼斯特对于人称的极性表述是基本一致的。晚年的巴特面对原先对立、冲突的范式，更为强调包容和多元性，不否定任何一方，让它们同时存在于主体之中，将中性当作消解对立性范式的基本手段。

四、中性的文本体现

本维尼斯特是颇具人文气息的语言学家，他关于陈述、话语、人称代词等核心概念始终贯穿着对“人”即说话主体的关注，这在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如日中天、把说话主体排除在语言之外的时代，无疑为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到了70年代，借助本维尼斯特的陈述理论，主体再次成为语言学思想的核心。主体的回归使得巴特披上了理论的盔甲，进一步使自己的书写模式主体化了。这种主体化体现为一种中性式的情结：难以被成见所接受，却被主体自我所喜爱。

对于巴特来说，对中性的思考是一种策略和方法，为的是寻找无拘无束地在时代抗争中的自身风格。巴特寻找的是一种生命的引导，希望循着细微的差异去生活。而晚年的《中性》课程，正是出于他心中有一种对于中性的欲望，那是一种感性诉求，希望通过中性的写作来寻找自我。因此，格雷厄姆·艾伦将巴特20世纪70年代的写作实践视为“中性书写”。艾伦认为，在这一时期巴特意识到了存在话语中的陈词滥调，而中性以愉悦享乐和反抗暴力的形式，批驳陈词滥调话语背后的主流意识形态。^④巴特故意断裂常规的逻辑与叙述序列，其目的在于阻止意义的“形成”。用片段的方式进行写作，意在标示出与其他人文字的差别性与独特性，而不让文字走上秩序化的循规蹈矩的道路。比如巴特在《中性》课程中，用断断续续的叙述强化中性的23个特征排序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一是借助于拉丁字母本身对23个特征按首字母进行排序，二是对按照首字母顺序的特征加以编号，然后打乱编号顺序再次随机排序，这就使得23个特征的排序具有了双重的随机性，以更有效地避免赋予课程以某种预先确定的逻辑

① [法]蒂费娜·萨莫瓦约：《罗兰·巴特传》，怀宇译，第26页。

②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第304页。

③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第304页。

④ [英]格雷厄姆·艾伦：《导读巴特》，杨晓文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5-132页。

意义，因为这种意义正是课程讨论的中性所要避免的。^①这并不是因为巴特无力构建一门清晰而系统的课程，而是这一连串无章法的特征用语是中性本身所要求的，无章法等于无结论，巴特借此来拒绝独断论。巴特之所以如此强调偶然性，其目的就在于消解人为制造的逻辑意义，防止意义固化进而成为“主义”或“真理”。特征排列的偶然性还会导致与之相应的片段写作，即没有连贯性、没有人为逻辑性的写作方式，《S/Z》《符号帝国》《罗兰·巴特自述》《恋人絮语》等都是采用这种文体。

当然，巴特在70年代以后的文本中自觉运用了中性手法，其目的除了反对终极意义的生成，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抵制二元对立。最为典型的文本便是1970年《S/Z》中的“雌雄同体”。“在巴特摒弃二元对立、二分法所走过的轨迹中，《S/Z》一书在萨拉辛的姓名之中和桑比内拉这个人身上通过消除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区别而完成了最后的过程……指出人们不能满足于结构性表现的二元对立的制度性结构。”^②在《S/Z》中，作品的主人公之一桑比内拉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而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阉歌手。巴特认为，在语法上，只有中性适用于阉歌手。中性在这里不取消性属，而是把两个性属结合起来，实现性别的完满性，使二者同时存在于主体，交替上场。这就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神话——“雌雄同体”(Androgynie)。“雌雄同体”，指男人身上有着女性因素，女人身上有着男性因素。对此巴特做了一个比喻：对于二元模式的、冲突性的、带有傲慢意味的姿态，即那种能引起阉割情结的笑容，中性的回答姿态是微笑(le sourire)。^③巴特认为将Sarrasine中的S与Zambinella中的Z对来起来的分割线(/)标显聚合关系，即意义，而中性是消解单一意义的基本手段。在巴特眼里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个真实：生殖意义上的二元对立被消解了，这种消解不是体现出冷漠的、无动于衷的特征，而是体现出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发出柔和光芒的、至善的特征。这里巴特将“被阉割者”“中性体”和“写作的身体”置于同一语境，把“中性”和性别联系在一起，使得“中性”在语言学层面之外又增加了一重模糊性。

五、结语

1979年2月，巴特在《法语评论》的访谈里娓娓而谈道，他从事的只是一种实验，是为了摆脱观念形态和语言的陈旧代码而发掘的新的前景，不要把中性当成一副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现成良药，不然中性本身又会变成一种说教和成见。^④的确，巴特的中性并非全面退隐和躲避矛盾，目的也不是全面否定结构主义再去创建自己新的理论架构，他的中性只是针对二元对立而去寻找的一片新的领域，是在更大范围内探讨冲破语言和观念形态束缚的方法，追求现实所无法达到的理想境界，即巴特称为的中性之“欲望”。巴特的中性是用带有个人色彩的话语取代僵硬的语言规则，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摒弃分等级、排座次的二元对立。而本维尼斯特关于陈述和话语的研究以及人称代词和极性的概念，为巴特提供了语言学上最有力的支撑。这一点值得学界关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本维尼斯特对普通语言学问题的研究，还是巴特对中性的思考，两者有一个最大的共通点，那就是以“人”为着眼点。他们思考的几个核心概念比如话语、人称、主体、身体等，贯穿其间的都是对“人”的关注：人如何将语言据为己有，人如何在语言中自立为主体，人的自我欲望如何走向“被压抑者的回归”^⑤等等。这无疑是一条在当时被成见所贬斥，但不能被时代所忽略的新思路，也是两位思想家留给后人的深远启示。

责任编辑：王法敏

① 黄晞耘：《罗兰·巴尔特“法兰西学院”课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5页。

② [法]蒂费娜·萨莫瓦约：《罗兰·巴特传》，怀宇译，第427页。

③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第312页。

④ [法]罗兰·巴尔特：《中性：法兰西学院课程讲义（1977—1978）》，张祖建译，译者前言，第3-4页。

⑤ [法]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流》下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435页。

Main Abstracts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from the Idea of the Hebbian Learning to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Yan Yan 23

Physiologist Donald Hebb proposed that the nature of learning is based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wo neurons that are active at the same time, which is known as the Hebbian synapse or the Hebbian learning rule. Hebb's idea of learning based on the 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e brain has been developed and certainly questioned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his idea brought neuroscience, biology, brain science,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 together. As a resul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in terms of dynamic topological processes has been developed. Hebb's rule of learning was also introduced into computer science to develop types of models to explain how learning happens. Researchers also advanced models from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odel to a deep Q-network model to update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It is understood that deep learning is achieved by interactions between an intelligent agent and an environment instead of only highlighting layers of the nervous system that are processing input in a hierarchical fashion. Although empirical science has shown its advantages and strong applications, and the concept of deep learning has already changed from exploring activities of neurons to illustrating interactions between an agent and its environment, it is challenged by an idea of learning in terms of engagement.

Argue Virtuously: The Virtue Approach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Liao Yanlin 32

Virtue argumentation theory (VAT) is a new type of argumentation approach based on the virtue turn that emerged from contemporary ethics and epistemology, which aims to take the character of the arguer into account, thereby reshaping the argumentative normativity. Firstly, this paper formulate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VAT as follows: the role of the virtues of arguers in argument evalu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rgumentative virtues. Moreov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the virtues of arguers in argument evaluation by the classical approach, the expansion approach and the reshape approach. Regar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rgumentative virtu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among epistemic virtues, intellectual virtues, and argumentative virtues, and assesses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argumentative virtues. As a result, the development of VAT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of the virtue turn in argumentation theory. The virtue turn of argumentation theory can provide fallacies studie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and serve as a platform for the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ogic.

From Resource Allocation to Resource Creation: Intra-Provincial Paired Assistance Under the Logic of Redistribu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Guangdong's Practice

Yue Jinglun and Wu Yonghui 44

Paired assistance is a major initiative with "originality and uniqueness" in promo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China, and also an important policy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However,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paired assistance within the province, it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Guangdong Province is a province with uneven internal regional development. Whether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Guangdong ha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paired assistance within the province. Paired assistance within Guangdong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ompleteness of the development stage an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its assistance measures. Redistribution is the fundamental basis for driving the changes in paired assistance policies within Guangdong Province. It can comprehensively presen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paired assistance within the province from three aspects: the level, content, and goals of redistribution. From a hierarchical perspective, Guangdong's paired assistance has shifted from regional redistribution to guiding urban-rural and class redistribution through regional redistribution; from a content perspective, Guangdong's paired assistance has shifted from a single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to a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systems; from a goal perspective, Guangdong's paired assistance has shifted from resource allocation to resource creation. Guided by the goal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tra-provincial paired assistance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orporate Governance: History, Emerging Fields and Future Research

Jing Fuxiu, Wang Ying and Ma Jia 72

Since the late 1970s,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become the core topic of many disciplines such as economics,

finance and management. In terms of academic thought, corporate governance has gone through five stages: originati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establishment, framework forming, framework perfect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scholars mostly adopted description method and induction method during the early research stage. Later, they regarded theoretical model method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 as the mainstream. Now, they further extend samples to unstructured text information. Finally, for future research, as technology advances and new economic and social trends emerge,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Governance (ESG), big data, blockchain and platform organization have become the latest topics in the field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in Contemporary Thinking ——Centered on JörnRüsens

Wei Peiyun and Hao Ping 123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with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teleology and the rise of narrative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linguistic turn”, historical meaning and reason have also lost authority.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meaning in modern times is accompanied by historical reason. The meta-reason is decomposed into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historical meaning becomes a process of “post-event meaning”.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hilosopher of contemporary Germany, JörnRüsens combines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with epistemological rationality in the overall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Guided by the concept of “historical culture”, JörnRüsens tries to re-examine the historical legitimacy and the ideological vitality of historical rati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of historical theory, the “historical culture” turn is a successful theoretical transformation.

The Masculinit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West ——New Directions, Methodologies and Agendas

Yang Fan 131

Since the 1980s and 1990s, masculinity studies have emerged as a field of inquiry in western academia.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some key aspects of the studies from new directions, methodologies and issues, so as to present researchers' diverse perspectives. The rise of this academic field is not just a response to feminism, nor is its focus limited to issues of gender liberation. The study makes up for traditional feminist studies that analyzed indiscriminately male identity, and revises the early discussion of “patriarchy” that focused only on institutions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 The debates around masculinities opening a new direction of men studies were deeply inspired by many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c thoughts. Most scholars believe that masculinity i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cultural basis for patriarchy to be maintained. As an analytical tool, masculinity is embedded in sociology, cultural anthropology, soci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literary criticism, and other cultural studies.

The Ukiyoe of the Water Margin and Its Art Change

Wu Xiaodan 153

“Water Margin” is the most widely spread Chinese novel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and has the most Ukiyo-e works. As a print of the common people, Ukiyo-e promotes the “Water Margin craze” from the literati to the civilian class, and also brings changes to Ukiyo-e. Sorting out the 11 picture books, more than Ukiyo-e 1600 of The Water Margin, it can be seen that Ukiyo-e on the theme of the Water Margin has developed fo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It has adopted the “copycat” technique commonly used in Japanese literature to adapt the Chinese illustration such as imitation, replacement, omission and gain. The changes brought by Ukiyo-e of the Water Margin have established the model of Uki-e painting of warrior, innovated the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shaped the heroic temperament that belongs to the value of Edo civilians. The changes of the Ukiyo-e and Water Margin as themes reflect the deep linkage between literature and art.

The Enlightenment of Benveniste's Linguistic Theory to Roland Barthes's “Neutral” Thought

Zhang Jing 170

Roland Barth's term “neutral” came from the structural linguistics, and was influenced by many linguists in its formation. At present, Ferdinand de Saussure, Viggo Brøndal, Louis Hjelmslev, A. J. Greimas and other linguists are more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but in fact, Benveniste was the biggest inspiration for Barth's “neutral” thought.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eutral”, we can find that Roland Barth's “neutral” is not a specific concept, but a vision or direction he hopes to achieve. First, he wants to realize the desire of individual freedom by replacing language with discourse; the second is to break all the binary opposition structure and eliminate the implied power. Benveniste's research on discourse and personal pronoun provides the most powerful linguistic support for Barth's “neutral” thought.